中国最美的大学

The Most Beautiful University in China

厦门大学

厦大往事

Memories of Xiamen University

朱水涌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厦大的风景

（自序）

无论你是站在宏伟的上弦场眺望大海，听燕子声声，看风帆争流，还是漫步于幽雅的芙蓉湖畔，感受椰树下绿茵上晨读的诗意，倩影对对，或者是踏着绿荫筛选的阳光走进“情人谷”，领略碧水翠峦山风，静思默想宇宙苍穹，你都会由衷地赞叹：太美了，厦门大学！当年鲁迅就这样告诉他的情人许广平：“这里背山面海，风景佳绝。”但你又分明感受到这佳绝的风景不仅仅是温馨，不仅仅是南国四季的绚丽，它还流淌着一股足于让人怦然心动的血性。像所有的名校一样，厦大有属于自己的永恒风景，这种风景与一个人的生命连在一起，厦大人亲切地称这个人为“我们的校主”。

“我们的校主”是厦大人最尊敬最有凝聚力的话语。无论在校园内校园外，也无论在故园在异水他乡，只要你是厦大人，只要你说起“我们的校主”，就会有无数无数颗赤诚的心连在一起跳动，你就不会寂寥孤单，你的心中就会升腾起一种久违的激动和力量。“我们的校主”是陈嘉庚，在天上他是一颗星，在地上他是一位拄着拐杖永远在厦大校园里行走的老人。

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刚刚踏进 20 世纪的门槛时，在海外奋斗了 20 多年的陈嘉庚，便怀着一腔家国之思，开始实现他那建立庞大教育王国的梦想。那时，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文化启蒙，实业救国，乡村建设，人们在寻找着屈辱民族走向复兴的拐点，陈嘉庚则坚信：“教育乃立国之本。”

一个有着伟大梦想而又敢为梦想泣血践行的人是足于彪炳千秋的。从 1893 年开始，陈嘉庚就把海外生意场上打拼而得的积蓄，一次次携回祖国，犹如痴绝的精卫，衔着一块块五彩

石，日日不歇地在故乡垒起了一座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专门教育的集美学村。然而他又深知道，能“使我国得以与世界各强国居同等之地位”者，还在于能创造“最新最完善之文化”的大学。1919 年，他患当时尚属致命险症的阑尾炎大病，大病中他甚至为自己立了遗嘱。但当他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时，生命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创办厦门大学。那一年，他抛离家小，托付产业，尽数带上企业红利，从新加坡回到故乡，为创办厦门大学奔走呼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嘉庚生命中这个热乎乎的胎儿，却遭到厦大筹备委员之一的蔡元培的反对，蔡元培是当时教育界一言九鼎的人物，他主张厦大“不宜速办”。但陈嘉庚是闽南人，闽南人来自中原，血脉里流淌着黄河的骨血，黄河奔流不回头；闽南人面向大海，胸中翻卷着天风海涛，天风卷起千重浪。陈嘉庚对蔡元培的回应是，“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之时”，创办厦门大学又“岂能久待”；他想望着厦大“为吾国放一异彩”，相信“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1921 年 4 月 5 日，厦门大学成立，成立大会上悬挂的是陈嘉庚亲自敲定的四个大字——自强不息。那一天，参加大会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很是感慨，他说：“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

沧波万里，精卫鸣叫，陈嘉庚说：“厦大既办，当成南方之强。”他要厦大“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建成一所“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的现代中国大学。反省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和世界从海洋开拓出来的现代道路，厦大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为了“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陈嘉庚不惜重金聘请，任国内外群贤备至，百川交汇；从“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出发，厦大继北大、清华之后建立了国学研究院。我时常想象校主当年的身份，是商人，又何来如此高远的文化境界？是教育家，又何来如此巨资创办中国南部的教育王国？倘若是两者集于一身，那它们的凝结点又在何处？

我没有找到答案，我只知道，当陈嘉庚公司濒临倒闭、现实无情地要他在建设厦门大学与拯救嘉庚公司之间作出抉择时，

他做出了“宁愿公司崩盘，不能停办厦大”和出卖大厦办厦大的壮举；当国民政府要把厦大更名为福建大学时，他将拐杖指向当时主掌教育部的陈立夫和主掌参政院的孔祥熙，他说，无故将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疑政府将步甲午故智，如台湾之放弃”，言语之重，令四座目瞪口呆，厦大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唯一没有变动过校名的名校。卖大厦办厦大的壮举，放弃的是陈嘉庚新加坡的三栋别墅，留住的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座青山；厦大更名的风波，保住的不仅仅是一个校名，更是厦大自身的生命。这是一种胆略，一种担当，它何止是商人或教育家的身份所为，而是一个民族血的蒸汽和一个伟大生命的喷薄。

厦大有芙蓉湖，湖面如镜，四季波光潋滟，绿茵碧水的温馨让人流连忘返；北大有未名湖，一水幽长，四季湖色鲜明，一塔一水的刚柔让人想到燕园的厚重。厦大人自己说，当北大的未名湖掀起历史激浪时，厦大的芙蓉湖才泛起一池春水。从民族危亡到民族振兴，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几乎都与北大学子的时代脚步相关。厦大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厦大人不像北大人那样时常会在历史运动中担当先锋的角色，但那“一池春水”下依然涌动着一股由校主传承而下的民族血性，一种已经内化于每个厦大人灵魂的敢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精神个性。正是这种精神个性的一以贯之，才使偏居东南一隅的学府，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各个风口浪尖，有着属于自己的光荣与希望。

昔日，在抗日烽火中内迁山城长汀的厦大，抒写的是“未到‘最后一课’”仍要“加紧研究学术和培养技能”的悲壮。校长拆毁自己乘坐的轿车为师生发电，师生在艰难困苦中铸就“南方之强”的辉煌，硝烟弥漫，弦诵不辍，恰恰是在烽火岁月里，厦大蝉联了全国大学生考试的两次第一，以至于国际友人十分惊讶这种战场与大学并存的奇迹，称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第一大学”。

如今，在全国高校强强联合的挑战中，厦大又敢以“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自信自立于中国高校之林；在全球化竞争潮流席卷之下，敢于敞开精神个性，坚持走精英教育之路，在国家

“211”、“985”重点建设的道路上，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创新了一个又一个先进的教学科研与办学成果，以陈嘉庚“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的豪气与血性，朝着建设世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奋然而前行。

我很想淘洗出芙蓉湖春水下那股涌动着的精神血性，是自强？是坚韧？是陈嘉庚的“不甘居人下”？但这样的概念又很难说尽一个“沛乎塞苍穹”的血肉之躯。我只记得，当年王亚南校长在福州街头遇到邋遢的陈景润，他知道这位学业优秀的厦大学子竟然不被原单位器重，便愤然把他带回厦大，然后再送往中国科学院，最终使陈景润成为摘取哥德巴赫皇冠上明珠的数学王子；我还知道，与厦大一水之隔的台湾，是由于“厦大六君子”在交通、IT、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才引发了台湾20世纪60年代经济建设起飞的大潮。厦大有一对生命科学的父女院士，两代人一生在生命最微小的细胞上耕耘不息，女儿院士对学生说：“要做学问，你就不要理睬传媒、记者。”厦大有一位人文学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座破祠里发现了一箱明清时期的民间契约，那些被尘埃封存的纸条却成了这位学者眼中的宝贝，从此他沉潜其中，在发黄的纸堆中开拓出了“俗例证史”的世界史学新路，创立了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国家重点学科；厦大还有一个拥有9位院士的化学学科团队，这个团队的奇迹不仅仅在于创造了一个个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还在于他以无形的精神和力量，影响与造就了一个国家杰出青年创新研究群体，从这一批批厦大人的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厦大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独特风景。

厦大成立时就高悬着一口大钟，90年来，风风雨雨，花开花落，这口钟发出的声音一直陪伴着厦大的成长年华。今天，很多很多大学都把古老的校园钟声换成了现代的铃声，厦大却依然敲着这口钟召唤着师生们上课下课、奋斗休息。钟声悠悠，延绵不断，苍茫浑厚中“校主”的声音在领着万千厦大人歌唱：“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

2011 年 4 月

目　录

厦大的风景(自序)

第一篇　校主建校的那些日子

一、陈氏宗祠的锣声 …… (1)
在父亲倒下的地方创业 …… (2)
在生育自己的故乡兴学 …… (8)
痴绝的精卫 …… (11)
二、创办厦大“岂能久待” …… (16)
叶渊的忧虑 …… (16)
陈嘉庚与汪精卫 …… (19)
“敢做敢担当”的闽南人 …… (23)
三、校址演武场的风雨 …… (28)
第一块奠基石 …… (28)
“演武”争夺战 …… (33)
“蛋还未孵就先数鸡” …… (35)
四、校名坚守的风波 …… (38)
从私立到国立 …… (39)
张伯苓的那次欢迎茶会 …… (42)

第二篇　校长的那些事儿

一、四个月的首任校长邓萃英 …… (49)
没有挂出的总统题匾和对联 …… (50)

不被采纳的校舍设计 …… (55)
校长与校主的那份纠葛 …… (57)
二、“止于至善”的校长林文庆 …… (60)
新加坡的“一驾马车” …… (61)
由同情康有为、跟随孙中山到执掌厦大 …… (68)
“自强不息”与“止于至善” …… (74)
建立国学院的欣喜与烦恼 …… (82)
蔡元培信中的“嘉庚鱼” …… (98)
三、烽火硝烟中的萨本栋校长 …… (102)
科学家、男傧相、运动员与大学校长 …… (103)
不到“最后一课”弦诵不辍 …… (109)
钱、小车与人:萨本栋治校二、三事 …… (119)
四、人民大学的校长王亚南 …… (126)
一生手不释卷的学者 …… (127)
《资本论》的首译者与“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作 …… (133)
人民大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 (138)
王亚南与陈景润 …… (145)

第三篇 “南强”作家的道道风景

一、厦大时期的鲁迅 …… (156)
恋爱中的鲁迅 …… (158)
“月亮诗”风波 …… (168)
鲁迅与顾颉刚 …… (172)
徘徊的寻路 …… (181)
二、林语堂的来去 …… (188)
大师的厦门情结 …… (189)
从北京到厦大 …… (194)
三、山城中的现代派施蛰存 …… (202)
“防空洞事件” …… (203)
图书馆的收获与闽山闽水的体验 …… (206)
四、烽火中的抒情诗人林庚 …… (211)

艰苦中的诗意栖息 …… (211)
学术的耕耘与收获 …… (217)
五、台湾三位文艺家的厦大生活 …… (220)
王梦鸥的厦大热血生涯 …… (221)
姚一苇的厦大起跑线 …… (226)
骑着自行车上学的余光中 …… (231)
六、多舛的命运 …… (237)
因笔名而罹难的徐元度 …… (237)
特殊身份的彭柏山 …… (240)
傲气逼人的李拓之 …… (243)
七、郑朝宗:敢有豪情继严林 …… (245)

附录　厦大文本

筹办厦门大学演讲词 …… (248)
记厦门大学开校式 …… (249)
本校五周年纪念会之演说辞 …… (253)
勗勉同学词 …… (255)
《唯力》创刊号献词 …… (257)
怎样做一个大学生 …… (259)

参考文献 …… (264)
后　记 …… (266)

校主建校的那些日子 …… (1)

一、陈氏宗祠的锣声 …… (1)
在父亲倒下的地方创业 …… (2)
在生育自己的故乡兴学 …… (8)
痴绝的精卫 …… (11)
二、创办厦大“岂能久待” …… (16)
叶渊的忧虑 …… (16)
陈嘉庚与汪精卫 …… (19)
“敢做敢担当”的闽南人 …… (23)
三、校址演武场的风雨 …… (28)
第一块奠基石 …… (28)
“演武”争夺战 …… (33)
“蛋还未孵就先数鸡” …… (35)
四、校名坚守的风波 …… (38)
从私立到国立 …… (39)
张伯苓的那次欢迎茶会 …… (42)

校长的那些事儿 …… (49)

一、四个月的首任校长邓萃英 …… (49)
没有挂出的总统题匾和对联 …… (50)
不被采纳的校舍设计 …… (55)
校长与校主的那份纠葛 …… (57)
二、“止于至善”的校长林文庆 …… (60)
新加坡的“一驾马车” …… (61)
由同情康有为、跟随孙中山到执掌厦大 …… (68)
“自强不息”与“止于至善” …… (74)
建立国学院的欣喜与烦恼 …… (81)
蔡元培信中的“嘉庚鱼” …… (98)
三、烽火硝烟中的萨本栋校长 …… (102)

科学家、男傧相、运动员与大学校长 …… (102)
不到“最后一课”弦诵不辍 …… (108)
钱、小车与人:萨本栋治校二、三事 …… (118)
四、人民大学的校长王亚南 …… (125)
一生手不释卷的学者 …… (127)
《资本论》的首译者与“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作 …… (133)
人民大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 (138)
王亚南与陈景润 …… (144)

“南强”作家的道道风景 …… (155)

一、厦大时期的鲁迅 …… (155)
恋爱中的鲁迅 …… (157)
“月亮诗”风波 …… (167)
鲁迅与顾颉刚 …… (171)
徘徊的寻路 …… (180)
二、林语堂的来去 …… (187)
大师的厦门情结 …… (188)
从北京到厦大 …… (193)
三、山城中的现代派施蛰存 …… (201)
“防空洞事件” …… (202)
图书馆的收获与闽山闽水的体验 …… (205)
四、烽火中的抒情诗人林庚 …… (210)
艰苦中的诗意栖息 …… (210)
学术的耕耘与收获 …… (216)
五、台湾三位文艺家的厦大生活 …… (219)
王梦鸥的厦大热血生涯 …… (220)
姚一苇的厦大起跑线 …… (225)
骑着自行车上学的余光中 …… (230)
六、多舛的命运 …… (236)
因笔名而罹难的徐元度 …… (236)
特殊身份的彭柏山 …… (239)

傲气逼人的李拓之 …… (242)
七、郑朝宗:敢有豪情继严林 …… (244)

厦大文本 …… (247)

筹办厦门大学演讲词

◎陈嘉庚 …… (247)

记厦门大学开校式 …… (248)

本校五周年纪念会之演说辞

◎林文庆 …… (252)

勗勉同学词

◎萨本栋 …… (254)

《唯力》创刊号献词 …… (256)

怎样做一个大学生

◎王亚南 …… (258)
一、做个人民大学的大学生是光荣的、幸运的,但很不容易
…… (258)
二、明确为谁学习,解决学习立场问题 …… (259)

三、学习什么？向谁学习？ …… (260)
四、怎样学习，学习方法问题 …… (261)

参考文献 …… (263)

后　记 …… (265)

校主建校的那些日子

“我们的校主”是厦大人最尊敬最有凝聚力的话语。无论在校园内校园外，也无论在故园在异水他乡，只要你是厦大人，只要你说起“我们的校主”，就会有无数无数颗赤诚的心连在一起跳动，你就不会寂寥孤单，你的心中就会升腾起一种久违的激动和力量。“我们的校主”是陈嘉庚，在天上他是一颗星，在地上他是一位拄着拐杖永远在厦大校园里行走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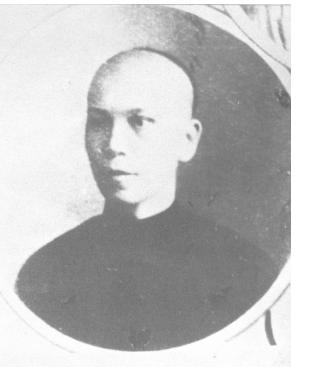
——题记

一、陈氏宗祠的锣声

1919 年 7 月 13 日下午 3 点钟，位于厦门岛上浮屿的陈氏宗祠传出一阵响亮的锣声，人们立即意识到，又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

在闽南的传统社会里，人们聚族而居，宗祠坐落于每一个乡村每一条街衢，一姓一祠，那背后隐藏的是血缘与那块土地的亲缘关系。作为中国传统家族制的具体象征与家族组织的核心，宗祠不仅是供奉祖先牌位、祭拜宗族先人的庄严之所，又是执行族规家法、举行家族盛宴、决策家族重要事项的神圣庙堂，敬宗收族，繁衍发展，一座小小的建筑物在文化中所发生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世界上是极其少见的。尚且闽南宗祠那小小的空间里，一直回响着中原文化南移的强大足音。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历经盛唐戍闽到 12 世纪宋室南迁，这 800 年间

的沧海桑田，闽南这块土地接受了数次中原大规模的移民高潮，形成了以中原族姓而居的景观，这块山海交融的土地，既流淌着中原文化的主导血脉，也活跃着因为边陲和大海造就的蓬勃的文化生命，家族文化的印记不仅滞留于本土的土地上，而且一直伴随着闽南人闯荡世界的脚步，越洋跨海走出国门，走向南洋各个国家，家族的纽带甚至比中原更为牢固紧密。在近代历史上，当漳州的月港悄然衰落下去的时候，厦门港蓦然上升为中国东南的重要港口，而成为开拓这个近代重要口岸的主要力量，则是来自厦门岛外同安的“陈、纪、吴”三大姓，三大姓割据地盘，各占码头，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宗祠，浮屿的陈氏宗祠便是厦门口岸陈姓人祭拜与议事的主要殿堂。



◎ 陈嘉庚青年像

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1919年7月的这一次陈氏宗祠集会，却远远超过了陈氏子孙繁衍天演的范畴，发起这场集会的陈姓人，他要宣告和讨论的是一件关乎八闽前途与中华民族图存的大事，聚集在陈氏宗祠的人，则是厦门的官绅商学各界人士。当时又有谁会想到，东南海隅这座小小祠堂传出来的声音，后来竟写就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辉煌一笔。

这个发起人就是陈嘉庚。

在父亲倒下的地方创业

公元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生于集美一座闽南普通民居里。集美早年是一个小渔村，属福建省同安县管辖，这个渔村是个半岛，三面环海，位于浔江出海口。传说中集美半岛就是一条龙的龙头，龙头伸向浩瀚的大海，两侧的鳌头屿和宝珠岛便是这龙的眼睛。陈嘉庚出生的那一年是清同治十三年，日本进犯借琉球船民事件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派军进犯台

湾，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赔偿白银五十万两，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地。生于祖国内忧外患历史中而又落地于“龙头”的陈嘉庚，后来自然会给以龙为图腾的华夏子孙们带来很多的惊奇和想象。

从出生到16岁那年，陈嘉庚一直生活在故乡的土地上。少年陈嘉庚与伙伴们一起讨小海，一起参加田野和滩涂上的劳动。9岁那年，他走进南轩私塾，跟一个叫陈寅的老先生读《三字经》和《四书》之类的古书。陈嘉庚后来在《南侨回忆录》中写到：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塾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义，就学虽多，识字却甚少。私塾的旧式教育给少年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以当他后来决意在家乡兴办学校时，他提出要选择学贯中西的教师，要设立学以致用的课程。

◎陈嘉庚的诞生地——集美颖川世泽堂

和当年的闽南华侨家庭一样，陈嘉庚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和母亲孙氏的抚育下度过的，他在母亲身上，吸取的不仅是闽南女性的柔肠慈爱，而且还有那“金钱如粪土，撒播才有用”的侠胆大度。10岁那年，也就是1884年（清光绪十年），福建发生

了一场重大的战争。那年 8 月，法国军队的战舰突袭了福州马尾港，把晚清政府辛苦建造起来的福建水师打得七零八落。马尾海战引起全国的震惊，也深深地刺激了这位已经懂事的男孩的心灵。后来，陈嘉庚亲笔记下了这样一份《帝国主义侵华年表》：

一八四零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来攻海口。

一八四二年与英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及赔款英国。

一八六零年俄又因调停英法事，复迫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割台湾及赔款。

一八九五年德国因山东曹州教士案，占胶州湾及山东铁路权，并许可开采各矿产。

……

这是陈嘉庚心里的一笔账，是他心灵里一份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是华夏子民一份痛苦的历史记忆。正是这份耻辱的记忆，催促着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在挣脱耻辱、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前仆后继，奋斗不已，有像谭嗣同等六君子那样为了改变封建政体而血染都门者，有像孙中山那般高举共和旗帜、虽屡战屡败却依然屡败屡战奋斗不止的革命者，有人倡导实业救国，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有人高呼科学救国，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则举起思想启蒙的大旗，从开辟新文化、拯救人的灵魂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呼唤。陈嘉庚原本是向往着实业、教育并举的救国之道，他想望着办“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但后来则坚定地走向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道路。他说：“振兴工商业的主要目的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在提倡教育。”由此抱定了“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不死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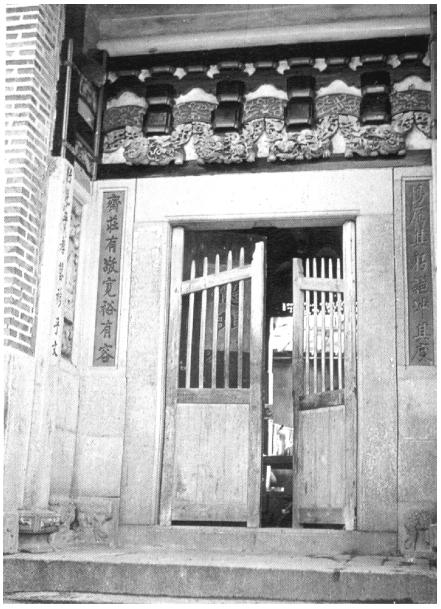
1890 年，16 岁的陈嘉庚遵照父亲陈杞柏的意愿，从厦门太古码头登上“美丰号”轮船，离开故乡，前往新加坡学习经商。这一年，从厦门口岸出洋的中国人多达 7 万人，其中大多是闽

南人。闽地属丘陵地带，平原甚少，闽南沿海的土地更是缺乏和贫瘠，淡水资源相当稀缺，在以农业作为人的生存最主要方式的农耕文明时代，闽南人虽然还以捕鱼和滩涂养殖支撑着自己的生活，生存还是极其的艰难困苦。陈嘉庚就亲眼见过家乡的一次惨景。那一年，闽南发生大旱灾，农田颗粒难收，而且灾情还带来了瘟疫流行。集美村陈氏宗族30余家100多口人，有一半人被活活地夺走了生命。正是如此艰苦的生存环境，逼迫着生活于大海边的闽南人向外开拓自己的生活世界，从16世纪开始，闽南人就漂洋过海前往南洋各地闯荡，在异国他乡谋求新的生存和发展。晚清以来，集美陈姓族人就有不少人背井离乡，踏上异国的土地。陈嘉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陈杞柏已远在南洋的新加坡，经营着米店和黄梨厂等生意，是陈家到新加坡创业的第一代人。

扼守着马六甲海峡咽喉的新加坡，由于“大英帝国缔造者之一”的莱佛士的发现，19世纪便开始飘起“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那时华人就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的60%以上，街上跑着上海造的人力拉车，走着身穿长衫马褂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陈嘉庚刚到新加坡时，父亲把他安排在吊桥头21号的顺安号米店，协助族叔经营、记账。后来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里回忆起这段日子，他说自己在顺安米店“守职勤俭，未尝妄费一文钱”，“终日仆仆于事业”，未曾让父亲生气过。

三年后，即1893年，20岁的陈嘉庚奉母亲之命，从南洋回集美完婚，娶板桥乡秀才之女张宝果为正室。这次返乡，他在家乡集美住了一年多，临别时，他拿出2000元，为集美社办了一所“惕斋学塾”，“惕斋学塾”兴办时正值甲午海战爆发，原本比日本强大得多的清政府北洋水师，却在甲午海战中被迅速壮大起来的日本海军打败了，于是，陈嘉庚将自己出资兴办的第一所学堂取名为“惕斋”，意在警醒父老乡亲不要忘了甲午战争的教训。这是陈嘉庚在家乡兴资办学的开端。

结婚后的陈嘉庚开始担当起陈家家业的重任，那几年，他几度往返于厦门与新加坡，在厦门购置陈家房产，料理母亲的丧事，又亲眼看到沦为万国租界的鼓浪屿上万国旗帜飘拂，厦



◎1894年陈嘉庚在集美创办的第一所学堂“惕斋”学堂

门港洋兵洋舰横行。在那个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年代，每一个丧权辱国事件的发生，每一寸华夏土地的丧失，都会是插在生活于海外的中国人心头的一把刀，尚且是国难往往就连着家祸。1903 年 7 月，陈嘉庚第四次从集美返回新加坡，此时他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利债苛刻、房产跌价、家中族叔染病、家庭中有人舞弊，父亲的产业连遭不幸，米店和黄梨厂等生意已亏欠了 20 多万元。第二年，父亲陈杞柏在万般无奈中宣告破产，陈家数十年的艰辛一时化为乌有。

家业的瞬间崩溃，对刚刚踏上而立之年的陈嘉庚自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毕竟是条闽南汉子，他决意要在父亲倒下去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1904 年，陈嘉庚与人合伙买下父亲的日新黄梨厂，后又自己建立了新利川黄梨厂，开始自立门户撑起一片实业天地。1906 年，陈嘉庚 32 岁，他遇到一个叫黎特利的英国人，得知橡胶业有发展前途，便用 1800 元向一个叫陈齐贤的商人手里买下 1.8 万粒橡胶种子，种在自己的福山黄梨园中，

首次进入橡胶业，这 1.8 万粒种子，后来就成了陈嘉庚建立起庞大橡胶产业的先驱。1908 年，陈嘉庚还清了父亲的巨额债务，以“守信如潮”的声誉，赢得了新加坡商界的尊重与拥戴。到 1925 年，陈嘉庚已拥有 1.5 万英亩的橡胶，开办了系列橡胶制品厂，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了英国垄断资本在橡胶业的垄断局面，成为当时无人不知的“南洋橡胶大王”，与此同时，罐头生产、船舶运输、米厂食品业也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形成了“守信”、“诚毅”的企业精神，信誉日著，事业日兴。

就在陈嘉庚进入橡胶业的那一年，孙中山领导的第 8 次起义失败，他从法国到日本，途经新加坡，6 月，又从日本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选厦门人陈楚楠为会长，创办了《中兴日报》宣传革命。1909 年，经林义顺介绍，35 岁的陈嘉庚认识了孙中山。孙中山屡败屡战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需努力”的精神，在这位正在寻找救国之路、自信自强的华侨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910 年春天，陈嘉庚和胞弟陈敬贤同时剪掉长辫，一起加入同盟会，他宣布将自己产品的商标全部改为钟牌，借以向世人敲响革命警世钟，并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签名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有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人处罚。”陈嘉庚后来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清末国势衰弱，余深感弱国之痛苦，总理倡

◎孙中山与新加坡早期同盟会会员合影

导同盟会作推翻专制之运动，余遂参加焉。”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无论是为孙中山的考察捐资万元旅费，为支持福建光复出任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之职，还是为孙中山出任大总统赠送数万元办公经费，陈嘉庚一直在以他的财力和在南洋的声望，不遗余力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他所建立的革命政权。后来，人们在概括这段历史的时候经常会说：“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打仗，福建人出钱。”孙中山先生也不无感慨地称道：“华侨是革命之母。”

在生育自己的故乡兴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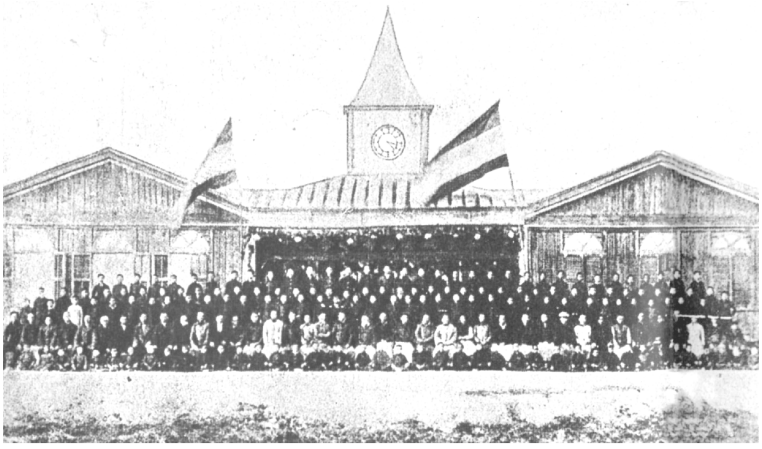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成功后，陈嘉庚满怀胜利的喜悦。他说：“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国民一份子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和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厂。”1912 年金秋时节，陈嘉庚带着家眷和价值7000元的机器设备，踏上回乡之路，他要在家乡办两件事：兴办工厂，创办学校，实现自己实业、教育两者兼而有之的救国抱负。这年冬天，陈嘉庚在集美创办了制蚝罐头厂，但由于技术不过关，制蚝罐头的试制很快就失败了。实业救国之志难酬，陈嘉庚干脆就抛弃了在家乡办企业的念头，而将整个的心思和气力放到兴学救国上，他这样写道：“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抑或有重光之一日。”①

这位身居英属新加坡的中国人，曾经苦苦地思索过西方富强的原因，对东西方几个国家的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比较。他说：英美法德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 10 人，日本百人中不满 20 人，而中国百人中则有 90 多人不识字，这样的中国人在世界竞争中未免要遭受天演的淘汰。为了免遭天演的淘汰，他决意要在故乡的土地上演一出教育兴国的大剧。

当年集美没有任何的小学，有的只是各角房各家族邀集家

① 新加坡《国民日报》1918 年 6 月 18 日。

族成员办的私塾，儿童十几岁还在家中或滩涂上裸体游戏，按陈嘉庚的说法是“儿童裸体成群，或游戏，或博赌”，“如不改善，十数年后，岂不变为蛮野村落者”；[①]而且各个家族之间往往为了争夺田间灌溉的水源和海域、滩涂发生争执与械斗，将同一个村庄的孩子卷进不同家族的纠葛与仇恨中。这一天，陈嘉庚把各角房各家族的老大召集到集美大社祖祠，劝各房乡亲停办私塾，抛弃宗族间的成见，联合筹办集美小学，学校经费则由他一人独资承担。在如此慷慨如此心系桑梓的还乡人面前，集美的各角房老大都服帖了。1913 年 1 月 27 日，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借村中的几座宗祠同时开学，开学后，陈嘉庚便买下了数十亩渔塘，填土造地，建成了以木质平屋为主体的新校舍，秋天，学生们就告别祠堂搬进了新校舍。在《集美小学记》中，陈嘉庚亲笔写下了他创校的初衷：“概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哄斗，以为改造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



◎集美小学师生在第一座新校舍合影

这一年的 9 月，在集美小学搬进新校舍之后，陈嘉庚再度返回新加坡，发展他在南洋的实业，他清楚自己既然选择了振兴教育以救国的道路，也就必须赚大把大把的钱，花大把大把的钱。

① 陈嘉庚：《谈闽省教育》，载《南洋商报》1933 年 8 月 14 日。

1914 年 8 月，也就是陈嘉庚返回新加坡的第二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向英国宣战。在印度洋上，德国的 EMD-EN 巡洋舰击沉了几十艘东南亚的商船，海路被阻隔了，南洋华侨的实业因此一片萧条，陈嘉庚工厂制造的菠萝、黄梨罐头等产品严重滞销，企业全面衰退。战火毁坏了原有的经济秩序，但也会给杰出精明的企业家、商人带来机遇，此时的陈嘉庚审时度势，及时改变经营战略。他抓住战争打乱原有航运格局的时机，将自己的产业向国际航运业务拓展。1915 年，他租下“万通”、“万达”两艘货轮，开始在新加坡、印度和波斯湾的大海中来回穿梭，从事稻米、木材的海上运输。1916 年，他改租船为买船，以 30 万元购置了载重 3000 吨的“东丰”号货轮，第二年，又以 42 万元买下了载重 3750 吨的“谦泰”号货轮，将两艘船都租给法国政府，每船每月收取费用 12 万元，同时将因战争罐头滞销而积压下来的白铁片高价出售。之后，他又根据经济局势的变化，将罐头厂改为橡胶厂，将稻米加工厂改为橡胶制品厂，产品直接销往美国，谋取高额利润。战争不仅没有把陈嘉庚的企业冲垮，反而让陈嘉庚的企业更加壮大起来。经济壮大，办学有了更坚强的后盾，陈嘉庚在家乡的办学举动便一发不可收了。

1916 年 10 月，陈嘉庚派胞弟陈敬贤回到集美，开始了大规模的学校建设。

1917 年，集美女子小学开学；1918 年，集美这块原本贫瘠的土地上，骤然出现了一片红砖绿瓦、中西合璧的建筑群，集美学校的大礼堂，“居仁”、“立功”、“尚勇”等教学楼群建成，供学校用的电灯厂、自来水塔、餐厅、浴室、大操场等公共设施也相继建好，集美师范学校和集美中学成立并开始上课。之后，陈嘉庚又创办了集美幼稚园、集美水产科、商科、农林部、国专部，增办了集美女子师范、集美幼稚师范。与此同时，集美医院、集美图书馆、集美学校储蓄银行、科学馆、体育馆、军乐亭、植物园也先后设立。由此，在东南之滨的浔江出海口，一个美丽的以现代教育为宗旨的学村出现了。在集美学村学习的孩子们，享有校方免费供给的日常用品和统一制服，不用缴交学宿费，师范生还免交膳食费。他们来自闽南一带，也来自东南亚各国，

在陈嘉庚的心里，集美学校不仅是故乡孩子们学习成长的家园，同时也是“海外侨生的摇篮”。在现代教育刚刚兴起的中国大地上，当年集美学村内的学校，其教育设施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内同类学校，那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电令福建、广东省长，请令两省统兵长官，辟“集美为永久和平学村”，那时很有影响的《社会与教育》杂志，称集美学校“是世界上最优良、最富活力的学校”。

痴绝的精卫

一个有着伟大梦想而又敢为梦想泣血践行的人是足以彪炳千秋的。完成集美学校由幼儿教育到中学、专门教育的一整套体系后，陈嘉庚教育兴国的脚步并没有就此打住，他想办大学了，这位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凭着他十几年在英殖民地的观察和打拼于世界市场的经验，已经很清醒地看到：“今天之世界，乃科学强盛之世界。”他说，“科学建设为建国首要之图”，科学要发展，有赖于专门学，“有了专门大学之设立，即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挈业”。[①] 于是，当一战的硝烟即将散去的时候，中国南方一所大学的蓝图开始在陈嘉庚的心里被勾勒着，在这位闽南汉子的胸襟中，梦想着在自己的故乡东南之滨建立一个现代教育的王国。

此时在中国的北方，也有一位像陈嘉庚一样的中国人，在他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创办了南开小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后，正在积极地筹办南开大学，这个人叫张伯苓。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张伯苓从美国回到天津开始筹募资金创办南开大学的 1918 年，也就是一次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陈嘉庚的“东丰”和“谦泰”两条轮船终究没能逃过战争的厄难，在地中海被德国的潜水艇击沉，为陈嘉庚赢得很大利润的航运业被迫终止。灾祸并不单行，5 月，陈嘉庚在新加坡病倒，患的是阑尾炎，这个今天看来很普通的病症在当时却属于致命的险

① 陈嘉庚：《本报开幕之宣言》，载《南洋商报》1923 年 9 月 6 日。

症。生死关头，陈嘉庚请来了律师和至交，立下遗嘱，将他所拥有的店屋、地产和树胶园共值 200 万元，全数拨给集美学校为永久基业，以保证在他死后集美学校依然能继续发展。病中的陈嘉庚两眼望着天空，眼睛里饱含着遗憾与惆怅，想到心中一个更加宏伟的教育蓝图就要成为泡影，心里又会是什么滋味？

但天也常常有不负有心人的时候，或许是壮志未酬身不死的意志支撑，几个月后，陈嘉庚终于战胜死神再次站立起来，陈嘉庚命硬，病魔无法夺走这个中华赤子的顽强生命。再次站立起来的陈嘉庚将家底一盘查，发现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4 年，自己的资产已经增加到 400 万元，这个家底让他很振奋，他又有了圆梦的资本，于是决意倾资兴办厦门大学。

20 世纪初正是中国千年未经之大变局时期，一方面是共和失败，袁世凯窃权称帝，接着是张勋的 12 天复辟，之后段祺瑞执政实行军阀黑暗统治，内政是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外政上是日本企图独霸中国，出兵攻占山东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威逼袁世凯秘密协议“附庸国二十一条”；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新思潮新思想涌进中国，社会涌动着救亡图存的呐喊和现代中国的焦虑想象。内忧外患，民族危亡，救亡呼声骤起，就如陈嘉庚所言：“吾国今处在列强腋肘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1918 年 11 月，一战结束，1919 年 1 月，美、英、法、日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向“和会”要求取消“附庸国二十一条”，收回山东被日本夺去的权利，提出各帝国放弃在华特权。但这一主权要求竟遭到美、英、日、意等国家的拒绝，“和会”所制定的《凡尔赛和约》明文规定了日本夺得山东的权益，妄图使日本的侵占合法化。愤恨与忧患中，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东方雄师觉醒了。

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 1919 年 5 月，陈嘉庚决定回国实现自己创办大学的梦想。这次回国办学，陈嘉庚自己预计要用四五年乃至五六年的时间，便将南洋的实业交给胞弟陈敬贤和公司经理李光前管理，并特地将公司的高层、中层职员召集一起，设宴与同仁告别。临别宴会设在陈嘉庚的新加坡恒米厂，餐桌有

意摆成一个“中”字，吃的是中国菜，饮的是中国酒，陈嘉庚特别向同仁表明宴会摆设与美食的用意是“愿诸君勿忘中国，克勤克俭，期竟大功”。宴会上，陈嘉庚宣布他将长住中国，竭力兴学，望诸君“一心协力进行”，他郑重宣布：“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①

1919 年 5 月下旬，陈嘉庚回到故乡集美，此次回国，他只有一个目的一条路要走，这就是创办厦门大学。7 月上旬，他在《东方杂志》第 16 卷第 12 号上向社会发出了《筹办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在通告里，陈嘉庚向人们诉说了自己的衷肠：“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而今日之中国，“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学识，不足以躐等而达”。一个海外赤子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作为一个生于闽地长于闽地的闽南人，陈嘉庚特别强调：“吾闽僻处海隅，地瘠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良以远方留学，则费用维艰，而政府难期，长此以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正是为了祖国的制度、教育、实业的“各臻完善”，为了故乡儿女们的“自由幸福”，陈嘉庚回来了，回来报效故乡的养育之恩，回来尽一个国民的天职，回来点燃一个贫弱民族的儿孙们的希望。在通告中，陈嘉庚向社会宣布：“谨订七月十三日下午三点钟假座浮屿陈氏宗祠，开特别大会，报告筹办详情。”

1919 年 7 月 13 日正是闽南天气入夏的时节，天高云白，虽为夏日，却因为海风阵阵，天气并不闷热。下午 3 点钟，伴随着陈氏宗祠响亮的锣声，居住在厦门这个通商口岸的各界人士在一个海外来客的感召下，来到了原本只是陈氏族人聚集的宗祠内。在这些各界人士中，有两个黄姓的先生坐在一起，一个是来自江苏的黄炎培，一个是来自印尼爪哇岛的华侨商人黄奕住。

黄炎培是著名教育家，1878 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字任之，清

① 《愿诸君勿忘中国——1919 年 5 月离星归国前在恒美厂宴请同人时演讲》，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末举人，在中华民族振兴的现代道路上，他是一个史册上的人物。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封建帝制统治的革命。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江苏省议会议员，也参加了讨伐袁世凯运动。但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社会沉疴依旧，黑暗如故，他深感自己投身的革命难以改变社会的面貌，转而办校兴学，走教育救国之路。1903 年开办川沙小学，1906 年创办浦东中学，1915 年赴美考察，并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回国后于 1917 年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张“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提倡手脑并用，实践育人。他与陈嘉庚志同道合，1917 年夏天两人在新加坡认识后便成为知己，在兴学救国的道路上相互支持不已。此次他便是特地从江苏来厦门支持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就在这次的厦门之行的归途中，他写下了《陈嘉庚兴学记》，分别发表在当年的《教育杂志》和《东方杂志》上，让身处内忧外患的中国人，看到东海之滨透露出来的科学与知识的曙光。

黄奕住是个在鼓浪屿有着 160 栋楼房的大商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868 年黄奕住生于福建南安金淘村，少年时代的黄奕住是个挑着“一热一冷”的剃头担子走村串巷的剃头（理发）小师傅。1885 年，春天的风将这个闽南少年吹到新加坡，在异邦的码头上为华工理发，人们用家乡话叫他“剃头住”。1888 年，相信“888”即“发发发”的闽南人“剃头住”，将剃刀和整担子的理发工具抛向太平洋，发誓不再做剃头匠，从新加坡转往印尼爪哇岛，改行挑起货郎担，摇起货郎鼓，由挑担买卖开始了一个闽南人在海外的创业。期间，他摆摊卖咖啡，创立“日兴杂货店”，后来货店壮大成“日兴商行”，主营蔗糖买卖，兼营进出口贸易，接着，商行又发展成股份公司，建造起“日兴商业大楼”，到 1917 年，黄奕住的资本已经扩大到 1500 万盾，成为印尼的四大糖王之一。1919 年 4 月 5 日，黄奕住在印尼拒绝加入荷兰籍、日本籍，携 2800 万美元回到故乡，定居鼓浪屿，并在上海创设中南银行，发展金融业，在上海、广州、天津、厦门等地投资铁路、汽车、纺织、矿产、水泥、自来水、电话等产业，成为遐迩闻

名的华侨富商。无论是在南洋还是回到闽南，黄奕住在陈嘉庚实业和兴学的生涯中，都给过陈嘉庚不少的支撑。

宗祠锣声响过之后，召集此次集会的陈嘉庚走到了列宗列祖的牌位前，用闽南话开始了他的慷慨陈词："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要兴教育，振奋"未死之民心"，则希望"内地诸君及海外侨胞，负国民之责任，同舟共济，见义勇为"，为创办厦门大学捐资"立集"。他说，"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认捐十分之二三或十分之三四，则亦无损于富"。面对着各界人士，陈嘉庚将我国不识字者与欧美先进国家、日本等国不识字者的人数作了比较，阐述了教育不兴则国遭淘汰的现实，他无不伤感地感叹道："嗟嗟！我国不竞，强邻生心，而最痛巨创心者，尤莫我闽若也。"[①]这样的感伤既是陈嘉庚内心的痛，也是他深藏于内心的隐忧焦虑的一种透露。

陈嘉庚实际上很清楚，创办厦门大学的路并不好走，要有人跟着他无悔地前行是很难的。他曾写信给当时集美学校的校长叶渊吐露过自己的苦衷，他说："厦中人士虽多，无论才、财，弟度能举为帮手者，未有其人。"[②]但陈嘉庚毕竟是个血性汉子，他生命中一以贯之的那份力量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让他一旦选择好一条道路，他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他在陈氏祠堂里依然是拳掌一握，振臂一挥，呼吁各方"抱定宗旨，毅力进行"。他说："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生；能断我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居人之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有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③]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神州舜尧，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血液就这样延绵不断地流淌在国人的血脉中，而当这样的血液注入海外赤子

①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讲词》，《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陈嘉庚 1920 年 6 月 2 日致叶渊函。

③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讲词》，《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的躯体里，则黄河血脉的慷而慨中便又增添了一份宽广浩瀚的情怀。陈嘉庚就犹如那痴绝的精卫，衔着一块块五彩石，垒就了一座座教育的殿堂。

◎陈嘉庚演讲照片

陈嘉庚的演讲感染了全场的听众，黄炎培情不自禁地碰碰身边的黄奕住问："听了陈先生的话有何感想？"黄奕住用手指指自己的心，答道："听陈兄之词，不支持他兴办厦门大学，就不是人！"这一天，陈嘉庚当场宣布他认捐100万元洋银作为厦大的筹办费用，另有经常费用300万元洋银，分12年付完，总捐资为400万元洋银。1919年的400万元洋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年陈嘉庚全部实有资产也就只有这个数字。

二、创办厦大"岂能久待"

叶渊的忧虑

1920年6月的一天，集美学校校长办公室内，校长叶渊急切地拆开陈嘉庚给他的第九封信，此时，距离厦门大学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召开的日期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备委员之一、又具体负责联络各筹备委员的叶渊忧心忡忡，他需要马上清楚陈嘉庚对蔡元培和蒋梦麟提出的问题的态度。

叶渊，号采真，福建安溪人，北京大学法科毕业的法学士，1920年5月应陈嘉庚之聘，任集美学校校长，总管集美学村的各类学校。前些时候，叶渊接到母校蒋梦麟校长襄赞的信，信中说蔡元培先生和自己都认为"厦大不宜速办"，原由是存在着

经费不能持续、教师欠缺等问题，并让叶渊“力劝”陈嘉庚放弃创办厦大。

蔡元培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这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1912 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后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同年 7 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毅然退出内阁。1917 年执掌北京大学，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民主管理和教授治校，成就了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地和中心，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威望，是当时文化界教育界一言九鼎的人物。蒋梦麟是位留美的哲学博士，1917 年回国后努力鼓吹现代新教育，1919 年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并襄赞蔡元培管理校政，继蔡元培之后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这样两位大人物的反对声音中，叶渊尽管是个被陈嘉庚称为“胸已成竹”的“博学才士”，也不免会乱了方寸，他赶忙将这个情况告知了陈嘉庚。陈嘉庚得知情况后“闷闷不乐”，在给叶渊的回信中，他很不客气地写道：“今蔡、蒋二君之忠告，实未代我等计及长短也。”[①]他要叶渊在“厦大进行之事”上，“锐意进行，千勿客气”。[②] 第二天，他又追加一函给叶渊，勉励叶渊不要因“蔡意而灰心”，陈嘉庚担心蔡元培的意见会影响了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们的情绪。

原来，陈氏宗祠的锣声响过之后，陈嘉庚一面呈文请求政府划拨厦大用地，一面聘任文化界教育界名流组织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准备在上海召开厦门大学筹备会议，以通过上海这个开放口岸，让全国以及世界知道东南海隅将建立一座“不居人下”的现代大学。在陈嘉庚聘任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中，第一位自然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第二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黄炎培，第三位是当时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才华横溢的汪精卫。其他委员中，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当时郭秉文正在南师的基础上积极筹办国立东南大学，有全国青年总干事余日章、私立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私立上海大同大学校长

① 陈嘉庚 1920 年 6 月 27 日致叶渊函。

② 陈嘉庚 1920 年 6 月 14 日致叶渊函。

◎北京大学校长、
厦大筹备委员蔡元培

◎江苏教育协会会长、
厦大筹备委员黄炎培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厦大筹备委员郭秉文

◎全国青年总干事、
厦大筹备委员余日章

◎私立上海复旦大学校长、
厦大筹备委员李登辉

◎私立上海大同大学校长、
厦大筹备委员胡敦复

胡敦复，以及刚从美国修业回国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邓萃英，本土的委员则是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和当时厦门的教育局长（时为福建省思明县教育局局长）、福建省立第十三中学（即厦门省立中学）校长黄琬。本土的两位委员中，叶渊是陈嘉庚很信任的人，陈嘉庚认为他“沉毅镇静，心中多妙，引为同志，实属难得”，所以让他负责厦大筹备委员会的联络工作。而对于黄琬，陈嘉庚则颇有微词，在对他的做事作过数次检验后，陈嘉庚写信告诉叶渊此人做事“颇轻率阔大，将来若用为厦大重要人

员关系非轻”，[1]因而只让他作为本土教育界代表参与筹备，并不委以要务。后来创办厦大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证明了陈嘉庚的这个看法，这是后话。那时陈嘉庚最看重的人是汪精卫，他不仅聘汪精卫为厦大筹备委员，还请汪精卫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对于这个后来成为卖国贼、被陈嘉庚所严厉声讨的天字第一号大汉奸，当初为何会得到陈嘉庚如此赏识呢？这还得从陈嘉庚所认识的汪精卫谈起。

陈嘉庚与汪精卫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绍兴，1883 年生于广东番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他是孙中山革命的左右臂，是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他与周恩来、张学良和梅兰芳被国人称为民国四大美男子，而使他名声大振者，则是 1910 年的刺杀清朝摄政王行动，这是民国时期震动全国的一件大事，那年汪精卫 25 岁。陈嘉庚认识汪精卫，就在这个刺杀事件的前两年即 1908 年，那一年，孙中山的革命走到了极其艰难的阶段，从 1895 年到 1908 年，孙中山连续发动的广州起义、三洲田起义、黄冈起义、士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廉州起义和河口起义等 8 次起义相继失败，起义给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一浪又一浪的冲击，但也给革命带来了重创，一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屡战屡败中革命士气开始低落。此时，维新派趁机冷嘲热讽，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嘲讽孙中山是“远距离革命家”，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则好端端地活在国外“高享高枕华屋”，一时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不料同盟会内部也闹起矛盾，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章炳麟指斥孙中山贪污，在同盟会掀起一场“倒孙狂潮”。“倒孙狂潮”的起因在 1907 年，这一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出境前他接受了日本朋友的 2 万多日元赠款，除了给《民报》留下2000日元外，其余的赠款他全数带回中国，用以

① 陈嘉庚 1920 年 11 月 23 日致叶渊函。

购买武器和作为活动费用，但他没有将这笔钱向同仁公布，于是就有了章炳麟和《民报》的发难。就在这多灾多难的1908年，汪精卫以同盟会总部评议会会长的身份来到新加坡，参加了支持孙中山的《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的论战。论战中，汪精卫犀利的笔致和豪气动人的演讲倾倒了许多侨胞，马来西亚华侨陈耕基的女儿、辛亥革命后成为汪精卫终身伴侣的陈璧君就是其中的一位。

陈嘉庚也就是在这时认识了汪精卫，他为孙中山身边有这样一位政治干才和文士才子而欣喜，他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慷慨之气和号召力。但那时的汪精卫则忧心如焚，他一边毫不犹豫地站在孙中山一边，撰写文章，参加辩论，一边就想北上进京干一票大的，“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粉碎所谓“远距离革命家”的谎言。1910年，也就是陈嘉庚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那一年，汪精卫不顾孙中山和胡汉民的反对，带着“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意志北上行刺，女侠式的陈璧君也不顾汪精卫等人的一切劝告毅然相随，与汪精卫一同前往行刺的还有热血男儿四川籍的黄复生，懂得制造炸弹的喻培伦。刺杀的目标是摄政王、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刺杀行动败露，汪精卫、黄复生入狱，身在纽约的孙中山得知消息后大为痛心，他说：“兆铭是我们的大人才啊，失去他无疑砍我一条手臂。”汪精卫身陷牢狱后却视死如归，以痴绝的衔石精卫自喻，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慷慨篇》，全诗共16句，其中“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两句在当年曾为万众吟诵，产生深广的影响。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11月6日，汪精卫、黄复生重获自由，北京各界千余人涌到法部大狱门前迎接汪、黄出狱。汪精卫出狱后实践了他自己“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作议员，功成名退”的诺言，与陈璧君举行婚礼后，返回他8年没有回过的故乡，并拒绝了袁世凯让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委任，于1912年9月携陈璧君前往法国留学。但事与愿违，汪精卫的命运似乎注定要被卷进政治的漩涡。1912年8月，孙中山成立国民党，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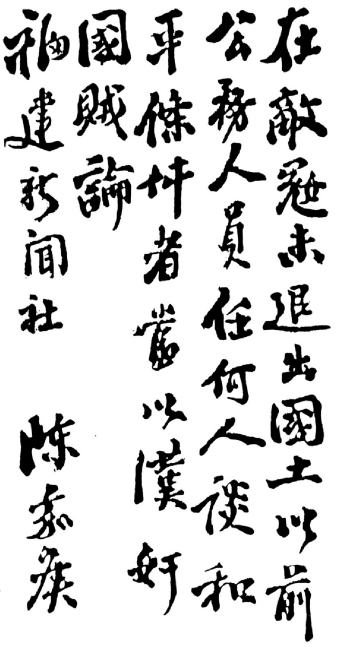
暗杀，南方各省亮出反袁旗帜，起兵讨袁，开始“二次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将汪精卫从法国紧急召回，参加讨袁运动。1913 年 9 月 1 日，南京陷落，讨袁失败，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汪精卫则逃到他留学的法国。1915 年 12 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复辟帝制。神州大地掀起新一轮讨袁运动，汪精卫再次被孙中山急召回国，加入讨袁救国军。1916 年 3 月，袁世凯在讨伐声中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于 6 月 6 日急病而死。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是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于 1917 年在“再造共和”的幌子下废止 1913 年选出的国会，孙中山在上海展开护法运动，史上称“三次革命”。护法运动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出任军政府大元帅，执著北伐。但军政府逐渐由桂系、滇系军阀控制，孙中山的政令无法走出元帅府，1918 年，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就是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兴办了集美学校，汪精卫也一度在做办学的事，他与陈独秀、李石曾遵照大元帅孙中山的意思，利用军政府从总税务司和公使团争取到的 13.7％关余，筹办西南大学。

1919 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再度回到厦门筹备厦门大学，汪精卫一样也在为筹办另一所大学——西南大学忙碌着，但他更赞赏陈嘉庚的办学举动，他答应了陈嘉庚的邀请，同意参加厦门大学的筹备并出任厦大校长。但孙中山辞去军政府大元帅之后便离开广州到了上海，1920 年 3 月，公使团向军政府停发关余，军政府负责保管关余的伍廷芳也携款到上海，将关余款项存入上海汇丰银行，西南大学的开办眼看就成泡影，汪精卫只得凭着自己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站出来进行调停，争取西南大学的经费照常划拨。他告诉陈嘉庚，关余的事情一解决，他便举家“来厦居住，一可静养精神兼研究学问，一可帮助厦大之事”[①]，并且让夫人陈璧君先行到了厦门，住在黄奕住的鼓浪屿观海别墅，与陈嘉庚商议相关事宜。

西南大学的关余最终得以解决，公使团停拨案被注销，解

① 陈嘉庚 1920 年 6 月 14 日致叶渊函。

决完西南大学的开办经费后，汪精卫守信地来到福建，他先到漳州访问了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后抵达厦门，参观了方兴未艾的集美学校，然后与陈嘉庚一起察看了厦大的选址演武场。一切是那么的称心如意，汪精卫就任厦大校长似乎已经是万事俱备，只等厦大一成立便走马上任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时局再一次发生了变化，1920 年 8 月，陈炯明带领闽粤军从漳州挥师讨伐桂系、滇系军阀，击退了盘踞广州的桂、滇军队，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取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汪精卫再次陷入繁忙的政务中，他无奈地写信向陈嘉庚请辞了厦大校长的职务，这位中国现代政坛上的人物，终究没有离开政坛的翻滚沉浮。1938 年，在中国军民进行“焦土抗战”、“全面抗战”与“长期抗战”的血火之中，汪精卫抛出了所谓的“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的论调，大谈“和平条件”。陈嘉庚三次电文忠告汪精卫“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力劝汪不要“淆乱视听”、“一言丧邦”，并且毫不留情地指斥汪的行为是“秦桧阴谋，张昭降计”。汪精卫给陈嘉庚复电申述自己是“主张以和平解决纠纷”，希望侨胞不要“误解”，但陈嘉庚则表示了国人与侨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战决心，告诉汪不仅南侨对其言行“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①] 于是，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陈嘉庚提出了震惊时局的电



◎陈嘉庚的电报提案

① 《汪精卫复电》，载《南洋商报》1938 年 10 月 26 日；陈嘉庚：《再忠告汪精卫》，载《南洋商报》1938 年 10 月 27 日。

文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陈、汪近 30 年的友情就此了断,汪精卫终究不会听陈嘉庚的忠告,最终沦为背叛中华民族的汉奸国贼。但这是抗战爆发后的事,在厦大创办时期,这两位孙中山的追随者则是亲密无间的。

“敢做敢担当”的闽南人

汪精卫辞去出任厦大校长后,陈嘉庚原本的设想不得不改变,他急忙奔赴上海与黄炎培商议,更加紧张地准备召开厦大筹备委员会筹备会议。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叶渊传来了蔡元培、蒋梦麟不同意厦大速办的意见。蔡、蒋尤其是蔡元培的意见是非同小可的,照林语堂的说法,不真正了解蔡元培的人以为他是个“好好先生”,“有求必应”,“其实,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①] 如今在办厦大这个“大处”上,他出来说“不宜速办”,这事要放在教育界、文化界其他人士身上,创办厦大的事也就黄了。但如今要办厦门大学的人是陈嘉庚,是一位决意要像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那样兴学救国的闽南人。

闽南人的祖先是正儿八经的中原人,在 800 多年的中原南移的历史变迁中,中原移民所带来的中原文化,累积成闽南文化的主导性格,汹涌狂放的黄河孕育了闽南人生命的胚胎,慷慨雄健的血性构成了闽南人的文化性格,那句挂在闽南人口头上的“敢做敢担当,毋惊鬼敲门”的闽南语,呈现的是这个华夏南部区域人们的阳刚之气;闽南人又生活在浩瀚大海的身边,大海是闽南人生命的基因,一望无际的海洋与变化莫测的风浪,造就了闽南人自由开放的心态与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胆略,在早早地将文化的舞台伸向蓝色大海的历史进程中,闽南人让自己的足迹跨过陆地、越过海洋,走向异邦的土地寻求生

① 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6 页。

存与发展的空间，形成了海一样的胸怀海一般的胆识。作为在异邦的土地上搏击了 30 年的闽南人，陈嘉庚身上更是集中体现了闽南文化性格的典型特征，他要认定去做一件事，则天王老子都无法阻拦。他对叶渊说："现国中最复杂多意见者，莫如教育界。"[①]所以厦大的事，只管"锐意进行"。在信中，他针对蔡元培和蒋梦麟的意见，提出了自己"不能同意二君"的理由，申辩了厦大只能速办的原因和条件：

其一，"万事非财不举"，针对蔡、蒋提出的办学经费问题，陈嘉庚坚信，"以华侨之富，决可源源而来"，是不必对经费担心的。相反，厦大"早办一年"，则会早一年激发海外华侨的"公益之义务"，尽"国民之天职"。

其二，办厦大是为了解决中国南部数省"未有一大学"的问题。陈嘉庚说，"世界除野人外"，教育上"未有若吾国之悲惨"。"兹如厦大开幕"，即使"缺乏教师，欠好成绩"，也是比"空空无一所大学"强。

其三，厦大成立，可提升福建中学毕业生的水平，让学生在厦大"培植数年后"，再"往国外留学"，创办厦大，可促进学生留学深造、培养栋梁之才。

其四，福建"赤贫"，但华侨之富"冠称全国"，只是有人"乐不思蜀"，要让他们"改易心肠，富于爱国"，将钱财用在"振教育、兴实业"上，则除了在厦门办大学外，"决难收美满之效果"。

其五，福建的中等学校有 20 多所，现有的教师大多是前清的人，缺乏新知识新思想。如果按每所学校每年增添 2～3 名新教师，则每年需要 70～80 名的新教师。厦大不早办，福建中学的师资无法解决，"则国萃日稀，精神日减，必至无救药之惨痛"。

除了这五个原因和条件外，厦门大学的创办还牵涉到当年中国东南的大学布局问题。据当年厦门道尹陈培锟在厦大开校式上的发言，当时中央教育部正在拟定全国分区设立大学的方案，有提出闽浙（福建、浙江）为一区者，有认为闽粤（福建、广东）为一区者。倘若闽浙为一区，则大学必设在浙江；倘若闽粤

① 陈嘉庚 1920 年 5 月 14 日致叶渊函。

为一区，则大学必设在广东。如此一来，“福建必无设立大学之可能”[①]。然而，陈嘉庚以其敏锐的眼光意识到抢占先机的重要，他要在浙江、广东还未设立大学的时候，先行创办厦门大学，以改变八闽大地的落后面貌，将八闽儿女从贫弱、愚昧中解放出来。

在给叶渊的信中，陈嘉庚最后写道：“凡事创始，要望日后之大成，未有必一举顺序无困难之问题，亦未必有一蹴便臻完善而免改革之苦心。”[②]厦大的事，“不得不急急筹谋，刻不容缓”。陈嘉庚显然对厦大“不宜速办”的意见很不满意也很不服气，话语间不免与蔡元培、蒋梦麟针锋相对。

1920 年 10 月，厦大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如期在上海召开，除蔡元培因往欧美考察、汪精卫因政务缠身未能出席外，其他的筹备委员都参加了这次对厦大建校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会议。会议成立了厦门大学董事会，确定了厦大的行政机构和教学机构，组织了以校长为主席的全校评议会、教务会和事务会议，决定设立 8 个专业性的工作委员会，并推举留日、留美的教育家邓萃英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

1921 年 4 月 6 日，厦门大学假集美学村的集美中学举行开校仪式，3000 多名福建、厦门的官绅商学各界代表和厦大的教师、新生以及集美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大会。此时，离厦大第一栋楼房群贤楼的奠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陈嘉庚等不及了，他在开校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之时”，创办厦大，又“岂能久待”。[③] 10 时 30 分，豪迈的军乐奏起，浔江两岸，响起了由郑贞文作词、赵元任作曲的《厦门大学校歌》：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
谁欤操钥发其藏？

① 《记厦门大学开校式》，载《申报》1921 年 4 月 16 日。
② 陈嘉庚 1920 年 6 月 27 日致叶渊函。
③ 《记厦门大学开校式》，载《申报》1921 年 4 月 16 日。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
谁欤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就在这高昂坚韧的校歌声中，中国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在东海之滨宣告成立。这一天，正在中国讲学的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参加了厦门大学的开校仪式，他听着陈嘉庚诉说着倡办厦大的由衷情缘，感慨万分，当他走上演讲台作大会演说时，便情不自禁地说道："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他希望"到会诸君，须景仰陈君"，盼厦门大学"人才辈出，如太阳经天，关照世界"。①

厦大成立 6 年后的一天，也就是 1927 年 1 月 30 日，以为厦大"不宜速办"的蔡元培在马叙伦的陪同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此时，鲁迅刚刚离开厦大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厦大学生由于鲁迅的离开而爆发了第二次学潮，集美学校也处在学潮的巨大震荡中。蔡元培在厦大活动了两天，作了两次演讲，参观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和生物学院，会见了在厦大工作的北大同仁林语堂、顾颉刚、张星烺、陈万里、容肇祖和厦大的浙江校友会，吃了南普陀的素斋，作了浙江革命工作的报告，在南普陀寺为闽南佛学院作了一次佛学的演讲，之后到了集美学校。这位当年认为厦大"不宜速办"的教育元老，面对已经处处呈现出"办理完善，成绩斐然"的厦门大学，他又会怎么想呢？我们无从在他的文字中寻找到他当年走进厦大时的感觉，我们只能从林语堂的《纪念蔡元培先生》、顾颉刚的《悼蔡元培先生》和当年《申报》的报道中，知道他在厦大和集美学校的足迹轮廓。奇怪的是，他在集美学校为学潮的事操了不少的心，在陈嘉庚、叶渊与学生间几次做了调停工作，而对于厦大的学潮从未说过一句话，没

① 《记厦门大学开校式》，载《申报》1921 年 4 月 16 日。

有表示过任何的姿态，但在1927年2月1日给妻子周养浩的信中则专门讲述了厦大的“嘉庚鱼”：

> 是日往厦门大学，十点，为在厦门之北大同学招待。先参观国学研究院及生物学院等。有一种鱼，在沙中钻行，白色而无目，为各种记述鱼类者所未见，而土人亦不知其为动物，故无名。现由厦大学者名为‘嘉庚鱼’，以作为陈嘉庚之纪念。①

蔡元培所说的“嘉庚鱼”实际上是文昌鱼，而不是“嘉庚鱼”（下文有更具体的介绍）。厦大的美籍学者莱德在厦门大学附近的海域中发现这一自然界的珍稀物种后，通过美国《科学》杂志向世界发布，引起世界的关注。厦大的文昌鱼发现与陈嘉庚先生的创校精神，显然给了蔡元培深刻的印象。

2月18日上午8时，蔡元培结束了他的厦门、漳州之行，从厦门码头乘“集美第二”捕鱼轮船返回浙江，他给这艘捕鱼轮留下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断发操舟古越民，浙东渔户尚精勤。更将闽士雄强气，随着银涛到海门。”半个月的闽南生活，蔡元培已经感觉到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雄健豪强之气，这自然与他跟陈嘉庚的直接接触有很大的关系。

离开厦门的第二年春天，即1928年3月21日，蔡元培以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身份，就厦门大学立案一事发布了131号训令，令：“私立厦门大学应即准予立案，除令行福建教育厅遵照外，合行令仰该校长即便遵照。”至此，厦门大学获得了政府批准的合法资格，成为比复旦、南开、燕京、金陵、大同、沪江、光华、大夏等私立大学更早获得政府立案的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当时对私立厦门大学的评价是：“基金充足，成绩甚佳，各种设备，亦极完善，方之他处，有过无不及。”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7页。

三、校址演武场的风雨

1921 年 5 月 9 日，陈嘉庚亲领着 100 多名厦大师生，从集美学校渡海来到位于厦门岛南端的演武场，为厦门大学的第一座主楼群举行奠基仪式。主楼群规划五栋，一字排开，主楼背倚五老主峰，南向南太武高峰，面对蔚蓝色的大海，取名“群贤楼”。这一天，天刮着风，飘着雨，天空有些灰暗，当陈嘉庚将一块四方形的奠基碑石嵌上大楼墙基后，他不禁仰头看看那飘着细雨的晦暗的苍穹。

第一块奠基石

细雨飘洒在刚刚嵌上墙基的碑石上，碑石上镌刻着这么几行字：

中华民国十年五月九日
厦门大学校舍开工
陈嘉庚奠基题

◎厦门大学校舍开工奠基石

5月9日这一天就这样嵌入了厦大的史册，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于当年8月对德国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乘着袁世凯企图世袭总统的机会，向袁世凯秘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确认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甚至提出“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的要求，企图独占中国的权益。从1月到4月，中日政府为此进行了持续的谈判，中国谈判代表多次拒绝条款中的部分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日方则以武力进行威胁，妄图将中国作为自己的附庸国。5月7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于5月9日前作出答复，强权霸道，主权丧失，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中的第一至第四号要求，偌大的中华民族，由于自身的贫弱，就这样任由他人威逼宰割，此恨绵绵何时休，于是全国教育联合会就将5月9日这一天定为国耻日。

陈嘉庚望着烟雨苍茫的天空，心里并不因为奠基碑石的奠定而平静下来，这位熟谙风水地理而懂得择取黄道吉日的闽南人，偏偏选择了5月9日来奠定厦大大厦的基石，其用心与意味是深长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现代发展的100多年历史中，海外华人世界由于身处异邦的土地在异民族的眼皮之下生存，他们对于祖国摆脱耻辱、民族迅速崛起的渴望，往往比苦难中的同胞儿女更加敏锐更加强烈。“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①]身居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陈嘉庚，对于祖国母亲的这种赤子之情是那些未曾离开过母体的儿女们所难以感同身受的。不忘国耻而自强不息，教育救国而振兴民族，在陈嘉庚的内心深处，孕育的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学，而是一所“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能创造“最新最完善之文化”、能“为民族

①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通告》，原载《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12号。

放一异彩”的南国学府，从集美学校到厦门大学，他勾画的是一个庞大的南方现代教育王国的蓝图，他需要一块足以充分发展的土地来创建厦门大学。

这块土地就是演武场。演武场是一块风水宝地，又是一块记载着厦门的光荣历史、能让每个富有民族正义的人们梦魂牵绕的土地。它襟山面海，北面五老山，蜿蜒苍翠犹如一条躬身向大海伸展而去的长龙，龙头与龙尾的延伸与五老主峰构成一座大自然的太师椅，牢牢地坐落在厦门岛南端的大地上；南面是浩瀚的大海，碧波荡漾中吞吐着串串白浪，浪涛中可以清晰地看见金门岛屿，水天连接处是突兀而起的南太武山峰，这里是可以行驶万吨巨轮的厦金海峡。

但那时的演武场左右远近荒冢累累，怪石错立，是厦门南端一处偏僻荒凉的荒郊野地，要来到这个地方，倘若步行，则要先经过已属厦门边远城郊的鸿山大生里，再越过铺头山、蜂巢山、澳岭和赤岭，虽说闽南海岛上的山岭不高不峻，却也是要攀援登越的，一路下来不免筋疲力尽。所以，当年有到演武场的人，大多走的是水路，从市区的码头搭船，沿着鹭江道到厦门港的海面行使，过虎头山，绕厦门港，在沙坡尾上岸，1926 年鲁迅走进厦大，就是从厦门的水仙码头乘着小舢板到的沙坡尾，再步行到学校的。从沙坡尾到厦大的群贤楼群，则是一条连接着大海与陆地的金黄色沙滩带，一片有 200 多亩大小的坚实平坦的沙质地，四处没有人烟。所以鲁迅才在给许广平和川岛的信中，很得意地“形容”厦大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①]

然而，这块荒僻的海角山冢，却记载着厦门一段不凡的历史，放送着一曲激昂壮烈的歌。明末清初，演武场是郑成功麾下练武的地方。1646 年清军南下，郑成功率领明军转战江西赣州等地，并在漳州、厦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奋力抗击清兵。明隆武帝被清兵俘虏后，郑成功被永历帝封为威远侯，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整军经武，自造货币，推行海上贸易，屡次大败

①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90 页。

清军，雄心壮志恢复大明王朝。在郑成功“据金厦两岛，抗天下全师”时期，他的军事根据地和练武的中心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鼓浪屿的日光岩，郑成功在岩上筑着水操台，居高临下指挥水上千帆万马，鼓浪屿日光岩主要是训练水师的地方；一个就是演武场，这里主要训练陆军。明永历九年（1655 年）3 月，郑成功命工官冯澄世在这里建筑演武亭楼台，搭建兵房，“以便驻宿，教练观兵”。那时，郑成功的演武场练兵有一高招，就是将一个重达 300 斤的石狮置于演武大操场中央，倘有军士能举起石狮绕场三周者，便可成为追随郑成功左右的“虎卫亲军”，成为军中“铁人”。鼓浪屿与演武场就这样作了郑成功恢复明室的两个大本营。永历十二年（1658 年），郑成功之师已有戈船八千，甲士二十四万，“铁士”八千，再加上闽南沿海一带海盗的加入，号称八十万众。这八十万众在郑成功的统领下，浩浩荡荡地兴师北伐，他们进长江，克瓜洲，破镇江，围南京，一度取得节节胜利，原以为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可以打救回来，却不料历史狂澜终究无法力挽，郑军在南京丧师损将，重新退居厦门、金门。在北伐无望的情况下，郑成功于永历十五年（1661 年）带领战船 3 百多艘，将士 2 万 5000 人，从厦门、金门出发，经澎湖列岛，攻打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经过 9 个月的围攻，迫使荷兰投降，收回祖国宝岛台湾。

演武场作为郑成功当年操练军队的地方，成为闽南人心中一块与历史相系的胜地，它伴随着历史进程的风风雨雨，也多次变幻着自己的容颜。康熙十九年（1680 年），清军攻占明室最后的据点厦门，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焚毁演武亭楼台，退往台湾，演武场成为清兵的驻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6 月，水师提督施琅东征台湾，演武场也是清军水师的出发地点。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清政府在演武亭旧址兴建水操亭，借助于这块临海之地，训练水战军士。鸦片战争爆发后，演武场一带是清政府军事布防的重地，从场前的胡里山炮台到白石炮台海岸线，布下了由 500 尊铁炮组成的炮阵，严阵以待海上入侵的侵略者。1841 年 8 月 25 日，一场厦门军民与英军侵略者的猛烈战斗在演武场一带打响，厦门南端海上硝烟弥漫。此次战争，

英军出动 34 条战舰，发射 24000 多发炮弹，8 月 26 日厦门失守，演武场涌进了红发碧眼的英国军队。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发难，闽南爆发小刀会起义，演武场又成了小刀会的主要驻地；在小刀会占据厦门的一年时间里，演武场发生了多次小刀会与清兵的战斗。从郑成功据厦反清复明到清王朝一代，演武场一直是个军事要塞或厮杀的战场。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美国海军舰队进入厦门港，演武场一改其萧索杀气，变成中美国际交谊大会的会场。这年 10 月 15 日，清政府在演武场盖起几十所竹片楼阁，搭起百尺牌楼，从上海买来马车，从香港运来发动机，随后开辟为跑马场，也一度为高尔夫球场，只是不久后便废置不用，风雨变幻，沧海桑田，到陈嘉庚要倡办厦门大学时，演武场已经成为一片很少人会顾及的荒芜墓冢之地了。

但陈嘉庚偏偏想到了这块土地，他经过“数次往勘演武亭地势”[①]后，就毫不犹疑地选中演武场作为厦大的校址。汪精卫抵达厦门时，他亲自带着汪精卫踏上这块荒废的土地，兴奋地谈论起演武场的未来，他对郑成功的演武场以及郑成功军队所留下的土地情有独钟。

少年时代的陈嘉庚是在家乡度过的，他的家乡集美一样驻扎过郑成功的军队，至今集美依然保存着延平故垒、国姓爷井等郑成功遗址。像所有闽南的孩子一样，陈嘉庚也是在郑成功的抗清复台的故事中长大的，像郑成功那样做人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厦门的这些郑成功抗击清军、收复台湾的遗迹，在人们的心中总散发着一位民族英雄的精气神，流淌着一股为担当天下大任而不折不饶的生命潜流。陈嘉庚建设集美学校时，他就选在集美郑成功屯兵的地方建起了 3 层 30 间的教学楼，取名为“延平楼”，以表示对郑成功的缅怀和承续之志。如今，他又要在郑成功当年的演武场上上演一幕教育救国的大剧了。

①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 1946 年印行，第 14 页。

“演武”争夺战

要获得演武场一带的地照并不容易，当陈嘉庚选择演武场作为厦大校址之后，这块原本荒芜的土地似乎马上价值连城了，福建省督军李厚基出来作梗，他凭借着执掌福建省军政大权敲起了陈嘉庚的竹杠。厦门大学开校时李厚基仅仅批准演武场的四分之一为厦大校址，这是想望着厦大成为“南方之强”的陈嘉庚所不能容忍的。我们从史料中发现，厦门大学第一座大楼奠基的时间是1921年5月，而思明县（现在的厦门市）公署案准演武场为厦大建筑校舍地址的布告直到1923年9月才公布，这之间有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就交织着一场陈嘉庚与福建省督军李厚基斗智斗勇的故事。

福建督军李厚基，字培之，江苏铜山人，1869年出生。此人为人很不地道。他自小随父在军营中生活，光绪十五年（1889年），充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亲兵。翌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任北洋陆军第四镇标统、协统。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任北洋陆军第四师第七旅旅长，驻防于天津马厂一带。1913年7月，孙中山“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调第四师到上海与讨袁军队作战，李厚基为吴淞要塞司令。此时福建省政权内部争权夺利，袁世凯乘机将福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派海军总长兼南洋巡阅使刘冠雄率李厚基旅入闽，赶走都督孙道仁，迫使国民党人许崇智离开福建。在闽期间，李厚基竭力奉承刘冠雄，经刘冠雄推荐，出任福建镇守使，授陆军中将衔。李厚基就任镇守使后，大力扩充实力，并将提携自己的刘冠雄所带的混成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捕杀革命党人向袁世凯表示效忠。1914年7月出任福建护军使，督理福建军务，晋衔陆军上将。1915年8月，袁世凯筹划帝制，李厚基献赠1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9月，14省将军联名劝进，李厚基以福建护军使列名，并率先上表称臣。同年12月，袁世凯废除共和登上皇帝位置，1916年李厚基逮捕杀害回闽策划倒袁刺李的同盟会会员林一士，袁世凯对此深感满意，授李厚基以子爵。李厚基受宠若惊，

将福建省一切文告改用“洪宪”字样。不料袁世凯皇权命短，几个月时间便权溃人亡，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与李厚基同属北洋皖系，便任命李厚基为福建督军。不久，黎元洪、段祺瑞争权，造成府、院对立，1917 年 5 月，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李厚基宣布福建独立，乘机驱走福建省长胡瑞霖。7 月，张勋拥戴清逊帝溥仪搞复辟闹剧，李厚基极力响应，拨款修葺“万寿宫”，制黄龙旗几百面，准备隆重庆祝帝制复辟。数日后，段祺瑞在天津马厂兴师讨伐张勋，李厚基便转而通电各省，大骂张勋，吹捧段祺瑞，表示反对复辟，拥护共和，以博取段祺瑞的欢心。段祺瑞重新组阁后，于 7 月 18 日正式免去胡瑞霖福建省长职务，以李厚基兼任省长，至此，李厚基集福建全省军、政大权于一身。9 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掀起“三次革命”，准备北伐，南、北战争一触即发。此时李厚基为段祺瑞皖系干将，他积极扩军，扩建兵工厂，筹备军饷，并成立造币厂，仿制广东毫洋，大量发行债券、证券，又向台湾银行、台湾大地主林熊祥和日商借来巨款，并且预收全省钱粮、正税 2 年，强迫农民栽种鸦片，借此收取烟苗捐，致使烟毒泛滥全省，民不聊生。

1919 年 5 月，五四运动浪潮扩展到福建，福州学生集会游行反对北洋政府卖国政策，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李厚基发告示诋毁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是“学匪扰乱治安”，声言“从严惩办”，逮捕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求是报》主笔王醒才与革命党人多人，并以策动学生闹事的“罪名”杀害革命党人。11 月，当时震动全国的福州“台江事件”爆发，李厚基诺诺听命于日本领事馆的无理要求，让殴打学生、枪杀警察的所谓日本、台湾浪人“敢死队”逍遥法外，还下令解散福建学生联合会，查封了学生联合会所办的《学术周刊》，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恨。

正是在这个时期，陈嘉庚向李厚基要厦门演武场地照建厦门大学。李厚基见要地的人是大华侨陈嘉庚，便想趁机大捞一把，伸手便向陈嘉庚要 4 万元的公债钱。陈嘉庚明知道这个李督军是借发行公债中饱私囊，但为了厦大的地照，也只好向好友黄奕住募捐了 4 万元公债。但等到黄奕住买下 4 万元公债

后，李厚基却翻脸不认人，称那 4 万元公债不是陈嘉庚的，仍然要陈嘉庚自己如数认购。陈嘉庚本是个耿直的硬汉，原本就不将李厚基这类卑琐的乱世枭雄放在眼里，只是为了厦大校址无奈同意购买公债，不想李厚基倒变本加厉起来，陈嘉庚这下子就火了，他干脆将李厚基暗中操纵的彩票骗局公之于众，直喝督军大人为“李贼厚基”，怒斥李厚基出尔反尔，揭发他逼民众种烟从中渔利，于民国九年就“一人私入百万元”，[①]同时发起组织闽南烟草禁种会，以“不愿放弃天职”的国民职责，晋省请愿禁烟，最后直抵督军府面斥“李贼厚基”。李厚基此人生平有两忌，一是害怕武力比自己强大者；二是忌讳财力比自己雄厚者，他见陈嘉庚拄着拐杖直抵督军府，想到那把陈氏拐杖要落在自己的头上，手脚也就软了，便答应闽南的禁烟要求，也很无奈地将厦门大学演武场的地照批复给了陈嘉庚。

“蛋还未孵就先数鸡”

陈嘉庚获得的演武场，“西自许家村，东至胡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二千余亩”，[②]面积之大空间之广阔是当时人不可理解而后来人赞叹不已的。

厦大初创时，陈嘉庚曾对当时负责厦大基建的宗兄陈延庭先生说，他之所以非要拿下整个演武场一带创办厦大，是“鉴于集美当时无远虑与宏愿”，乃至导致集美学校发展受到束缚，“贻后千悔莫及”。当时演武场虽是一片荒冢乱岗，荆棘丛生，倘有一丝人烟，也是昔日美军进入厦门后在此开辟跑马场、高尔夫球场留下的残垣断壁。但陈嘉庚说：“厦大校址，将来可以扩充至广，虽沿海山岗，坟墓如麟及城垣炮台，多属私家与军人权势之手，总是他日必完全归入厦大，无论谁人万不能鼾睡寸土，了无疑义。”他兴奋地将厦大的校址比喻成“一匹新布”，可

① 陈嘉庚：《抗议闽南种烟苗演词》，载《新民国日报》1922 年 10 月 30 日。

②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 1946 年印行，第 14 页。

以任他剪裁各式衣裳，“预有算划，庶免后悔”。[①]

实际上，刚刚诞生的厦门大学师生员工很少很少，到校的首届学生仅仅只有98人，教职员不上20人，但陈嘉庚却一下子要下了2000余亩的土地，想到了将厦大“扩充至广”到整个演武场的左右上下，不让任何人作“鼾睡寸土”的梦想，这位经历过岁月沧桑跨越过大洋的中国人，他的眼光投得很远很远，他的胸襟袒得很宽很大，他要办的是“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的大学，是能“为民族放一异彩”的“世界之大学”，他的眼界、胆略和气魄实在是同时代人所难以抵达的。在陈嘉庚一生的道路上，就像他的儿子陈国庆说的：“父亲天生的是一个敢挡风险的人，他喜欢冒险去做那些心中无数的事，而且往往蛋还未孵就先数鸡。”[②]陈嘉庚似乎真的蛋还未孵就数起未来的那一群群美丽的“鸡仔”了，他开始向人们展示厦门大学的三个辉煌的五年计划：

首期五年，每年添招新生三百，至第五年，在校学生可二千人；

次期五年，每年添招新生五百，至第十年，在校生客四千五百人；

三期五年，每年添招新生八百，至第十五年，在校生可八千五百人；

再后五年，距今二十年，前后毕业生，可达二万余人。

陈嘉庚欣喜地憧憬道：“以二万余人专门大学之毕业生，分配于各省重要机关，如工商学政议各界、各要职，纵未能充分布满，较之今日人才乏缺，何天渊之别。且其时民智更开，实业与教育，愈益进步，人民自治之能力，何军阀伟人之足道哉。”[③]一个宏伟的厦大蓝图，一个美好的教育前景，在陈嘉庚的心中铺展开来。

① 陈嘉庚1924年3月8日致陈延庭函。

② 陈国庆：《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③ 陈嘉庚：《实业与教育之关系》，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23年9月6日。

从选址演武场那天开始，陈嘉庚就亲自在这2000多亩土地上描绘起厦大的校园："北虽高山，若开辟车路，建师生住宅，可作许多层级，由下而上，清爽美观。至于东向方面，虽多阜陵起伏，然地势不高，全面可以建筑，颇为适宜。"[①]而南面面对大海，却是厦大得天独厚的风景，他禁不住内心的喜悦说道，"厦门港阔水深，数万吨巨轮出入便利，为我国沿海各省之冠。"他想望着"将来闽省铁路通达，矿产农工各业兴盛"之后，"厦门必发展为更繁盛的商埠，为闽赣两省唯一出口"，而且造船业、港口业也将得以重要发展，成为"不亚于沿海他省"的口岸，到那个时候，"凡川走南洋欧美及本国东北洋轮船出入厦门者概当由厦门大学前经过"，厦大的"山海风景之秀"，自会让人羡慕不已。[②]这就是我们的校主陈嘉庚先生在一片荒冢累累、怪石错立的演武场上描绘出来的厦大。

鹭江东去，逝者如斯。近一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厦大演武场亲历了90年的风风雨雨，目睹了90年的斗转星移。今天，厦门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国际性港口风景城市，厦门大学已经是遐迩闻名的中国政府"211"、"985"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这里活跃着4万个建设共和国的现在和未来的生命，厦大的校园则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恰如陈嘉庚90年前想望的那样，五大洲四大洋进出于厦门港的远洋巨轮，当它经过厦大演武场前面的海面，眼望着那青石、红墙、琉璃瓦与绿荫掩映的厦门大学时，便会轻轻地拉响一声悠远的汽笛，向一座自强不息的中国大学表示致意，向一位了不起的大学创建者表示由衷的致敬。而那万千个生活和曾经生活在厦大校园里的一代代厦大人，一生中也不知有多少次为自己校主当年的高瞻远瞩和大海般的雄风魄力而激动和自豪，厦大人很感激自己的校主，倘若没有校主当年执著的演武场选址，又哪会有厦大如此优越的学习授业环境和天造地设的发展空间。

①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印行，第14页。

②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印行，第14页。

四、校名坚守的风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姓名犹如一个人的生命，是不会轻易更改的。无论是在中国的古典小说叙事中还是在古典戏剧舞台上，一旦两军对垒，两将相遇，势必来一句："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而任何阵势中，无论是帅是卒，都不会有改名换姓者，即使是兵败如山，成残兵败将，也都叫上一句"本将×××，兵败岐山下"，然后再说再唱，一副英雄气短的架势。在闽南，孩提时的打架打赌，往往也是以姓名作为"赌注"，"你输了，你就得跟我姓×"，于是，两个人就开始为自家的姓名而血战开来，因为更改姓名，就意味着一种对祖先的侮辱，是自身丧失自我的耻辱。因此在民间话语和传统历史叙事中，大凡英雄豪杰都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坚守自己的姓名在中国人的眼里，成了人之品格与气节的一种表现。

中国的现代大学，发端于清末民初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改革运动中，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期，大学的名字随着时代的风云而变动是常有的事情。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体制被迫向近代演变的标志。民国建立初期，严复接办京师大学堂，由于蔡元培提议，京师大学堂才正式命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29 年则改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之后才恢复原名；清华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 1911 年的清华学校，一字之差却也是名字与内涵的重大变动；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奉命南迁，先在长沙联合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1921 年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则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变而来，南京高师之前还有 1903 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为基础；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杭州知县林启于 1897 年创办的求是书院，不久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和浙江高等学堂，1927 年建立的浙江大学原名却是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才改名为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的前身是盛宣怀 1896

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最早创办的两所大学，1907 年改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才命名为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的校名则经历过从震旦大学脱离到复旦公学的变动，1913 年李登辉出任校长时，才正式改组为复旦大学，校名蕴含着回复震旦的意思。

当人们回顾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这段滥觞史的时候，厦大人往往会很自豪地称："我们学校是一所从未变动过自己校名的大学。"一所高校未曾变动过自己的名字，却能让自己的莘莘学子难以忘怀，引以为豪，是因为在这个从未变故的校名中，蕴含着一个厦大人和他们的校主为校名而与国民政府据理力争的故事。

1940 年的春天，是一个失却了春意而弥漫战火硝烟的季节，在同为山城的福建长汀与陪都重庆，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厦大改名的风波，那时，厦门大学刚刚收归国立大学不久。

从私立到国立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美国一个恐怖的"黑色星期五"，让纽约的百万富翁一夜间沦为乞丐。美国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的主要买主，经济危机对陈嘉庚的橡胶工业产生严重影响。而此时，日本政府又对本国橡胶企业补贴扶持，通过廉卖、挂钩推销等手段，乘着经济危机争夺橡胶市场，橡胶价格暴跌，一担的橡胶由原本的 70～80 元猛跌到 7～8 元，橡胶工业陷入崩溃边缘。

1929 年，陈嘉庚公司已累积亏损 320 万元，经营每况愈下，陷入资难抵债的困境，公司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急需注入资金以挽救局面。当时汇丰银行和一个准备支持陈嘉庚公司的财团，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道理，认定陈嘉庚公司在商场上潜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卸掉办学的沉重包袱，必能起死回生，东山再起。于是，他们向陈嘉庚提出一个条件，要求陈嘉庚停办集美、厦大两校，只要陈嘉庚能答应这个条件，即刻会有大量资金注入陈氏企业。陈嘉庚一听这样一个触犯到自己信念

的条件，也不加考虑就回答："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后来陈嘉庚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有人劝余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余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大。"

1931年8月，陈嘉庚公司的所有借贷陆续到期，却无力清还，公司被迫接受汇丰等债权银行的条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由汇丰等债权银行派代表组成，陈嘉庚仅出任董事经理，月薪4000元。他除了留下100元作生活费外，其余3900元全部汇给了集美学校，至于家庭费用，他说："由业已长大的子女自行照料。"也就是在这段极其艰难的时期，陈嘉庚卖掉了新加坡林密小山中的3栋楼房，维持住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正常运转，这林密小山中的三座楼房，是陈嘉庚原本为他的两个儿子购置的别墅。陈嘉庚的这一举动犹如痴绝精卫的一声填海鸣叫，令人震撼令人叹为观止，人们称之为"出卖大厦，维持厦大"，黄炎培先生特别发表了《陈嘉庚毁家兴学记》一文，高度评价了陈嘉庚"毁家兴学"的境界与人格。

改为股份公司后，拥有巨额资产的陈嘉庚瞬间降为股份公司的一个股东，一个敢于叱咤风云、一向指挥全局的企业家顿时要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制约，要听命于他人办事，拳脚不能再像以前那般自如地伸缩了，这对于陈嘉庚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事。陈嘉庚常对儿子说："社会公益事业要视自己的能力随时随地去做，如果要等到发财去做，终生一事无成。"[①]然而，这个随时准备将自己的所有奉献给厦大和集美学校的闽南汉子，此时却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为厦大和集校运筹帷幄了，别说没有发财就去做"社会公益事业"，就是陈嘉庚股份公司发财了，董事经理的陈嘉庚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决策公司的资金流向。救国的抱负受阻，兴学的信念遭遇到金钱的困扰，陈嘉庚心痛极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家手持伦敦汇丰银行令箭的英国商号来到新加坡，要求陈嘉庚股份公司放弃其他7家商号，将股份公司的所有胶制品靴鞋由他垄断专卖，公司董事会不顾陈

① 陈国庆：《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嘉庚的坚决反对，越权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专卖合同，陈嘉庚尤为恼火。1934 年 2 月，陈嘉庚股份公司宣布收盘，收盘时的股份公司债款达 309 万元，陈嘉庚的资本实力已经丧失殆尽。

公司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陷入江河日下困境的陈嘉庚依然是一条路走到头，他不能放弃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那部分。在这几近一贫如洗的时期，他在女婿李光前、族亲陈文确、陈六使和一些朋友的鼎力支持下，一点一点地募得一些资金，自己又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和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告以千苦，乞极力赞助月捐三四千元”[①]，由此而苦苦地支撑着中国东南沿海的一片教育天下。但办大学终究是要花大钱的，尽管厦大迅速地缩小规模，从 5 个学院 21 个系裁减到 3 个学院 9 个系，乃至将当年影响很大的教育学院也组合为教育学系并入文学院，但厦大还是摆脱不了办学经费的拮据。一时有关厦大的谣言蜂拥而至，无中生有的“陈嘉庚辞董事长，林文庆辞校长”消息，竟也通过《申报》的简讯而传播开来。面对着这一严峻的情势，陈嘉庚心力交瘁，他深感厦大再维持已“无进展希望”，自己已经是力不从心，便决定将厦门大学无条件地“奉送”给政府。1936 年 5 月 17 日，陈嘉庚致函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和南京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向他们坦陈道：

> 窃弟自创办厦大后，来洋已十有四年之久，为俗务纠缠，无福可得回梓视察厦集二校，虽梦寐思乡，寝食不忘，乞成泡影，而念虑之切，尤以厦大为最。又不幸弟自十年以来，在洋事业如江河日下，千余万元资产荡尽无遗，迨至昨年敝公司收盘后，对厦大经费乏力维持，不得不请求政府帮助，免至停闭关门，然后再作后图也。厦大为福建省最高独一无二之学府，建立于厦门地方，论省界不免有稍偏于南区，若合浙江、广东沿海区域而言，则堪称为最中心地位。况研究海洋生物，已经全国各大学考虑公认，推全国沿海最相当之地点。又若大而言之，合南洋祖国，则更

① 陈嘉庚 1933 年 11 月 7 日致叶渊函。

为中心之中心矣。

……

以厦大如此重要而限于经济不能发展，弟千思万想，别无他策，唯有请政府收办。弟愿无条件将厦大产业奉送，不拘省立或国立均可，所有董权一概取消，如何之处，千祈示复。①

拳拳之心，一腔热血，委实让人动容，更让一代代的厦大人感恩不已，永不忘怀。一年后的6月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致电陈嘉庚："将于本年度编列厦大改归国办预算。"从陈嘉庚致函国民政府到王世杰部长的明确表态，厦大收归国立的事情也折腾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中，厦大全体师生追随着陈嘉庚的意愿，致电教育部，推举代表赴南京请愿，校长林文庆也亲自到南京晋谒教育部长，终于让厦大收归国立事尘埃落定。10年后，当陈嘉庚回忆起这件事时，他的话语带着深深的人生感慨："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回忆古语云善始者不必善终，亦聊以自解耳。"②

1937年7月1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定，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

张伯苓的那次欢迎茶会

厦大成为国立大学以后，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未曾想到的是，两年多以后，一个让厦大人难以容忍的事情发生了。

1940年3月，社会上开始传出一个信息，厦门大学要改名为福建大学，紧接着，福建与当时的陪都重庆的一些报纸也开始报道这个消息。3月下旬，执掌厦门大学的萨本栋校长接到

①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2页。

② 陈嘉庚：《南洋回忆录》，新加波南洋印刷社1946年印行，第19页。

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正式来电，就厦门大学改称福建大学一事征求学校的意见，全校一时哗然。

原来，福建省政府也想办大学，他们于1940年初向教育部递上创办福建大学的申请，这时的教育部部长是陈立夫，陈立夫回复福建省政府：福建已有厦门大学，战争中不宜再增办大学。于是福建省政府便提出将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的要求，教育部也认为此意甚妥，便向厦门大学发出正式征求电函。如此由上而下的易名意见，来头是教育部和省政府，看来厦大是非改名不可了。

然而，厦大师生和校友却群起反对，远在新加坡的厦大校友首先发难。1940年3月28日，新加坡厦大校友召开特别大会，会上群情愤慨，当即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向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教育部长和福建省政府主席发出电函，恳请“保存厦门大学原名，勿予更改”，他们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和福建省政府提出厦大不可易名的三条理由：

> 一、厦门大学为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所创办，苦心经营约廿载，个人捐资达国币千余万元；陈先生为谋厦大前途尽量发展起见，而自动呈请政府收归国办。今苟轻易改名，在重实际轻虚名之陈先生，或将不以为意；惟政府方面，为维持策励初衷计，自无轻于更易之理。
>
> 二、历考中外著名大学，每多所在地命名，后虽经扩大范围，亦无轻易改名之举。厦门大学创办迄今，已历廿载，负有国际上、学术上之荣誉，苟予轻易改名，过去光荣历史，势将付诸东流，可惜孰甚？
>
> 三、厦大毕业同学之留学欧美者为数甚多，在校学业成绩，早经欧美大学正式承认。此种信誉，自非朝夕所可幸至，一旦遽予改名，将来同学进修及学校行政比多困难。[①]

① 《厦大通讯》第二卷第七、八期，1940年8月30日。

一石激起千层浪，两天后，即1940年3月31日，厦大旅汀毕业同学会在长汀召开全体会员临时大会，就“教部致电学校征求将厦大改名福建大学本会应如何表示”一案进行讨论、议决，议决结果形成五点意见：

(1)由本会即电陈校主，请其支持本会意见，反对改名；

(2)征求校友总会筹备会同署名；

(3)提请校友总会致电教育部表示反对；

(4)电重庆校友会共同表示反对，并函各地分会一致行动；

(5)电文交由干事会负责，限明日发出。

紧接着，一个个厦大校友的集会在长汀等地举行，一封封反对厦大更名的电报、信件从各地飞往重庆陈嘉庚住处。

1940年3月26日下午4时，陈嘉庚率领南侨回国慰问团从缅甸仰光飞抵重庆，下榻嘉陵招待所，开始他一生中一次重要的考察。3月2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会见了陈嘉庚。这是陈嘉庚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双方除了互相问候外，没有详谈。陈嘉庚后来谈到当时的印象，说蒋介石好像皇帝。

经过短短几天与重庆的接触，陈嘉庚就感到了陪都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事实。他发现自己下榻的嘉陵宾馆竟是孔祥熙所开，政府大员吴铁成、朱家骅也正在大兴土木，不禁惊讶政府高官哪来的巨资，又怎么能与民争利。他对老蒋及其国民政府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

厦门大学改名福建大学一事，在陈嘉庚未到重庆之前并不知道，抵达重庆3天后他访问教育部长陈立夫，才从陈立夫的口中知道这件事情。那一天，陈立夫向陈嘉庚说明了福建省政府审办福建大学和教育部同意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的决定，称厦大更名一事原本就想咨询陈嘉庚的意见，想到他行将到重庆，所以没有告知。陈嘉庚听了陈立夫的话并不作答，作出一副“本人闻言，未置可否”的姿态。第二天拜会孔祥熙副院长，孔祥熙照旧向他提起厦大更名一事，陈嘉庚照样不予回答。3月30日，是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五次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张伯苓副议长为陈嘉庚举行欢迎茶会，并请陈嘉庚向众议员报告南洋华侨的情况。在众议员的掌声中，陈嘉庚简略地报告了南洋华

◎陈嘉庚抵达重庆时接受欢迎人群的献旗

侨的大概，但他很快话锋一转，说："现有一事亦与南洋华侨略有关系，敢费诸君时间。"陈嘉庚所说的"敢费诸君时间"的事便是厦大改名一事，陈嘉庚幽默地说自己对厦大更名有三项"怀疑"[①]，敬请众议员给予解惑和主持公道。

陈嘉庚所谓的三个"怀疑"：一是厦大改为国立，是否就得改动校名。为此，他特别举新加坡"陈笃生医院"为例加以驳斥。他说，70年前新加坡华侨陈笃生捐资6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后由新加坡政府接收，政府每年投资百余万元扩大医院规模，提升医疗水平。后来政府要办中央医院，有人提议将陈笃生医院改为中央医院，提案交到新加坡"议事会"议决。议事会20多席，华侨只占3席，但议决的结果却是：陈笃生虽仅捐6000元，却是首倡义举，没有陈笃生的首创，又如何有陈笃生医院，"今日政府如欲创办中央医院，应另处设立，不宜埋没创办

①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印行，第106～107页；《反对厦大改名》，载《南洋商报》1941年1月8日。

人名誉”。陈嘉庚说,“殖民地洋人尚待华侨创办人如斯高风,我国素称礼义之邦,反欲如是摧残”,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况厦门大学悉地方之名,与余姓名无丝毫关系”,为何非得更改校名?

二是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中国的海洋与海洋生物的研究与人才培养还要不要。陈嘉庚对众议员说,中国海洋与海洋资源,“不亚于诸富强国家”,厦门大学地处海洋,周边海产丰富,化学生物等设备完善,建校 10 多年来,已成为国内各大学、研究机构或专门学校研究海洋和提供海产物标本的中心,“此为厦门大学与国内诸大学不同之点”,倘若改名福建大学,学校也将“移往他处”,则“海洋生物无从实验”,这关系非同小可。身在异邦的陈嘉庚,既痛感近代以来中国海权丧失的耻辱,又深知海洋资源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创办厦大时就意识到海洋与民族富强的紧密关系,所以厦门大学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设立海洋系的学校,也是在海洋生物学科最早产生国际影响的中国高校。将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对陈嘉庚来说,不是一所学校改名不改名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要不要海权与海洋资源的问题。于是,陈嘉庚向众议员们抛出了他的第三个“怀疑”。

第三个“怀疑”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指责和警告。陈嘉庚说,在这个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抗战关头,厦大更名将伤痛广大华侨的心。因为南洋华侨福建居半数,家乡多在厦门附近一带,厦门则是闽侨唯一出入门户。自厦门沦陷后,闽侨“痛苦哀情不言而喻”,终日“盼望抗战早日胜利”,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筹赈支持祖国的抗战。而如今“政府无故将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或难免海外闽侨,疑政府将步甲午故智,如台湾之放弃乎”。陈嘉庚所说的“甲午故智”是指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那年 1 月,日本海军进攻山东,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攻占了威海卫,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4 月 17 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国民与海外华侨的一块心病。陈嘉庚将厦大的改名比作“台湾之放弃”,指责国民政

府“以厦门沦陷则连大学亦该消灭厦大二字”，让人“怀疑”“我政府收复厦岛的坚决”，如此一来，势必“增加闽侨之悲痛，于抗战时筹赈及外汇之助力，难免有多少不利”，话语之重，令四座震惊。

1940 年是抗战爆发的第三个年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着大半个中国的河山，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收复祖国河山，但抗战处于“焦土抗战”的极其艰难困苦中，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整个抗日战场，都极其需要海外华侨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各种支持和资助。陈嘉庚带着南侨回国慰问团抵达陪都重庆，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的慰问，还有着抗战急需的物资和资金。海外华侨尤其是陈嘉庚所说的东南亚一带的“南侨”，一直是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重要财源。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的一个月，新加坡侨民首先召开大会，推举陈嘉庚担任临时主席，通过建立“星华筹赈会”，筹资筹款支援祖国抗战；1938 年 2 月，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印尼侨领庄西言分别致函陈嘉庚，请他出面统一组织一个支援祖国抗战的侨胞组织，这年 7 月 30 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驰电陈嘉庚，请陈嘉庚领导各属华侨筹款；1938 年 10 月 10 日，来自东南亚 45 埠的 168 名华侨代表聚集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悬挂起“立国五千年忍使黄魂洒赤血”、“华侨八百万誓扶白日照青天”的对联，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即南洋华侨总会）成立大会，发誓与祖国一起“团结救亡，抗敌牺牲”，发出了“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的抗日宣言。会上，陈嘉庚被选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他号召全体侨胞“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他说：“不当亡国奴，就要打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南侨总会的发动领导下，南洋侨胞发动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抗日筹赈运动，从 1937 年至 1941 年，南侨抗日义捐达 5 亿国币，认购救国公债 2 亿5000万，捐献飞机 217 架，坦克 27 辆，救护车1000多辆，并且在广州沦陷军事物资无法运往前线的危急时刻，于战火硝烟中开辟出滇缅公路，打开了一条突破日军封锁的军事运输通道。在中华民族这场伟

大的战争史上，南侨谱写的是一曲慷慨豪气的爱国史诗。

所以，当陈嘉庚将厦大改名一事与抗战、与南侨的心中祈盼联系起来辩驳时，参加欢迎茶会的参议们都为之一震，他们对陈嘉庚的“怀疑”深表同情，共同表示愿意为厦大保留原校名而呼吁。

欢迎茶会两天后的一个晚上，陈立夫部长与萧吉珊来到陈嘉庚下榻的寓所拜会陈嘉庚，声明厦大改名一事已经取消，此后不会再提起。这一次拜会，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陈立夫是有些尴尬的，所以座谈也就长了一些，按陈嘉庚的回忆，“座谈至一、二小时之久”。

厦大改名的风波就此平息，厦大人清楚，自己与校主的坚持与努力，并非是一个学校改名不改名的问题，而是对于一种文化血脉的坚持，一种不愿放弃初衷和向往的努力，在那个为坚守校名群起而行动的团队里，我们会感受到一种豪迈，一种气节，一种从黄河流域流淌到东南沿海的“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中原风骨。厦门大学因此成了中国近代高教史上极其少有的自始至终未曾改动过校名的著名高校，厦门大学从学生、校友到校主陈嘉庚，为了保持自己学校的校名而做出的举动，也成了近代高教史上的一个奇观。

校长的那些事儿

虽说“大学者，乃大师也”，但校长乃是一所大学的脑袋，造就一个伟大的大学，必定要有卓越的校长，著名大学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她曾经有过卓有见识、卓有才识和卓有胆识的掌门人。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以来，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经历了100多年的风云变幻，应运而生了一批大学校长，这之中有彪炳千秋者，有被历史所驱逐者，或美或丑，或善或恶，或不美不丑不善不恶，是卓识干练还是庸才蠢才，这都会被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儿所记录。尽管人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小姑娘”的记忆毕竟是清晰形象的。

——题记

一、四个月的首任校长邓萃英

1921年4月6日，在厦门大学的开校式上，担任大会主席的是位身着西装的魁梧男性，他那方形的脸上配着一副半圆形的眼镜，这让他的刚愎又增添了几分的斯文气。他向大会介绍了陈嘉庚用尽苦心筹备厦大的两年经历，对陈嘉庚的不辞劳苦办学表示感激，他就是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邓翠英博士。然而，一个月以后，在5月9日厦门大学第一栋校舍楼奠基的时候，人们却再没看到他的身影。在中国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奠定第一块基石的场景里，没有首任校长的出现，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原来，在厦大校舍奠基的前一个星期，即1921年5月3日，厦大首任校长邓萃英向校主陈嘉庚提出了辞呈。开校仪式才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刚刚启动的学校千头万绪，一校之长却不想干了，这对厦大来说，犹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刚刚被人抱起，又即刻被甩到产床上。那时，主持教务的郑贞文、主持总务工作的何公敢出来力劝邓萃英留任，但上海的《民国日报》却公开邓萃英致厦大筹备委员的信，信中说："特因才力既疏，体质又弱，理想诸难实现，抚躬自省，实深愧惭，不得已谨向先生告辞，以避贤路。"[①]信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采取如此公开信的形式，表明去意已无法挽回；作为厦大筹备委员之一的黄琬也出面调停，他称邓萃英是办学之才，力劝陈嘉庚对邓萃英加以挽留，但陈嘉庚很干脆，他说邓萃英是"自辞"，不是学校"辞他"，"弟不挽留"。[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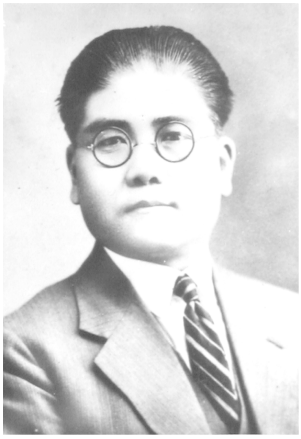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陈嘉庚、邓萃英在厦大校长的去留上都表现得如此坚决？

没有挂出的总统题匾和对联

邓萃英（1885—1972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家，字芝园，福建闽侯人，原本毕业于全闽师范学堂，毕业后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日本时，他与林觉民一起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到福建从事教育工作，任福州师范学校校长，孙中山到福州视事时，他向孙中山起誓："此生愿遵守同盟会誓约精神，专心从事教育。"1917年由教育部选送到美国留学，进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深造。1919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祖国筹备创办厦门大学，第二年组织厦大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筹备会议，邓萃英刚从美国完成学业归来，任北洋政府教育参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厦门最高教育长官黄琬（时为思明县教育局）推荐，陈嘉庚认识了同是福建人的邓萃英，见邓萃英既是同盟会盟友，又与自

① 邓萃英致厦大筹备委员会各委员函，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5月8日。

② 陈嘉庚1921年5月2日致叶渊函。



◎厦大首任校长邓萃英

己一样怀抱“从事教育”的信念，又是美国名校深造过的学者，便聘他为厦大筹备委员，并于厦大筹备委员会上推举邓萃英为厦门大学校长。1920 年 12 月，邓萃英接到陈嘉庚的校长聘书后，开始主持厦大筹备创办的方方面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同时接受了教育部的委任，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理校长。

邓萃英身兼两校校长，地跨一南一北，这也就埋下了他与校主陈嘉庚矛盾冲突的根子，而且这根子还埋得很深。

对陈嘉庚来说，厦门大学就是自己的生命，八闽大地上刚刚诞生的这所学府就是他生命中刚刚孕育出来的婴儿，虽然学校是白手起家困难重重，一切都得从零从无开始，陈嘉庚依然微笑着憧憬着，他对叶渊说：“百尺高楼从地起，初举之简陋及寡数，窃世界虽文明国之学校，难保不从此经过。”[①]对于最让人头疼的办学经费问题，陈嘉庚也很乐观：“爪哇黄君家产一万万，富甲全国，亦同安人。他日若能回意，则厦大之事济矣。”[②]在他的想望中，厦大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他需要一个全心全意的校长来将他心中的美好想望变成眼见得到的现实。当厦大筹备委员会推举邓萃英为校长的时候，陈嘉庚就在聘任校长的契约中声明邓萃英必须辞掉教育部参事职务，但邓萃英却在受聘厦大校长的同时，接受了教育部委任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一职，这自然是一个比原来的参事更具体更要负责任因此也就更要花时间花精力的工作。

邓萃英作为厦大的首任校长，也确实为厦大的草创作出了努力，按他自己的描述，是“受命以来，勉尽绵薄，奔走京厦，筹

① 陈嘉庚 1920 年 9 月 9 日致叶渊函。

② 陈嘉庚 1920 年 11 月 25 日致叶渊函。

备进行”[①]。1945 年，进入“耳顺”之年的他，还在自己的《芝园六十自述》中这样回忆道：“余在厦大筹备创办时期，呈领官地，计划建筑，拟定校则，组织董事会，延聘各科教授，时与陈嘉庚先生接洽。”那时，他推荐了郑贞文到厦大负责教务，举荐何公敢为厦大的总务，使教学与后勤这两项最基本的工作一开始便有人主持，学校工作得以正常开展。但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北京高师在京城，又是国立大学，就在邓萃英服务的教育部眼皮下；厦大为私立，又在东南海隅，在邓萃英奔走于京厦之间的忙碌中，他即使想将两校的工作一视同仁，不存主次之想，也难以不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刚刚接手的北京高师上。而对于厦大，他更多的只能是提提看法，发发指示，谈谈建议，既没能在厦大待很长的时间，也无能为力开展落实具体的工作，这样一种偏重北京高师而慢待厦大的工作姿态，恰恰是一腔热血而性格耿直认真的陈嘉庚所不能容忍的。陈嘉庚这样评价邓萃英当年的校长工作，他说“校长一年之时间，大半在外”，一再叮咛后才来到厦大，而“到校未满一月”，尚未下车或下车伊始，便呱啦呱啦下指示，且“大功大劳”往自己身上靠。[②]

1921 年春天厦大开校前夕，邓萃英曾很高兴地从京城寄来一块题匾和一副祝贺的对联，题匾和对联都是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给厦大的题赠，是邓萃英借助于教育部官员的身份而乞得的。徐世昌不仅是大总统，而且是文人出身，通晓诗、书、画，他一生编撰的书籍有 20 多种，为总统时还成立了北京艺术篆刻学校，这就是后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因此有“文治总统”之称，他那副祝贺厦大成立的楹联就署着他的雅号“水竹邨人”。能获得徐大总统的题匾和楹联，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求之不得的贺礼，邓萃英要求郑贞文和何公敢在开校式上悬挂出来，但陈嘉庚却拒绝悬挂总统题匾和楹联，也不提题匾楹联的事，所以在各路媒体的厦大开校式报道上，未曾透露过总统贺礼的信息。陈嘉庚的拒绝悬挂，是因为他不喜欢徐大总统，他认为徐世昌是个“少了士人气节

① 邓萃英致厦大筹备委员会各委员函，载上海《民国日报》1921 年 5 月 8 日。

② 陈嘉庚 1921 年 5 月 2 日致叶渊函，陈嘉庚 1921 年 5 月 20 日致叶渊函。

的人”，他不需要这种缺少人格的大牌人物来给厦门大学撑面子。

徐世昌之所以被陈嘉庚认为是“少了士人气节的人”，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是个左右逢源的达官，史上有“水晶狐狸”的雅号。此人在政治上深谋远虑，善于审时度势而仕途上进退有度，以“中庸之道”为灵丹妙药保身保位，这正是诚信为商、慎笃为人的陈嘉庚所讨厌的人格。

◎徐世昌像

徐世昌 1855 年 10 月生于河南府城，为前清举人，后来又中了进士，光绪五年（1879 年）结识袁世凯，相互欣赏而结成金兰之好，开始他“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的政治生涯。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他是袁世凯的谋士，一文一武，互为同道。1905 年，经袁世凯、张之洞保荐，徐世昌进清廷最高军政机关军机处，重掌中枢，由此打开了混迹政治高层的通道。52 岁时（1907 年）清廷封他为朝廷钦差大臣，任东北三省总督兼管东北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在东北时，他已经意识到清王朝的日落西山，便未雨绸缪考虑起自己的退路，为人处事谨慎，绝不骄矜，广结广交，不以党派示人，既能符合潮流，呼应戊戌新政，又不疏远旧派、权要，左右逢源。光绪皇帝与西太后一同驾鹤西去之后，袁世凯地位岌岌可危，摄政王载沣成为清廷实权人物，他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一心要除掉他，袁世凯只得“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是袁世凯同僚盟友，唇亡齿寒，他便主动奏请开缺，清廷却认为此人尚可留用，将他调任邮传部尚书，实为降用，却还保留朝廷官职。1911 年 5 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世昌任协理大臣。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炮响，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调北洋新军镇压，在徐世昌力主下，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北方军阀南下镇压革命军，徐世昌与袁世凯重新联手。但此时徐世昌对中国的考虑，已经由“君主专制”、途径

“君主立宪”而转向拥护“民主共和”，他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策略已经由剿而抚，由抚而和，不愿与革命党人对阵，却主张避开内战，采用和平方式将清皇帝赶下台。此间徐世昌献出一条计策：让段祺瑞领衔主演，以北洋军阀64名将领联名，发电逼迫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文发出第二天，徐世昌便主动向清廷恳请辞职，以表明此事与自己没有干系，巧妙地避开政治嫌疑。1912年2月12日，清廷末代皇帝溥仪颁发退位诏书，徐世昌在张謇主稿的这份诏书中塞进“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诏告，300多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袁世凯夺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最高权位，徐世昌则出人意料地激流勇退，以闲居两年的生活方式审察民国初年的局势变动。至1914年5月，才进京受命任袁世凯政府的内阁总理。次年，袁世凯开始推行帝制，徐世昌以沉默应对，见局势难料，便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画画写字，自称水竹邨人，退隐观望时局变化。1916年3月，袁世凯在讨袁护国浪潮中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再次起用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徐世昌力主与讨袁护国军停战议和，但遭到讨袁护国军拒绝，任职仅一月便举荐段祺瑞继任，自己以北洋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操纵政坛。这年11月应邀再次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后又调解直系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由此赢得偃武修文的评价。1918年10月，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登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他下令对南方停战，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一面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缓和全国舆论压力，一面极力鼓吹尊孔读经，抵制新文化运动潮流高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徐世昌退位，徐世昌被迫回到天津，从此结束他那“没做什么好事，也没当什么坏事祸首”的政治生涯。

厦门大学成立时，首任校长邓萃英虽然获得了徐大总统的题匾，但陈嘉庚则讨厌徐大总统左右逢源的政治人格，陈嘉庚是个很有个性很看重人格的人，他因钦佩孙中山的坚贞不屈而以孙中山为友，从来就不遗余力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对于徐

大总统的题匾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不被采纳的校舍设计

厦门大学创建时，兴建校舍是学校建设首当其冲的要事，这自然由首任校长邓萃英负责，邓萃英校长也尽职而为，他经陈嘉庚的赞同后，及时地请了美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茂旦洋行为厦大校舍勘测设计和承包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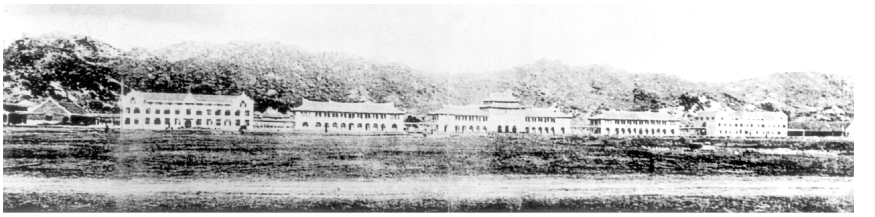
1921 年 1 月，邓萃英由北京返回厦门，这次返厦他带来了茂旦洋行设计师墨菲，也带来了茂旦洋行已经设计好的厦大校舍图纸，图纸包括厦大首批校舍的平面图总图、立体简图和凭图建筑工程的估算表（预算表）。这份设计方案，作为学校主要建筑的五座大楼安排在演武场西北的一角上，构成“品”字形组合，而演武场的大部分用地则设计成农事实验场，学校形成一个大圆圈模式，整个建筑群排列局促而难展开。邓萃英本以为设计者是上海滩上的洋行洋人，自己此番来厦，校舍的兴建便可解决了，却没想到陈嘉庚摊开图纸仔细审阅后，便毫不犹疑地否决了洋人的设计和估算。

陈嘉庚是一个有自己的建筑理念和见地的人，他心中的厦大宏图实际上蕴含着自己的桑梓之情、民族之志和厦门大学的宏伟愿景。茂旦洋行的墨菲设计师，则仅仅只能从外在的美观上作出楼房的设计，既没能将校舍的设计与演武场的地理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更无法体验到一位志在以教育拯救民族的华人那博大的胸襟和深沉的情愫。陈嘉庚认为，茂旦的设计毁坏雄伟的演武场，妨碍将来厦大的发展。他这样评价茂旦的这份设计：“其土司每三座作品字形，谓必须如此方不失美观，极力如是主张。然余则不赞成‘品’字形校舍，以其多占演武场地位，妨碍将来运动会或纪念会之用。”[①]在陈嘉庚的眼里，厦大校舍的设计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校舍的位置安排，要能让外国的轮船来往厦门港的时候，能从海上一眼就看到一所壮观的学

①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 1946 年印行，第 13 页。

府，首批校舍的空间方案一定要考虑到将来厦大的发展壮大；二是教室、办公场所空间要大，光线要好；三是要求校舍外观上美观大方，粗中带雅，要能节省建设费用。对照陈嘉庚的这三点要求，茂旦洋行墨菲的设计方案，显然无法让陈嘉庚满意，而且，对于茂旦洋行提出的数千上万元的工程承包费，陈嘉庚也认为“索价过昂”，表示学校可以自己购料雇工，节省开支。

于是，陈嘉庚自己动手，将首座校舍楼群从“品”字形形改为“一”字形，五栋大楼置于演武场北部中点，一线摆开，南向大海对面的南太武高峰，中座主楼背依五老山的最高处，一条笔直的连廊贯通各自独立的五栋楼房。陈嘉庚说：“我要站在长廊的尽头，看那从第一栋大楼到第五栋大楼下面走过的厦大学生。”话语中透露出一种自豪感。整排大楼的前面则是一片开阔的运动场，运动场与海滩相衔接，原本茂旦设计中占据大半的演武场的农事实验圈被移在了演武场后面。在陈嘉庚的设计蓝图中，广阔水天之下石板悬挑，清水雕砌，西式的廊柱、房间，中式的飞脊彩檐和琉璃屋顶，不但气派雄伟壮观，而且垂珠彩帘秀丽雅致，由此形成了被后人称为“嘉庚风格”的建筑群落。为了更好更节约地完成校舍的建设，陈嘉庚还选择在临近厦门的漳州建立了砖瓦厂，设计了被后人称为“嘉庚瓦”的建筑材料。



◎厦大首批校舍群贤楼群旧照

就这样，在陈嘉庚的亲手设计和亲自监制下，厦大的第一座校舍落成，这就是今天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群贤楼群。楼群五座，主楼“群贤”楼，取“群贤毕至”之意，主楼两边各是“集美”楼与“同安”楼，用的是陈嘉庚先生故乡的地名，东西两端的两座各取名为“映雪”、“囊萤”，引用的是晋代孙康冬月映

雪读书与车胤囊萤照书的勤学典故。

然而，茂旦洋行校舍设计的被否定，对原本主持校舍设计的邓萃英来说，却有说不出来的不满和不快，他或许就此而想到一校之长的权力问题。于是他提出要求：把学校的100万元开办费和300万元经常费提出来交给学校主持人管理，或者委托朋友们帮助管理，他想借助这笔数目不小的经费，投资于当时的东三省的农田开垦，或做些买卖，以增加厦大的办学经费。陈嘉庚虽说是个在商场上敢于冒险的人，但对于学校的经费却是一厘都不让乱动的。他认为邓萃英的想法不现实，拿学校的办学经费做买卖实属冒险行为，他不答应邓萃英的要求。

校舍设计方案被否定，主持经费的要求被否决，接下来的事件便是邓萃英提出辞职。

校长与校主的那份纠葛

邓萃英的辞职选择了报上公开的形式，1921年5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邓萃英致厦大筹备员辞职书》，辞职书写道：

> 萃英猥以菲材，于去秋谬承厦门大学筹备委员，推举为厦门大学校长，十一月复承嘉庚先生惠赐聘书。受命以来，勉尽绵薄，奔走京厦，筹备进行。现在布置组织，粗有头绪，本当赓续策励，以其有成，特因才力既疏，体质又弱，理想诸难实现，抚躬自省，实深惭愧，不得已谨向先生告辞，以避贤路。萃英一息尚存，苟能裨于厦门大学之处，仍当尽心力为之，除迳函嘉庚先生辞职外，谨肃即请道安。[①]

邓萃英在函中最后表示，将自己工作四个月的校长薪俸2500元，“敬捐”厦大图书馆，以作为“购备教育书籍之用”。邓萃英致筹备员函的内容看上去倒没什么可挑剔，甚至还能体现

① 《邓萃英致厦大筹备员辞职书》，载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5月8日。

出一点君子的姿态与风度，但那隐藏于其中的纠结和情绪，则是深知内情的人都能体察出来的。

邓萃英的公开函发表后，厦大首任校长的辞职便成为了全国的新闻，有人就传出流言，报上也有了蜚语，说邓萃英受聘时并无必须辞掉教育部职务的约定，邓萃英提出辞职是因为受到陈嘉庚的“侮辱”。陈嘉庚是个注重人格气节泾渭分明的人，当问题发展到以媒体的披露来公开厦大内部的纠葛时，陈嘉庚意识到这是损害厦大形象的“鬼蜮伎俩”。他阅读报上的邓萃英公开信与流言飞语后，不能不气愤，不能不“以明真相，为厦大前途计”。他说报上之言“长篇累牍，多无稽设词，信口雌黄，冒教育之美名，阻商人之同志，甚至毁骂不顾，自污其口”，于是便针对邓萃英的“君子态度”以及聘任邓萃英时的契约，同样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就邓萃英辞职事致厦大筹备员函》，以“请诸君谈判曲直以明真相而辨是非”。关于邓萃英受聘校长时约定的有无，陈嘉庚说：“事只数月，筹备诸君多能记忆，况逐条讨论精细，绝无遗漏此必有之条件”；对于邓萃英将月俸2500元捐给厦大图书馆一事，陈嘉庚却认为是邓“以鸣其慷慨义愤，或者为升官钓誉，而不计利己损人及厦大前途之影响”，面对着这样一起“略有人格之商人尚不屑为”的行为，陈嘉庚感叹道：“莫怪今日我国之现象也。”①

邓萃英提出辞职后，作为厦大当地的筹备委员的黄琬一面再三劝说陈嘉庚出来挽留，并要陈嘉庚“信重”邓萃英举荐到厦大的郑贞文、何公敢两人，一面又在学生中散布邓校长之去是因为无权行使校长之职的言论，陈嘉庚对此大为恼火。对于黄琬这个人，陈嘉庚早有看法。厦大筹备时，鉴于黄琬是厦门当地的教育局长和省立中学的校长，陈嘉庚聘他为筹备委员，也接受了他对于邓萃英的推荐，但对他存有疑虑，筹备期间陈嘉庚就对叶渊说：“孟君（即黄琬，字孟奎），弟近阅其做事数次，颇

① 《陈嘉庚就邓萃英辞职事致厦大筹备员函》，载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3日。

轻率阔大，将来若用为厦大重要人员关系非轻。”[①]早在陈嘉庚在厦门陈氏宗祠号召筹备创办厦门大学那天（1919 年 7 月 13 日），各界人士来了数百人，连当时的北洋政府驻厦军队司令臧致平都派了自己的副官参加，可是作为厦门的最高教育长官的黄琬却不见踪影，这已经让陈嘉庚感到他对创办厦大“乏诚”；之后，他又阻止陈嘉庚争取演武场官地为厦大校址，劝陈嘉庚无论如何不要去讨要这块军事之地；厦大筹备会召开之前，黄琬又不征求陈嘉庚的意见，先到上海串联筹备委员，让邓萃英出任厦大校长，并称这也是陈嘉庚的意见；后来又假借陈嘉庚的意思，要请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到国外留学，而将整个集美学校校务交给邓萃英一人办理。黄琬这一切做派，都让陈嘉庚感到他对厦大没有诚意，而“不成则不达”。5 月 1 日，即邓萃英正式提出辞职的前两天，黄琬约请陈嘉庚面谈，言称“邓君如何足可办学”，“厦大乏人困难种种”，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询问陈嘉庚为何会对邓君“不满意至此”，陈嘉庚很不由衷地回答他：“绝不知邓君此会辞职究从何起因。”实际上，陈嘉庚已知道黄琬是先与邓萃英斟酌之后再来与自己交谈的，便想到《朋党论》中所提示的“小人之难合”和“多生枝节”的危害，[②]甚是怀疑黄琬本人的用心及其能“干何大事”的本领。当邓萃英正式提出辞职，他的致各厦大筹备员的函在报上公开后，陈嘉庚便很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无心互相原谅及以义务求益为怀，决不能共事。”他希望邓萃英暑假后不要再来“更幸”。[③]

就这样，邓萃英在厦大仅任了四个月的校长，就回到北京高师，专心地履行了一年北京高师校长的职责，在那里成功地请准了招收女生，使北京高师成为中国最早招收女大学生的高校。1922 年以后，邓萃英两度担任教育部次长，后前往河南大学任校长，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等职。1931 年脱离政界，回到福建闽侯家乡从事过一段畜牧业。抗战爆发后继续在

① 陈嘉庚 1920 年 11 月 23 日致叶渊函。
② 陈嘉庚 1921 年 5 月 2 日致叶渊函。
③ 陈嘉庚 1921 年 5 月 12 日致叶渊函。

家乡兼理民办中小学教育。抗战爆发后复出，于1949年赴台，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和“总统府国策顾问”。在台湾，他不遗余力倡导九年义务教育，为实施该义教方案，他著书立说，四处演讲，奔走呼号，促使九年义务教育于1965年在台湾成为制度。1972年在台北逝世，终年87岁。

在《芝园六十自述》中，当邓萃英回忆起厦大的这段往事时，他道出了其中的苦衷，他说自己“与创办人常务董事陈嘉庚先生接洽，言语不通，以舌人或笔谈达意，备极繁琐”，“委屈调处，煞费苦心”。言语的不通，沟通的困难，似乎成了校长与校主之间一道引发种种不愉快乃至不得不辞职的鸿沟。但陈嘉庚在1946年出版的《南侨回忆录》中依然认为邓萃英不能履行契约中“辞去教育部职务”约定，厦大校长只是挂名，校务全然交给郑、何二人，“此种挂名校长虽他处常有，若厦大当然不可”。

历史中事，似了未了，90年的厦门大学，在其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教育长河的奔流中，自然有许多的曲折许多的浪花激起。首任校长与创校校主的那一份纠葛，是人之性格的冲突，还是校之事业的纠纷，这之间有多少的是非曲直多少的误会，我们实在不必做那么多的追究。当我们将这些为人难知的厦大往事叙述出来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将这样的纠葛当作创校初期的一种艰难，一种扬弃，一种自强前行的体现。

邓萃英辞职之后，陈嘉庚立即向新加坡的朋友林文庆博士发出邀请，毫不犹疑地作出决定：请林文庆接替邓萃英担任厦大校长。

二、“止于至善”的校长林文庆

1957年元旦天刚破晓的时候，厦门大学私立时期最重要的校长林文庆博士，因心脏衰竭在狮城与世长辞。这一天，新加坡的中英文报纸大多在显要的位置上，报道了这位新加坡杰出人物溘然而去的消息，媒体介绍了林文庆的生平，刊登了林文庆的照片，人们称他为“新加坡最杰出的市民”，“新加坡的伟大

老人”,“大老”、“圣人”,认为他无论作为医生、学者,还是社会先锋、华侨领袖,“皆有极伟大之成就”,是个“懂得如何过圆满、活跃、有意义的生活,为他人创造幸福的人士”。①

1957 年对中国来说却是个揪心的政治斗争年代,“冷战”的世界格局形成了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针锋相对,中国作为东方阵营的核心力量,与新加坡的资本主义是严重对峙的。此时的厦门大学正与共和国一起,在经过一段“百家齐鸣”的短暂日子后,正面临着一次即刻就要降临的所谓“反击右派进攻”的严酷风暴。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一个个紧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政治运动的腥风血雨冲击着学府的正常秩序,也摧毁了人的情感世界,将人的命运悬在了一根捉摸不定的弦上。在这样的时候,厦门大学对于苦心经营厦大 16 年之久的老校长的逝世,似乎非常的冷漠,严酷的政治现实,使厦门大学不敢也无法对林文庆校长的逝世作出任何的追念和吊唁。

新加坡的“一驾马车”

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字梦琴,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与陈嘉庚一样祖籍同属与海洋相邻的闽南金三角,这个地区的百姓主要靠海上捕鱼和贫瘠丘陵地种植为生,生活艰难,因此从 16 世纪开始,闽南人便开始作起海的梦,他们跨越海洋走向异邦的土地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在一批批跨越海洋的人群中,最多人来到了东南亚的岛上诸国,结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华人社会。

1869 年(清同治八年)10 月 18 日,林文庆生于英属殖民地新加坡,在一切唯英文为尊的新加坡,他自幼接受英文教育。林家虽不是文化之家商贾之人,却颇有文化素养,家道也算殷实,祖父林玛彭曾在中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父亲林天尧则是在新加坡莱佛士书院完成学业的,两人共同受雇于当时新加坡的福建侨领、华侨巨商章芳琳手下,分别担任酒庄经理与

① 新加坡《南洋商报》1957 年 1 月 4 日。

◎林文庆像

鸦片局副理。这使得幼年时期的林文庆能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1879 年(清光绪五年),林文庆考进英殖民政府创办的官立模范学校莱佛士书院,这是林文庆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16 岁那年,父亲不慎自己刮伤引起血液中毒,最后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破伤风夺走了壮年的生命。父亲去世后,虽然乐善好施的章芳琳依然聘用祖父,但家庭的经济支柱已经坍塌,祖父也已经年迈,林家家境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林文庆的几个妹妹被送往马六甲亲友家寄养,林文庆也面临着学业半途而废的威胁。但幸运的是林文庆遇上了莱佛士书院的校长胡列特先生,在一次傍晚回家的路上,雨中的林文庆被胡列特招进了自己驾驶的小汽车中,胡列特对淋着雨的年轻人说:“孩子,请记住,千万不要随意拒绝一个老人的好意。”就是在这次送自己学生回家的雨中之旅,胡列特意外地发现了一位对英国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并初显出造诣的华族青年,他决意帮助林文庆摆脱经济困境,培养他考取英总督刚刚设立不久的女皇奖学金,送他到英国深造,他深信林文庆定“会出人头地”,他对他的前途怀着比莱佛士任何学生“更大的信心”。[①] 胡列特一面亲自找了自己的朋友章芳琳,让这位林家的东家到林家劝说林文庆的祖父母,保证了林文庆学业的继续;一面开始给这位青年“开小灶”,补习英文,指导阅读朗诵莎士比亚戏剧,循循诱导他的学业,林文庆听从了胡列特的话,他没有“拒绝一个老人的好意”,也没有辜负这个老人的期望,学业成绩突飞猛进。1887 年,林文庆实现了胡列特与自己的想望,在英女皇奖学金的遴选考试中获得

① 宋旺相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 198 页。

优异成绩，成为第一位赢得女皇奖学金的华族青年，这一年林文庆刚满 18 岁。

◎英女皇奖学金得主，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林文庆。
严春宝供图

19 世纪的大英帝国，正处于登峰造极的辉煌时期，尽管世纪末的精神危机已经在现代工业的轰鸣声中露出端倪，但雾中的帝国依然是一片繁华景象，展示给每个外来人的是一个现代的昌盛的世界。

林文庆走进了这个现代工业最早发达的国家，他来到了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迈入了大英帝国创建于 1823 年的古老的爱丁堡大学，在那位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曾经学习生活过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那时，爱丁堡大学的事业发展正如日中天，这里聚集着一批世界顶尖的医学家，包括后来成为英

国病理学之父的莫尔。带着父亲破伤风不治而亡、兄弟摔伤而死的心灵创伤，凭着每年 200 英镑的女皇奖学金，林文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且获得了 Atholl Medal 金质奖章，成为远东地区赢得这项奖励的第一人。1892 年，林文庆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而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是，恰恰是在西方的英语世界里，这位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大汉民族子孙，萌发了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渴望，他买了一本学习中文的英文书，由此开始了他持续 40 年之久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执著学习与坚守。

大学毕业后，林文庆先是留在爱丁堡大学皇家医学会图书馆工作，不久便接受剑桥大学病理学系主任 Roy 教授的邀请，到了剑桥大学，在 Roy 教授的指导下担任病理学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剑桥康河那“波光里的艳影”，似乎已经为林文庆荡漾起一幅医学教育研究的锦绣图景。

但就在这个时候，林文庆的祖父林玛彭在新加坡去世，故乡开始呼唤远方游子回归。“从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在英国学习生活了 6 年多的林文庆要回家了，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还有那与他的生命血脉相连的中华文化的怀抱。

回到新加坡那年林文庆 24 岁，他先在自己住家附近的直落亚逸街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开始他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生涯，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第二年，他联合爱丁堡大学的同学罗伯逊医生，在新加坡闹市区的莱佛士坊开设了九思堂药房，创下了新加坡华人开办西药房的先例。不久，林文庆的高超医术开始在新加坡流传开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1894 年阳春三月的一天，中国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著名诗人黄遵宪来到了九思堂，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亲具衣冠”，给林文庆送来一块自己精心题写的匾额。匾文为“功追元化”四个大字，并有跋文一段，跋文不仅节书《华佗传》以喻示林文庆为当今华佗，还称林文庆“从三万里外学成而归，上追二千年前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表明自己赠匾“盖以谢其

医愈之德也”，也“兼为华人幸”。[①] 原来，黄遵宪久治不愈的病症就是在林文庆手下治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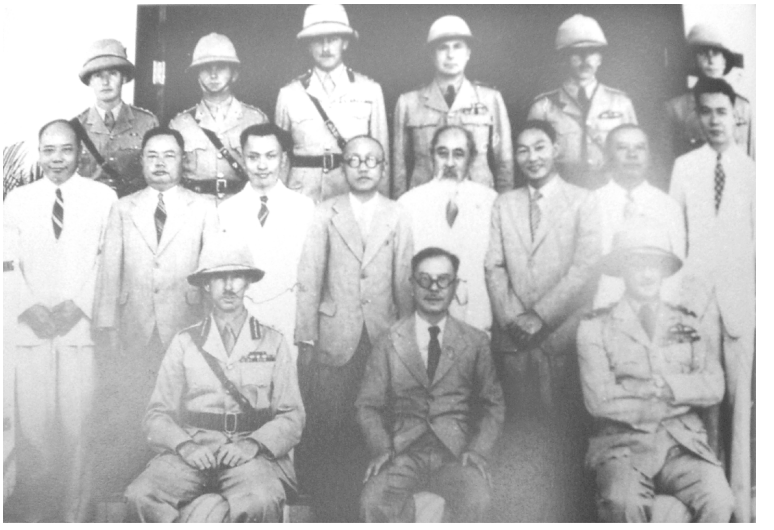
林文庆回到狮城的时候，黄遵宪在新加坡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但此时他患了肺结核病，这种今天看起来并不严重的病症，却一度是人类的险症，直到20世纪初期还在不断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即使是西医也尚无一套根治肺结核的有效方法。当时黄遵宪实在无奈，他只得听从随从和友人的劝告，电呈清政府请求辞职，回中国休养治病。正是在这个时候，黄遵宪得到林文庆从英国学成归来的消息，即刻登门求医。面对着这样一种西医也束手无策的病症，林文庆想到了自然界一个特别的现象，即自然界凡是食肉类的动物，像老虎、狮子、狗之类的都不会患肺病，他根据自己对犬类动物的实验研究，认为狗肉具有补肺气的作用，于是让黄遵宪以狗肉为药，吃狗补气治病。黄遵宪虽将信将疑，终究没有其他更好的治疗途径，何况狗肉也还算佳肴，于是大量地吃起了狗肉，却不料这一着真的有了灵验，狗肉吃着吃着，他的肺结核症状也就逐渐地消失，身体竟然康复了，也就收回了辞职的呈电。

林文庆精湛的医术和治病救人的医德很快誉满狮城，他成为新加坡迅速崛起的一代华人名医，最终被殖民政府任命为政府医官。这期间，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与华社领袖陈若锦一起，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推动了英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的创办，这所医学院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是新加坡培养医学人才造福社会的最主要学府。从1907年至1910年，他在这家医学院担任义务讲师，之后被委任为医学院的董事，被授予医学院名誉院士。1911年，林文庆奉肃亲王谕前往北京，担任清政府内务医务顾问及北京西医院监督，同年，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巴黎和罗马召开的国际医学会议，并前往德国德累斯顿参加万国卫生博览会。辛亥革命成功后回到祖国，与孙中山同船前往南京，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机要秘书兼医官，第二年升任卫生部总监督。1921年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后，

① 新加坡《叻报》1894年3月14日。

他一直关注着厦门的社会卫生和疾病状况，为了解决学生与厦门市民的医疗问题，不辞劳苦奔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募捐，筹集资金，从设立分诊所与医药处开始，一步一步地创办起厦门大学公医院，向全社会开放。1930 年，他还联合厦门各界有识之士，为弘扬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造福社会”的精神，共同倡议创办厦门中山医院，并被推举为中山医院的董事长。在医学的道路上，林文庆是一位集医生、学者和医官三者为一身的医者。陈嘉庚曾将医生分为三类：“一自救，二自救并救小部分之人，三置自救于不顾而注意以大规模救人为职志。”[①]在陈嘉庚眼里，林文庆就是那“置自救于不顾而注意以大规模救人为职志”的人。

人们或许很难想到，林文庆这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学博士还是新加坡经济舞台上的杰出人物，在新马经济开拓史上，至少有两件大事与林文庆的名字是紧密相连的，这就是新马橡胶种植业的兴盛与银行保险业的崛起。



◎陈嘉庚、林文庆与英国殖民地官员合影。严春宝供图

众所周知，在一段不短的历史时期，橡胶业是新加坡、马来

① 《陈嘉庚先生在中华俱乐部欢迎林文庆先生之演说词》，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26 年 2 月 1 日。

亚的支柱产业，陈嘉庚便是凭借着建立庞大的橡胶王国才赢得了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巨额资本，但陈嘉庚却称林文庆为“树胶种植之父”。原来，东南亚一带并不生产橡胶，19 世纪末，一个叫李德利（H.N.Ridley）的英国人首先将橡胶幼苗移到自己的新加坡种植园，他意识到这是一种会给人带来金山银山的植物，便发疯似的向新马人鼓吹推荐，但人们不理睬“李橡胶”，将他的一次次橡胶鼓吹当成阵阵疯话。1896 年的一天，李德利遇到了在种植园散步的林文庆，他给了林文庆几颗橡胶种子，继续讲述他的橡胶神话，但此次他碰到的是一个有目光有头脑的人。林文庆经过对新加坡的土壤分析和实验后，确认了李德利的神话，于是，他联手了马六甲的陈齐贤，合资成立了联华树胶有限公司，创立了新马第一家华人树胶园，拉开了橡胶树在东南亚大规模种植的历史，开启了新马橡胶种植业前所未有的盛况，之后，陈嘉庚从陈齐贤手中抢先购买了 18 万颗橡胶种子，开始了打造橡胶王国的辉煌历程。

金融是经济活动的命脉，但在新马一带，华人金融业的眼光与意识一直到踏进 20 世纪门槛时才萌生。1912 年 9 月，林文庆联合华人富商李俊源和林秉祥，出资一百万成立了“华人商业银行”；1917 年，他再次与李俊源、林秉祥合作，联合黄仲涵、黄奕住等华商成立“和丰银行”，和丰银行的手脚从新加坡伸向马来亚，成为当时当地最大的银行，林文庆任银行首席董事；1919 年 10 月 1 日，林文庆联合其他几位华商成立的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开业，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金融公司，林文庆任公司的首任主席；1920 年 2 月，林文庆又和朋友开始筹办华侨保险有限公司，成立了新加坡第一家华人综合性保险公司，他被委任为该公司的董事，之后，他还参股了联动保险公司，林文庆因此成为东南亚一带华人金融保险业的开拓者。

“手到春回”的医生、“橡胶种植之父”、金融保险的先驱，林文庆在各种领域都宣示出了自己的智慧，屡屡建立功勋，在新马人民尤其是华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华社可以放心地委托”、“保护他们至高无上的福利与权益”的“富有经验的行家”，一个“通精老练，明察秋毫，深谙多种语言”与对公众事务“具有

远见卓识”的“太平局绅”[①]，他曾几度出任新加坡立法议员，担任过殖民地政府内务部顾问，出任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务，鉴于他对新加坡的贡献，1918 年英皇特别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新马一带的老百姓说：“新加坡共有两驾半的马车，一驾是英总督，一驾是林文庆博士，还有半驾是××人。”[②]

由同情康有为、跟随孙中山到执掌厦大

1898 年是戊戌年，这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仅仅坚持了 100 天便宣告失败。变法失败，乌云压城，追捕杀戮维新派的腥风血雨猛起，慈禧以高达 14 万两白银的悬赏捉拿百日维新的头号人物康有为，并派出刺客四处追杀。康有为及其弟子犹如惊弓之鸟，开始了海外的流亡逃难生活。

◎康有为像

1900 年 2 月，康有为从香港逃到了新加坡，此时，新加坡的报纸上，频频爆出了慈禧刺客南下的消息，并称已经有 4 名刺客抵达新加坡，尽管新加坡总督瑞天成想方设法保护康有为，通过当时的立法委员林文庆数次转换康有为的藏身之地，但康有为依然是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为了保护康有为，一幕由林文庆导演的戏剧开演了。

2 月 23 日早晨，康有为和他的随从在英警方的保护下，登上一艘英国邮轮的汽船，他的这趟出行，一边受到警方的护卫，一边受到许多支持变法的华人的欢送，而且动身之前，林文庆

① 宋祖望：《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 431 页。

② 曾郭棠：《林校长在星洲的地位及其为厦大奋斗牺牲的精神》，载《厦大周刊》第 14 卷第 18 期(1935 年 3 月)。

就有意放出风声，让媒体事先获得康有为要离开新加坡的消息。当康有为乘坐着英国邮轮驶向大海后，人们深信这位维新变法的干将离开了新加坡逃往其他国家了。第二天，新加坡的报纸纷纷登出了康有为离开新加坡的消息，报道了康有为离开时的具体情形。然而，康有为的这次逃离却是假的。原来，为了迷惑清廷和清廷派出的刺客，林文庆使用了一次金蝉脱壳之计，当邮轮开到浩淼的大海后，康有为又悄悄地下了邮轮，登上早已在海上准备好的小船，神不知鬼不觉地重新登上新加坡海岸，躲进了邱菽园开设的“客云庐”内，躲过了清廷刺客的严酷追杀。

从2月到8月的半年时间里，康有为在新加坡过着东躲西藏的蛰居生活，也一度将林文庆家作为隐蔽之所。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总督瑞天诚、友人邱菽园和华社领袖林文庆等拥护维新变革的新加坡人的保护和支持下，以新加坡为基地，遥控指挥和组织勤王军，策划了1900年8月的汉口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在新加坡，林文庆成了邱菽园之外康有为最信赖和倚重的人。

林文庆对于康有为的保护，实际上源于他对戊戌维新变法的认同与支持。自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接触中华语言与文化后，林文庆就一直关注着祖国与中华文化的命运。回到新加坡后，他结识了新加坡唯一的华族举人邱菽园，娶了也是晚清举人的黄乃裳的女儿为妻，林文庆的文化思想就更加中国化了，也更热烈地期望着中国的革新改良。邱菽园和黄乃裳是让林文庆更加走近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人物。

邱菽园（1874—1941年），福建海澄人（现归属厦门海沧区），自号星洲寓公，光绪举人。1895年因继承遗产而成为华侨巨商。此人有江湖义气，喜好济助结交四海之内的朋友，从不吝啬金钱，只要有中国的留学生经过新加坡到他府第读书论经，向他求助，他都会慷慨解囊，少则几十元，多则数百元。1895年2月，邱菽园在京城参加会试，正奉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于是参加了全国千位举人抗拒“和谈”的“公车上书”事件，接受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思想，结识了康有

为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由此成了康有为的朋友，并且于1898年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宣传鼓动维新变法运动，与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一起，一南一北为维新派摇旗呐喊。林文庆是在“公车上书”的第二年结识邱菽园的，他与邱菽园一起办报，一同组织会社，还共同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华侨女校，引进了西方的教材、教育方法，革除科举学堂的陈旧陋习，两人“志行相合，雅相引重”，共同“将欧美良法输灌宗帮，冀臻盛治”。[①]在邱菽园的影响下，林文庆同情、支持康有为和中国的维新改良主义运动，邱菽园则写信给康有为，推荐林文庆为“海外友人第一豪杰”。

黄乃裳（1849—1924年），字绂丞，福建闽清县人。他是晚清的维新志士，三弟黄乃模是“致远”号巡洋舰副管带（副舰长）。甲午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与伪装成美国舰队的日本舰队遭遇，展开激烈战斗，遍体鳞伤后依然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击日舰，不幸被敌舰发射的鱼雷击中，黄乃模同舰上252名官兵一起，与“致远”舰一起为国殉难。不久，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黄乃裳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一气呵成《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倡导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发展工商业抵抗外国侵略。1896年4月，黄乃裳自筹资金独力创办的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建》，倡导广开言路，针砭时弊，实行维新，引起康有为、梁启超、王锡蕃等维新派的关注与赞赏，并由王锡蕃推荐入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在京期间，他遍访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门庭，六次晋谒李鸿章，八次上书皇帝，倡言变法维新。1898年9月戊戌政变，光绪被囚禁，“六君子”伏尸都门，黄乃裳乃冒死通知康、梁出走避祸，之后离京返回福建。1899年秋天，黄乃裳举家登上“格兰诺”号，远涉重洋。黄乃裳的长女黄端琼是个周游过世界的女性，一位学贯中西的才女，深得李鸿章的赏识。1896年12月29日，即黄乃裳创办《福建》的几个月后，同是福建人的林文庆和黄端琼结

① 转引自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年印行，第29页。

婚，结婚后的林文庆显然受到岳父与妻子的影响，有了一个了解中国和研读经书的极好环境，由此，他不但认同与支持中国的维新改良，而且文化思想上日渐倾向传统儒家，由笃信基督“改信了儒教”，将关注的问题与焦点逐渐移到了内忧外患的中国，成为之后新马华族社会儒家思想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个时期林文庆关于中国的观察研究，集中在 1901 年编印的《中国内部之危机》一书，书用英文写作，叙述与分析了中国的维新运动和慈禧的暴政与危机，从内政与外交上阐述了当时中国的状况，透露出一个海外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革新的祈盼。

康有为在新加坡遥控的汉口勤王起义失败后，备受仁人志士的指责，尤其像邱菽园这样的华侨领袖，他为了支持唐才常汉口的“勤王起义”，在新加坡华侨中募集了大批捐款，自己也两次捐出 20 万元，但康有为并没能及时将捐款送抵起义军手中。起义失败后，清廷扣押了邱菽园在中国的亲属，将他列入“唐才常同党”公开通缉，邱菽园只得散尽金钱来保住自己的亲属和剥离“同党”的罪名，经济元气从此大伤。但经历了这段挫折之后，他也逐渐看清了康有为保皇的性质，与康有为公开绝交，转而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派。邱菽园与康有为绝交后，林文庆也逐渐疏远了康有为，最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晚清时期的中国，政治上的三股力量是搅拌在一起的，其一就是占据着江山统治权的清政府；其二是主张维新改良的康有为保皇派；其三就是屡败屡战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戊戌变法维新失败，汉口“勤王起义”被镇压，尽管维新派与革命派曾经有过合作救国的尝试，但合作终究因为改良与革命的不能相容而烟消云灭，之后，人们将改变黑暗中国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上，那个首先在海外发起的同盟会成了众多爱国华侨认同的革命组织。

从 1900 年夏天开始到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一生中曾八次到新加坡，在第一次抵达新加坡时，他便与林文庆结下了不解之缘。1900 年 7 月，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琦寅藏前往新加坡见康有为，为孙中山联合康有为协力救国当说客，不料康有为

恐惧于清廷刺客，疑心宫琦与青藤二人就是传闻中从日本下来的刺客，也不顾宫琦曾经护送自己到日本避难的救命之恩，拒绝与宫琦相见，并向殖民地政府报警，致使宫琦、青藤二人被当成清廷刺客逮捕起来。得知消息后，孙中山不顾危险，立即从越南乘船抵达新加坡营救宫琦二人。那时林文庆已是新加坡立法议员，孙中山听从同窗好友黄康衢和吴杰模的建议，拜会林文庆请林文庆出面帮忙搭救宫琦、青藤二人。林文庆尽管当时还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尤其反对暴力革命，却为孙中山的大公无私、重振中华的赤诚所感动，便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最终，经过林文庆的积极斡旋，总督瑞天诚接见了孙中山，相信了宫琦、青藤来新加坡的真正意图，于是放了宫琦、青藤二人。但殖民政府担忧孙中山将新加坡当作在南中国发动起义的基地，便将孙中山与宫琦、青藤一起驱逐出境，并限制他们 5 年之内不准登陆新加坡。这次见面，让孙中山看到了一位甚有才干和作为的新马中国人，林文庆也真切地体验到一位革命先行者的光明磊落与理想乐观，比照康有为的贪生怕死和疑虑忧心，林文庆对孙中山的革命有了新的认知，孙、林两人的友谊由此开始。

◎油画：林文庆向孙中山介绍陈嘉庚加入同盟会。
严春宝供图

1906 年 4 月，5 年不能登陆新加坡的期限刚满，孙中山就来到新加坡，这次的到来，带来的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成立。

当孙中山看到首次加入同盟会分会的12人中没有林文庆时，他立即请正会长陈楚楠和副会长张永福约请林文庆见面，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孙中山与林文庆长达数小时以及连续三个晚上的长谈，孙中山终于成功地说服了林文庆加入了同盟会。从此林文庆便与已经是著名的革命党人的岳父黄乃裳一样，为推翻中国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尽着一位华侨的职责。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林文庆立即从欧洲乘船赶到汉口，稍后孙中山也抵达汉口，孙、林与黎元洪、黄兴四人一起同住一个帐篷里，商讨着革命的局势与建立共和的举措。之后，林文庆与孙中山同船前往南京。1912年，当孙中山在南京明陵前向国人宣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共和诞生的时候，林文庆就肃立在孙中山的身边，此时，他受命为临时大总统的机要秘书及军医官，第二年升为卫生部总监督，从那时起一直到袁世凯专权、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之前，林文庆一直伴随着孙中山的足迹，为先生及其共和事业日夜操劳。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后，林文庆也辞掉身上的一切职务，回到了新加坡。

1921年5月，“非常国会”成立，孙中山再次由国外回国，在广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此次，富有理想的孙中山谋划起一场由南向北打倒军阀的战斗，他迅速将一批得力干才重新召集到自己身边，也向新加坡的老朋友林文庆发出电召，召他回国襄赞外交，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萃英辞去厦门大学校长职务，之后，厦大学生闹起风潮，开会向校方提出要求减少必修课学时、改良课程设置等十九条件。陈嘉庚一面亲自坐镇主持学校工作，维护住刚刚诞生的这座南方学府，一面接二连三急电新加坡好友林文庆，邀请他相助出任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手持两份电文，一为从政，应大总统委托执掌“非常国会”外交大权，仕途风光无限；一为出任校长，帮陈嘉庚实现教育救国宏愿，于清苦的教育生涯中培育生命的绿树。面对着这来自两个自己都很钦佩的人的邀请，林文庆将这个难题交给了孙中山，请大总统为自己定夺。出于对中国教育的关切与对陈嘉庚教育救国举动的敬佩，孙中山回电林文庆，同意他前往厦门主持厦大校

务，而此时林文庆的第二任妻子殷碧霞想念家乡想念病中的母亲，渴望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厦门，于是林文庆给陈嘉庚回电，一个月准备之后便到厦大赴任。

有人说，林文庆放弃仕途而选择走进厦大，是因为“第一即为景慕陈嘉庚先生兴学之仁风，第二则欲实现其素来提倡孔子教育之主张”，[①]而陈嘉庚的解释是：“一、林先生由于良心上之天职以尽义务；二、不忘为学生时代在英伦大学受教师之训戒，当力行博爱及大规模救人之宗旨；三、不敢违背本坡政府官费生之主义，尽政府培养优秀分子，莫非希望他日成才为大规模之救人且无界限地方种族。”[②]作为好友的陈嘉庚显然更能从林文庆的精神境界和内在世界去理解林文庆的选择。事实上，兴办教育也是林文庆推进社会进步的一个梦想。从爱丁堡回到新加坡后，他与邱菽园、陈合成发起创办了华人女子学校，担当起华人女子教育的重任；他倡导新加坡要有自己的医科学校，促成了爱德华医学院的设立；他还在新加坡开埠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开始谋划筹办一所马来亚自己的大学，陈嘉庚提出创办厦门大学时，他是陈嘉庚的有力支持者。林文庆的“大规模救人”的“天职”，他对于教育的热衷和身体力行，让陈嘉庚在厦大遇到困境时就想到他，也促使他毅然决然地走向跟随陈嘉庚创办南方之强的教育之路。

1921 年 6 月中旬，林文庆带着家人来到厦门，从此开始了他长达 16 年之久的厦门大学校长生涯。

“自强不息”与“止于至善”

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前者为校主陈嘉庚提出，后者为私立时期的校长林文庆确定。“自强不息”是

① 《林文庆博士在暨南学校演讲会记（暨南通讯）》，载新加坡《叻报》1924 年 6 月 6 日。

② 《陈嘉庚先生在中华俱乐部欢迎林文庆先生之演讲词》，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25 年 2 月 1 日。

那个时代的关键词，蕴含着一种民族的浩然之气，一种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胆魄与气概；“止于至善”是种思想精神境界，是中国文化的人格理想，蕴含着生命对于至善至美理想的追求与践行。

“自强不息”是在厦大立校那天亮出的精神话语。1921 年 4 月 6 日厦大举行开校式，演讲台中间悬挂的是陈嘉庚指定的四个大字——“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出自于《周易 · 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史上曾留下一段佳话，说晋朝荆、江二州刺史陶侃以“自强不息”为座右铭，励志勤力，督领八州军事，从而屡建战功，唐代开元年间编修的《礼学记》记载陶侃事迹便是“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厦门大学创办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代，甲午中国海军战败，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失利；戊戌维新仅存百日就被政变翻了个底朝天，光绪、康有为的君主立宪终成泡影；武昌起义爆发，换来的是袁世凯的专权、张勋的复辟以及袁世凯的称帝，孙中山的共和理想遭受沉重打击；而西方列强对中华大地则虎视眈眈，瓜分中国的野心和行动日益放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此时正如陈嘉庚所说的是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之时。正是在这个民族危机四起而希望犹存的时候，每一个有抱负有责任的中国人开始抛弃幻想，走向了自强救国之路，或践行实业救国，或力主教育救国，或倡导科学救亡，或以改造乡村社会寻求中国之出路，仁人志士们从老祖宗那里寻得一把催促民族自立的精神利剑，以君子之道自强自立，奋发图强，不懈奋斗，“自强不息”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用中国私立大学的“第一个拓荒者”郑伯苓的话说是“自强之道，端在中国”。当时，以“自强不息”为精神标高的不仅是厦门大学，建校早于厦门大学 10 年的清华大学也是将“自强不息”作为其校训的首句，水木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止于至善”是林文庆到达厦大后确立的厦大校训。“止于至善”源于《礼记 · 大学》，《大学》开篇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按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四书》中的解释，“亲民”即“新民”，这便是启迪提升民之智性与道德，去旧习

恶染，新进步事理；“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林文庆认同中国的儒家文化，他将儒家文化尊奉为宗教式的儒教，他取《礼记》“大学”篇中的“止于至善”为校训，意在表明厦门大学应该是始终如一、永无止息地追求最高理想，在启智与道德上达到完美至善的境界。在20世纪20年代，以“止于至善”为大学校训的还有东南大学，制定者便是有着“东南大学之父”之称的郭秉文，他也是陈嘉庚邀请的厦大筹备委员之一，他从“止于至善”的校训出发，要求东大学生养成“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的品格。

林文庆于1921年7月4日正式到校视事。那个时候，前校长邓萃英仓促辞职，化学家刘树杞教授受陈嘉庚委托暂时代理校长，维持着刚刚诞生的厦大的日常秩序，但一切都还“未有头绪”，学生犹如无头苍蝇，不知所向，大多是“汲汲欲藉学校毕业为利达之资，而志在深造者殊鲜不可得”；[①]教师则有的已随邓萃英辞职而去，留下的则大多没有长远打算，就像鲁迅后来所看到的，“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而且，在创校最初的五年中，厦大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校内教职人员的不能合作，“闽南人与闽北人之感情如水火”，本土教师、外来教师各立山头，鲁迅称此情形“就如一座梁山泊，你枪我剑，好看煞人”，[②]校主陈嘉庚也察觉到这个问题，他曾说：“教职员六七十人，难免无程度参差，品流庞杂之患，且多属欧美日留学生，意见分歧，逐分党派，而一般无气节者，甚至巴结学生，以固地位。”[③]除了师生这个学校的关键因素外，当时林文庆的直接感受是：“本校种种之组织均未完全就绪，大纲之修改，各种规则之制定，学校政策之采择，各学部及各学科之设立，均需通盘筹画。”[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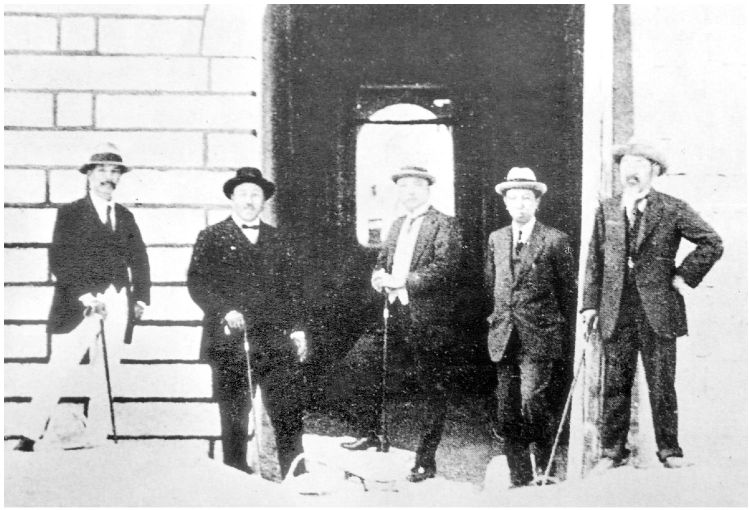
① 秉志：《林文庆传·前言》，载严春宝著：《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②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真迹》（原信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③ 陈嘉庚：《辟诬》，载《南洋商报》1924年6月17日。

④ 《厦门大学民国十年度报告书》，1922年。

视事当天晚上，林文庆召集了一个学生座谈会，宣布要把厦大“办成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从自己制定的“止于至善”的校训出发，林文庆以他通西学尊中学的思想和多才严谨的品格，为厦大带来了最初的一套独特的办学主张和实现陈嘉庚办学理想的周密思考，确立了私立时期厦门大学的办学宗旨、组织机构、学院规则、学生通则等一整套系统的纲领、章程与制度。



◎陈嘉庚、林文庆等人视察建设中的厦大校舍

在办学宗旨上，林文庆深知陈嘉庚创办厦大的宏愿与用心。那是辛亥革命告成之后的一天，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总统，林文庆赴南京为临时政府服务，他与正要带家眷返乡的陈嘉庚同船回国。在浩淼的海洋上，两位老友促膝相叙，“论议时政，相顾欷歔”，辛亥革命的成功给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侨带来极大的兴奋与鼓舞，面对着封建专制的垮台，陈嘉庚那时并没有意料到中国还有一幕袁氏闹剧要开演，他以为孙中山的共和就此会走在大路上了，他自问道：“政治有清明之望矣，而匹夫之责将何为？”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位“志怀祖国，希图报效”的新马华侨，向老友透露了自己发愿兴学的打算。他

说:“慨民智未开,则共和基础,终无由巩固。”[①]这位中国人想得很远,他是跟着那开启民智的时代潮流走过来的。正是这次返乡,启动了陈嘉庚从集美小学开始的南方教育王国的建设宏图。

林文庆到厦大后,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陈嘉庚办的厦门大学,“虽名为厦门大学,实则为世界之大学,所收学生,不唯中国十余省子弟,即外国如高丽台湾亦有学生来肄业”。[②] 当他着手确立学校的办学宗旨与目标时,他首先依据中华民国《大学令》的“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申明厦门大学“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三大宗旨,由此宗旨出发,他在《厦门大学校旨》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厦门大学的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建成“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的大学。

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发端于清末民初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其制度借鉴于西方大学,是横向移植的,而非纵向的继承,所以一开始便纠结着中体与西体、中学与西学孰轻孰重的矛盾纠葛。最早的办学主张是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主张带着对西学侵入的高度警惕;而后的百日维新,正式将建立综合性大学提上议事日程,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因此创立,并且统辖各省学堂,此时的办学主张是“中西并用”,梁启超在其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就提出大学的办学方针有两条:“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便是中学为必修的普通学科,西学为选修的专门学科。林文庆来自于西学的教育背景,但他本人又特别钟情于中国文化,尤

① 林文庆:《陈嘉庚先生与本校》,载《厦门大学九周年纪念刊》(1930 年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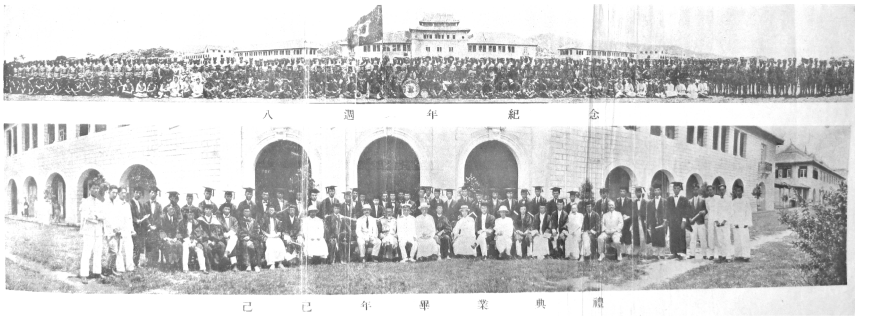
② 《林文庆先生在中华俱乐部之演说词》,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26 年 2 月 2 日。

其是儒家思想，因此提出发扬古今中外的学术，注重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底蕴、功用与美质，建设最新最完善的文化，这种目标的高远与胸襟的宏大，堪称是那个时代的一声教育强音。

从这样的办学主张出发，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校旨》中强调：厦大的教学要“以切于实用，造就应用科学人才为前提”，要“养成各种高等专门人才，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学生“能与世界各国大学学生受同等之教育”。在中西问题的纠葛上，他认为既要让“吾国数千年之文化赖以不堕，而近世各国之学术思想亦得彼此沟通”，虽“首重国文，而英文一科亦极重要”。这样一种世界眼光与中外并重的培养理念，实在与林文庆的博学和眼光有很大关联，林文庆说：“我们办学的目的，不在乎校舍的美丽，取快人心于一时，而在内容完善，得谋发展于将来。”要内容完善，谋求于将来，“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良好教授之聘请，实验室之设备，以及各种图书之充实”。立足于实实在在的内容，立足于世界的将来与学生的将来，林文庆认为，“为求美观，将全部经费移用于建筑方面，根本就是不妥当的”。[①] 由此，他将更多的办学经费用在办学的刀刃上，尤其不惜重金礼聘知名的教授、学者来到海角执鞭，将一个偏居一隅的厦大办得有声有色。在他执掌厦大期间，厦大的规定是：教授月薪可达 400 元，讲师可达 200 元，助教可达 150 元。而那时同样是私立的复旦大学，其校长及专任教授的月薪最高也只达到 200 元，至于国立的北京大学，教授每月的口袋里则还要拮据。有一段时期北洋政府连北大的教师工资都要欠账，鲁迅到厦大之前，就因月薪欠账问题而要与北洋教育部打官司。林文庆的“内容完善，谋求于将来”的方针，带来的是体系较完备的多学科厦大的创立，是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的聚集，是办学条件的充实完善。1928 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对厦门大学展开全面调查，调查的结论是“基金充裕，成绩甚佳，各种设备，亦极完善，方之他处，有过无不

① 林文庆：《厦门大学十周年纪念的意义》，载《厦门大学十周年纪念刊》。

及”，[①]厦门大学也因此先于金陵、大同、复旦、沪江、大夏、燕江、南开等 8 所大学获得政府的立案。



◎1929年厦门大学建校八周年纪念照

在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上，林文庆宣示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与那个时代的救亡图存的主题一致，他强调大学的人才培养“对于国家有很大的责任”，他说在那个“还没有全国承认的中央政府，没有一省完全平静”的“大局到处骚动”时代，厦大培养出来的人是要“救中国”的，要“为全世界人类服务”的。但他并不赞成甚至反对学生去参加社会运动，他希望的大学能培养出领袖人物、精英人才出来挽救中国的局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救中国的方法很多”，“大学教育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能够养成全国的领袖人才”。何为领袖人才，在林文庆“止于至善”的精神境界里，首先是符合“智仁勇”的“士君子”。他说，“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不外乎三种：一富国，二治安，三与各国平等，“但这些问题不是大声疾呼所能得到的，也不是各处骚动可以得到的”，而要靠中国传统中的“智仁勇三者”，“所以要救中国，先须养成人格，没有人格，就没有法子”，这就要“全靠有相当的大学指导人格教育，养成全国风气，使人人为士君子”，培养“德智体三方面完全”的“士君子”[②]。很显

① 《厦大周刊》第 180 期(1928 年 3 月 3 日)。

② 《本校五周年纪念会林校长之演说词》，载《厦大周刊》第 155 期(1926 年 6 月 19 日)。

然，中国传统的君子之道、圣贤之思、人格理想是林文庆大学人才培养的关键元素，林文庆的愿望是“能使集美厦大造成许多学行优良的男女以挽救中国，并为全世界人类服务”，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造成良善的公民，他们能实行古今中外的圣贤之遗教。于是中国人民可以安全的建设一个新国家，基于全体人民的意志，谋全民族的安全、幸福与昌荣；而且不仅为我们的民族，我们还应当尽我们的能力以改进全世界人类的命运！这还有实现大同的真理，安性立命，范围全世界在一个团结之中”，[①]由此，他要求厦大学生“各抱至伟至大之毅力，至勇至诚之愿望，各奔所学，各尽所能，为国家增光，为人民造福，万勿辜负本校造就人才之至旨”。[②]

培育“至伟至大之毅力，至勇至诚之愿望”，林文庆这种以人格树人的思想是与那个动荡的时代相关的，也是他钟情、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当时，与林文庆培养人才理念相似的是执掌交通大学十四年之久的唐文治校长，唐文治的培养人才首重以德树人，他认为大学人才道德是基础，科学是房屋，“基础未筑则房屋不固”，他称：“欲成人才，当成第一等人才。而欲成为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③]首重道德与人格，培养“士君子”的“智仁勇”与“第一等品行”，这样一种与西方张扬个性、强调自我所不同的人才理想，恰恰体现了中国现代大学虽为横植西方体制，却也有自己人才培养的理想设计。

建立国学院的欣喜与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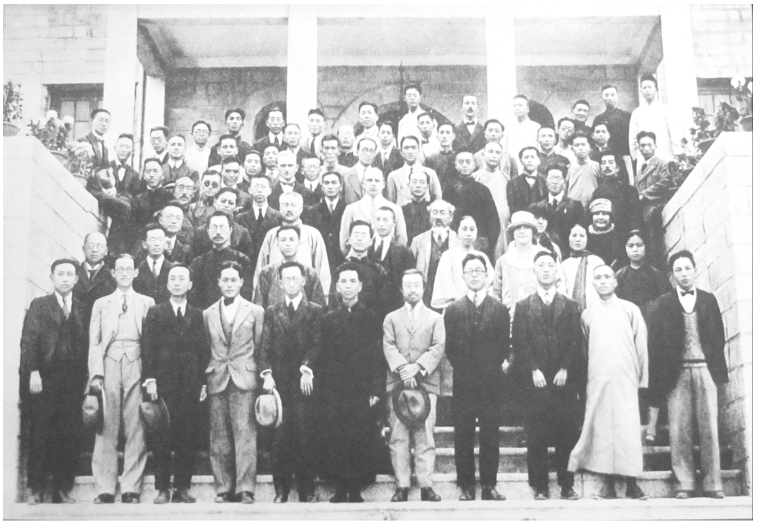
1926 年 10 月 10 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这是继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门之后中国高校成立的又一个“研究高深

① 林文庆：《陈嘉庚先生提倡教育之目的》，载《厦门大学八周年纪念特刊》(1929 年 4 月)。

② 林文庆：《大学毕业生之责任》，载《厦大周刊》第 155 期(1926 年 6 月 19 日)。

③ 唐文治：《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词》，载《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一。

学问”的国学专门研究机构，林文庆亲任国学研究院的院长，而整个国学院的学术班底，则基本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延续。在当时的学术界文化界眼中，厦大国学院的成立是件振奋人心的大事，人们称其势头“大有北大南移之势”。



◎1926年厦门大学全体教师合影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国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是伴随着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调整而发生的。

1915 年新文化运动滥觞，中国现代文化先驱者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直取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以彻底“打倒孔家店”的姿态，反对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想象与设计着一个现代民族的中国，1911 年之前原本盛行的“国学”研究也淡出了学术舞台。但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化革新方略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种“东西洋文化接触之后，酝酿出一种新文化来”的思想滋生发展起来[①]，就连“愿拖四十二生大炮”为打倒旧文学旧文化充当急先锋的陈独秀，也以“宣言”的形式发布了《新青年》同人的新主张：“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

① 罗家伦：《复熊真子函》(1920 年 5 月 28 日)，载《新潮》第 2 卷第 4 号。

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①]1921 年 1 月，这位高喊“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也在演说中提出：“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②]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胡适则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③]，将“整理国故”提上新文化建设的议程。此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逐渐暴露，西方思想界出现了反思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和赞颂东方古老文明的思潮，中国一批留洋的学者也由此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了“保存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又引发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愤慨与重新认识，促成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1917 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道路的更多方向的思考。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中国现代文化先驱的思考轨迹，从单一的仿效西洋文明转变为综合中西文明创造未来文明的轨道上。1919 年初，北京大学的旧派学者刘师培、黄侃等人成立国故社，创办《国故》月刊，提出了研究国故的话题，尽管他们的思想遭遇到新文化阵营的激烈批判，但毕竟将“整理国故”问题提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思考中。1922 年 3 月，北京大学决定停办《北大月刊》，改出四种季刊，其中之一就是以胡适为主编，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新文化人为编辑的《国学季刊》，胡适还亲自撰写了《发刊宣言》，阐述了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具体主张。同年 12 月，北京大学确立“国学门”为学术研究的四门之一（其他为自然科学门、社会科学门和外国文

① 《〈新青年〉宣言》，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 页。

② 《新教育是什么？》，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0 页。

③ 《新思潮的意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2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1 页。

学门)。北京大学学术研究的这些变动,实际上是出自于沈兼士所说的以“国学”“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的意愿,是出自于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汉学研究可能被西学彻底取代的焦虑,是使中国大学不沦为西方附庸而打开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五四”后期新文化人的整理国故、融合中西文明的主张,已经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珍视和肯定,展现出在对待传统问题上与“五四”前期的全面反传统全然不同的姿态。20 世纪 20 年代大学国学专门研究机构的出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这也构成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的历史文化背景。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一是出自于陈嘉庚的办学宗旨。林文庆说:陈嘉庚先生请他出任校长时,他即询问其将来之办学宗旨,陈嘉庚回答说,中学西学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故鄙人来校之后,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此次特组织国学研究院,聘请国内名人,从事研究,保存国故,罔使或坠。”[①]一是与校长林文庆的文化思想息息相关。陈嘉庚与林文庆的西方经验和民族身份,他们“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的精神和信念,与他们的异国现代性经验和民族身份紧密相连。

自从林文庆在爱登堡大学开始学习中国语言之后,这位血脉里流动着华夏血液的中国人,便将生命与自己祖先的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念念不忘于为祖国文化的振兴尽绵薄之力。有一次,作为医学家的林文庆到北京参加一个政府召开的医学会议,在会议上,中国医生代表讲起医学的名词和术语,用的全是洋文,而“将中国固有名辞,完全废弃”,这种情形让林文庆“不禁生无限感慨”。对林文庆来说,他成长于新加坡,学习于英国爱登堡大学医学院,英文毕竟是他的第一语言,论起医学洋话,他自然要比别人来得“溜”,但他却对在中国土地上开的医学会议上洋话连篇表示出“痛心切齿”,感到这是一种文化的耻辱。他说:“因念中国数千年来固有文字,竟衰替一至于此,真是令人痛心切齿。”此事过后不久,陈嘉庚找上门让他出任厦大校

①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载《厦大周刊》第 159 期(1926 年 10 月 16 日)。

长，当他听到陈嘉庚的办学宗旨是“当注重中国固有之文化”后，便“蔚然归国”，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他与陈嘉庚正不谋而合，“予亦尊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也”。[①] 海外中国人民族身份认同而引发的对祖国文化的依恋，往往要比身在祖国的人们更为深厚。

1921 年林文庆执掌厦大后，他亲历了神州大地当年西学盛行的情况，不由感慨“中国各大学之教授，多注重外国新学说新知识，于中国古来文化则不甚研究”，便以儒家的身体力行精神，倡导中国文化传统，他在厦大提倡“无论大学中学，皆当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②]在孔子生日时特辟假日 1 天，召开纪念大会，并亲自发表英文演讲《孔子学说是否适用于今日》（由校长秘书刘树杞博士现场翻译），称“孔子学说实为千古不可磨灭之学说”；[③]他还在厦大讲授经史和文学。他说：世界古来的文明，如波斯、埃及、印度等国，“其古代之文化胥归淹没”，而最为幸运的是“中国五千年之文化，至今犹见昌明”，在他的心中，自周公以来的中华古文化，“至今尚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④]

1923 年，林文庆重金礼聘国学家陈衍出任文科国文系主任。陈衍是福建闽侯人，清末举人，因在诗学与经史子集上的深厚造诣而在清末民初文坛上享有盛誉，曾任上海《求是报》主笔、湖北《商务报》总纂、北京大学经学史学教授兼译学馆伦理学和文学教授，与章太炎、李根源、金天翮等人在苏州组织国学会，出任国学会会刊《国学论衡》主编。陈衍到来之后，力促传统文化课程的开设与研究，1925 年，厦门大学师生与海内文人共同组织了“国学专刊社”，举陈衍为主任，陈衍的高足陈青为社长，成员达 50 多人，宗旨是“以整理国故、发扬文化为己任”。“国学专刊社”的成立，是厦大对当年复兴国学的学术思潮的回

①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载《厦大周刊》第 159 期（1926 年 10 月 16 日））。

② 《校庆三周年林校长演说辞》，载上海《民国日报》（1924 年 4 月 14 日）。

③ 《恭祝圣诞之盛况——林校长演说纪略》，载《厦大周刊》第 158 期（1926 年 10 月 9 日）。

④ 《校庆三周年林校长演说辞》，上海《民国日报》1924 年 4 月 14 日。

应，尽管其宗旨与研究方法与后来的国学研究院不同，却也可以看作是厦大国学研究院的先声。1925 年 10 月，陈衍告假，继而辞职，其高足陈青也转到金陵大学，“国学专刊社”陷入停顿状态。但 2 个月后，即 1925 年 12 月，林文庆开始动用全校资源，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自己亲任筹委会主席，组织委员会，制定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准备向全国招聘国学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但因为他前往新加坡与陈嘉庚面商校务，国学院的筹备暂停了一段时间。

◎1923年厦大国文系主任、国学家陈衍像

不久，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

1926 年 3 月 12 日，在冯玉祥的直系军阀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战争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天津大沽口，并炮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 8 国公使，于 16 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限令北洋政府在 48 小时内作出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与此同时，各国军舰同时云集大沽口，兵临城下，进行武力威胁。民族的耻辱再次激起民族的愤慨，3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北京各界及 80 多所学校共 5000 多人在天安门集会，召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大会通过八条决议，并“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大会结束后，5000 多名热血青年从天安门出发，到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却没料到段祺瑞的执政府命令预伏军警以武力镇压请愿队伍，造成当场死亡 47 人、伤 132 人、失踪 40 人的惨剧。死者中有鲁迅的学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杨德群等，伤

者有共产党人李大钊和陈乔年等，这一天被鲁迅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史称“三·一八”惨案。之后，北京举行惨案遇难者追悼大会，鲁迅写了“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的追悼挽联，并连续发表了7篇讨伐檄文，而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追悼哀歌则唱遍了京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知识分子纷纷撰文谴责段祺瑞政府。惨案发生当天，段祺瑞一面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且从此终生吃素；一面则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将朱家骅、蒋梦麟、鲁迅、林语堂等几十位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知识分子上了黑名单。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张作霖取代了段祺瑞的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他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京报》等报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对革命师生继续实行残酷镇压，《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惨遭杀害，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教授朱家骅等被迫遁入六国饭店再秘密离京，上了通缉令和黑名单的人都面临着生命危险，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林语堂躲藏的地方是同为福建漳州籍的林可胜教授的家里，林可胜是林文庆的长子，时任协和医学院教授。据林语堂的女儿的回忆，当时林语堂还在家里后院放了一把绳梯，随时准备翻墙逃跑。当林可盛知道父亲正在积极筹办厦大国学研究院的时候，便将躲在家里已经三个星期的林语堂介绍给了当校长的父亲。1926年5月，林语堂回到厦门，应聘为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文系教授，并着手筹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当时，北京的高校乃处在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情形一片混乱，哪里做得了专门的国学研究。于是，经过林语堂推荐和建议，林文庆兴奋地向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和其他专家发出聘书，并任沈兼士为研究主任，林语堂兼任研究院总秘书，正式启动了国学院的建设。

1926年9月，沈兼士“抱一国学研究之绝大愿望”从北京来到厦门大学，随之而来的是鲁迅、顾颉刚、孙伏园、陈万里、张星烺、张颐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厦门大学一时精英荟萃，群星闪

烁。

◎沈兼士

◎林语堂

◎鲁　迅

◎顾颉刚

◎张星烺

◎陈万里

鲁迅(1881—1936 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杰出的文学家和文学史家。1926 年 9 月至 1927 年 1 月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在厦大期间,鲁迅讲授“小说选及小说史”和“文学史纲要”两门课,写下了 17 万多字的著作和书简、日记。其中有《朝花夕拾》中的后 5 篇散文、收入到《故事新编》中的《奔月》,以及《〈阿 Q 正传〉成因》、《坟》的题记和后记、《厦门通讯》等。在厦大还编定了杂文集《坟》和《华盖集续编》;指导学生先后组织起泱泱社和鼓浪社,创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

林语堂(1895—1976 年),原名和乐、玉堂,福建漳州平和

人，著名语言文学家。1926 年 5 月至 1927 年 2 月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言学教授、国学研究院总秘书。在厦大期间，讲授“英文发音学”、“英文作文”课程；他与沈兼士一起筹建国学研究院各种研究机构，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组织编辑国学研究丛书、中国图书志和《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季刊》；撰写《汉代方言考》、《西汉方音区域考》、《闽粤方言之来源》和译文《论古韵》，并拟与顾颉刚合作《七种疑年录丛编》。

沈兼士（1886—1947 年），又名坚士，浙江吴兴人，著名语言学家、国学大家。1926 年 8 月至 10 月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主任兼文字学教授兼国学研究院主任。1922 年 1 月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担任国学门主任。到厦大后，与林语堂、顾颉刚等人制定厦大国学研究院章程、计划，建立研究院各部机构，规划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丛书；开设“文字学及文字学史”和“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两门课；发表《今后研究文字学之新趋势》一文。

顾颉刚（1893—1980 年），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1926 年 8 月至 1927 年 3 月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兼国文系讲师。1923 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古史大辩论。在厦大期间，参与国学研究院的筹办和成立后的各项学术活动，承担《中国图书志》“春秋”和“尚书”类图书志的编辑工作，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编辑主任，为该刊的创办写《缘起》；在国文系开讲“经学专书研究”一课；编写了《古史辨》第 2 册，撰写了《泉州的土地神》、《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作了“孔子何以成为圣人”的专题演讲。主张“掘地看古人生活，旅行看现代人生活”，提出了国学研究中的古书探究、考古发掘和民俗调查“三重证据法”。

张星烺（1888—1951 年），字亮尘，江苏泗阳人，著名历史学家。1926 年 9 月至 1927 年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担任过国学研究院代主任和国学系主任。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厦大期间，承担国学研究院组织的《中国图书志》地理部分的编纂工作；国学院首批确定的 10 个自行研究

项目中，有他的“马哥孛罗游记”、“中国交通史”和“闽省姓族迁移史”三个项目，首批列入国学研究丛书的 10 部编著中有他的代表作《马哥孛罗游记》、《古代中西交通征信录》和《中外交通史料丛书》。

陈万里（1892—1969 年），考古学家，中国现代著名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早年学医，平生多才多艺，研究过昆曲，能唱能演，还爱好摄影。他的最主要贡献是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查，从而开辟了一条瓷器考古的途径。

◎陈万里在泉州伊斯兰教先贤墓拓碑
艾锷风摄

当时国学院著名的学者还有原本就在厦大任教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他出生于瑞士，就读于巴黎大学，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佛学家，“二战”后法国汉学界的带头人。1924 年底至 1926 年 6 月任厦门大学言语学教授。在厦大

期间，开设较多课程：有法文、印度文明和佛教史、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关系史、亚洲史等。与艾克合著了《泉州双塔：中国晚期佛教雕刻研究》一书，是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委员。

除此，应聘到厦大国学院又与北京大学国学门有渊源关系的还有丁山、容肇祖和编辑家孙伏园，由北京南下的学者还有潘家洵、章廷谦（川岛）以及原本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干事黄坚。

群贤备至，国学院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的名家名学者，林文庆自然大喜过望。1926 年 10 月 10 日，厦门大学隆重举行国学院成立大会，参加的人不仅是学者，还有思明县（当时厦门隶属思明县）代表、警察厅代表、英国领事代表和各界代表 300 多人。大会上，林文庆首先作了演讲，讲述了他在北京医学会议上的感慨，倾诉了自己与陈嘉庚“不遗余力”提倡国学的衷心；接下来是研究院主任沈兼士报告，内容主要是对国学研究的方法和材料提出意见，指出从前研究古学的信人、信己，“在此科学昌明时代，殊无价值可言”，倡导国学研究的新方法；之后，总秘书林语堂、学者张星烺作了演讲，主要也是对今后国学研究及其开展的内容提出意见；学校代理秘书刘树杞和英国领事代表也作了演说，对厦大国学院的成立表示祝贺。大会之后，各界代表在沈兼士、林语堂的引领下，到了国学院（当时厦大的生物学院 3 楼）茶叙，参观了国学院开辟的东西两间陈列室。东边一间展示的是鲁迅收藏的拓片，大多是六朝隋唐造像，以及陈万里所藏的大同云冈拓片和敦煌像片，还有他拍摄的一些老北京的照片；西边一间陈列各种古物，大多为河南洛阳一带出土，有数百件之多，除此还有厦大商科原本收藏的古钱币。按鲁迅给许广平信中所说，结果是看古钱的人们最多。

厦大国学院成立时，林文庆为其所设置的学科有 15 个，不仅有北大国学门的文、史、哲、语言、考古，还包括了医药、天算、地学、美术、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甚至经济，而聚集在厦大国学院的学者的研究则涉及经学、史学、语言文学、哲学、中西交通史、人类学、考古学以及编辑学。如果不深究这样的学

科设置是否过于宽泛而缺少科学性，我们可以发现林文庆和林语堂、沈兼士的这个学科设置，正是对于当时学术和教育体系的一种突破和重组，其人员的自由组合精神，学科边界的模糊性，以及研究和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对于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和知识的过于专业化精细化，实在也是富有启示的。尤其它将医药、天算、地学、法政以及地域文化列入国学研究范畴，这实际上已经注意到除人文价值之外，传统文化中可能存在的更丰富的资源问题。倘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是否可以说陈嘉庚与林文庆的国学潜意识中有一种与西学相抗衡的组构意识。

在国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上，厦大国学院代表了五四新文化的文化更新意识。在国学院成立大会上，沈兼士否定了原古学的“信人”、“信己”，而主张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除“从书籍记载之外，再以实物印证”，他提出组织风俗调查会，“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同时并进”；林语堂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研究的“至微”精神，虽“片麟只爪，亦必加精确研究”，提出注意“民间表现之一切动作，如歌谣等”，“一方调查闽南各种方言社会及闽南民间一切风俗习惯，一面发掘各处文物”，与北京大学一北一南发掘南北风俗；留学西方主攻化学的张星烺则倡导西欧对于一切事物的“无不悉心研究、力求明确”的科学分析，主张学习“西洋学说条分缕析，一目了然”。[①] 成立大会上这些学者的演说，都表现出“五四”时期国学研究的新方向，除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外，还有着“五四”之后国学研究向民间、向其他学科索取资源的学术新趋向。在厦大国学院，无论是鲁迅的取“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还是顾颉刚的既可用研究历史的眼光研究故事、也可用研究故事的方法研究历史，他们研究的立足点是一致的，既有一种扎根四野之学，援引西洋之说，破解四库之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结构，又特别地注重风俗文化和精神变迁，借助边缘改变中心的新学特点，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潮学术的重要特

①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载《厦大周刊》第159期（1926年10月）。

征，这就是以新的方法、新的史料和新的视点，动摇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与学术的根基，体现了“五四”时期“重估价值”的精神，是一种从古人学术束缚中跳脱出来的学术重建。由此，厦大国学研究院一经成立便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备受学界关注与赞誉。

厦大国学研究院下设研究部、陈列部、图书部、编辑部、造型部和出版部，推出了一批研究课题；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学术著作，这些课题及其成果有的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代表，如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沈兼士的《杨雄方言之研究》、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顾颉刚的《汉以前的知识界与宗教界》；国学院还很快组织出一个编辑队伍，雄心勃勃地着手编纂一部中国历代书籍总汇，取名为《中国图书志》，并编辑发行《厦大国学院季刊》和《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国学院还颁布了《国学研究院研究生研究规则》，招收国学研究生，第一批入学的研究生是厦大教育系毕业的郑江涛和高兴僔二人，1927 年 1 月 19 日出版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中的“本院纪事”，还列出了“审查合格之研究生”14 人的名字与研究题目。虽然当年中国大学并没有硕士学位制度，郑江涛、高兴僔等最终并没有硕士头衔可戴，但国学院招收研究生一事，却标志着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开始。

厦大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是林文庆用心血铸就厦门大学“止于至善”形象的一个重要表征，其学科设置的丰富、研究的独树一帜与研究制度的创新，是当时国内尤其是高校国学研究模式上的一次艰难的尝试。她也为厦大的文科发展奠定极其坚实的基础，成为厦大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界碑，学术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厦大学人。

然而，厦大国学研究院却是短命的（1926 年 10 月—1927 年 4 月），国学院在给厦门大学带来诸多荣耀的同时，也给林文庆校长带来了诸多烦恼。

其一是国学院的研究、出版经费问题。当年，这批著名学者由北南下厦大，很重要的原因是厦大有着足够的经费让他们开展研究、出版工作。1926 年，北洋政府财政已近崩溃边缘，北

京大学的经费常常短缺，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时常发生，北大国学门的国学研究难以开展，成果难以出版，1926 年 6 月 26 日的《申报》这样叙述这一情形，“沈兼士顾颉刚等在北大对国学之整理，已有成绩，而该校绌于经费，致沈等著述竟无力付梓，其他亦感经济之压迫，无由进展”，林文庆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林语堂向沈兼士他们发出邀请。当时沈兼士复函林语堂说，“苟厦大于开办经费外，五年内有若干经费之把握，则余等必能予以相当之成绩”，[①]林语堂便将沈兼士的这个经费要求告知林文庆，征得林文庆同意后，便复函沈兼士说可以保证。于是沈兼士“抱一国学研究之绝大愿望”来到厦大，他将在北大未能进行下去的浩大工程——《中国图书志》计划带到厦大开展，并计划出版 1 套 10 部的“国学研究丛书”，仿效北大出版厦大国学季刊和周刊。当时顾颉刚很是心情振奋，在 1926 年 8 月 25 日致陈垣的信中说：“厦大富于资财，出版一方面，大可做些事业。现在出版经费虽规定为每年一万，二、三年后积累既多，可以腾转，不难印大部书籍。”[②]沈兼士也在厦大周会演讲中称誉厦大“其经费之充裕，设备之完全，不仅为南方各大学所不及，即全国各公私立大学，能与之匹敌者亦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故鄙人对于厦门大学，实抱有无穷之希望”。[③] 然而，国学院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却遇到了陈嘉庚橡胶生意的一段低落期，国学院的经费一时难以如愿，经费被大幅削减下来，加上文理科矛盾冲突，让林文庆伤脑筋的事便发生了。11 月 20 日，林语堂因“办事不顺手，经费节减一半，理科人横加排挤，愤而辞职”。[④] 11 月 25 日，林文庆连忙召集林语堂、鲁迅、顾颉刚、张星烺等人商量，并答应在4000元的经费上再增加 600 元，林语堂才放弃辞职的念头，但原本的出版计划，除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能正常出版外，编辑好的《国学季刊》创刊号和一套“国学研

① 《厦大之更张》，载上海《申报》1926 年 6 月 26 日。

②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70 页。

③ 《上星期四周会纪略》，载《厦大周刊》第 158 期（1926 年 10 月 9 日）。

④ 《顾颉刚日记》第一卷，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819 页。

究丛书”都没有了出版着落，更不要说沈兼士心中那套神圣的工程浩大的《中国图书志》了。原本学校的承诺无法实现，国学院那些“大牌”们的热情与信心就犹如闽南的倒春寒，温度一下子降到低点。

其二是当年文理科的矛盾。国学院成立的时候，厦大的生物学科由于发现了被世界认为绝种的文昌鱼而成为当时国内生物科学的研究中心，闻名遐迩，领头人是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威斯特生物研究院解剖学博士的动物学家秉志。国学院成立时，借生物学院三楼办公，三楼同时也是鲁迅等人的暂时居所。不料国学院成立 10 天后，即 1926 年 10 月 22 日，由秉志牵头出面，要求收回国学院的房子，这使得林语堂、鲁迅、顾颉刚大为恼火。顾颉刚在 10 月 22 日的日记中记载：“我们来，颇招人忌，这是早知道的。今日乃知理科方面已对我们下攻击，由秉农山领衔，要求收回国学院房屋，以我们借生物学院三楼办公也。此等小人伎俩，一何可哂。”对于秉志先生，顾颉刚见他确实是研究生物的专家，原本是颇尊敬他的，但遇到他带头要收回房子，便认为他是“掀风作浪之徒”。像顾颉刚这样的怨愤之言，在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也屡屡出现。在顾颉刚看来，收房子一事，“为厦大理科与文科冲突之起点”，那时在国学院的这些大牌教授眼中，“文科主任为林玉堂，与校长同乡，理科主任为刘楚青，为校长秘书，各有力量”，[①]鲁迅所说的“一部梁山泊”便因此激烈开演起来。林文庆万般无奈，只得将国学院迁到集美楼，与图书馆放在一起。但鸿沟已经出现，文理之争已难以平息。所以，当鲁迅离开厦大的时候，厦大出现了第二次学潮，此次学潮便是以驱逐理科教授、校长秘书刘树杞（即刘楚青）为目标，学生认为是刘树杞排挤了鲁迅，才使鲁迅离开了厦大，最终，林文庆不得不割爱地让刘树杞离开了厦大，才平息了这场学潮。

其三是国学院内部的问题。一方面国学院中就有如鲁迅所说不作“长久之计”的人，像沈兼士在国学院成立两周后（10

① 《顾颉刚日记》第一卷，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809 页。

月 27 日)就告假去了北京,却再也没有返回厦大;一方面是有人虽同在一个院中却貌合神离,这主要体现在作为国学院核心学者的鲁迅与顾颉刚的关系上。鲁迅与顾颉刚在厦大时虽然同室办公、同桌用餐,而且时常有相互拜访探问之举,也一起到过鼓浪屿、南普陀等赴宴,矛盾绝没有像到中山大学后那样闹得满城风雨、要对簿公堂的状态,但两人的关系是紧张的,他俩都来自北大,人脉转移,矛盾随之。尽管厦大国学院内部实际并不存在着后人所说的"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但国学院的人际关系则与北京的"语丝"和"现代评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林语堂、沈兼士将北大国学门的班底搬到厦大时,同时将北大"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际纠葛也带到了厦大,这主要体现在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上。

"语丝派"的主体是北大浙江籍学人,沈兼士、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都是"语丝"人,林语堂虽不是浙江人,却也是《语丝》的主要人物,"语丝"派学者在教育上有留法或留日背景;"现代评论派"的中坚是胡适、陈源(陈西滢)、徐志摩等,主要以留学英美的学者组成,所以"语丝"与"现代评论"的矛盾又有北大英美派与法日派之争的说法,厦大国学院中与"现代评论"关系较密切的有顾颉刚、黄坚、容肇祖、陈万里等。"语丝"与"现代评论"的矛盾爆发发生在对"北京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的态度上。1925 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学生抗议校长杨荫榆开除学生的风潮,鲁迅、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沈尹默、李泰棻、周作人七教师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宣言》,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现代评论》的"闲话"主持陈西滢却在"闲话"上发表《粉刷毛厕》、《走马灯》等文章,指责发表"宣言"的教师"偏袒一方,不大平允",暗斥鲁迅"暗中挑剔风潮"。鲁迅于是在 6 月 1 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并非闲话》,在 9 月 21 日的《语丝》周刊的第 45 期上发表《"碰壁"之后》,对陈西滢进行反击,"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战斗因此打响,并且愈演愈烈。1926 年,"三·一八"惨案发生,陈西滢发表《闲话》,针对杨德群的死一事,散布学生的死亡"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论调,鲁迅对如此荒谬地将学

生的牺牲归罪于“校方与教员”的“闲话”尤为愤慨，便撰写了《空谈》、《新的蔷薇》等文加以抨击，林语堂也站出来激烈反驳“闲话”、“流言”，“语丝”与“现代评论”的矛盾斗争加剧。

顾颉刚并非“现代评论”人，他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也是《语丝》的撰稿人，但他称胡适为自己的导师，称陈西滢为自己崇拜的人，鲁迅也就将他列入“现代评论派”。而致使两人永不和解的原因则是所谓的鲁迅“抄袭”公案，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污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是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言论，鲁迅误以为这是顾颉刚提供给陈西滢的“炮弹”，嘴里不说，心中却对顾颉刚十分的不满与警戒，以至发展到后来“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水火不容的程度。在厦大时，两人的矛盾并没公开，内中的怨恨却在暗暗滋生发展。在鲁迅看来，沈兼士请了一个顾颉刚来，顾颉刚就乘势推荐了陈乃乾、潘家洵、陈万里三人跟来，陈万里又荐了 2 人，而鲁迅推荐的章廷谦（即川岛），最后虽然来了厦大，但之间又曾遇到顾颉刚“曾劝语堂不要聘川岛”的事，所以鲁迅说：“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现代评论派的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①]除了鲁、顾之间的纠纷，国学院其他人也并非就一团和气，被鲁迅认为与顾颉刚同一阵营的潘家洵在顾颉刚眼里恰恰是个“小人”，因顾颉刚到厦大后提为研究教授，薪金 300 元，比聘为讲师的潘家洵高，潘家洵便“火高三千丈”，与顾颉刚“争名夺利起来”；[②]还有，顾颉刚原本是“立定主意与语堂同进退”的，但自从章廷谦来到厦大后，他就认为林语堂受了章的“挑拨”，对他有所“猜忌”，觉得不必为林语堂“作此无谓之牺牲”了。[③] 凡此种种，国学院内部诸多的矛盾纠纷，林文庆终究是不甚清楚也无法解决的，但学者

①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真迹》（原信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8 页。

② 《顾颉刚日记》第一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786 页。

③ 《顾颉刚日记》第一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14 页。

间的这些纠葛却严重阻碍了国学院的研究和工作进展。

1926 年 10 月底，沈兼士告假回北方，却没有再回到厦大；12 月下旬，孙伏园离开厦门后到了武昌编报；1927 年 1 月 15 日，鲁迅不顾林文庆的挽留，前往广州中山大学；3 月，林语堂辞职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3 月 31 日，潘家洵、章廷谦辞职离开厦门；4 月 15 日，顾颉刚离开厦门也到了广州中大。曲终人散，好景不长，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随着一批著名学者的离去，便消失了她那短暂的轰轰烈烈。

蔡元培信中的“嘉庚鱼”

1927 年 1 月 20 日，刚刚任国民党浙江政治会议代理主席的蔡元培在马叙伦的陪同下抵达福州，这位在北京大学最先实行男女同校的教育家，在福州女子职业学校作了一场有关“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的演讲。林文庆知道蔡元培抵达福州后，便让在福州购书的顾颉刚拜访蔡元培，代表校长邀请蔡元培访问厦大和集美学校。

1 月 22 日，顾颉刚到福州东街拜见了自己的老校长蔡元培，第二天的中午，顾颉刚参加了在福州聚春园公宴蔡元培、马叙伦的午宴，宴会上，你言我语，“说话人极多”，顾颉刚则应了蔡元培的要求，报告了厦大的状况。显然，这位曾经认为厦大“不宜速办”的教育界大佬，是很想知道厦大到底办得怎么样了。那天晚上，顾颉刚照旧在聚春园陪同蔡、马参加福建政务委员会教育科的宴请。26 日，蔡元培复电厦门大学，答应日内抵达厦大。

1 月 29 日上午 11 时，在顾颉刚的陪同下，蔡元培、马叙伦从福州义和洋行码头出发，由小火轮转送到海康号轮船，开始他的厦门之行。这一天，据顾颉刚日记记载，是“舟出福州湾，风浪颇恶”。1 月 30 日上午 9 时 30 分，海康轮抵达厦门码头，林语堂早在码头等候，他将蔡、马二人接到厦门酒店休息。第二天，蔡元培、马叙伦在顾颉刚等人的陪同下，开始在厦大的一天活动。

此时，鲁迅刚刚离开厦大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厦大学生由于鲁迅的离开而爆发了第二次学潮，厦大的学潮虽然已是尾声，但集美学校却正处在学潮的巨大震荡中。这一天，蔡元培与马叙伦参观了厦大国学院与生物学院，会见了在厦大工作的北大同仁林语堂、顾颉刚、张星烺、陈万里、容肇祖和厦大的浙江同乡会，在厦门大学浙江同乡会的招待会上，他向浙江籍的厦大学生报告了浙江的革命情况，“说到革命不顺利处，他竟失声哭了”。[①] 那天，中午由厦大校长室宴请，晚上是顾颉刚、章廷谦和黄坚共同在南普陀素斋馆宴请蔡、马，晚上二人住进厦大生物学院。

2月1日蔡元培到了集美学校，2月6日，受北大校友、集美学校校长叶渊之请，蔡元培对集美学校的学潮进行调解。原来，集美学校受厦大学潮的波及，学生起来要赶走校长叶渊，叶渊是陈嘉庚最为信任的人，陈嘉庚一怒之下便要开除带头闹学潮的学生，并“有意停办”集美学校。在厦门的几日间，蔡元培在省政府、集美学校与陈嘉庚之间进行斡旋调停，他劝住了陈嘉庚停办集美学校的决定，让学生电报陈嘉庚道歉，提出叶渊不离开集美学校而任总监学的意见，终于平息了集美学校的学潮。

奇怪的是，他为集美学校的学潮操了不少心，在陈嘉庚、叶渊与学生间几次做调停工作，但对于厦大的办学与学潮从未说过一句话，没有表示过任何的姿态，这位当年认为厦大“不宜速办”的教育元老，面对已经处处呈现出“办理完善，成绩斐然”的厦门大学，他又会怎么想呢？我们无从在他的文字中寻找到他当年走进厦大时的感觉，我们只能从林语堂的《纪念蔡元培先生》、顾颉刚的《悼蔡元培先生》和当年《申报》的报道中，知道他在厦大和集美学校的足迹轮廓。但在他1927年2月1日给妻子周养浩的信中，我们却能发现，当他参观厦大生物学院时，已经被一种极其细小稚嫩的小生命吸引住了，在给妻子的信中，蔡元培专门讲述了厦大的“嘉庚鱼”：

① 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是日往厦门大学，十点，为在厦门之北大同学招待。先参观国学研究院及生物学院等。有一种鱼，在沙中钻行，白色而无目，为各种记述鱼类者所未见，而土人亦不知其为动物，故无名。现由厦大学者名为“嘉庚鱼”，以作为陈嘉庚之纪念。①

蔡元培所说的“嘉庚鱼”实际上是文昌鱼，文昌鱼是自然界腔肠动物向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过渡性生物，自然界的珍稀物种，在厦大发现它之前，生物科技界都认为它已濒临灭绝，是一种当今世界很难再见到的稀有物种，却不料厦大的美籍教授莱德在厦门海域中发现了它的存在，并且发现这种世界稀有物种于厦门、金门之间的海域大量繁殖，成为当地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

莱德教授是在林文庆《厦门大学民国十年度报告书》所提出的“研究教侣”计划下应聘于厦门大学的。按陈嘉庚的说法，“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而能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者，当首推林文庆博士”，②林文庆接受过西方科学的严格训练，深知科学精神与科学研究成果是一所现代大学生命的重要标志，在接手厦大时他就提出“将来厦门大学或成为我国南部之科学中心点”的建设方针，他说，“我国科学之知识尚属幼稚，故本校之目的，在设一极有精神之科学研究机关，此数年中，拟以全副精神注重于科学院之建筑及设备”，“实验室之设施，力求完备”，“使各种学术，均能达到最高深之地步”。③ 中国有数千年的人文传统，这是林文庆所钟情并为之发扬的“一极”，但中国欠缺科学精神和对科学的执著探索精神，这也是林文庆所深刻认识到的问题，因此在“首重国文”“一极”的同时，林文庆将研究科学作为厦大“研究高深学问”的一项重要使命。为此，厦大创办初期林文庆麾下的教师队伍，就经常会出现许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17 页。
② 陈嘉庚：《辟诬》，载《南洋商报》1924 年 6 月 17 日。
③ 林文庆：《厦门大学民国十年报告书》，1922 年。

多洋人的面孔或说着洋文的中国人，仅 1924—1925 年度的主要 14 名理科教师中，便有 6 名是外籍或者是从美国等欧美国家回来的留学人员。这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科博士刘树杞、哈佛大学职务专科硕士钟心煊、美国辨士勿尼亚大学医学研究生廖超照、美国麻省工业大学冶矿科学士、意耳诺大学研究院学侣黄汉和等，发现文昌鱼的莱德教授的学习背景是美国巴克大学的学士、硕士。

莱德到东海之滨的厦大目标是很明确的，他的研究计划是“采集编撰厦门一带动物标本，以为动物教授及博物院之用”，他在厦门大学仅半年，就发现了数十种海洋生物，其中以文昌鱼的发现影响最大。1923 年，莱德在 7 月号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厦门大学附近之文昌鱼渔业》一文，莱德向世界宣布，在厦门大学附近的海域中生存着大量的文昌鱼，这种珍稀动物还常常出现在厦门市民的餐桌上。这篇宣告自然界过渡性珍稀物种依然存在的文章成为生物界的一大奇迹，初创时期厦大的文昌鱼发现，引起国内外各大学生物研究机构的惊疑与关注，《科学》杂志的文章一经发表，世界各大学便纷纷向厦大索求文昌鱼的信息与标本，厦大海域的文昌鱼标本一时遍及世界各个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当时，中国大学的腔肠动物向脊椎动物进化的标本只能向美国购买，一条仅一厘米长细小无比的文昌鱼标本的价格竟然要价 2 角美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外汇支出，厦门大学的文昌鱼发现，中国各大学这个物种的生物标本就不必再花费大量美金进口，而可自主提供了。

厦门大学的生物科学，就这样由一种无脊椎细微生物的发现而开始走向世界，这时，距离厦门大学创办才不过两年。除了发现文昌鱼之外，莱德还于 1924 年在厦门海域中发现了一种水母新品种，后来命名为“嘉庚水母”。那个时候，厦大生物学者新发现的生物有 10 多种，他们及时函约欧美生物学家和各大博物院专家对这些物种合作审定命名，这之中就有林文庆海星、何氏水母、厦门线虫、钟氏圆虫、秉氏脊椎动物、林文庆鲂鱼、中国多毛环节动物、蓝藻类、绿藻等。

蔡元培不是生物学家，就那么一次参观，他是很可能将文

昌鱼误记成“嘉庚鱼”的，但文昌鱼的发现确实给了他最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会写信特别告诉妻子这件事。厦大的文昌鱼发现和厦大国学院的成立，意味着厦大文理两科在当时学界的重要影响，这是当年认为厦大“不宜速办”的蔡元培始料不及的，他不能不感叹陈嘉庚先生的创校精神和林文庆校长的办学智慧。不久，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院长，1928 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厦门大学进行全面调查，3 月 26 日，蔡元培签署国民政府大学院 131 号训令：“该私立厦门大学应即准予立案，除令行福建教育厅遵照外，合行令该校长即便遵照。”

1927 年春天的厦门之行，蔡元培眼中的“为各种记述鱼类者所未见”的“嘉庚鱼”，一定是让他亲历了中国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的自强进展，看到一位以英文为语言的中国大学校长的办学成就与才干。

三、烽火硝烟中的萨本栋校长

1937 年 7 月 1 日，私立厦门大学收归国立，正式改为国立厦门大学。7 月 6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清华大学萨本栋教授出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第二天，“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天夜里，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便枪炮猛轰卢沟桥，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 29 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向长城内外踏进，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拉开了。

烽火连天，神州大地陷入无法安放一张书桌的战争年代，萨本栋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从北京赶到厦门，率领厦大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那年只有 35 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国立大学校长。

科学家、男宾相、运动员与大学校长

◎萨本栋校长像

萨本栋（1902—1949 年），字亚栋，1902 年 7 月 24 日生于福建闽侯县。先祖萨拉布哈是塞北荒漠的色目人，宋代末年，随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北战，传至第三代，由泰定皇帝铁木儿钦赐姓萨，后世族人萨仲礼被派往福建任中书省检校，便举家迁到福建闽侯，渐成闽地望族。萨本栋是元朝大诗人萨都剌第十七世孙，为清末民初中国海军名将萨镇冰的侄孙。福州是清末船政学堂的所在地，这里诞生了不少中国第一代海军名将；闽侯是“八闽首邑”，近代以来产生了像林则徐、严复、林觉民、林白水这样一批仁人志士。无论在家族中还是在社会上，萨本栋从小受到民族在万般耻辱中自强奋起复兴的风云熏陶。

少年时，萨本栋在福州求学，6 岁进明伦小学，12 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1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选派美国留学。1922—1924 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1924 年转入麻省伍斯特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27 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27—1928 年，萨本栋在美国应聘为华儿斯特工学院研究助理及西屋（Westing House）电机制造公司工程师，先后在著名的科技刊物 TransALEE 发表了《关于空气中的火花的研究》和《三相系统的非平衡因素》两篇论文，年轻的中国学者萨本栋，开始蜚声于美国科技界。

1928 年，萨本栋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讲授普通物理学、电磁学、无线电物理学等课程，指导理科研究所物理部研究生从事电路与无线电的研究。他根据中国大学生掌握现代科学的要求与特点，将讲稿整理成《普通物理学》（上、下册）与《普通物理实验》两部本科生教材，在中国首次以中文正式出版了大学物理教科书。在这之前，中国大学的物理教科书用的都是英文版本，1933 年、1935 年这两部教材出版后，结束了中

国大学物理教科书没有中文版的时代，赢得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赞赏。这两部教材在中国大学流行了近 20 年，对中国培养物理人才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黄昆、钱三强、邓稼先等，在西南联大学习时，就得益于这两部教材而奠定了物理学的坚实基础。

1935 年 9 月，萨本栋应邀为美国俄亥俄大学客座教授，在该校电机工程系讲学。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科技界自视甚高，而中国却被西方视为科技教育的落后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人被聘为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这实在是极为罕见的事。在俄亥俄大学的第二年，萨本栋在美国的 TransAL-EE 上发表了论文《应用于三相电路的并矢代数》，创新了电机工程研究的领域，引起美国科技界的强烈反响，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随即将该论文讨论的问题作为当年冬季会议（1937 年 1 月 25—27 日）的主要议题，萨本栋的这篇论文也被评为美国“1937 年理论研究最佳文章荣誉奖”。之后，他用英文写就的那部被称为“新理论杰作”的专著《并矢电路分析》出版。这是萨本栋在“数学、物理、机电三角地带”开垦出来的科技创新，是一份走在世界电机工程界前沿的研究成果。当年流传着这部著作“世界只有 7 个人看得懂”的传说，[①]但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福建《中央日报》上署名仲君的《学府人物萨本栋》一文，这篇文章说萨本栋的“精心大作竟在至世界上只有四十余人可予理解”，无论实际情况如何，萨本栋的这一科学创新理论，是当时世界科学家们极少有人能想到和做到的。该书出版后，就被选为国际电工丛书，并获得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第一次荣誉奖章。

1937 年 3 月，萨本栋载誉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授。6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与陈嘉庚就厦门大学改归国立问题进行商讨，由于萨本栋已经是位卓有成绩的物理与电机工程专家，又考虑到陈嘉庚更喜欢用闽籍学者主持校政，国民政府教育部便与萨本栋本人商量出任厦大校长事宜。萨本栋正在科

① 石清镇：《忆在萨校长家上课》，王豪杰主编《南强记忆》，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 页。

学研究的高峰期，他正想趁势而上，深入电机工程学的研究领域，但却为陈嘉庚毁家兴学、报效祖国的火热衷肠所感染，便答应出任厦大校长。他说，陈嘉庚“毕生之事业、人格、精神，以及识力眼光，在在足为全国同胞之楷模”，他决意“无负先生拳拳祖国之忱”，去追随陈嘉庚建设“南方之强”的梦想。[①] 但萨本栋毕竟相当留恋自己的学术，他提出以两年为期，之后要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自己的电机工程学研究。

1937 年 7 月 6 日后，萨本栋开始他 8 年厦大校长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那时，35 岁的萨本栋正是壮年而立之时，潇洒英俊，器宇轩昂，很多人都知道，这位让美国人敬佩的物理与机电工程专家，还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与著名作家冰心 1929 年结婚典礼上的男傧相。在清华学校时，萨本栋是清华网球代表队的主力，清华学校一个不可或缺的网球运动员，是体育运动场点燃他与运动健将、标枪名将黄淑慎的爱情火花，让这两位同为教师的有情人结成百年之好。但到达厦大后，厦大人却很难看到校长打网球的矫健身影。这并不是因为烽火中的厦大艰苦到连一块打网球的场地都没有，而是萨本栋校长一到厦大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烽火厦大的艰苦办学，他说：“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时代，所以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②]从厦大的迁徙长汀到山城学府的建立，从战时大学生的培养方案的确定到特殊时期学生课程的讲授，为了在这个民族危难时期推进厦大发展，萨本栋事无巨细地奔波忙碌着，艰难困苦的办学旅程将萨本栋的网球权力与兴趣剥夺了。有一次，1941 级的化学系学生庄汉卿，为陪女朋友运动，托人从上海买来两筒网球，利用体育处的网球拍与女友打网球。当他与女友在网球场地一来一往地对抗起来的时候，萨校长走到他的身旁悄悄地说：“庄同学，现在不是打网球的时候，等到抗战胜利后，

① 萨本栋：《陈嘉庚先生莅汀欢迎词》，载《厦门大学通讯》第二卷第 11 期（(1940 年 11 月 9 日）。

② 周辨明：《厦大迁汀两年之变化》，载《唯力》旬刊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1939 年 7 月 7 日）。

我再陪你打网球。”

到1943年，山城长汀中的厦门大学已经成为让国人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刮目相看的“加尔各答以东最完善的大学”，但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萨本栋校长老了，当他带着厦大师生在战火中、在山坳里做足了陈嘉庚建设“南方之强”的蓝图后，朋友们看到的萨本栋却已经“面色苍白，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艰巨的工作与艰苦的物质条件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山城的自然与现实条件让这位兼为网球运动员的科学家患上了关节炎，校医不得不给自己的校长做了一件铁衫，用它来撑着腰部，支撑他坚持上课工作。那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到长汀视察厦大，安排在礼堂与师生见面。人们没有料到，朱家骅并没有发表什么演讲，他给来听演讲的师生们看一张放大了的萨本栋担任校长前的照片，他把照片挂在台上，然后感慨地说：“同学们，我对不起老朋友。你们看，这是你们校长任职以前的相片，他原来是打网球的健将，可是当了几年的校长，鞠躬尽瘁，日夜呕心，现在已是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扶着拐杖走路。”朱家骅的那次讲话，让场下的女同学放声大哭，男生和老师也跟着落泪。[①]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并没有踏破陈嘉庚的办学梦想，反而将厦大推到了血与火的洗礼中，让厦大迈入了一个更加自强更加完善的发展时期，在萨本栋校长的带领下，厦大人懂得了如何在战火中在艰难困苦中磨炼奋斗，发展壮大自己。1944年春天，抗战的胜利犹如喷薄欲出的曙光，即刻就要照耀山城长汀，此时，美国国务院向萨本栋发出邀请，请这位在二战中了不起的校长、物理与机电工程学家赴美讲学，这时，离萨本栋原先与教育部约定的担任校长两年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整整5年。萨本栋答应了美国的邀请，他觉得厦大已经不必再像战争刚爆发时那样“事无大小，都要亲为或与闻”了，他委托了生物学家汪德耀教授管理校务，决定赴美讲学，也一并养养身体。

① 林昌骏：《萨本栋校长的故事》，王豪杰主编《南强记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

5月23日，天气格外晴朗，天刚破晓，山城长汀北山周围，已经聚集起厦大的800多名师生，他们来欢送自己的校长带着“南方之强”的光荣，从山城远涉重洋赴美讲学，人群中也站着华北运动会上的标枪健将黄淑慎老师，她穿着浅绿的旗袍，和厦大师生一起站在群山翠峦中，来与自己的丈夫辞行。这一天，长汀万人空巷，从横纲岭到中山公园门口一里多长的路上，站满了长汀的市民，他们也加入到欢送厦大校长的队伍。当萨本栋校长身着浅绿色中山装、精神奕奕、满面笑容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整个山城沸腾起来了。在厦大教务长周辨明博士的指挥下，人群一面高呼起“同盟胜利”的抗战口号，一面高唱起周辨明教务长特地为欢送萨校长而作的歌曲《送亚栋呼》，歌曲用英文创作：

Three cheers for Adam and his Madam,
Gone out a-talking to Uncle Sam,
Ne'll care a damn, pals!
We'll make the Sam, gals!
Susanll sure bring him home!
Rah! Rah! Rah!

萨本栋看着自己7年来在山城集结起来的厦大伙伴，不禁脱下头上的帽子，别情依依地向人群挥帽致意。他走到黄淑慎身旁，见太太只穿着旗袍，便微笑而诙谐地说：“把大衣丢掉了？”后来这句体贴的话，便成为当年一篇报道中很起眼的一句话。

当接送萨校长的汽车开动起来时，“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的厦大校歌在群山峻岭中豪迈响起，三位女生将一面绣着“止于至善”校训的蓝绸小校旗和两束美丽的鲜花，呈现给了萨校长与夫人。厦大人要让自己的校长将厦大的旗帜带向大洋彼岸，将校训的精神远播到美国，厦大人也期盼着自己的校长快快回来，回到即将迎接抗战胜利的厦大人身边。

但萨校长没有很快就回来，在美国讲学治病中，他又用英语撰写出专著《交流电机基础》（*Fundamentals of Altermating*

Current Machines），这是一部物理学、电机学的创新巨著，1946年出版后就被加利福尼亚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等10多所高校采用为脚本，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理科著作被西方高校采用为教材的先例。在美国时，由于健康的原因，萨本栋三次向教育部请辞厦大校长职务，厦大师生知道后，立即飞电美国萨校长及国民政府教育部，恳切慰留，请教育部“万勿准予辞职”，但萨本栋的请辞决心已难改变，请辞于1945年获准。这年9月，萨本栋从美国取道英国，在英国作短暂的讲学后回国，改到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兼任物理研究所所长。1948年年底被确诊为晚期胃癌，并于12月飞抵美国加州治疗，1949年1月31日，这位为科学的发展和厦大的建设倾注了整个生命的最年轻的国立大学校长，终因错过了治疗时间，不幸与世长辞，终年47岁。

萨本栋在遗嘱中交代，希望自己的骨灰分三份献给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厦门大学和南京中央研究院，他逝世后，在厦大强烈要求下，经萨夫人黄淑慎同意，萨本栋的骨灰全部安葬在厦大校园内。在山城欢送萨校长赴美讲学的5年后，厦大人接到的是他们校长的骨灰盒，这是何等的让人悲痛扼腕，他们在美丽的海滨校园为敬爱的校长建了一座纪念陵墓，由萨校长的清华校友、厦大中文系教授郑朝宗撰写墓志铭，称萨校长治校“成绩斐然，众口交赞”，贡献“约为五端”；赞誉其“舍身治校”、承继嘉庚的“毁家兴学”精神，两者“真可谓珠联璧合，炳耀千秋，并垂不朽者欤”。

不到“最后一课”弦诵不辍

“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①]这是萨本栋校长抵达厦大后，勖勉厦大学生的一句铿锵之语。

“最后一课”出自于法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是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写于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873年）的一部著名短篇。小说的背景是1870年9月，普法战争中法军大

① 萨本栋：《勖勉同学词》，载《唯力》旬刊第3期（1938年4月3日）。

◎萨本栋纪念陵园

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已经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的一所乡村小学，被侵略者强迫放弃自己祖国的语言，而改用德语上课、教学、讲话，就在这自己的语言就要被强行取消的最后一刻，一位叫韩麦尔的普通老师，穿上自己最美丽的礼服，向一群孩子们讲最后一堂法语课，他向学生诉说法语是世界最美丽的语言；而一位平时讨厌上法语课的孩子小弗郎士，正是在与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课里，发现了祖国语言的美和法语老师的伟大。小说通过这个童稚无知的小弗郎士的自叙和心理活动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悲愤和对自己祖国的执著。萨本栋借助韩麦尔老师坚持在法语存在的最后一刻讲完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故事，唤起厦大人即使在残酷的战争中也要坚守学习与研究的信念和意志——只要不到“最后一课”，就不能放弃研究学习，这成了厦门大学在抗战中艰苦办学的一句很响亮的语言。

萨本栋在 7 月 11 日离开清华南下，25 日抵达厦门，经过 3 天的工作交接，于 29 日正式执掌厦大。这一天，日军炮轰天津

◎萨本栋校长与林文庆校长交接仪式后合影，校档案馆提供

车站及南开大学等处，南开大学遭受惨重破坏。萨本栋写信致南开张伯苓校长，想到张老“四十年之苦心经营，竟一旦为敌人所焚毁，益令人痛心不置”。萨本栋说：“国难日深，敌寇日张，每念及此，不胜悲愤。”他告诉张伯苓与清华大学的月涵，假如清华与南开有南下与厦大合作的愿望，则厦大“愿尽绵力，藉收合作之效”。然而此时的厦门也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战火同样威胁着这个南国的岛城。9 月 3 日，日本军舰侵入厦门海域，炮击厦门胡里山炮台，厦门大学校园处于火线之中，厦大校舍遭受敌舰的轰炸。萨本栋只得借公共租界鼓浪屿的英华中学和毓德女校，坚持厦大秋季的开学上课。

就是在这个严峻的 9 月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在兵临城下的危险时刻才奉教育部令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之后再迁徙云南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三校的图书、设备来不及转移，损失严重。平津沦陷，接着是淞沪激战爆发，厦门也面临着日寇铁蹄踏进的危险，厦门大学往何处去？是跟着北大、清华、南开等国立大学往西南内地迁徙，在流浪中办学，还

是自己寻找出路？此时萨本栋作出一个大胆果断的决定，决定厦大不随潮流远迁而坚守在粤汉铁路以东，他说："在艰危中，须特别努力分内职务，务求无负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及政府将厦大收归国立之至意。"[①]为不负嘉庚先生毁家兴学之志，不负厦大收归国立之意，他认为厦大乃需坚守东南，不能让东南半壁江山没了高等教育，所以他决定厦大内迁的原则是：一要留在东南最偏远的福建省内，以免东南青年向隅；二要设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点，以便利闽浙赣粤学生之负笈；三是新校址的环境，要比较优良，以使员生得安心于教导与求学。萨本栋选择了福建长汀山城为战时厦门大学的内迁目的地。

12月20日，厦门大学全校停课，在萨本栋果敢的指挥下，24日开始从厦门鼓浪屿向上千里外的山城长汀急迁，300多名师生与九辆载着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大卡车，渡过鹭海，渡过九龙江，淌过一条条溪流，翻越一座座崇山峻岭，向着厦大新的校址长汀进发。抗战发展到1938年底时，平汉、粤汉铁路线以东的大片国土沦丧，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的国立大学纷纷往大西南转移，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同济大学迁往云南昆明，中山大学迁到云南徵江，武汉大学迁向四川乐山，浙江大学进入贵州遵义。就这样，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厦门大学却在萨本栋校长的带领下坚守住了东南半壁，承担起收留因战乱而失学的青年的历史使命，自觉地担负起粤汉铁路线以东国立最高学府的全部责任。

长汀是福建的边远山区，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历史上为州、郡、路、府所在地，八闽客家首府，客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曾是闽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红色革命最早开辟的一块红色政权所在地之一。那个时期，长汀刚刚经历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多次围剿与红军反围剿的战火，红军已经被迫实行北上战略转移，虽然战事已过，但战火的荼毒却加重了这个山城的累累伤痕。当厦大人经过遥遥近千里的跋涉，翻越险阻山川，走过崎岖通路，抵达长汀的时候，这个山城给予

① 萨本栋：《勖勉同学词》，载《唯力》旬刊第3期（1938年4月3日）。

厦大人的感觉是“举目凄凉无故物”,“真像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①] 面对着与厦门有着天壤之别的学习环境和条件的山城,萨本栋告诫学生:“移入乡村,不当常说‘这地真糟,什么东西都没有’;应时时想‘此处尚好,还有不少人物’。”[②]他本着“在艰危中,须特别努力分内职务”的责任感,要求全校师生秉承陈嘉庚的精神,将厦大办成“南方之强”。

1938 年 1 月 12 日,厦门大学搬迁结束,在这不到一个月的艰苦搬迁中,萨本栋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在厦门沦陷前(1938 年 5 月厦门沦陷),安全转移了厦门大学的所有的图书、仪器、文件、标本及其他实验设备,这是当年播迁流浪中的中国大学难以办到的事。因此,抵达长汀后的第五天(1938 年 1 月 17 日),厦大立即在长汀复课;2 月 28 日起,萨本栋亲自督导全校各系举行 1937 年度第一学期的学期考试;3 月 10 日,厦大开始第二学期的新学期注册;3 月 20 日,厦门大学学生生活促进会成立。此时,日寇铁骑快速残忍地踏进中华大地,狂妄地叫嚣着三个月内占领整个中国,在继北平、天津、上海沦陷后,太原与南京又相继失守,日寇直逼武汉,形势严峻,举国震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萨本栋向厦大师生发出“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的号令,他说:“要知道我们对暴日只能抗战而不能作‘惩罚’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学术至今尚未独立,我们民众的技能水准,几百年来未曾提高。”为此,即使在最艰难困苦中,只要“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就要努力于研究与学习,并将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当作“国魂所寄托的事业”。[③]

面对着严酷的战争局势和无比艰苦的学习条件,萨本栋想的却是为战争胜利后储备好战后的建设人才,因此,他特别注意从大学一年级学生开始的培养训练,厘定了一个独特的厦大一年级课程“基本哲理”,即“要思想纪律化,最好去研读数理;

---

① 周辨明:《厦大迁汀两年来的变化》,载《唯力》旬刊第二卷第 7、8 期合刊(1939 年 7 月 7 日)。

② 萨本栋:《勖勉同学词》,载《唯力》旬刊第 3 期(1938 年 4 月 3 日)。

③ 萨本栋:《勖勉同学词》,载《唯力》旬刊第 3 期(1938 年 4 月 3 日)。

◎ 萨本栋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为萨本栋。照片作者提供

要知道祖国的可爱，应当温习史地；语文不通顺的人，在学术界不会有地位；不动手做实验的人，休想控制大自然，以造福于国家及人群”。[①]

在人才培养理念与培养方式上，萨本栋取的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思想”和清华大学带过来的通识教育理念，他尤其重视大学一年级的基本课程教学。萨本栋校长的夫人黄淑慎女士曾说，丈夫是“以他在清华的标准来办厦大和教科的”，在厦大，萨本栋遇事都会请教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在造就人才方面，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大学不应该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洽闻”的“完人”，他提出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格修养提高的“通才教育”。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的教育政策是“提倡理工限制文法”，但梅贻琦校长却不管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清华只提“提倡理工”，决口不提“限制文法”。他主张，大学首要任务不在授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在传授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最惯常的综合的基础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

① 萨本栋：《勖勉同学词》，载《唯力》旬刊第3期（1938年4月3日）。

头脑与治世才干、多方面书本知识与文化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说："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不在专。……通识为本，专识为末。"[①]萨本栋便是按照"通识"这一教育思想，制定校制，设定厦大的课程体系，他将语文、外语和高等数学确定为全校的必修课，一年级必修国文和英文，不及格要重修，再不及格则退学。除此，各学院还必须在中国通史、政治学、社会学三者中任选一门为各院系的共同必修课。当时科学救国的呼声很高，不少学生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漠视文科学习，萨本栋就给学生讲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说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他甚至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到二年级时才视学生的学科成绩予以审核，不达标准者不予选系入悉。学制实行严密的学分制，学生在大学四年里可选主系和辅系，需修满不同的学分数才能毕业。考试与考核分平时、学期和毕业三种。在毕业与否的裁定上，他遵循陈嘉庚创办"世界之大学"的愿望，特别要求厦大学生掌握良好的英语技能，学生毕业前须通过英语的特殊考试，不及格不发毕业证书。毕业前的英语考试有两种形式，学生可以任选一种，其一是由考生任选一本英语书，经三人考试委员会认可，阅读后在三位委员面前口试；其二是事先不确定考试范围，由三位考试委员任意考试。萨本栋说："假如一位大学毕业生连中、英文都不通顺，要他何用？"[②]为此，厦大还特地开设了英语补习班让英文差的同学编班学习，萨本栋的夫人黄淑慎亲自在补习班义务辅导。

萨本栋认为，既然战乱时期办学经费短缺，求学学生的数量有限，就更应该注意人才培养的质量。他说："我校一向对于学生程度的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之下，对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重视。"[③]为让青年一踏进大学校园

① 梅贻琦：《大学一解》，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

② 《萨校长开学词》，载《厦大通讯》第三卷第10期(1941年10月25日)。

③ 蔡启瑞、黄厚哲等：《萨本栋与厦门大学》，载《文史资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萨本栋校长与部分师生在长汀校门前合影。校史馆供

就有个质量的保证，萨本栋尤其关注与重视一、二年级基本课程的讲授，他要求厦大名师教授必须为一、二年级讲授基础课，这实际上是当年中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的教学传统，萨本栋将清华的这个传统移植到厦大。长汀时期的厦大，知名的教授、副教授都活跃在基础课教学第一线上，大名鼎鼎的傅鹰教授讲授普通化学，理工学院院长谢玉铭教授担任普通物理课教学，萨本栋校长则亲自讲授一年级微积分。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张存浩研究员回忆起他当年在厦大学习的情景，很是感慨地说："厦大基础课的教授阵容不仅为当时国内所仅有，即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很难找到。"

当时长汀的条件很差，上课的教室很紧张，学校只得从早晨六时就开始安排课程，以便充分提高教室的使用率。早晨六时在长汀山城是天刚破晓的时候，不少师生尚在"春眠不觉晓"的睡梦之中，萨校长虽然校务缠身，却身先士卒，将自己的课安排在教授们最不欢迎的清晨六时的时间段。他不仅长期上微积分课，还不停地为缺乏教师的课程代课，讲授普通物理、大一英语、电机等课程，每学期坚持上2门甚至3门课，周学时达到11学时，学生称他是"O形的代课者"，说他是"教书教上瘾了"，但他们没有想到，萨校长却因此累倒了，累倒了的萨校长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后来在台湾成为新竹科技园创始人的厦大机电系1944级学生何宜慈这样回忆道：记得在我们四年级时，萨校长已十分衰弱，腰伸不直，头也抬不起来，但是，他还要我们到他家上课。萨校长住在学校北山山坡上，他把客厅作为我们的课堂，厅内有一长方形方桌，一块黑板，我们就在他的客厅

里听他的电工原理课。[①]

清华的梅贻琦校长有一句经典之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者谓也。"厦大创办时就有延揽名师的传统，萨本栋来自梅贻琦手下，更是将聚集名师作为办好"南方之强"的重要方略，在一处没有大楼的山城学府中，不遗余力地延揽名师教授。这一天，著名的法学专家邹文海教授受中山大学聘请往广州赴职，途中路过长汀，他与萨本栋是清华的校友，有师兄弟之情，萨本栋便请他吃饭，邹文海自然不便推辞。却不料酒席间萨本栋向邹文海提出留在厦大的问题，不让他再往广州。萨本栋说厦门大学政治系已成真空，请邹文海务必帮助他在厦大料理政治学科。邹文海已经接受中大礼聘，不愿也不好爽约，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师兄的请求，萨本栋见他为难，便直截了当地说："胡步曾拉去我的陈耀庭，我就扣住他的邹文海，两不吃亏。"邹文海见师兄态度如此坚决，只得放弃了中山大学之聘而留在厦大，萨本栋也因此半路拦截到一位名师。萨本栋当年就用了各种方式聘请到许多优秀学者，尤其是清华园的学者，长汀时期厦门大学有 51 名教授，这其中就有 47 名来自清华大学，如傅鹰、黄开禄、朱保训、周长宁、林庚、郑朝宗等著名学者都是从水木清华走出来的教师。

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年代里，维持一所完整的大学已是相当不易的事，但厦大依然没有停步在现状上，山城中的萨本栋已经意识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为了给胜利后的国家建设事业准备人才，他在艰苦奋斗中奋力地推进厦大的发展，不断壮大学校的实力。考虑到战争结束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工科人才，萨本栋采取行政集中的校制，集中全校资财，于 1937 年创办土木工程系，并在该系的草创时期兼任该系系主任；1940 年又办起机电系，1944 年筹办航空系，从而把厦大理学院扩充为理工学院，使厦大原本比较薄弱的工科在战时得到迅速发展；1940 年，萨本栋又利用福建大学未予批准的机会，复办厦大法科，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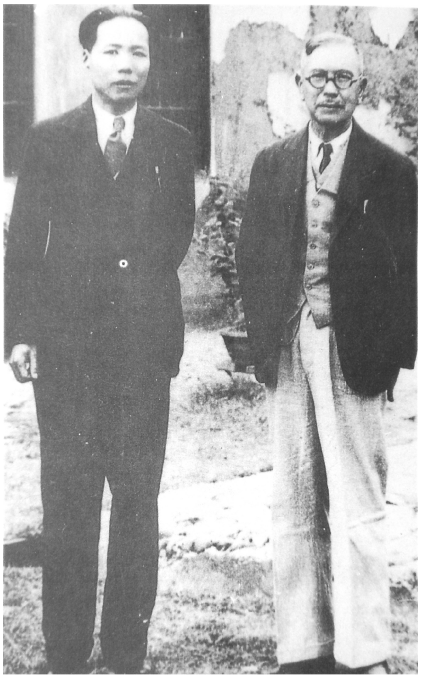
① 何宜慈：《永怀恩师萨本栋校长》，王豪杰主编《南强记忆》，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 页。

厦大法学院，并在商学院增设了会计、金融等专业。正是有了萨本栋校长当年富有眼光的专业开拓，才使得厦门大学的会计、金融、法学学科一直在全国得风气之先，也才让厦大在改革开放工科恢复后，有了一个健康快速的发展。

延揽名师，推行通识教育，严格学习制度，强调育人质量，抓住时机，充实学科实力，在萨本栋的苦心经营与艰苦奋斗下，尽管山城中的厦门大学依然会经常遭受到敌机的轰炸，经常会遇到战争所带来的特殊困苦，却依然坚韧地在烽火硝烟中成长壮大。1939 年 9 月 22 日，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在重庆召见萨本栋，指出厦大“现为东南唯一国立学府，政府属望甚厚”；同年 12 月，重庆教育部司长吴俊升致函萨本栋，赞誉厦大“为东南最高学府，逼近战区，乃能处于镇静，弦诵不绝，益见硕划荩筹，深为当局嘉许”，部长陈立夫也以“厦大困处长汀，辛苦奋斗，校务蒸蒸日上”而“尤深嘉慰”。1940 年 12 月 27 日，《申报》特别刊登了一篇《萨校长谈厦门大学近况》的报道，报道中萨本栋说厦大“目前所堪告慰者，一为一贯之纯良学风始终精进，更较抗战前浓厚；一为各种设备，凡最低限度之必须者，皆足敷应用，尤以一百二十余种之西文杂志，始终能源源寄到，供诸参考浏览，此恐为内地任何大学所不及”。[①] 1940 年和 1941 年，重庆教育部为考验全国高校大学生程度，提高学术研究风气，连续举办两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赛”，在这两次学业竞赛中，厦门大学均获得全国第一名，“消息传出后，士林为之震惊。盖全国著名学府，比比皆是，想不到僻处福建边陲的厦门大学，实力竟如此雄厚”。当时连续两届作为厦大学生代表参赛的林绍贤这样说：“其实母校所以有如此辉煌表现并非侥幸得来，因为：第一，母校图书仪器之疏迁，由于当时总务长策划得宜，保持得相当完整，尤其图书馆藏书的丰富，更非疏迁西南各大学所能望其项背。第二，因为母校环境良好，生活安定，苦读精研，蔚为一时风气。第三，母校校长萨本栋博士鞠躬尽瘁的本

① 《萨校长谈厦门大学近况》，载《申报》1940 年 12 月 27 日。

学精神及他言传身教的影响。”[①]鞠躬尽瘁的萨本栋校长，就这样把战火转化为对厦大的磨炼与洗礼，顽强地将厦大带上了陈



◎萨本栋与陈嘉庚长汀合影

嘉庚期待的“南方之强”高地。

钱、小车与人：萨本栋治校二、三事

“初到长汀真像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举目凄凉无故物”，这是厦大刚迁入长汀时教务长周辨明教授的一声感叹。从五口通商的口岸到福建边陲的山城长汀，厦大确实是来到一个与原来环境有天壤之别的地方。

首先是长汀缺乏起码的教学生活设施，政府拨给厦大的校舍只有原为龙岩专署办公用的一座文庙，加以修葺后也只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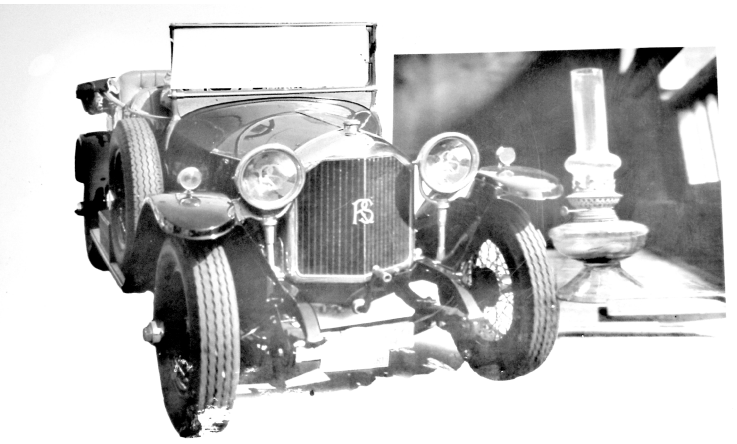
① 林绍贤：《我参加两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载《国立厦门大学五十年纪念刊》，厦门大学台湾校友会 1971 年 4 月编。

勉强可用，教职员与学生宿舍就没有着落了，教室、实验室就更是云中雾水中月，摆在萨本栋面前的难题首先是解决师生最基本的生活学习设施。厦大先从伦敦公会借得一座中诚楼，暂时作为女生宿舍；租得旧的长汀饭店加以改造，当作教授的栖身之所，如此因陋就简地先将师生作了安顿后，厦大就这样开始了一边开学一边建设的艰苦奋斗的长汀旅程。经过两年的求官拨地，搭建修葺，厦大人以树皮代屋瓦，以夏布代窗纱，陆续建成各类具有南洋风貌、静雅美朴的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办公房、球场以及躲避敌机轰炸的防空洞，总占地面积 60 亩，在那时，长汀城似乎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大建设。但即使是这样，条件依然艰苦，新建的同安堂是男生宿舍，也只能采用大统仓式住宿模式，几十人挤在一起，经常要坦诚相见，虽住宿条件很差，统仓的气氛却是其乐融融。

校舍是个问题，建设校舍需要经费，但办学经费更是个问题。厦大虽然是唯一一所坚守在战区的国立大学，但自改国立以后的连续三年里，厦大每年从教育部拿到的经费却只有 20 多万元，经费数列于全国倒数第二，仅高于江西大学。在这种经费处处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萨本栋规定：教授及高级职员薪俸在 200 元以上者按六成支领；副教授专任讲师助教及其他职员薪俸在 101 元至 200 元者按七成五支领；在 51 元至 100 元者按九成支领；萨本栋自己则按校长薪俸的三成五支领，只取工资的 35%。他将自己的住处安排在山城老旧的仓颉庙内，庙内仅有两室，一室布置为卧室，一室为饭厅，饭厅也就同时是校长的会客厅了。为了节约家庭的开支，萨夫人还在仓颉庙的周边开垦山地，自己种菜，努力减少生活费用。

更严峻的是山城没有电灯，学校又不能像山民那样以火把、油灯照明。没有光明，一到晚上，师生就如瞎子一般，正常教学、学习、生活难以进行。萨本栋知道必须先解决厦大的照明问题，他是机电工程学家，他一下子就想到自己的小车。原来萨校长配有一辆小车，就这样萨本栋便把自己的小车拆了，将汽车的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自己设计、安装，让山城长汀亮起了电灯。后来，曾经就学于长汀时期的厦大校友回忆那段岁

月的时候，都会提到萨校长拆车发电的事，他们说，山城亮灯的那一天，大家都欢呼："这是萨校长发的电，萨校长放的光。"



◎小车照片。萨本栋把配给自己的小车拆了，将汽车发动机改为发电机，用于学校照明

山城中的厦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大致 10 元，这 10 元如何安排，总务处是煞费苦心的。在主要的粮食上，学校从邻近的宁化粮区买谷子碾米，因为 100 斤谷子可以碾出 81 斤米，所以厦大人称为"八一米"。早餐是稀饭和一小碟黄豆，中餐晚餐时干饭和一碟青菜。全校 800 多个学生，大概每天合起来只吃两斤猪油，逢年过节萨本栋校长便赠送给每个学生一片猪肉增加油水，这让学生感到很温暖，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

因为是战乱，许多家庭流离失所，已很难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来支撑孩子们上学，更多的学生只能靠政府发放的战区学生学习贷金生活，为了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学习贷金，厦大规定每位学生的学习贷金一般都在每月 8 元钱的范围。1941 级的化学系学生庄汉卿是厦门人，家父是当时厦门杂货同业工会会长，原本经济上比较富裕。抗战爆发后，父亲因抵制日货出走厦门，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儿子汇钱，他也就与大家一起领取贷金生活。后来父亲由漳州给他寄来 100 元，但他已拿了每月战区学习贷金 8 元，萨本栋校长知道后，也了解到这位

同学经济上尚比别人强，便请化学系的系主任找了庄汉卿，请他将战区的学习贷金退出来让给其他同学，庄汉卿也就将自己的贷金退了。还有一次，庄汉卿的父亲给儿子寄来一大瓶奎宁，由学校转交庄汉卿。长汀地处山城，四周群山包围，因为卫生条件不好，蚊虫很多，而且蚊子多带疟原虫，所以刚到长汀时，很多同学都患疟疾，打起摆子，当时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是奎宁。有一天，萨本栋校长就找到庄汉卿，征询他可否将那瓶奎宁送给学校医务处，以便让更多的同学摆脱疟疾的痛苦。庄汉卿自然是同意的。

但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萨本栋对学生教育丝毫都不放松。萨本栋说："吾人应知此次战争，关系数千年固有文化之持续，将来永固国基之奠定者至巨。自今日起，务必急起直追，厉行节约，人力固不许浪费，须一身肩负二人之重任，一日急二日之操作。"[①]厉行节约，则又"一身肩负二人之重任，一日急二日之操作"，这就是当年厦大办学的一个特色。他告诉青年："以纯粹科学为终身事业的同学们，若被诘问所学有何所用的时候，可坦然的答复'政客们将来可以由此征收税款'，这是法拉第氏研究电磁现象时回答英国首相的不朽名言。"[②]他用法拉第的事迹来激励战区青年将精力用在学习科学知识上，放远目光，不要因一时一地的困苦而退却，不要为知识在战时有用无用所困惑。为此，他制定了战时尤为严格的纪律，要求令行禁止，建立诚信，仅开学注册一项，就规定学生必须按开学注册日期准时到校注册，绝对不予通融。抗战期间，交通极为不便，有些同学注册截止后才到校，也都不能例外注册。萨本栋要求"青年用理智来训导"，以严格的纪律来训练学生未雨绸缪，在学习与将来走向社会的工作中，不存侥幸之心。长汀时期的厦大，是以严格治校而闻名的，厦大学生能在全国大专以上学生学业竞赛中蝉联第一，不能不与萨校长严格的学习生活

① 萨本栋：《"七七"二周年纪念与节约运动》，载《唯力》第二卷第7、8期合刊（1939年7月7日）。

② 萨本栋：《勖勉同学词》，载《唯力》旬刊第3期（1938年4月3日）。

训练有密切联系。

严格的治校同样体现在人事制度上。学校规定夫妻不能同时在厦大工作，学校领导人员或教授“不能安插自己的亲属到学校里工作”。萨本栋的夫人黄淑慎是毕业于师范大学的体育健将，华东运动会上的标枪名将，当时厦大也很需要一位女生的体育指导教师，但萨本栋身先士卒，不给夫人正式教师的编制，只允许夫人做一名不领取薪俸不用任何津贴的义务女生体育指导员；教务长傅鹰教授的夫人张锦博士是非常优秀的教师，也是厦大学科上非常缺乏的教师，也因为受人事制度的限制，只能到永安地区的一个研究单位服务；校部一名姓杨的秘书，只因为他是萨本栋的亲戚，校长就不让他参加学校决策会议，只给他整理文件办理文稿的工作。萨本栋认为只能以如此严格的制度与不折不扣的执行力，才能训练师生不为私利所囿，方能养成大公无私的胸襟。

强调困境中“一身肩负二人之重任，一日急二日之操作”，以严格的训练和制度纪律治理学校，才使处于战乱中的厦门大学即使在极其艰难中，各项事业依然有序迅速地发展，成为战区最完善的学府。1943 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督学东南，他来到长汀后，见萨本栋在山城中将厦大办得如此完善，欣慰而感慨地说：“厦大在萨先生领导之下，居然以最少之经费，获得最多之代价。”①

像每一位卓越的校长一样，萨本栋的治校是严格的，却不是专制的，这位有过西方学习生活经历和名校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很注意培养学校的民主作风。在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萨本栋经常做的一件事便是找学生座谈。1938 年，即在厦大刚刚迁到山城的那年春天，他与全校的每一个学生都进行了面谈，这给长汀时期的厦大学生留下了永不忘却的记忆。那时，他将全校学生分为 20 多个组，每组约 10 人左右，另有 2～3 名教授参加，从 5 月开始，定期与各组同学座谈，或听取学校建设的意见，或作时事讨论、学术质疑，座谈是下午四点以后开始，一谈

① 仲君：《学府人物·萨本栋》，载福建《中央日报》1947 年 1 月 17 日。

总是 3～4 个钟头。

在厦大，常设的委员会很多，有咨询、校务、行政、校舍建设、招生、社会教育、教务与考试、奖学金与贷金审查等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各司其职，其特点是大多数委员会都有教授代表参加，有的委员会根据其职责性质还以教授为主体，教授代表的产生则由全体教授用票选方式选出，大部分委员会都由萨本栋自兼主席。有一年，被称为中国文学新感觉派的主将施蛰存被选为校务委员会的教授代表，一天，他参加了校长主持的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对教育系的一对男女学生的处理，因为这两位学生违反校规，两人躲到防空洞里夜不归宿，作出了情不自禁的事情，被训导长发现了。按学校的规定应有所处分，于是萨本栋召开了校务委员会议。会上萨本栋不预先定调，他先请训导长报告实事，然后让大家发表意见，委员们发表的意见几乎都主张对两位学生从严处理，不是主张开除，就是主张记大过处分，有一位教授主张开除，态度非常坚决，他的理由是男女在校内作出不名誉的事实严重败坏校风。施蛰存则站起来为学生说话，说两位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人，只要他们愿意结婚，就不必处分他们。如果他们中有一方不愿意结婚，那就成为法律问题，受损害者可以向法院起诉。没想到萨本栋听了施蛰存的意见后也点头同意。会后，训导长找了这两位学生谈话，结果是两位学生同意公开确定婚约，待毕业后即在学校举行婚礼。一次民主的校务会就这样让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对有情人便是后来成为台湾著名剧作家的姚一苇和话剧表演艺术家的范悠兰。施蛰存先生在回忆起这件事时称赞道："萨本栋是一位极其民主的大学校长。"[①]

那时厦大学生不仅入学后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和制度纪律的约束，在入学前的招生中也得进行严格的入学考试。1941 年暑期，厦大在当时的江西省政治中心泰和举行招生考试，这是抗战极其残酷的年头，考试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空袭的威胁下进行的。于是考场规定：每场考试，开卷后在一个小时内，倘

① 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0 页。

若遭遇到敌机空袭，考试立即停止，考生疏散，以后另定时间，换卷重考；倘若考试进行的时间已超过 1 小时遭遇到空袭，也立即停止考试疏散，但试卷留在考场座位上，由工作人员收集，考试有效，不必重考。这次江西的招生考试共考 5 门课，前两天考语文、数学、外语、政治，考试平安度过，到第三天考物理时，开卷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却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考生只得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将答卷留在座位上，纷纷离开考场进入防空地点。一个叫钱学新的女生是当年经历过这场空袭中考试的学生，她考后自己估计成绩甚佳，对录取厦大信心十足。但待到厦大的录取通知在《民国日报》上发榜后，却死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而与她同时参加考试的人中，几个自度考试成绩不如钱学新者，却是榜上有名。钱学新一时傻了眼，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困惑与焦虑中她写信给厦大的两位师友请代查原因，很快她的师友给了她回音：因为见不到她的物理试卷，只能以零分计算，按厦大当年的录取规定，有单科零分者录取一票否决，因此钱学新尽管其他 4 门科目的总成绩已达到 5 门考试录取的资格，却也只得名落孙山了。得到这个信息后，钱学新很懊恼也特别委屈，她想之所以自己的卷子没了，很可能就是防空袭的慌乱中被弄丢的，是掉到地下，还是被风吹到什么角落了，她实在无从知道。很不甘心的她于是鼓起勇气给萨本栋校长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描述了物理考试遇到空袭的情景，和自己答卷的情况。为了证明自己参加了物理考试，钱学新在信中复述了考试中的题目，并提出可以从其他 4 科的成绩推演出自己的能力以及考完全场的信心，不能因为找不到试卷而判了自己的“死刑”。她恳求萨校长允许她先期抵达长汀，然后重新举行一次物理入学考试，看自己的实际水平。对钱学新来说这是孤注一掷，是件相当于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事，自己并不抱什么希望，她想，战时的大学校长有那么多辛苦的事要做，他能注意到一个青年考生的一封来信吗？没有料到的事却发生了，半个月后钱学新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回信，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她被厦大录取了。60 多年后，当钱学新回忆起人生的这个故事时，她说：“饮水思源，回顾这一曲折的经历，我能不感谢萨校长

对我的关怀吗？当年若非得到他的关注，我的人生历程可能就是另一种途径。”[①]

饮水思源，厦大人永远不会忘记，是萨本栋这位忍辱负重的校长，在民族危难中用铁的纪律带领师生筑成中国教育的“南方之强”；是萨本栋这位目光高远的教授，在烽火硝烟中用心用血浇灌着未来的民族栋梁。47 年的人生旅程，47 岁的短暂生命，铸就的是厦大校园内一座永远泽被后学的纪念碑。2001 年，在厦大庆祝建校 80 周年的日子里，当年从长汀毕业、后来成为台湾新竹科技园创始人的何宜慈先生感慨地说起自己的校长：“由于他无私无我、鞠躬尽瘁的身教言传，全校师生都能翕然一致地追随着他走。由于他的标杆榜样，他的学生们应该都能体会到一个人对国家、社会应有的责任。”[②]

四、人民大学的校长王亚南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从此打开历史的新篇章。10 月 17 日厦门解放。1950 年 5 月，共和国政务院发布全国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任命，这是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的第一次任命，《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首次翻译者之一、著名的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

王亚南教授从 1944 年便开始与厦大结下不解之缘，那年春天，担任福建研究院经济所所长的他应聘为厦大经济学系的客座教授，来到长汀讲授“高级经济学”课程；1945 年 10 月，他应厦门大学之聘正式到校任教，1948 年担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

① 钱学新：《老厦大招生的故事》，王豪杰主编《南强记忆》，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2 页。

② 何宜慈：《永怀恩师萨本栋校长》，王豪杰主编《南强记忆》，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 页。

◎王亚南校长像

长兼经济系系主任。1949 年 1 月，他应台湾大学邀请赴台湾讲学，因厦门白色恐怖加剧，党组织通知他不要返回而转往香港，郭大力等也相继转移到香港，与在港民主人士一起发表时局宣言，谴责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拥护新中国诞生，5 月初由香港北上到达北京，不久进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大课，再没有回到厦大。

就在厦大人盼望着自己尊敬的老师归来时，王亚南被任命为厦大校长的消息从北京传到东海之滨，全校师生为之一振，“深庆得人”，情不自禁欢呼雀跃起来，全校师生员工立即向北京的王亚南发出祝贺欢迎的电报。

受命为人民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将妻子儿女留在北京，很快启程奔赴厦门上任。那时，福建没有一寸铁路，更不要说航空往来了，王亚南先乘火车抵达浙闽边境，然后改乘汽车南行，在福州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交流后，再经过将近一个白天的车程，前往当时为海防最前沿的厦门。

王亚南是晚上才到达厦大的，这是厦大一个沸腾的夜晚，厦大师生员工知道王校长即将抵达的消息后，便早早地聚集在学校的东边，列队准备夹道欢迎，毕竟这位新任的校长原本就是厦大人，是老朋友了。王亚南所乘的车子开进校门后，他便下了车，欢迎的人群便涌了上去，欢呼声、招呼声、笑声、掌声、鞭炮声融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大家簇拥着校长，走过勤业斋，走过敬贤楼，走过笃行楼，转弯来到大南教师宿舍区的王校长住宿地，这一段百米左右的路程，那天晚上厦大师生却走了好几个小时。第二天王校长开始办公，开始了他十几年人民大学校长的生涯。

一生手不释卷的学者

1901 年，王亚南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王家坊村，家里人没能料到，这位在乡村土地上呱呱落地的生命，将来会成为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一所著名学府的校长。王亚南的父母早逝，他在兄长的极力撑持下于黄州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一中学。

经济上的困难，反而让农村出身的王亚南从小有了大的志气，磨炼出一种人穷志不短的坚韧，他后来对人说："穷一点好，穷而后工。"那时，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摆脱自己命运的途径便是读书，王亚南从小便养成了刻苦读书、手不释卷的习惯。早年没钱买书，他不是设法借书读，就是整天呆在书店看书，或者整本整本地抄书。在中学时，为了将自己的每一分钟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他竟仿效司马光的"警枕"，为自己设计了一张"警床"，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一小截，成为三脚长一脚短的特别床铺。一旦自己熟睡之后翻身，床就会失去平衡向短脚方向倾斜，这就会把他惊醒，他便起床点上床头的油灯，继续伏案夜读，这个争分夺秒的行为，使他在中学最佳的读书年龄中学获了比别人多得多的知识与见识，也让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在武昌第一中学，他是老师同学心中的班级三杰之一。毕业后，王亚南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命运似乎在他青年时就给了他一次重要的暗示。

1924 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1926 年夏，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国共两党决定实行北伐，以武力打倒祸国殃民的封建军阀。根据敌众我寡和军阀内部貌合神离的情况，北伐军采纳了苏联顾问的建议，确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在不到 10 个月的时间内，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大革命风暴席卷半个中国，北洋军阀迅速崩溃。就在这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中，王亚南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在北伐军军中

任政治教员，像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他投身到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洪流之中。

然而，革命者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到胜利的喜悦，一场厄运便降临了。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7 月 15 日，汪精卫为主席的武汉国民政府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王亚南从武昌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在杭州，王亚南因生活窘迫寄居在杭州的大佛寺内，选择了孤灯青卷的生活，准备创作小说糊口。在中国，寺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既养育了和尚、信众和山林，也常常会成长出一些仁人志士、学者、武林高手乃至政治家，大佛寺实在也成了王亚南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里，他结识了他人生旅程的重要伙伴郭大力，郭大力是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在动荡的时局中与王亚南一样流寓到大佛寺，在大佛寺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他们一起在山林寺庙中读书学习，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一起畅谈人生理想，向往着祖国和自己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清静的地方，王亚南开始了他从经济学兴趣到孜孜不倦的学习研究的转变，与郭大力一起萌生了翻译《资本论》全本的念头。就在天堂般的杭州城的一座寺庙里，两位从大革命失败中流转到孤灯下的青年从此结为至交，开始了近 40 年的友谊与事业的合作，一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中国经济学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生活的颠沛，让两位青年暂时分手。1928 年，王亚南东渡日本留学，郭大力到上海教书。此时，王亚南已经将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作为自己事业的定位，东京三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神田町的书市，是他畅游学海的胜地。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铁蹄踏进中国东北三省，富饶的黑土地陷入悲惨的年代。作为一个在为祖国的命运寻找振兴之路的青年，决不能容忍外敌对于故国的蹂躏，他愤然离开日本，回国来到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这段时间，他主要靠卖稿维持生计，自然要笔耕不已。

◎青年时期的王亚南

回到上海后，他与郭大力重新会合，两人合译了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三原理》。李嘉图曾很自负地说自己的这部专著全英国只有25个人能读懂，所以译本在中国出版后被认为译者肯定是大专家大教授，却不料原来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国民十九路军（后期增加了中央军第五军）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战火在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熊熊燃烧起来。王亚南耳闻目睹了淞沪战争的日日夜夜，他为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敌而振奋，钦佩十九路军将士的民族义愤与豪气。但蒋介石南京政府迫于日本压力，与日本签署了中日《淞沪协定》，十九路军被迫调离上海，奉蒋介石命令开赴福建“剿共”。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的政策，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和“剿赤”军事失败的刺激下，放弃抗日与“剿赤”并行的方针，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和红军代表彭德怀在福建南平王台签订停战协定，十九路军还于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军长将领联合国民党南京政府要员李济深、国民党军事元老陈铭枢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同情与敬佩十九路军的王亚南奔赴福建参加了“福建事变”，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福建事变”自然让蒋介石大为恼火，他决不能容忍反抗自己的政权存在。1934年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十余万人，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福建，同时，大撒

金钱收买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十九路军顿时阵脚大乱，军长师长几乎全部向中央军投诚。1月21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的最后据点漳州和泉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终告失败。

1933年岁末，王亚南因被通缉而取道红海逃亡欧洲。浩瀚的大海上，是一望无际的蓝色世界，在从太平洋到红海的航线上，激浪拍打着远洋的客轮，将逃亡中的王亚南带向他心中向往的另一块土地，这块陌生的土地诞生了王亚南敬仰的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一大批王亚南心中渴求走进去的经济学伟人与经典著作，这一年，王亚南32岁，刚刚过了而立之年，正是生命最为奋发的时期。旅途上，王亚南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西方的经济学著作。当客轮行至红海时，突然巨浪滔天，船在波浪中颠簸，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同船的旅客几乎都晕得只得乖乖地躺在船舱里。王亚南却无法忍受没有阅读的时间煎熬，他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把他绑在餐厅的柱子上，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遵照王亚南的意思，把他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书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他们很难想象，在东方那个有着悠久文明却很贫穷的国度里，一个有志于从经济学上为自己的国家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他那求知欲望是再大的风浪都难以动摇的。

逃亡是因“祸”所至，但中国人讲祸兮福所倚，恰恰是这段欧洲流亡的生活，给了王亚南一个更为丰富更加深厚的经济学世界。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考察研究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1935年，王亚南取道日本回到上海，再次与郭大力会面，他向自己的朋友谈了自己的欧游见闻，提出了翻译《资本论》全本的想法，并且开始着手翻译起马克思的这部经济学的举世经典。在上海，王亚南妻妹曾一度与王亚南住在一起，后来这位老人回忆说，她经常在半夜醒来，看到王亚南头上扎一块湿毛巾，乃在伏案作学问，他被当时上

海学术界誉为“一个非常刻苦的学者”，他的习惯是每天凌晨4点左右起床，伏案工作一两小时，然后外出散步，回来用完早餐后，继续阅读、写作或工作。就是在如此坚韧的工作中，王亚南与郭大力完成了马克思《资本论》三大卷中文全译本的工作，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发行。

抗战爆发后，王亚南于1938年前往抗战中心城市武汉，曾在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董必武对这位青年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给予很大的鼓励。1940年9月，他应聘到中山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这位手不释卷的学者毕竟更热爱在世界经济学的海洋中遨游。在中山大学执教时，他身居陋室，潜心治学，经常风趣地对人说：“穷一点好，穷而后工。这比我在上海卖稿过活要好得多了。”在中山大学，他发表了《经济科学论纲》、《中国经济论丛》等重要著作。1944年他离开中山大学，到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反日反蒋事变的发生地福建，在福建永安任福建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同时应聘为厦门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从事教学与著述。当时与他一起在福建研究院工作的陶大镛就住在他的楼下，陶大镛回忆说：“我习惯于开夜车，而王亚南一向在黎明前奋笔。每当我刚躺下去，楼上的灯光已亮，他早就伏在案头了。”1945年秋天，由于抗议国民党政府迫害羊枣等进步人士，王亚南愤然辞掉福建研究院职务，到厦门大学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系主任，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开创与卓越的建设。

从1950年到1969年逝世，王亚南一直担任着“南方之强”的厦门大学校长，为新中国的经济学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作出杰出的贡献。但他那手不释卷、争分夺秒读书的习惯，却始终保持着，从未改变过。旅途上，他总是随身带着一部英、德、日、韩四种语言的词典，一旦手边的书读完了，他就背这部词典。解放初期，从厦门到北京要走一个星期，他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随身带上一箱书籍，备足旅途的精神食粮。王亚南给自己规定了一条日常守则：非星期天不看电影，即使再好再精彩的电影或演出都不动摇。他的女儿王岱平回忆，20世纪60年代他在上海主持编写经济学教材时，曾经巧遇一个著名的芭蕾舞团

来沪演出，时间只有两天，王亚南倒是很有观赏的兴趣，但演出的这两天都不是星期日，因此任他的助手怎么劝说，就是执意不去观看。1956年夏天，儿子王洛林陪他到青岛疗养，有一天散步时王亚南就批评儿子："今后不能像这次一样接连几个星期都在玩，不做学问。"当时年仅18岁的王洛林不服气，反驳父亲说这是暑假，疗养也不是玩，王亚南就说："学问没有寒暑假。"

读书分秒必争，学问没有假期，这是一种典型的学者日常生活方式，因为在真正的学者世界里，绝不会有停歇下来的时候，书读得越多，研究越是深入，越会感到自己的无知，感到学问的没有止境，于是会更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读书、研究，研究、读书，周而复始，止于至善，王亚南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学者。这位手不释卷的学者、教育家，在他半个多世纪的不凡人生中，就这样只争朝夕地学习着、研究着、工作着，在经济学与教育学领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41部学术著作（译作）和340多篇学术论文。

◎《王亚南文集》一卷至五卷

1969年，王亚南因癌症医治无效于上海去世，终年89岁，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并兼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概括他的一生有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共福建省委在他的骨灰安葬仪式上，称他一生"不辞劳苦，勇于攀登"，是"学识渊博的著名经济学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资本论》的首译者与“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作

20世纪30年代，是国际性的红色年代，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炮响的成功，为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信心与憧憬，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从西方徘徊到东方，漫游在五大洲四大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迅猛异常。此时的中国，红色革命就如毛泽东所说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正从中国南部的山坳中喷薄而出，尽管国民党对红色苏区进行大肆围剿，在全国制造白色恐怖，但那由星星之火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已经是武力和白色恐怖难以熄灭的了。革命的行动需要革命的理论指导，需要革命的舆论宣传，中国的文化中心此时已经由北方的北京移到了南方的上海，“普罗”文化与革命理论的倡导与传播，在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形成另一个被称为“左翼”的文化高潮。在这个时候，《资本论》这部世界经济学说史、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划时代的经典著作，正是中国革命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最重要的理论武器，30年代经济贫瘠的中国大地，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滋润它的干涸，人们翘首以盼《资本论》中文译本的出现。

早在1920年9月，上海青年社发行了一本李汉俊翻译的德国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同年，费觉天翻译的《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问世，人们从这本书里，了解到在那个遥远的德国，有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伟人写了一部很有批判性和预见性的大书，这之后，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便成为中国革命志士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热切期望。1924年秋，激情洋溢的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他知道《资本论》对于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的重要性，准备花上几年的时间翻译《资本论》，这位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家、学者“觉得如果能为译完《资本论》而死，要算一种光荣的死”。然而，最早倡导“革命文学”之一的郭沫若并没有为《资本论》而“光荣”，如此篇幅浩瀚的理论深刻的《资本论》的中文翻译并非像翻译一部《高老头》那么容易。1930年3月，在距离郭

沫若翻译念头产生的5年后，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接着，上海商务印书馆也在1934年5月出版了吴半农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尽管这两个版本都只是《资本论》中的第一卷第一册，它们却打破了中国出版界尚未有《资本论》中文译本的局面，人们开始有机会从中文中认识了《资本论》的部分面貌，《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

1928年，在杭州西湖畔的大佛寺，从大革命失败中走出来的王亚南与郭大力相遇了，禅房寂寂的寺庙生活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产生的张力，给两位志趣相投的青年知识分子新的灵感，他们萌生共同翻译《资本论》全本的决心，并且商定了合译《资本论》计划。按郭大力在“译者跋”所言，王亚南负责翻译第一卷第五篇和第一卷终、第二卷序和第一篇、第三卷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两位青年虽才华横溢，一腔热情，却又是深懂得学术深浅的严谨的知识分子，面对着《资本论》这部博大精深的巨著，他们意识到他们要翻译的不是普通的著作，而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要准确无误地译成中文，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中文表达能力，还要有深厚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学识积累。于是两位青年知识分子严格按照他们制订的计划，先用几年的时间，翻译马克思之前的6部经济学和经济史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此作为翻译的练习，也从中把握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宝库，为全译《资本论》打开了通道。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战火不仅让人再难以摆放一张平静的书桌，连郭大力翻译的第一卷书稿也毁在了日军的炮火之中。1933年岁末，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遭受通缉而逃亡欧洲，他怀揣着翻译《资本论》全本的计划，在马克思的故乡与《资本论》的诞生地收集、研究相关的资料，郭大力也是从零开始，于1934年重起翻译的炉灶。此时，与中共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得知消息后，便由艾思奇、郑易里两位主持业务的编辑出面找到郭大力，说明翻译《资本论》的迫切性，希望他与王亚南尽快完成翻译工作，早日使《资本论》

中文全译本付印，他们很快与郭大力签订了约稿合同，为了让两位翻译者更集中精力做好翻译工作，出版社还每月向译者预付40元版税作为生活开支，以保证译书的进度与质量。1935年，王亚南从欧洲回到上海，再次与郭大力会面，他将自己在欧洲的感受、心得与翻译《资本论》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于是两人便依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正过的最新德文版、并参照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进行了一段集中深入的《资本论》全本翻译工作。然而，战火再次燃起，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郭大力不得不带领全家到租界暂避，但房租昂贵，租界并非久留之地，郭大力把两人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携着妻儿返回江西南康，在南康继续翻译第二、第三卷；王亚南也转移到了内地，两人在分散的情况下坚持合作，在动荡的环境里继续着一项伟大的工作。他们按各自的分工将自己翻译好的书稿分批寄往上海，直至将《资本论》全本完整地翻译完成。上海沦陷后，读书生活出版总店被迫迁往内地，大部分人员相继离开上海，只有郑易里夫妇等人留守“孤岛”顽强地坚持工作，接收着两位《资本论》翻译者冒着敌人炮火传递过来的译稿。

1938年4月，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易里高兴地抱着厚厚的200多万字的《资本论》中文稿，他笑了，他立即向郭大力发出电报，请他到上海统稿、校订。郭大力接到电报后，绕道香港来到上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仅剩下的两间小屋里，昼夜紧张劳动，用4个月的时间统完、校订好整部的译稿。就这样，从1928年到1938年，王亚南和郭大力用了10年的心血，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在屡次燃起的战火中，历经艰辛，辗转多个地方，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三大卷的全译工作，人们翘首以盼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终于付梓了。8月31日《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出版，9月15日第二卷出版，9月30日第三卷出版。由此，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部鸿篇巨制第一次全貌地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作为中国革命与未来建设的一个指南，指导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道路的方向。

《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

◎《资本论》1938年首印版本，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播的里程碑。《资本论》全译本首印 3000 部，2000 部运往大后方，封面风格与德文原版基本一致，细纹米黄色封面，中间套印红色，写上“资本论”三个大字。出版后便引起文化界、学术界反响，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等社会贤达都订购全译本。后来，译本多次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重版，共印了 7 次之多，发行总量达 3 万多册，这在当时出版界是个很大的印数。著名的经济学前辈许涤新在回顾《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历史时曾感慨地说：“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在那个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得出版界奄奄一息的出版界里，有谁能有条件把这部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全部译成中文呢？有哪个出版社有决心、有胆量敢出这一部使资产阶级反动派发抖的《资本论》呢？感谢郭大力、王亚南二同志的劳作！感谢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除了翻译其他西方经济学著作外，王亚南自己的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问世，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也是王亚南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开始。王亚南不像一般的翻译家，一本书翻译完了也就完了，他对《资本论》的翻译，也就是他对《资本论》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作为一个经济学学者，王亚南的五部文集中，有着许多他的《资本论》研究的成果，这实际上也是他的翻译能更准确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王亚南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将自己在翻译《资本论》过程中深刻领会到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精髓，用在自己对于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上，以《资本论》反映出来的观点、立场与方法，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武器，他提出了“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主张。他认为

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他在理论上反对按图索骥似的套用现成公式，在实践中反对削足适履似的去应用，而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研究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思想。

1944年6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的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厦大，在厦大作了“民主科学与文学”、“反抗轴心战争之科学”以及有关实验胚胎学的学术演讲，此时王亚南正在厦大客座讲授经济学，他在中国经济研究上的造诣已经为人所知，李约瑟是位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西方学者，他拜访了王亚南。早在一年前，他在广东坪时就访问过王亚南，向王亚南提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此次两人就这个问题又进行了一番探讨，王亚南对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已经有了进一步的研究。4年之后，王亚南写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作为对李约瑟的答复，专著以史实与具体的分析，论述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僚政治对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改造中国、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也是在这个时期，王亚南在厦大为学生演讲他的“中国经济学原论”，演讲内容后来整理撰写成专著《中国经济原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这部著作运用《资本论》的体系范畴，从商品经济入手，揭示了旧中国商品形态的经济属性，创新性地分析了传统中国经济的运动规律，提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所取代的必然性。由于该书创造性地应用了《资本论》的理论与方法，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被译成多国文字。

《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与《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是王亚南的代表作，这是他一生中为中国经济形态研究所作出的最为杰出的贡献。在这些著作中，王亚南对于旧中国的商品经济理论、资本理论、利润利息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独到精辟的分析，并形成

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在这些系统研究中，他着重指明在近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既有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又存在着封建经济这个具有过渡性质的经济形态，在当时经济学界关于近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论争中，为近代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作出了科学系统的理论阐发；并且完整系统地提出著名的“地主经济论”，将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并以地主经济形态和半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解释了中国社会经济史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经济学界称为是“对 30 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些研究大胆创新，独树一帜，对于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和革命的战略策略具有重大意义，具有“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三大特色”，是 1949 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史学界一项卓越的标志性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是王亚南提出的“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人民大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1948 年的秋天，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炮火正从中国北方向南方蔓延，这一天凌晨，东方欲晓，海风劲吹，灰暗的云阵，在隆隆的涛声伴奏下，像千军万马自东而西疾驶，厦大背后的五老山峰开始呈现出它苍翠的轮廓。此时，厦大 1948 级经济系学生孙越生站在厦大博爱楼所处的山冈上，观察着喷薄欲出的第一阵霞光射向灰暗的云阵。云遮霞蔚，东方的海平线染上了瑰丽的红晕，拍岸的白浪泛起了金色的光芒，在蔚蓝的大海中欢呼雀跃，正当孙越生兴奋地欣赏着这历史时空中急速变幻的风云时，时任厦大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的王亚南教授从山冈下向他走了过来。

孙越生是在 1945 年年初认识王亚南教授的。那时，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办学，王亚南还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这位当时已经闻名遐迩的经济学家应聘为厦门大学客座教授。有一次王亚南在嘉庚堂举行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

他后来以《中国经济原论》为题发表的学术著作，在这部著作里，王亚南以《资本论》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性地分析了传统中国经济的运动规律，提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必然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所取代的必然性。这一次演讲，在山城长汀和整个厦门大学激起了很大的波澜，“这不仅是一个高级经济学讲座，而且是一次不平凡的政治性示威”。那时，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照射在神州大地，一场决定着中国命运往何处去的决战即将发生，王亚南的演讲，无疑给经历过八年抗战洗礼的山城中的大学生及广大青年，指出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必然的走向。对于聆听王先生演讲的孙越生等青年来说，这次演讲是长汀这块红土地上自瞿秋白之后再次举起的一把火炬。“自从瞿秋白同志在长汀慷慨悲歌、英勇就义以来，十年间，在先烈牺牲的刑场上空一直是漫漫长夜，滚滚寒流呀！但是现在，1945 年，竟然有一个也像瞿秋白那样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敢于接过火种，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把秋白同志毕生服膺的那种真理，把先烈们为之捐躯的革命目的，化作理论的语言，对众宣讲。”青年们称此“是精神的弹雨”，“是革命的火炬”，是“在枪杆子不能继承历史的地方，用笔杆子把历史继续写下去”。[①] 听完这次演讲，孙越生最重要的收获便是学会把平时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知识同中国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思考，心中滋生了“信仰之光”，生命有了“一把衡量现实的价值尺度”。

孙越生见王亚南走来，眼光便从海天霞蔚中收了回来，他向他们的王院长迎了上去，心中一个纠结很久的问题要请教。孙越生有绘画木刻特长，两天前，王亚南教授请这位学生给他雕刻一枚藏书章——“野马轩藏书”，因为王先生几年来将自己的居所自称“野马轩”，他发表文章时总在文章后面注明“于野马轩”四字，他想在自己的藏书上也盖一个“野马轩”的印章，便请孙越生代劳。这是一块4 cm×6 cm大小的木刻，画面是一匹迎面奔驰的骏马，马首嘶昂，马鬃翻飞，四蹄扬起，“野马轩藏

① 孙越生：《“野马轩”的由来》，王豪杰主编《南强记忆》，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4 页。

书”五个字呈半弧形排列在扬起的马蹄前方。孙越生走到王亚南面前，他先问先生对“野马轩藏书”的木刻感觉，王亚南说：“很好，正是我想象的。”得到先生的肯定后，孙越生便提出他心中的问题，他问先生为什么要以“野马”命名，王亚南看看天看看海，他说：“一个波浪在海洋里激荡，同一匹野马在原野中奔驰是一样的，每滴海水越是按照自己的自然规律自由的活动，大海才能成为一个威力无比的整体。每个人越是自由发展，马克思的理想就越是临近。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是比个人职业自由高级得多的自由理念。”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进，这是人类最高的愿景，让人成为自由的、全面的、充分发展的主体，这是马克思所向往的人类进程的理想境界。作为《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第一个翻译者和杰出的研究者，王亚南要比他人更能真正地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执著地实践和传播着他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活跃而喜欢思考的孙越生听了先生的话，便大胆地问了一句：“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吗？”孙越生的意思是否也能以“野马”的精神理解马克思理论，把握老马的“自由发展”思想。这是 1948 年的秋天，曙光就在前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结合即将取得全面的胜利，1948 级的厦大经济学学生孙越生觉得他的问题十分自然。王亚南没有马上回答，他转了个身，看着正在升腾而上的一轮红日，侧身对孙越生说：“‘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的座右铭。马克思最懂得什么叫作自由，只有像他那样不愿在别人脑子里跑马的人，才不会让别人在自己的脑子里跑马。”“野马”奔跑在最广阔的草原上，知识的“野马”在永无止境的思想天地奔驰，只有这样，创造才是可能的，发展才是自由的，这才是一个思想家、科学家所应具有的而许多人难以具有的品质。孙越生不禁又想起长汀时期王先生课堂上常常对学生说的话：“你们对我的意见，只可以当作一种启发，你们应当有你们自己的见解。”

“野马”是王亚南对自己学术形象的一个比喻，也是他培养科学研究人才的一个思想。在长汀客座与厦大复员后任法学

院院长期间，他一直以一个民主战士的姿态站在大学教育的前沿，抨击当时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对科学与学术自由的扼杀，指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科学不受尊重，研究科学的自由也横遭限制与剥夺，就表明这个社会正在衰落式微、正在倒退。他经常引用黑格尔的名言“理性与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勉励学生，倡导学生自己学习和自己研究，他要学生“从反对者获取自由，予反对者以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未曾再使用“野马轩”这个别号，这里的理由是不必赘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仿佛一夜中作了同样一个梦，在梦中都将自己的别号、斋名丢弃了，开始了一个将个人完全融入一个崭新时代和崭新事业的集体历史进程。“野马”在科学领域自由驰骋的形象转而走进了王亚南的教育思想中。

1950 年 6 月，王亚南被政务院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这是共和国第一批人民大学的校长。王亚南一上任，就针对当时呼之欲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着手厦门大学的改制工作，从新中国建设的急需的人才出发，将原有的法学院的法律系与政治系合并为政法系，与文学院并成文法学院，将商学院撤销，与法学院的经济系合并为财经学院，下设财政金融系、贸易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统计系，同时创办了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经济研究所，自己亲自任所长。理学院、工学院则保留了原有的体制和设置。王亚南校长上任后的这一举措，显示了一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厦大财经学院不仅是厦门大学新设立的学院，也是当时国内大学的新的高教建制，厦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科的优势与在国内领先的地位，其基础便是在王亚南校长主持下奠定的。

1955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厦大的工科学系被调整到北京、青岛、福州等地的相关大学，厦门大学被国家确定为综合性大学，全国与厦大一起被定为综合性大学的只有 13 所。王亚南根据国家的需要与厦大所处的环境与办学特点，提出了厦门大学“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的办学方针，确立了厦门大学培养研究人才培养科学家的育人目标。他说：“今天我们所在学

校是个综合性大学，不是工业大学、农业大学，而是综合性大学。不同地方是培养的目标不同。工农科培养工农业所需技术人才，师范培养教师，综合性大学主要是培养研究人员，科学研究人员。”他对学生说，“你们将来就是要培养成为科学家”。[①]他从近代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出发，认为科学教育是现代教育的关键，提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与民主教育为核心，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教育并重。从综合性大学培养目标出发，王亚南要求厦门大学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要创造自由研究的科学风气，培养国家需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人才。为此他到任后的一项创新举措，就是在全国首开经济学培养研究生的先河，像邓子基、黄良才等一批后来的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就是从厦大首届经济学研究生中培养出来的。

◎王亚南(前排左第五人)与经济研究所师生

早在1946年，王亚南就对中山大学的学生说：“真正的大学教育，并不是要大家到学校来，张着口，让老师像‘填鸭’般的灌进一些他认为营养的东西。而是要大家就学期间，利用学校的人的、物的环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自己去寻觅‘食物’，

① 王亚南：《怎样做一个大学生》，录自厦门大学校办档案56—11。

自己消化。”“自己消化了的东西，往往是最有益于自己身体的。”[①]他特别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他要求学生无论读书还是生活，要自己多思考：“多想是一件好事，多想可以出智慧，可以使人的头脑锻炼得更敏锐。”他在多种场合强调，一个人要多开动思想机器，工作上要有所创造，事业上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学会多开动思想的机器。对于那些人云亦云、依样画葫芦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都觉得不会有出息。他曾说：“把一本美国或英国大学的经济学脚本，在课堂上敷衍一下，无疑是非常轻快的偷懒方法，但无奈那一类刻板的尝试性书籍是专为他们自己社会需要而写出的书籍。含糊笼统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叫那些被动性同学勉强学着应付考试，固然轻而易举，但要用此对付那些认真学习、要求使学理同现实联系来理解的同学，那就大嫌不足了。”[②]因此，这位自己手不释卷的长者，尤其赞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

◎王亚南与青年学生座谈学习和研究《资本论》

站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基点上，王亚南不遗余力地推动厦大学生的自学活动。他认为：现代教育既然是科学教育，掌握科学方法便是人才成长必不可少的因素，一个大学生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就得掌握好学习知识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尤其是自学的本领。但他又指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死的，不同的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世上不会有适用于每一个人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但自学并非闭门独学，“独自一个人学习，易使人流于孤僻，流于孤陋”，他非常赞

① 王亚南：《留给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载《每日论坛》1946年11月。

② 王亚南：《留给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载《每日论坛》1946年11月。

同“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说法。他认为，一个人做学问，不仅要依靠自己的独立钻研，也需要老师的指点和朋友的帮助，由此，他提出一个“共学”的概念。他给学生讲授《资本论》，就像一个《资本论》的探寻者一样，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在那个资本的批判王国中自由地遨游，从来不会以一个《资本论》首译者和研究者的权威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在他的教学观念中，成功的学习与教学的侧重点不应该在于让学生掌握知识，而是让学生学会自己组织知识，是那种有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学习与教学。在他的带领下，厦大学生的自学风气浓厚，并形成了一种教学相长、师生互动、同学共学的优良学风。

有一次，王亚南校长与一位老师散步，校长问老师一个很基本却并不那么好回答的问题：“你说一所大学的运行哪些人最重要？”那位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大师、教授和校长。”但校长摇摇头，笑了，他说：“我认为是排课的、敲钟的和食堂的厨师最重要。”老师怵然，不是说“大学者，乃大师也”吗？面前他所尊敬的王校长怎么会称那些平时在学府中最不起眼的人为最重要的人？然而，这正是王校长与众不同的地方。倘若你仔细一想，往这句极平常的话语深处想，你便能领悟到这话中的校长情怀，人民大学校长的这种情怀，与他的教育思想是多么一致地联系在一起啊。

王亚南与陈景润

20 世纪的脚步刚刚迈进 80 年代的时候，一部中国的报告文学引起了好几亿中国人以及外国人的争相阅读，这就是著名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亿万读者从徐迟那充满激情与哲理的叙事中，认识了一个木讷孤僻然而却是世界数学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陈景润，听到了 1975 年邓小平那句斩钉截铁的话：像陈景润这样的“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也庆幸陈景润能遇上王亚南这样的伯乐。倘若陈景润没有自己信奉尊敬的王校长，他那多舛的命运还能让他攀上数学的巅峰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吗？

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徐迟称王亚南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懂得人的价值”，这是一位教育者、一位领导者以及一个人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素质，但长期以来这个素质在中国被忽视了。

◎厦大校园里的陈景润铜像。
董铭远供图

一个人便是一个世界，一个人便是一页历史，而一个人的那一页历史又是与他所存在的世界的种种人、种种现实与历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 1742 年，一个叫哥德巴赫的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数学现象：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但他无法证明这个发现，他写信给当时意大利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帮忙证明他的这个前无古人的发现。欧拉被这个发现迷住了，这位鼎鼎大名的数学家穷尽一生的劳作来证明哥德巴赫的新发现，却没能获得成功，他无奈地将这道数学难题留给了后人。从此，哥德巴赫的发现成为一个猜想。在科学领域，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这个引人着迷让人懊恼的哥德巴赫猜想便是那皇冠上的明珠。

1900 年，德国数学家希伯尔特向世界宣布：哥德巴赫猜想是整个数学界留下来的最重要的难题之一，他在国际数学大会

上把这颗皇冠上的明珠介绍给了20世纪的数学家。于是世界上的数学大佬们开始前仆后继地向这个难题发起了进攻，络绎不绝地去刷新摘取明珠的纪录。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首次打破寂寞，证明了(9＋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代马证明了(7＋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6)；1938年和1940年，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塔布分别证明了(5＋5)与(4＋4)；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4)，同年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1957年，王元又将自己的研究推进一步，证明了(2＋3)，1963年，他又证明了(1＋4)，与他同时证明出(1＋4)的还有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就这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将成百成千的数学家推向那数学的巅峰绞尽脑汁、一步步地艰难爬行，但巅峰依然云遮雾障，横断巫山。到1965年，当阿·布赫夕塔布和意大利的朋比尼向世界证明了(1＋3)时，世界数学家们的智慧与行动似乎就要接近了巅峰的最高点。

然而，越是接近巅峰越是会险象环生，越是到了最难抵达的时刻。这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不善言辞的陈景润说话了，他说：“我要打倒维诺格拉多夫，我要证明(1＋2)。”

陈景润是厦大的毕业生，出生于福建省会城市福州的白鹤巷里，故乡则是距离福州15公里的胪雷乡村，出生地与故乡是他童年少年时生活的地方。陈景润从小寡言，爱看书，与哥哥、姐姐玩捉迷藏时，常常是拿着一本书，躲在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不吭声地看自己的书，直到被人“捉”出来为止。那时，无论是他经常往来的故乡乡村，还是他生活、读书的城市，大致没人会知道有个红头发蓝眼睛的叫哥德巴赫的德国人给世界出了一道数学难题。

但在1948年，正在福州英华中学上高一的陈景润，听到了哥德巴赫的名字。那年，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留英博士沈元教授回福州奔丧，因长江以北解放战争炮火连天，交通一时中断，沈元只得暂留福州。英华中学是沈元的母校，在母校的邀请下他到学校为中学生上课，就是从这位清华教授的授课中，陈景润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这道著名的难题。沈元教授还告

诉陈景润与同学们:“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你们中间有一个同学,他真的了不得,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沈元教授在中学课堂上的这个风趣之言,不过是对青年学生们的一个鼓励而已,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梦在25年之后,竟然真的由在座的一个学生一生自强不息的奋斗而变成了现实。

1950年夏秋,陈景润身着一身黑色学生装,头带黑色学生帽,提着一只很旧的小藤箱,走进了素有“南方之强”之称的厦门大学,他住进了博学楼(现在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23室,成为厦大数理系的一名学生。当年厦大数理系4个学生一个班,教师几乎是手把着手教着这些未来的数学家。数学系系主任方德植教授教他们“高等微积分”、“高等几何”,给陈景润一生很重要影响的李文清老师教他们“高等代数”和“实变函数论”。让陈景润记忆最深的是李文清老师讲授的数论史上的三个没有解决的难题:费马问题、孪生素数问题和哥德巴赫猜想,李老师笑吟吟地对四位学生说:“我们班上谁能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对世界就是了不起的贡献。”像沈元教授的梦一样,李文清也盼着他的学生能有人去摘取那颗熠熠闪烁的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一次,陈景润将老师的梦想深深地装进了自己的心里。

在厦门大学,陈景润以他的沉默到近乎孤僻的性格,痴迷于数学王国的遨游。白天,他除了听课,便是伏在课桌上演算不已,教室、图书馆、食堂与宿舍四点一线,很少会在其他场所发现他的身影;夜里,他打开准备好的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读书,为的是不惊动同宿舍的舍友。有一次,他从食堂吃完饭回宿舍,忽然一阵海风刮起,一片雨幕随之而降,同学们立即飞跑起来,躲开了那场突然而至的大雨,只有陈景润一人在雨帘中依然独自低头慢步,自在地继续着自己的问题思考,直到同班同学惊奇的喊叫才让他从雨帘中恍然大悟过来,恍悟过来的陈景润摸摸自己淋湿的衣服,看看挂着雨帘的天空,说了句:“唔,老天下雨了。”如此沉湎在数论的演算推理中,忘我于书海里,陈景润在厦大就已显示了他那不知有汉、只知数学的性格,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好像都聚集在一个神经元上,这个“元”直通数

学的皇冠数论，有人说他只有一条数学神经线，同学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爱因斯坦”。

◎陈景润与他的老师同学合影，左起杨锡安、陈景润、方德植、李文清，林群

1953 年，国家急需人才，陈景润这一届大学生全部提前一年毕业，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能到首都工作，这在当时是无尚荣耀的事，陈景润去了，但他很快就回来了。陈景润天性沉默寡言，神态木讷，虽学业优异有过人的智慧，但只有在抽象的数学王国里遨游时才智的蓓蕾才会绽放，他的脑袋塞满了数论的抽象问题，他的神经很少回到现实的世界，“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与符号”。然而他的任务却要在现实的课堂上组织教学，用让学生容易理解的语言为一群活跃活泼的首都少年讲解简单基本的一元一次方程。人生发生了错位，他懵了，他在课堂开始不知所措，这个一心只奔数学皇冠而去的老师实在无法胜任中学的数学教学，他被学校辞退了，灰溜溜地卷起铺盖回到了福州城，像解放初期那些城市小商小贩一样，在街头摆起了卖香烟与出租小人书的摊子，只是摆摊

的陈景润依然在想象着他所向往的那片数论天地。

1954 年的一天，这一天对陈景润来说是阳光无比的明媚，正在摆摊的陈景润见到一位熟悉的身影走过，他一下子有了一种莫名的惊喜，他赶忙向那个身影呼唤："王校长！王校长——"

陈景润虽然像个书呆子，但他对自己母校的校长王亚南还是熟悉的，他知道王校长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一个很严格的导师，也是一个极其珍惜学生才华极力奖掖后进的长辈。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王亚南就推荐过不少厦大经济学的毕业生就业，许多学生正是受到他的恩惠不仅避免了毕业即失业的痛苦，而且得到了自己价值实现的岗位。在厦大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陈景润上大学的时候，厦门大学不少农村来的学生平时还打着赤脚上课下课，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王校长认为大学生打赤脚学习生活不文明，有碍校园作风。他通过调查得知，学生赤脚的原因既是农村学生的生活习惯所致，也有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鞋子的原因。于是王校长让办公室人员作了一次统计、登记，记下那些买不起鞋的学生，量下他们所需鞋子的尺码，然后用自己的稿费，为这些打赤脚的学生买了鞋子送去，学生穿上校长送的鞋子，学习生活便精神了许多。有一天，王亚南在校园里看到依然有几个学生打赤脚行走，心里不免有些不大高兴，他当场叫住这几个同学，问道："你们 HAI-GI 呢？"其中有个学生回答："王校长，我们都是学生，还没成家，没有孩子。"王亚南听了哭笑不得。这时，另外一个学生忙纠正说："傻瓜蛋，王校长在问我们为什么不穿鞋子，可你胡说什么啊！"原来王亚南是湖北人，湖北口音很重，"鞋子"让人听成了"孩子"，这件事后来成为厦大一则很亲切的笑谈。这之后，厦大校园里便不再出现随便打赤脚的人了，校长知道后高兴地说："好，大家都做文明大学生了。"

这些厦大记忆让落魄于福州街头的陈景润鼓起勇气向王校长呼唤了。曾在惊涛骇浪中绑在船舱中读书的王亚南与不知有雨只知读书的陈景润有天然的默契，听到有人叫，王亚南便停住脚步，他回头一看，认出走到面前的青年就是那位被同

学叫作“爱因斯坦”的陈景润，他很惊讶，在中国到处都呼唤着大学毕业生的 1954 年，厦大的这个高材生为什么会在街头摆摊呢？当他问完陈景润的遭遇后，心疼起来，他并非神仙，不可能预见眼前这个狼狈的摆摊大学生将来会是个闻名世界的数学王子，但他深知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更清楚厦大 4 个学生一个班成长起来的数理系学生决不至于成为街头的小商贩，更何况是一个有着“爱因斯坦”绰号的学生，他不能容忍这种不珍惜厦大学生不珍惜人才的行为，他把陈景润带回了厦大，把陈景润安排在数学系的资料室工作，陈景润获救了，福州街头消失了一个只懂得一分一厘不会有误差但不懂得招呼买卖的小商贩，但厦大多了一个能够冲击科学巅峰的人物。

重新回到厦大的陈景润，住进厦门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勤业斋 106 室，经过北京四中这次意想不到的生活变故，他变得更加沉默与孤僻，更是将一门的心思追随着数论上那一道道曲折蜿蜒的问题，将生命消融于夜以继日的读书与演算推论之中，他暗暗地驱使生命与抽象世界赌一把，去进攻那些让多少数学家望而生畏的数论难题。1956 年，陈景润 23 岁，23 岁的陈景润开始啃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开始静静地向数学的高峰发起了沉雄坚韧的冲击。除了上班，他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寝室，连饭也端到屋子里用，人们偷偷地望一眼勤业斋 106 室，满房间堆放和满地撒放的是演算过的稿纸。

终于，巉岩叠嶂中天门开启，陈景润发现了数论中的中心问题之一“他利问题”，这是华罗庚正在着力研究的问题。陈景润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交给了自己的老师李文清，李文清看后特别的惊喜，他立即将陈景润的论文寄给了正在研究“他利问题”的中科院数学所的华罗庚先生，华罗庚审阅后，又马上将论文转给手下数论组的一批年轻人论证，结果是陈景润的想法与结果是正确的。华罗庚感慨地对弟子说：“你们呆在我的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是不及格的中学数学教师攻克了一个数论抽象世界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个奇迹，直至今天，中科院数学所的专家们谈起这件事还说：一个数学家

一生能有这样一个发现，便是幸运的了。

1956 年 8 月，中国数学元老俊杰们荟萃的“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在北京举行，经华罗庚推荐，陈景润走上了设在北京大学一间教室中的数论大会报告台。然而，走上报告台的陈景润面对着台下众多数学家的目光，他的腿软了，平时就不善言语的他此时脑袋是一片空白，所有准备好的发言全部逃得无影无踪，他除了颤颤抖抖地在黑板上写下论文的题目外，就只能毫无逻辑地说了一两句原本逻辑性特强的数论话语，他似乎只懂得在深邃的抽象世界里思考，而不懂得在现实世界中发言，他败下阵来。就在参会代表们对这个华罗庚极力赞扬的年轻人怀疑与失望时，陈景润的老师李文清急了，文静的他此时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自告奋勇地走上讲台，向大会解释了学生的怯场，对陈景润的论文作了补充介绍。之后，华罗庚笑着走了上去，刚刚的一幕他都看见了都领悟了，他向大家阐述了陈景润论文的意义与不凡之处。权威一锤定音，会场上响起掌声，脸色苍白的陈景润和急得脸颊冒汗的李文清都长长地吐了一口气。8 月 24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大会，令陈景润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研究被放进这篇数学界最重要的报道中，报道特别写道：“从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的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推进。”一个 25 岁的资料员推进了中国数学泰斗的研究，这是学术界人人都清楚的了不得的奇迹。

王亚南与学校领导会见了载誉而归的陈景润、李文清等会议代表，校长欣慰自己从福州带回了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深知道辩证法的奥妙，他从那木讷、怪癖、似痴若愚的陈景润外表上看到了一种攻克科学顶峰的生命力，他鼓励陈景润趁势而上。不久，陈景润的第二篇论文《关于三角和一个不等式》在 1957 年第 1 期《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这时，陈景润科学生命的伯乐华罗庚提出了自己的意愿，希望陈景润调到中科院数学所，数学所领导来到了厦大协商，王亚南二话没说便同意了中科院数学所的要求。1957 年 9 月，陈景润的科学生命的

脚步，踏进了代表着中国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中科院的大门，他那属于摘取数学皇冠明珠的生命揭开了坎坷而辉煌的一页。

走进京城中关村的陈景润依然惯于独处惯于独自思考，人们总将独来独往与天马行空联系在一起，但陈景润的独来独往却犹如孤雁独飞一般，一点都不天马行空。在中关村 63 号宿舍楼二单元一楼的集体宿舍里，陈景润向同宿舍的 3 个同事提出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恳求，他要住进三人共用的那间 3 平方米的卫生间（当时叫厕所，并不具备现在的卫生间条件）。这间卫生间咫尺之间，只能安放一张单人床，冬天也不会有暖气，但陈景润则在这里待了两年，常常是一天吃 2 个馒头，配 5 分钱的菜，用一壶开水掺着人参须喝，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陈景润向数论史上的一个个难题发起进攻，1959 年，发表了《华林问题 g(5)的估计》，这是华林问题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华林问题是在厦大时李文清老师介绍给他们的世界数学三大难题之一，陈景润以 3 平方米卫生间中的 2 年思考，突破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填补了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

从 1958 年到“文化大革命”，伴随着那些此起彼伏的政治风波，陈景润命运之舟在政治运动的风浪里颠簸着，在遭难的煎熬与研究成果的喜悦循环中沉浮。

1957 年“反右”斗争之后，一场以整顿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首先在武汉大学发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在中科院数学所，以华罗庚为首的专家和青年业务骨干都靠边站了，陈景润和在代数拓扑领域很有成就的岳景中被当作“最顽固的小白旗”拔掉了，陈景润被下放到大连科学院东北逢源的化学所，除了洗瓶子，陈景润真真是到了虎落平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1962 年，周恩来、聂荣臻、陈毅主持召开广州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在大会上，华罗庚向周总理提出调回陈景润的请求。陈景润在广州会议温暖的南风吹动下，回到中科院数学所。回到数学所的陈景润，不久就在《数学学报》发表了《给定区域内的整点问题》与《圆内整点问题》两篇论文，一副数学大家的风范，从这两个空山绝响似的研究成果中显示出来，

数论史上几个关键的难度很大的问题陈景润都涉猎了，这个数学所里的不声不响的怪人要去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明珠了。

1966年春天，陈景润庄重宣布，他得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成果，证明了(1＋2)，这真是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但这时的中国，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批判京戏《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杂文，意味着一场大的劫难即将发生，中科院相关部门对陈景润论文的发表与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在关肇直拍案而起的“不发表陈景润的这篇论文将是历史罪人”警告下，陈景润的《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他赶上了这个科学权威刊物在“文革”前的最后一班车，(1＋2)的证明正式发布了，世界数论史上又一个重要奇迹诞生了，陈景润也实现了他“打倒维诺格拉多夫”的诺言，但世界数学界在惊讶之际，也对中国科学家的这个能力有所怀疑。而此时的中国，无论男女老幼，都被卷入了所谓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陈景润不仅没有成为科学的英雄，反而被当成“寄生虫、白痴、传染病患者”揪了出来，到了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绝境。他的6平方米的房间被抄了，造反派从那里搜出了几麻袋几麻袋陈景润用心用血浇灌出来的草稿手稿；他那瘦弱的身躯被挂上一块写满罪名的2尺多长一尺多宽的“黑帮牌子”，数学王子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了“牛棚”改造，造反派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等于3吗？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领国家发的工资，受着解放军的保护，还研究什么1＋2＝3，这是伪科学。荒诞的岁月荒诞的话语荒诞的行为，神圣的科学殿堂被玷污了，只在数论王国中遨游的陈景润，他的信念连同他的肉体都被残酷地摧毁了。1968年9月的一天，陈景润从“牛棚”的三楼上纵身一跳，他绝望了，他要以“文革”中很常见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老九不能走”，伸出的屋檐和地上的白杨树救了他，他没有死。他拖着一身创伤的身躯重新回到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似乎是自杀时哥德巴赫在冥冥中推了他一把，死里复生的陈景润反而孤注一掷，继续起他的(1＋2)的研究。

1972年，万劫复生的陈景润终于登上了数论的巅峰，科学、完整系统地证明了(1＋2)；1973年，《中国科学》正式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了，中国人创造了距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的辉煌，开拓了数论研究中一个崭新的时代。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哈贝斯特坦从香港大学获得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后，便将陈景润的(1＋2)命名为“陈氏定理”，称其为“惊人定理”，“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世界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A. Weil)称赞道：“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20世纪数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这样诞生了，陈景润那瘦弱的身子，几乎凝聚了全世界所有数学家关注倾慕的目光。

遗憾的是，陈景润所尊敬的他要感恩的校长此时已经离开人间了，王亚南校长没能见到他从福州街头带回厦大的学子最后登上科学顶峰的形象。晚年的王亚南在完成了《经济思想史》后，一直在经济学说史上探索一条研究与编写体系的新路，但这一条新路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在“文革”中，王校长与陈景润一样，都未能幸免国家栋梁民族精英罹难的遭遇，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后来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与指示，他才得以到上海治病，于1969年11月13日病逝在上海华东医院。但在陈景润和千千万万厦大人的心中，王校长却一直活在厦大的校园里，他依然以那慈祥严谨的目光，注视着这座“南方之强”学府的时代脚步。

“南强”作家的道道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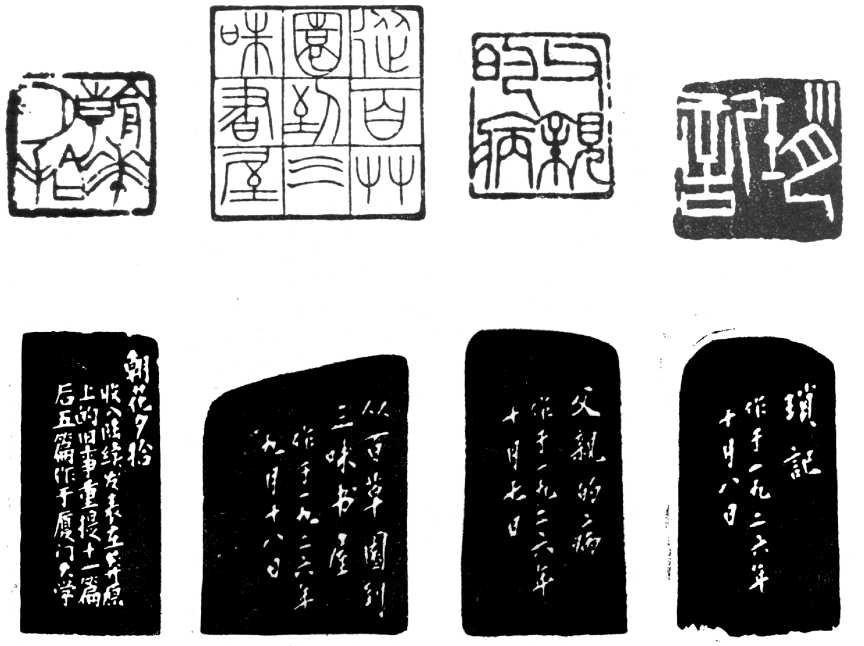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大凡有那么一段厚重历史的学府，都会数落出那么一些人们不会忘却的著名作家的名字。提起北大，人们自然要想起周氏兄弟、胡适、俞平伯，想起沈从文；怀念清华大学人文鼎盛的那段时期，自然会忆起朱自清、闻一多；说到素有“南方之强”称誉的厦门大学，人们就会浮现出鲁迅、林语堂、施蛰存、林庚、洪深、彭柏山以及台湾的王梦鸥、姚一苇、余光中等作家的身影，他们在“南强”学府行走的脚步，与这座中国东南学府的风雨岁月一起，构筑了大学道道别致的风景线。

——题记

一、厦大时期的鲁迅

1926 年 9 月 4 日至 1927 年 1 月 15 日，鲁迅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从北京南下时他原本计划在厦门教两年书，却不料一个学期结束后就很快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但厦门的短短 4 个月，却是鲁迅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在这被鲁迅称为“风景佳绝”的厦大校园，鲁迅有了一种别样的心境。他冷静地思索了自己的过去，编就了那部生命自省自剖的杂文集《坟》，怀着“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的心态，撰写与编辑了一部“任心闲谈”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抱着“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的想法，撰写了那部中国现代学

术史上的代表著作《汉文学史纲》，他还创作了《奔月》、《眉间尺》两篇历史小说，为中国的历史小说创造了一种“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叙事方式。



◎鲁迅在厦门所撰著作篇名印谱（节录）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刊刻

他在国文系、国学院教了整整一学期的《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课程，在厦大、集美学校和平民学校作了四场演讲，帮助厦大学生创办了“泱泱”和“鼓浪”两个文学社团，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 17 多万字的珍贵文字，这包括一部凝集着鲁迅与许广平爱情旅程的《两地书》。厦门大学的 130 多天的日子，是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生命世界里“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的日日夜夜，也是他情感世界温暖与无聊的相互厮守的日子，同时是他徘徊于“寻路”阶段身份纠葛的真实写照。

恋爱中的鲁迅

1926 年 9 月 1 日夜，天下着雨，鲁迅在三弟的送别下，登上了“新宁”号客轮，第二天早晨 7 时，“新宁”轮拉响汽笛，缓缓离开上海码头，向厦门驶去。与此同时，许广平也从上海启程，乘“广大”号回广州。这对师生约定两年后在广州会面。

船平稳地行驶在蔚蓝的东海上，一路无风，鲁迅不时走到甲板上，他看见后面也有一条轮船，“总是不远不进地走着”，他想象那就是许广平乘坐的“广大”号，心里在问许广平：你是否就在船中，你可看见前面的船？鲁迅恋爱了，面对着浩瀚的海天，他心里在说：“我也可以爱！”

在认识许广平以前，鲁迅的生活中可以说没有女性的温馨没有青年女性给过的特别感情。在他东渡日本留学（1902 年 3 月）后不久，鲁迅就接到母亲来信，告诉他家里已经给他说了一门亲，女方名叫朱安，缠脚，不识字，母亲见了喜欢，就托人做媒定了这份亲事。对如此的包办婚姻鲁迅自然是反对的，他要求母亲退婚，但母亲坚持不退，鲁迅只好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脚，二要她进学堂读书。既然拗不过母亲，就去改造将与自己一起生活的女人。但母亲又来信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堂读书。鲁迅明白了，朱安是个完完全全的旧式女人。这次鲁迅没有立即给母亲回信，他不能与母亲冲突，他想让时间的拖延来摆脱自己的婚姻困境。但母亲又来信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回。这是 1906 年的夏天，鲁迅从日本匆匆赶回浙江，跨进家门才知道这就是那个年代父母逼迫孩子结婚惯用的手段，母亲没病，她是在诳鲁迅回家完婚。孝敬母亲的鲁迅无奈地接受了，他按照他后来猛烈抨击的礼俗迎娶了朱安，第二天又依着习俗随朱安去了娘家，甚至还在自己已经剪了辫子的头上装了一根假辫子，为了母亲高兴，鲁迅似乎是在努力向礼教靠拢。然而他并不愿意接受“母亲的礼物”，婚后第三天，他搬到了母亲的房里睡，又过一天，他干脆远走高飞，回日本去了。但从一而终的朱

安，却从此跟定了鲁迅，过了一辈子连婚姻都是虚假的生活。而鲁迅也一直压抑着自己，处于新文化涛头的中心人物，他除了“拳来拳对，刀来刀挡”的战斗外，似乎就是一幅“横眉冷对”世态的冷峻姿态，他不能在论敌面前有半点闪失，人们没有发现他与哪个青年女性有过密切的来往。但这位信奉“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中国现代文化先驱，岂能没有自己追求的爱情与自己个人的幸福。

1924 年，鲁迅开始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之后，他的客厅里便出现了一群活跃的女大学生，这群人中有许广平。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年轻 20 岁，她是这群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充满热情，鲁迅亲昵地称她“小鬼”。1925 年端午节那天，鲁迅请她们在家中吃饭，竟喝得有了醉意，他“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案小鬼（指许广平）之头”，[①] 手舞足蹈起来，年青新女性的鲜活生命激活了这位冷峻的先生的热情，他那压抑的生命活力勃然显现。许广平敬仰鲁迅，作为“五四”后的一个新女性，她大胆地追求起自己的导师。鲁迅也想爱，但他非常的谨慎，他心中是一团的疑虑：自己已经是这样的年纪，内心有着许多的伤痛，他不想让这伤痛影响给青年；何况，他已有的婚姻在拘囿着自己，他的学界、官场的怨敌正在蜿蜒伸展，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他便会授人以柄、授人以口实。后来，北京女师学潮发生了，再后来，“三·一八”惨案发生了，鲁迅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几次离家避难。北京的空气已经日愈的压抑，这对师生的感情已经越来越密切，无论是政治的原因还是爱情的原因，鲁迅都需要“换一个地方生活”，寻找一处比北京更安全更自由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时候，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筹备国学研究院，他推荐鲁迅的好友沈兼士任厦大国学院主任，邀请鲁迅到厦大任教。那里远离北京，远离朱安，邻近正在燃起南方革命烈火的广州，政治空气和自然气候都比北京暖和，又有比北京多得多的每月 400 元的薪俸，鲁迅欣然应允。此时，恰逢许广平要离京回广州，于是两人一起动

① 鲁迅：《两地书》1925 年 6 月 28 日致许广平。

身，同车到了上海，再各自从上海乘船分别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他们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了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①]

9月4日下午1时，“新宁”号轮抵达厦门，鲁迅因为不懂闽南话，无法问路，便先住进中和旅馆，打电话告诉林语堂抵达的消息。下午，林语堂、沈兼士和孙伏园便来到旅社，雇船将鲁迅送到厦大。

鲁迅住进了厦大生物馆的三楼。当天晚上，他便给许广平写信，告诉她“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白天虽暖夜里却凉，自己“暂住在一间很大的三层楼上，上下虽不便，眺望却佳”，“要静养倒好的”。[②] 从这一天开始，一向自称懒于写信的鲁迅，与许广平有了一生中最为频繁的通信，厦门的130多天时间，这对恋人的来往书信有83封，在周海婴整理出版的父母一生书信的《两地书·原信》164封中，厦门通信占了一半以上。在这两天不止一封的书信中，他们不厌其烦地询问对方是否收到自己的信件，推算着邮件行走日程，猜测邮件迟到的原因；相互担心操心着饭菜合不合口，居住适不适应，工作累不累，身体是胖了还是瘦了。在鲁迅这里，他担心许广平“食少事烦的生活，怎么持久”；[③]在许广平心里，她害怕鲁迅有闷气会闷在心里，让鲁迅有闷气向她发。正是在如此细微的体贴和浓浓的爱的情意中，鲁迅深深体验到了“有充实我的心者在”[④]的温暖与幸福。乃至连生活习惯都有了改变。不再喝酒，打消到海中游泳的兴致，不在半夜出去寄信，不发牢骚，因为喝酒、游泳、半夜寄信和发牢骚都会让许广平不安。在远离北京的海滨学府，鲁迅可以大胆的思念与表白了。

现在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却可以静观默念HM，所以

① 许广平：《鲁迅与青年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第8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③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④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精神上并不感到寂寞。①

至于有一个人，我自然是足以自慰的，且因此增加我许多勇气，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并且也不能“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②

这默念之度常有加增的倾向，不知其故何也，似乎终于也还是那个人胜利了。③

“有一个就好”，鲁迅有了一个给了他温馨的女性了，他开始“默念”起一位女性了。这样的一种种“默念”让鲁迅“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盼着“年月过得快到民国十七年”。④（民国十七年是鲁迅与许广平约定重新见面的时间）

11 月，厦门的冬天来了，许广平很细心，她从广州给鲁迅寄来自己一针一线织成的羊毛背心，鲁迅温暖极了，他很有意味地将毛背心穿在紧贴内衬衣的身上，他特别告知许广平：“背心我现穿在小衫外，较之穿在夹袄之外暖得多，或者也许还有别种原因。”⑤

此时鲁迅 45 岁，作为一位 45 岁的恋人，鲁迅的爱情是理智的，“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⑥却是充满了欣喜和温情，他的心情好极了，他的生命似乎回到了与闰土一起在月下瓜田耍玩嬉戏的童年。1926 年 10 月的一天，鲁迅在厦大集美楼的一道铁丝网上跳起舞来了。那时，他已离开了那要爬 100 多级台阶的生物馆，搬到了集美楼楼上住，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花圃里经常有蛇出入，为了安全，校方用有刺的铁丝将花圃围将起来，但穿着长衫的鲁迅偏在那有刺的铁丝网上做跨栏动作，居然还跨过去了。他得意地告诉许广

①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9 页。
②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8 页。
③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9 页。
④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4 页。
⑤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3 页。
⑥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 页。

迅師：

七、九、十二寄了三信，祇接到来的一封（三旦），你那裏的情况一概不知道，惟有夢想臆测，究竟近状如何？是否途中感冒现在休养？盼即示知。

我不喜欢街，因为到處不勝今昔之感，也因回来慶了，更不好意思偷懒，日常自早八时至晚之時，總從事公室退至寢室，继續是沐浴和预備教课，（二时间逃学証任各方迟未顺就，终日傻你你的一個。這校有三数学生是鄧魯西山会议你大多数是首從，外你右实刘被利用者人，今日十六晚是星四此信寄到或不是至郵差休息時，你可以早些看見了，你预備教课忙嗎？餘以陈。

祝你至郵境度中秋望他们的快乐

你的H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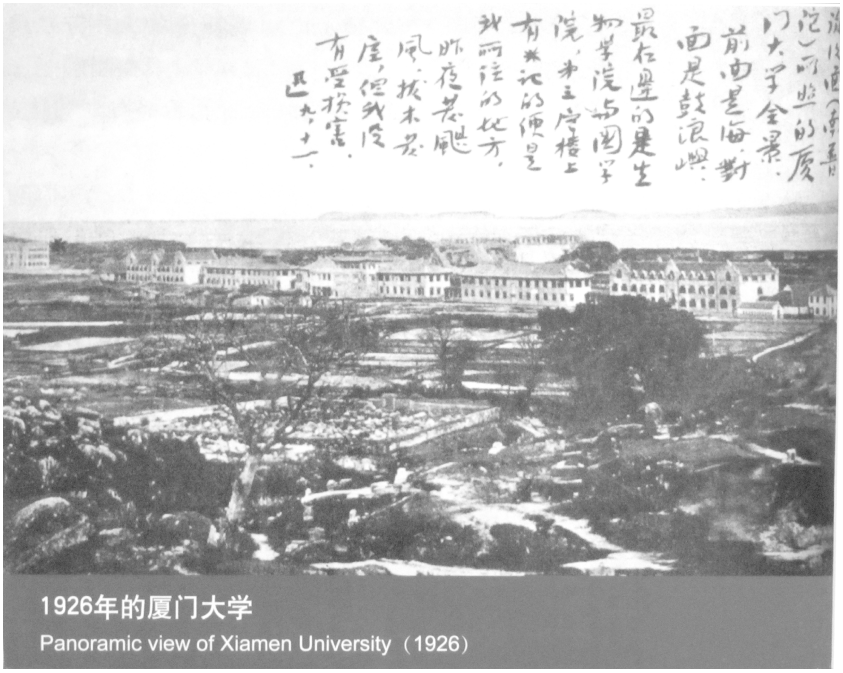
九月十七

◎鲁迅与许广平“两地书”真迹

平:“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①]爱情激起的生命火花将一个45岁的冷峻的生命拉回到了青春年少的阶段,虽然“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却跳跃起来了。许广平读到鲁迅的这封信时也禁不住自己的兴奋,她回信道:“在有刺的铁丝栏跳过,我默然在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幅图画,有一个小孩子跳来跳去……活泼泼的。”[②]许广平的这段话在鲁迅1932年编《两地书》时被删掉了。我们不知道鲁迅在1932年上海那个环境里删掉这些话的原因,但却能感受到45岁的鲁迅在厦门时的一种“跳跃”心境,一种童心未泯的天真之气,一种生命的活泼状态,有了这样的心境,鲁迅才会在厦大写出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经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才有了像“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在这里弹琴”、“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样轻松愉悦文字的自然流露。

恋人的话语是很有趣的,它会在平凡的日常中制造出男女间有意思的话题。在9月30日的信中,鲁迅向许广平叙述自己上课的情景,他说听课学生多起来了,其中有5个女生,在说到女生时鲁迅特别写道:“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③]这是恋爱中的鲁迅的幽默。对于这样幽默许广平是高兴的,她在10月14日的回信中写道:“这封信特别的‘孩子气’十足,幸而我收到。‘邪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邪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并且开玩笑让鲁迅不妨“体验一下”张竞生的“鲜花美画”的“伟论”。[④] 张竞生是北大的哲学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大胆提倡性爱理论,提出“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作一种艺术”,称人生哲学以性学为重,认为性犹如“鲜花美画”。军阀张作霖扬言:要把这伤风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②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③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④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鲁迅寄给许广平的1926年的厦大照片，上有鲁迅的亲笔字

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张竞生被迫于1926年离开北大，前往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开办“美的书店”，继续自己的离经叛道。当时，所有商店都雇用男店员，张竞生却让几个美女在柜台后卖书，这又给他招致无数谩骂。鲁迅曾撰文讽刺道：“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许广平的信便是借着张竞生的“性美论”与鲁迅开了个爱情的玩笑。于是鲁迅回应说：“邪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并且表示“决计从此不瞪了”。[①] 显然，这是一对恋人间的玩笑话、调皮话，无论是正话正说，还是正话反说，或者是反语正说，都流露出与爱偕行的鲁迅活泼的生命状态和禁不住的欣悦心情，这也便是鲁迅在厦门经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常提到的自己“精神上倒并不是寂寞”,[①]和生活上“无须喝酒”的重要原因。鲁迅在北京经常喝酒,“太高兴或太愤懑时就喝酒”[②],来厦门之前,则是寂寞孤独与悲哀笼罩了他的生命。但来到厦门,正如鲁迅后来自己所说的,“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我沉静下去了”,[③]正是这种从新文化战场和“女师大风潮”中上“沉静”下来的鲁迅,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他那深沉世界里温暖的情怀。

恋爱中的鲁迅,又是从充满激烈斗争与论争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来到了位于东南海隅的厦门大学,他的内心显然少了许多外在的制约因素,他要考虑考虑自己的生活了,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而此时“只能听我自便”,[④]他的心情确实比较自由比较轻松。在厦门大学,除了国学院的研究任务,鲁迅每周只有五六节的课要上,他在写给许广平和友人的信中,多次写到“教科不算忙”,“时常闲着玩”,“茶水饶足”,“能吃能睡”,人“肥胖一点”,“心情也自然安泰”,“比先前较安贴”,于是有了一种“想从此整理为较有条理的生活”的想法,甚至为自己的“懒惰”深感“内愧”。[⑤] 恋爱成了鲁迅厦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恋爱中的鲁迅向我们呈现了他生命中最柔软的那部分。

这位因“从小康坠入困境”而“感受到世态炎凉”的“精神界之战士”,历来以“横眉冷对”那如磐的社会黑暗与芸芸众生嘴脸,但到厦大后,他却有了一段难得的正面表现其温暖情怀的岁月,“与爱偕行”的他,虽然周围的世界让他深感无聊,但迟到的爱情在心灵扎根后,他不仅“足以自慰”,而且也“埋葬”了他一向孤独悲观的情绪,增加了生活的许多勇气。由此,他在厦门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③ 《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42页。

④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⑤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128、134、169、178、120、140页。

先生》和《范爱农》5篇回忆性散文。他在1926年10月12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连做了四篇《旧事重提》。这东西还有两篇便完,拟下月再做。”[①]鲁迅向来不相信和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坚信“好的文艺作品”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出来的东西”,[②]这五篇“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由于“思乡的蛊惑”[③]而作出的散文,“自然而然”地“流露”了鲁迅在厦门时的特别心境。无论是《父亲的病》对于“人间至爱者”亲情的叙述,还是《范爱农》关于“旧朋”间寂寞中相濡以沫的友情的回忆,或是《藤野先生》对异邦教授“不倦的教诲”爱心的抒写,都弥漫着温暖的慈爱与闲适的情调,而不像他以后写的《忆素园君》、《忆刘半农君》那般有着更多的世间感慨与悲哀。尤其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弃尽了先前《野草》的隐晦与沉重,显得特别的率真与明亮,让童年的“乐园”洋溢着童年生命的天真之气,即使是描画三味书屋里的那位私塾老师,他朗读文章时的沉醉乃至他的“瞪眼”与“怒色”,也都隐藏着鲁迅其他文字少有的温情。这批与“鲁迅风”不同风格的文字,表现了鲁迅对人更细微更日常的体贴和关爱,情感世界的温暖和生命状态的活泼常常溢于言表。

恋爱中的鲁迅,也比往常更体贴人了。在鲁迅眼里,那时的厦门可谓是不干净的“大沟”中的“小沟”,对于此地的闭塞、守旧和风气,鲁迅有诸多的牢骚和厌倦。但他并没有采取他在北京时“站着”“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④]的姿态,相反却表现出某种平静与对人的体谅。他是林语堂推荐邀请来的,他在不少场合不少事情上都会考虑到林语堂的处境。有一次,校方派人将他住处的两盏电灯摘走了一盏,坐椅也被收走了一张,他恼火了,便要递上辞职书,但想到他的辞意使林语堂“一晚睡不着”,“对他不起”,也就取消了辞意。[⑤] 这样的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② 《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31页。
③ 《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
④ 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7页。
⑤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小刺激”有几次，都让鲁迅有些愤然而决计要一走了之，也都因为想到“只怕我一走，玉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①]鲁迅之所以坚持到学期结束后才离开厦大，有很大的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为玉堂面子计”，不想落下让人指责林语堂的“口实”。[②] 即使对“尊孔”的林文庆校长，他也不会与他针锋相对地对抗着，他如约参加校长在学校和鼓浪屿家中的宴请，礼貌地回复校长对于自己离去的挽留。[③] 而他与顾颉刚的关系，在厦大时起码在表面上还保持着正常的同事关系和客气，直至他要离开厦门时，厦门《民钟报》报出“鲁迅之行系由国学院内部分为胡适派与鲁迅派之故”的传言，[④]他还与林语堂、顾颉刚一起到《民钟报》社，澄清《民钟报》的报道，要求报社作出更正声明，这一对冤家实在没有后来在广州时那般的势不两立，也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想象的那种剑拔弩张的对立状态。这一切，都表明了恋爱中的鲁迅，不再是一个“横眉冷对”的斗士形象。

1932 年，鲁迅编《两地书》出版时，他特别做了一个声明，他说：“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看近来书籍广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不过我们这书是不然的，其中并无革命气息。”[⑤]很明显，鲁迅担心的是人们将他与许广平的爱情也看成是“革命”的，他不愿人们用“革命”的眼光去理解他那段温暖幸福的时光，在较为平静的教授生涯和热烈的恋爱中，厦门时期的鲁迅给了我们生命中柔软的一面，这是与“横眉冷对”不同的人间鲁迅不可或缺的生命组成。

1927 年 1 月 15 日，在许广平甚至有点光火的催促下，鲁迅不再迟疑了，他离开厦门到了广州，无论是南下厦门还是离开厦门，鲁迅的这一段行踪，都有一条红丝线穿着，那就是他与许广平的爱情。

---

①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0 页。

②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6 页。

③ 《鲁迅佚信一封·致林文庆》，《鲁迅研究月刊》1999 年第 10 期。

④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5 页。

⑤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 页。

“月亮诗”风波

恋爱中的鲁迅也有很不愉快的事，在生命获得温情与激情的时候，一个令他十分愤懑从而要“拳来拳对”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所谓“月亮诗风波”，与这个风波直接关系的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诗人高长虹。

高长虹是个激越的青年作家，他成立了狂飙社，创办了《狂飙》杂志，鲁迅与他相识于1924年底，那时鲁迅认为他是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①]他全力支持高长虹，甚至咯着血还在为他校稿。1925年，鲁迅创办《莽原》周刊，狂飙社和未名社成为《莽原》的主力，主要开展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高长虹便常常到鲁迅那里，帮忙鲁迅编辑《莽原》。有一天晚上，高长虹到鲁迅寓所，鲁迅从抽屉里拿出一篇题为“乱七八糟”的稿子给高长虹看，征询他可否发表的意见，鲁迅告诉他作者是女师大的，那时，高长虹尚未认识这篇稿件的作者许广平。高长虹看后，“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和鲁迅都认为“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那时，高长虹出版了一本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有一天，他接到许广平的一封信，还附了邮票，要买他的这本诗集，就这样两人开始通起信来，据高长虹回忆，前后两人有七八次书信来往，可从未见过面。女师大学潮发生后，鲁迅寓所里常常聚集一些女大学生，高长虹也是鲁迅寓所的常客，他在鲁迅那里见到了许广平，却也仅是一次面而已，却没有谈过话，敏感的高长虹已觉出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是很好的。

鲁迅到厦门后，《莽原》由未名社的韦素园主持编务，编辑内部矛盾由此爆发了。起因是韦素园退了狂飙社高歌的小说，又压下了向培良的剧本，高长虹为此很不服气，他凭借自己的阵地，于1926年10月在上海的《狂飙》上发表致韦素园和鲁迅的两则“通讯”，提出要听一听鲁迅对韦素园退稿压稿事的意

①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见。鲁迅觉得此类事的发生“真是吃得闲空”，他意识到几年来为这种无聊的“闹架”“生命耗去不少”，决定“不愿意奉陪”，[①]甚至还想将《莽原》停掉，以结束一些人无聊的“争夺”，他没有回应高长虹的“通讯”。不料鲁迅在厦门的沉默反而激起了上海高长虹更激烈的反应，他一面在11月7日的《狂飙》第5期上发表《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暗指鲁迅戴着“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一面在《新女性》登了“与思想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的广告。鲁迅见此便不高兴了，觉得高长虹“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停”，便决定“不再徬徨，拳来拳对”，在《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上发表了《所谓“思想先驱者”鲁迅启事》，不客气地指斥高长虹的“利用”与“笑骂”，声称要将高长虹的伎俩“揭露出来”。[②] 正是在这样一个很容易意气用事的时候，11月26日，《狂飙》周刊第7期上刊出高长虹的爱情组诗《给——》中的第28首，这首诗也被人称作“月亮诗”。

我在天上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着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我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又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高长虹的诗歌发表后，文坛上便有人议论起来，将这首诗杜撰为鲁迅、高长虹、许广平之间的“爱情纠葛”，说“月”是指许广平，“太阳”是高长虹自比，“夜”是指鲁迅，“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流言着实可怕，假如真如流言所言，那鲁迅自然成了夺人之好的“夜”，而高长虹则成了慷慨大度的“太阳”了，对此是绝对不会沉默的。鲁迅远在厦门，原本并不在意高长虹的爱情诗，但韦素园写信告知了鲁迅，鲁迅在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信中说：“那流言，最初是韦漱园通知我的，说是沉钟社人所说，《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他。今天打听川岛，才知此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衣萍、小峰、二太太。”鲁迅曾一度怀疑那“流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也曾怀疑这是《狂飙》社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他的别一种方式，但有了自己信任的韦素园和川岛的证实，他最终还是深信不疑。于是就决定对高长虹不再隐忍退让，而要“拳来拳对，刀来刀挡”。他回忆起与高长虹的来往后，认为到厦门之前高长虹“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但“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鲁迅干脆很坦然地表白，“我是夜，当然要有月亮的”，他笑高长虹为此“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

很”。在“拳来拳对”中，他在厦大作了历史小说《奔月》，以背叛恩师后羿的逢蒙影射高长虹，与高长虹“开了一些玩笑”。

高长虹的“月亮诗”是否隐含着鲁迅、许广平与高长虹的情感纠葛，这成了文坛的一件纠结不已的事。后来有人考证出“月亮”所指并非许广平，而是石评梅。石评梅也是“五四”时期一名知名的女作家，在高长虹的心中，她是才女、美女、圣女，高长虹特别地仰慕她，曾为她写了不少的爱情诗，《给——》这集组诗主要就是表达对石评梅的爱慕之情。但“月亮诗”的流言却也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高长虹正是风华正茂，他历来不向人示弱。“月亮诗”风波搅起时，他又在12月12日的《狂飙》第10期上发表了《时代的命运》等3篇文章，放言自己对鲁迅“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献过最大的让步”。高长虹在“通讯”里说鲁迅为“思想界之权威”，这已经让鲁迅无法容忍，因为在与“现代评论派”因“女师大”学潮而引出的论争中，陈西滢就以嘲讽的腔调讽喻鲁迅为“思想界之权威”，如今自己的学生高长虹也以同样的口吻刺激他，他岂能不恼；之后又出现了“月亮诗风波”，引出近乎人身和人格攻击的流言，这使得鲁迅不能不高度惊觉起来；待到这个狂起来的青年又放言为他“献过最大的让步”时，鲁迅真的就到了有些愤懑的程度了，他对于高长虹，“从此便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①]

从“吃得闲空”的“压稿事件”到《给——》引出的“月亮风波”，鲁迅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一次从无聊到悲愤的痛心过程。他沉痛地发现自己在北京时为青年打杂的“拼命”，“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发觉自己把生命“牺牲给一部分人，是不够的，总非将你磨消完结，不肯放手”，[②]感到了有些青年对于自己是“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了，便想一棒打杀”，[③]“发现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0页。

②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③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为傀儡或背后枪击我，都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①]由此，他开始放弃了早期“青年必胜于老年”的信念。

许广平则是个较为直观感性的人，当她知道鲁迅因为高长虹的事以及身边的所谓“顾颉刚之流”而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在1926年11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信中说：“想起你的弊病，是对有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待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感觉太敏锐太热情。其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是小说家取材失策。”[②]这段话在鲁迅编《两地书》时只保留了前面的三分之一，但许广平说的却是大实话，是对人间鲁迅的近距离感受。

在厦门，让鲁迅深感世界无聊而心情不好的人，还有与他一起在厦大国学院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以至于发生了震荡文坛的“候审事件”。

鲁迅与顾颉刚

1927年7月，中国南方进入炎热的夏天，在这让人禁不住会火气上升的季节里，从南方革命发源地的广州，爆发出一场顾颉刚要与鲁迅对簿公堂的事件，因为官司的两位主角都是著名的文化人士，发难者是人气正旺的历史学家，“被告”则是引领新文化新文学的文学家，这场被后人称作“候审事件”的风波尤为引起全国文化界、学界的特别关注，担心焦虑、怀疑困惑、幸灾乐祸，人们各怀心思地观察着这场官司的发展。但“对簿公堂”终究没有成为现实，鲁迅离开了中山大学，与许广平一起到了上海，他终于逃出了自我禁闭20年之久的旧式婚姻，开始

① 鲁迅、景宋：《两地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② 鲁迅、景宋：《两地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了他建立新家庭和继续以文艺反抗黑夜的生活。

“对簿公堂”的发生，是在鲁迅、顾颉刚先后离开厦门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之后，推荐、邀请他们两人到中大的主要是傅斯年教授。傅斯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参与者之一，1918 年他与其他同学发起组织了“新潮社”，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学生运动的领袖。1927 年他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并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担任所长职务。1 月 15 日，鲁迅离开厦大到中山大学，被聘为国文系教授与国文系主任，当他知道顾颉刚也要从厦大到中大时，他说出了“顾来我走”的话。傅斯年清楚鲁、顾二人所摆出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对峙姿态，但顾颉刚毕竟是史学界的新星，是过去“新潮社”的同仁，他还是极力推荐顾到了中大。顾颉刚于 3 月 19 日离开厦大到广州，校方回避矛盾的办法是将顾颉刚安排到学校图书馆，让顾颉刚到全国各地购买图书，以此来躲开他与鲁迅的冲突。

但冲突还是发生了，而且达到“对簿公堂”的激烈程度。按说鲁迅与顾颉刚都是由北京南下的同仁，他们在厦大时尽管貌合神离，却没有发生过什么公开的冲突，为什么一到广州便不得了，便要针对针芒对芒的呢？这究竟是何原因？像中国现代文坛的不少无头公案一样，这场最终没有发生的“对簿公堂”也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有人说，事件的爆发是孙伏园引起的，那时，孙伏园已离开中山大学到北伐军占领的武汉，在这座长江边的革命中心城市的《中央日报》社工作。1927 年 4 月，孙伏园接到鲁迅与他的学生谢玉生的广州来信，信中叙说了中大的情况，自然是要谈到顾颉刚的情况的。孙伏园就将两人的来信加按语发表在 5 月 11 日武汉的《中央日报》上，信和按语都提出了顾颉刚反对“民党”的问题。反对“民党”就是反对国民党，这可是个反对革命反对南方新政权的政治问题。当时顾颉刚正在杭州为中大购书，7 月 22 日他见到这期《中央日报》，愤怒无比，“感到鲁迅等人值此国民革命之际加自己反对民党的罪名，真是要置自己于死地”。于是于 7 月 24 日给鲁迅写信，与鲁迅“要在法庭上辩一个黑白”。

后来，顾颉刚在他的《自叹》中慨叹道：“我一生中第一次碰

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这对“冤家”还真是冤家路窄，生活总让两人的命运碰撞到一起。

◎顾颉刚像

鲁迅与顾颉刚相识于1918年，那时顾颉刚伙同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月刊，他们如期将杂志赠请鲁迅支持和指导。《语丝》创刊后鲁迅成为“语丝派主将”，“语丝派”以江浙人为主，沈兼士、周作人、孙伏园都是“语丝”成员。那时北大教授有法日派与英美派之争，“语丝”派与法日派关系较密切，因为法日派以浙江籍的三沈二马（沈兼士、沈士远兄弟，沈尹默和马裕藻、马衡兄弟）为首，是留法留日教师的阵营，顾颉刚也是《语丝》的16位撰稿人之一；与《语丝》相抗衡的是《现代评论》杂志与“现代评论”派，以留学英美的教授为主，摆出一副博通西学的架势议政衡文，《现代评论》是北大英美派的阵地，胡适、陈西滢（陈源）是欧美派中坚。北大校园内法日派教授与英美派教授争权夺利，自然也带来了“语丝”与“现代评论”不和。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又受到胡适、陈西滢的大力赞赏和推崇，也是《现代评论》的重要作者，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上发表了《古史研究法》和连载《古物陈列所画艺录》，与“现代评论派”过往甚密。北京女师大风潮兴起后，“语丝”与“现代评论”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鲁迅与陈西滢作为双方的代表人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顾颉刚虽持“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立场，却在1926年的上半年连续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批史学文章，这也就是鲁迅将他归为“现代评论”派的原因。此时顾颉刚虽与《语丝》的同仁保持联系，但对鲁迅已“甚生恶感”，认为鲁迅“对人挑剔诟谇，不啻村妇之骂

也”，对“语丝”的活动也厌烦参加。[①] 但倘若仅此而已，是不至于使这对一老一少的人成为对头冤家的，因为鲁迅虽为“语丝派主将”，但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北大派，他只是在北大兼课，并不加入某派某系的竞争；顾颉刚虽然是胡适的学生，得陈西滢的赏识，但人微言轻，并不能跻身英美派的行列。造成这两个人之后的“最大过不去”，应该与所谓的鲁迅“抄袭”公案有关。

从 1925 年开始，《语丝》与《现代评论》的论战激烈起来，鲁迅与闲话专家陈西滢的笔战白热化了。1926 年 1 月 21 日，陈西滢说闲话了，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上发表了《剽窃与抄袭》杂文，含沙影射鲁迅“剽窃”，称自己“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因文中没点鲁迅的名，鲁迅便装糊涂，不予回应。陈西滢见鲁迅没有动静，又于 1926 年 1 月 30 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致志摩》一封信，此次，他毫不遮掩地道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是“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指责鲁迅“窃取”日本学者成果，犯了学界大忌。陈西滢仅凭道听途说，也不求证落实，便公开发表这样的闲话，这当然引发了疾恶如仇的鲁迅的强烈反应，1926 年 2 月 8 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上发表了《不是信》进行反击，尖锐地批驳“现代评论”的“流言”，这就是所谓的鲁迅“抄袭”公案。这个公案后来是由“现代评论”的主将胡适出面“洗刷明白”的。1936 年，胡适以公开的形式发表了致苏雪林的一封信，在信中，胡适诚恳地评价鲁迅“早年文学作品，和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反省“抄袭”公案“真是万分的冤枉”鲁迅，主张“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②] 信中还说当年陈西滢是“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才说出“抄袭”的话。但从 1926 年到 1936 年鲁迅逝世，却整整有 10 年的时间，这 10 年“抄袭”公案不能不是鲁迅

① 《顾颉刚日记选刊》(1925 年 9 月 1 日至 1926 年 3 月 31 日)，载《中国文化》第 14 期。

② 《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10 页。

一个消解不了的怨，就像胡适所言，它“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①] 实际上，“抄袭”公案事发时鲁迅就认为陈西滢是不会知道盐谷温书的底细的，“抄袭”一说“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②] 那么，给陈西滢的“耳食之言”的人是谁？鲁迅无论在日记、书信和文章中都未曾提及。按顾颉刚的女儿顾潮的看法，“抄袭”公案是引起鲁迅与顾颉刚结怨的原因，顾潮根据顾颉刚的日记，说当时有人认为鲁迅的“小说史”参考盐谷温的书而未注明，这有抄袭之嫌，顾颉刚持鲁迅有“抄袭之嫌”的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 年初陈氏便在报刊将此事公布出去”，顾潮说，“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③] 鲁迅是否怀疑顾颉刚？还是他也像胡适所说认为是张凤举？这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陈西滢的这则无中生有的“闲话”，“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使鲁迅对“陈西滢之流”深恶痛绝，仅就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陈西滢）两个人”，[④]鲁迅对他就不会有太好的眼色，是无论如何也要将顾颉刚视为异路人的。

1926 年 9 月，这对“异路人”各自从北京、上海出发又汇合到了厦大。顾颉刚抵达厦大的日期是 8 月 19 日，比鲁迅先到半个多月，他离开厦大的时间是 1927 年 3 月 19 日，比鲁迅离开厦大时间晚了 2 个月，是从北京到厦大国学院的人中在厦大呆得最久的学者。

在厦大，他们两人倒是同室办公，时有同桌进餐的时候，却“不曾当面破过脸”。顾颉刚还赠自己编的宋濂的《诸子辨》给鲁迅，鲁迅也函请日本友人抄出内阁书库所藏明本的序言，帮助顾颉刚解决撰写《封神榜》序言缺少资料的苦恼。直至鲁迅离开厦大前夕，两人还和林语堂、陈万里、川岛一起到民钟报社去否认“鲁迅之行系由国学院内部分为胡适派与鲁迅派之故”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39 页。

② 鲁迅：《不是信》，载《语丝》第六十五期（1926 年 2 月）。

③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3 页。

④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6 页。

的传言；鲁迅临行前，顾颉刚也几次参加了民钟报社、林文庆校长为鲁迅举行的饯行；在鲁迅离厦的当天，他还“到鲁迅处作别”；[①]鲁迅离开厦大后，他写信给自己的老师胡适，说：“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的信仰的，大家觉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钟于刘楚青（即刘树杞），说他的走是刘氏夺权的结果。”[②]这对冤家相安无事的关系和客气，显然一直维持到鲁迅离开厦大。

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这对貌合神离的学者之间，暗地里的各自抱怨是强烈的。有一次，林文庆校长在鼓浪屿别墅请鲁迅与顾颉刚吃饭，当林文庆的厨子端出一盆厦门的煎螃蟹时，鲁迅便用筷子敲敲螃蟹的硬壳，对顾颉刚说：“顾先生，你考证考证这东西原本是什么。”顾颉刚是以《古史辩》出名的，他在《古史辩》中疑古辨伪，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代历史”的观点，通过考证辨伪说出许多与前人不同的观点，这包括认为传说中的大禹原本是一条虫。但鲁迅反对疑古辨伪，他更热衷于清除旧物，与形形色色的古学对峙，对于《古史辩》常是冷嘲热讽，对于顾颉刚的“大禹原本是一条虫”更是不屑一顾，且有反感，因为他毕竟是吴越文化的后人，大禹是他的祖先。鲁迅暗讽式的螃蟹提问，在林文庆校长面前把顾颉刚弄得有些尴尬。

刚到厦大时，厦大比北大充足得多的“资财”，让顾颉刚对国学院的前景和自己的研究信心倍增，心情振奋，以为“大可做些事业”；由北大的讲师而成为厦大的研究教授，又激励了这位学术地位和影响正在飙升的年轻学者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和热情。他参与了厦大国学院众多的工作，编书、编杂志、研究撰文、访古调查、作演讲、搜罗风俗物品、组织风俗调查会，取得许多国学研究的实绩。顾颉刚称自己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

①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6、129 页。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23 页。

见与道德主张”，[①]是一个“不作事则已，一作事则必用全力为之”[②]的人，直至1927年2月5日，他还在给冯沅君的信中表示：“只要厦大不解散，总想在此半年中出版书籍数种，周刊季刊20余册。”作学问的顾颉刚显然没有文学家鲁迅那种“一面是埋葬，一面是留恋”的思想纠结，他也因此认为厦大国学院“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③]

但鲁迅就不一样了。初到厦门时，鲁迅对“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他对厦门大学最初的印象是“背山面海，风景佳绝”，自己也度过了几天难得的轻松闲适的日子，“拾贝壳”、“海滨闲步”、与同仁“游南普陀”；而且也想认真一下，“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一本较好的文学史，“功罪在所不计”，[④]这也就有了那部未写完的《汉文学史纲》。但很快鲁迅就感到“无聊”了。“无聊”是《两地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仅在厦门致许广平的信中就出现10多次，它是鲁迅对厦门时期自己精神状态的一种写照，“无聊”也是鲁迅对于这世界、人生和自我生命的一种独特体验，只是厦门时期的“无聊”，带着鲁迅在特定时空里的特别感受。

鲁迅在厦门的“无聊”，有来自自己对于南方革命的失望；有来自自己与尊孔的校长的“相反”，学校的“死气沉沉，也不能改革”；但最使鲁迅感到“无聊之至”的，还是“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物”，[⑤]教员中“有希望得到爱，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有和著名美人结婚，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有以异性为玩意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

①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②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0页。

④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⑤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的密斯先生；有打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①]以及“你枪我剑，好看煞人”的学界“在小岛上挤轧”。[②] 身临如此环境，鲁迅作为一位最清醒的现代知识分子，一位有着深刻的“立人”的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其“无聊”之感的日趋浓重是很自然的事。

鲁迅所说的“语言无味”的“浅薄者”，实际上也指顾颉刚及与顾关系密切的陈万里、潘家洵、黄坚等人。鲁迅说：“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他说陈万里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唱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③]说顾颉刚是“急于成名，又急于得势，所以往往难免于道大莫能容”。[④]在鲁迅眼里，“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似皆他所荐引”，[⑤]他觉得顾颉刚是在扶植自己的势力，排斥自己，“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⑥] 于是他将“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与在北京时的与现代派论争联系起来，觉得“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样的情形“比北大还坏”。[⑦] 鲁迅表示“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大”。[⑧]既然“不与此辈共事”，又得同室办公同系科教学研究，“无聊”自然深切。此间，又发生了潘家洵向鲁迅“进言”的事，这让鲁迅在对顾颉刚的看法上又增加了“阴险”二字。

---

①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0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8 页。
③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9 页。
④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55 页。
⑤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6 页。
⑥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5 页。
⑦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6 页。
⑧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6 页。

潘家洵也是研究古史的，他与顾颉刚交往有 10 年之久，两人关系密切，经顾颉刚的推荐而同顾一起到厦大。按顾颉刚日记所言，因《古史辩》一书的影响顾颉刚被厦大从讲师聘为研究教授，而潘家洵依然按北大的资格聘为讲师，这一来，潘家洵内心就很不平衡，“火高三丈”，与顾颉刚“争名夺利起来”，[①]暗地里挑拨他与鲁迅的关系，向鲁迅“进言”顾有替代沈兼士当主任的野心。那时，鲁迅推荐他的朋友川岛到厦大工作，林语堂征求顾颉刚的意见，顾表示反对，但林语堂同意聘川岛来厦时，他又赶忙给川岛写信，告知川岛受聘的事。潘家洵与顾颉刚同为苏州人，是被鲁迅当作“顾颉刚之流”看待的，他的对顾颉刚的不满与向鲁迅的“进言”，连同顾颉刚反对川岛进厦大却又赶着事先告知聘任信息的举动，都让鲁迅瞧不上他的人格，对他厌恶有加。鲁迅一面将顾颉刚的阻挠写信告诉了川岛，一面也将顾想当主任的消息写信告诉了许广平。按顾颉刚的说法，川岛到厦大之后，又与孙伏园等“从旁挑剔”，使得鲁迅“厌我益深，骂我益甚矣”。[②] 在顾颉刚的心里，是潘家洵、川岛和孙伏园等的“耳食之言”，加剧了他与鲁迅关系的恶化，这种恶化的结果便使鲁迅后来发出了“顾某若来，周某即去”的公开宣言。

对于这些恩怨纠纷，鲁迅原本对外是“秘而不说”，[③]尽管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对顾颉刚有相当的怨辞，但那是对许广平一个人说的，外人只是到了 1932 年《两地书》出版后才清楚了内中的实情。厦大国学院时期，鲁迅与顾颉刚依然维持着正常的同事关系，他们的矛盾与怨愤都还隐藏在自己私人的文字里，能透露这其中奥妙的，是那些以学术或思想面目出现的论争。

鲁迅与顾颉刚的关系纠结，表明了那时学界的一种现实逻辑，即人与现实的不可分离，简单的一件事，在交锋、交际中会渐渐地蜕变成意气之争、门户之争、派别之争，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人事风波。但从更深处探寻，鲁、顾的纠结实际上反映了

① 《顾颉刚日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786 页。
② 《顾颉刚日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787 页。
③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40 页。

那个时代必然要发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学术的异同消长，背后蕴含着知识群体和学术的重新分化和重新组合。顾颉刚说："我性长于研究，他（鲁迅）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过问可已。"这句话暗含着他与鲁迅在思想与方法上的根本不可能走在一起。鲁迅是文学家，伟大的文学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顾颉刚是历史学家，学问家，学问家讲究客观，探究历史原本的实际。思想家与学问家的不同是，文学家总是把着眼点放到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上，使其文献整理、文史著述、金石考证都流露一种深刻、彻底的独特，即使做起学问也会贯注着自己对社会变革、人类发展的关怀，很难是学问家的所谓客观，所以鲁迅"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之改革不可缓了"。[①] 在一个处于历史大变局的时代里，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立场方法，是难以成为同路人的。

徘徊的寻路

在厦门大学，鲁迅特别在南普陀旁山坡的坟场中选择了一个长着龙舌兰的坟，他扶靠着坟头坐着，拍下了一帧很经典的照片，这就是那张人们极熟悉的"坟"的照片；在这里，他写下那句被一代代人反复引用的话："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他还将自己五四时期写就的杂文，编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很经典的杂文集《坟》，在《坟》中，鲁迅很明白告诉我们，生命的路，"自己还不明白怎么走"，只是"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45 岁的他，在厦大如此"风景佳绝"的所在，却选择"坟"作为自己生命的关键词，这意味着他理智的却也不无悲哀于生命的最终归宿，他清楚死亡的必然，但又意识到走向死亡的道路并不那么好选，他明白地告诉人们："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②] "寻路"，这是鲁迅在厦门时的生命指向，埋

① 《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8 页。

② 《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5 页。

葬与留恋纠缠，温暖与无聊厮守，是寻路中的鲁迅的精神特征，此时鲁迅的真实人生，是“对于此后方针，实在很有些绯徊不决”。[①]

◎鲁迅坐在坟的旁边

鲁迅的南下厦门，自然有爱情的驱使，有政治形势的逼迫，有在北京经济上收入欠佳的原因，但离开北京，摆脱诸多无奈的困境而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生活的想法，则是鲁迅南下的根本所在。

五四新文化高潮跌落下来之后，鲁迅经验着新文苑的“寂寞”，经历了“两间余一卒”的徬徨，尝到了“无物之阵”的孤独，领教了飞蛾扑火的悲哀，他实际上对于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对

①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4 页。

于自己与他人的反抗，内心已经不抱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他对许广平说："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而"满纸是'将来'和'准备'的指教，其实不过是空言"。[①] 此时，尽管他还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那更多的是小说《药》结局所出现的白花，为的是不想让青年染上他的悲观，他说，"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②] 这种"绝望的反抗"还时常是在"不得不尔"的情形中进行的。

厦大的夜是寂静的，鲁迅站在集美楼二楼的住处里，他的眼前有屋后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耳边传来了南普陀寺牵线傀儡戏的锣鼓声，这让他觉得四周更加的静谧。他想到自己的过去，想到在北京遵奉前驱使命的奋斗，却觉得"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在做什么"，他说："身在北京，不得不尔，譬如挤在戏台面前，想不看而退出，也是不很容易的。"新文化阵营的呐喊，将他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却也"因此而不能'以自己定夺'的事，也就往往有之"。[③] 但自己毕竟"既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④]他对于这世界对于那世态炎凉的中国与世间，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他是无法总是"依了组织者的希望"的。他的南下，带着一种"逃离"的情绪，逃离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逃离正人君子们的困扰，也逃离自己在包围中乃要"挤在戏台前面"的困境。

在厦大写作《〈阿Q正传〉的成因》时，他道出自己作为"孺子牛"的内心独白："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换一转磨，也可以的……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要连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③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179页。
④ 《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为此他决定，“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①]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他选择了离开是是非非的北京，来到寂静的厦大，他要尝试一下学者的角色，做一名讲授学识、著书立说的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在此关门读书一两年”，[②]“专门讲书，少问别事”。[③]

这时期，鲁迅给自己摆出了迟疑不决的三条道路。

> （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我了，为生存起见，我便不论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④]

这三条路虽说包含了鲁迅对爱情的选择和态度，但更是鲁迅到厦门后思考的人生指向。在更多的时候，他把这三条路具体到两个很难统一的问题上：“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绯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⑤]“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⑥]在这徘徊中，鲁迅当时仍是倾向于研究学问与教授学生的，他想先研究一两年，把文学史之类的讲义编好，教书无须预备了，余暇再从事创作之类。

然而，要找一块安静的地方做一点实在的事的愿望，尤其像顾颉刚那样不闻外面的世界而专心地做士大夫式的学问，对鲁迅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

---

① 《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25 页。
③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68 页。
④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6 页。
⑤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4 页。
⑥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8 页。

鲁迅到厦大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四，厦大照例的在群贤楼礼堂举行周会，此次的周会是请鲁迅进行演讲，礼堂早早就济济一堂，许多座位都让学生抢先占走了。上午九时，周会开始，周辨明教授指挥全体师生唱起了“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的校歌。歌声唱毕，校长林文庆走上主持台，他主持道：“鲁迅先生乃新文化运动的首领，国内外闻名的文学家。到本校来已一个多月，大家老是盼望要听他的伟论。今早算是付了众望，他到这里来演讲了，请大家肃静，倾耳以听。”说完，向坐在台后的鲁迅一鞠，掌声便响了起来。鲁迅站到讲台的旁边，开始了他到厦大后的第一场演讲，这次他演讲的主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他照例以“五四”反封建的姿态，批判读经复古，他说自己受聘到本校是搞国学研究的，是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的，本应劝埋首古籍，但依旧要说“与其多读中国书，不如少读中国书好”；他说，“世人对于好事之徒，每致不满”，但“我以为今之中国，却欲好事之徒之多，盖凡社会一切事物，惟其有好事之人，而后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这种社会文化批判性的演讲，自然引发了满堂的掌声，也让那时已是中共闽南地区党组织发祥地的厦大，又添了一份社会革命的热气。一周后，《厦大周刊》第一六〇期出版，“周刊”以较大的篇幅报道了周会与鲁迅的演讲，较详细地叙述了“做好事之徒”的内容，却一点也不发表鲁迅有关“少读中国书”的言论，问题很清楚，鲁迅的“少读中国书”与当时尊奉孔子的林文庆的“首重国文”的办学方针是有冲突的。

鲁迅实在难以忍受不介入社会推动的学问与纯粹的教书的生活，他不由自主地道出了内心的躁动：“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他开始厌倦厦大安静的日子。他说，“此地初见虽然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的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①] 这位骨子里是战士的教授无法将脚步停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3～484页。

止在单调的学院体制中，尽管厦大与他的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厦大方面和我的‘缘分’，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①]但清醒的他很快就意识到“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②]的事实。在《两地书》中，他多次写出了“出我意表之外”这句话，这表达了他离开北京寻找新的生活路上的一次次失望。刚到厦大时，他说厦大是“背山面海，风景佳绝”，是个“静养”的好地方，但一个月之后在写给川岛的信中，他的厦大描述变成了“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③]情绪变了，对自己生活的环境的描述也发生了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新文化先驱的鲁迅，他离不开那“地火正在运行”的中国社会现实。

对于鲁迅的厦大来去，著名的鲁迅研究先行者李长之曾在1935年做过一个分析，他说：鲁迅“还有新的梦想，要治两年的学，于是到了厦门，在厦门能耐的话，他可以像林语堂似的，在那儿停一停，然而他不，他终于是鲁迅，他痛恨于‘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苦恼于一班人‘语言无味’，他以为‘离开了那些无聊人’，‘心就安静多了’，所以他就又被广州的情形所诱引，而到了广州。”[④]当“关门读一两年书”的愿望在厦大成为“妄想”之后，鲁迅还没有完全放弃他的换一种生活的打算，他选择到中山大学再试探一下，在他的心目中，南方革命的发源地广州，或许不至于让自己“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但他错了，他到广州后不久，他照样与学院体制发生了冲突，他还得离开中山大学。

路向标到了，做学问教书终究“已属空想”，此时他说：“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⑤]鲁迅在这里说的是一个价值冲突的问题。说到底，鲁迅毕竟是写过《摩罗诗力说》的鲁迅，那种“立意在反抗，指归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7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
③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0页。
④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⑤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9页。

在行动”的“精神界之战士”的精神，还有那“掊物质而张灵明”的启蒙思想，已经是鲁迅生命的重要组成。鲁迅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与社会、与现实、与传统的悲剧性对立，同时也意识到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难以割断的联系。“精神界之战士”的底蕴，使鲁迅的生命始终蕴藏着行动的冲动，他始终没有放弃从社会批判与自我探求中去获得生存的意义。因此，即使在平静的厦门，在“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的“哀愁”中，他还要宣告“少读中国书”，要“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①] 而那种比别人清醒的冷峻，又使他能深刻地看到这世界的“无聊”和无望，感受到自己想“为社会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的“不能实行”。[②] 既想摆脱站在社会斗争台前的身份而又情不自禁地向往之的心态，终究使他最终没能完整完成那“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的心愿，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整理国故”也没有热情甚至持有异议；作为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一个对“立人”和社会、文明有着自己思考和想象的知识分子，鲁迅即使是在重新思考自己生命之旅的厦门时期，也是无法对“十字街头”的平庸与浑噩视而不见。他需要的是对不良社会的批评、对文化的拷问，在历史质疑的同时质疑人自身，先驱者与士大夫的异质同构，让他在厦大徘徊着寻找着新的人生路径，最终宣告了那“关门读一两年书”的“妄想”的失败。于是，当离开厦门前往广州前夕，他已经作出了一个与到厦门时不同的决定：“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仍然继续作文艺活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③]

1927 年 1 月 15 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登上苏州号海轮前往广州，在离开的当天，他给林文庆留下一封信：

文庆先生足下：

① 《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5 页。
② 《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5 页。
③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2 页。

前蒙惠书，并嘱刘楚青先生辱临挽留，闻命惭荷，如何可言。而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幸今者征轮在望，顷即成行。肃此告辞，临颖悚息。聘书两通并还。

周树人启

一月十五日

二、林语堂的来去

◎林语堂像

1926年的秋天，经过了许多年的异乡漂泊之后，林语堂回到了离老家坂仔很近的厦门，他应厦门大学林文庆校长的邀请，到厦门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离开了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北京城，回到久别的亲切故乡，林语堂的心情异常的舒畅。厦门对于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学语言大师来说，是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一块土地，这里是他少年成长的地方，是他接触西方生活的开始，这里是与他终身相伴的妻子的家，还有他刻骨铭心记忆着的年轻时的恋人。林语堂回来了，他的人生在厦门大学应该有较长久的打算的，起码不会短于老朋友鲁迅两年的计划，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只回来半年便又离开这个自己十分迷恋的岛城。

大师的厦门情结

厦门是少年林语堂成长的故乡。10岁那年，他翻过坂仔老家的山岭，乘上小舟登上厦门鼓浪屿，走进了教会办的寻源书院，那时，他的名字是林和乐。他说："我与西洋生活初次的接触是在厦门"，在这个"赤足的童子"眼里，是传教士和战舰在"轮流威吓我和鼓舞我"。他"瞪眼看着一九〇五年美国海军在厦门操演的战舰之美丽和雄伟"，看着传教士身着白衣，"清洁无瑕和洗熨干净"，还有"醉酒的水手在鼓浪屿随街狂歌乱叫"，以及"头戴白通帽，身坐四人轿"的外国商人行走在小巷海滩上。[①] 他像所有鼓浪屿上的顽童一样，从围墙、栅栏的穴隙窥看那绿茵场上的外国男人与女人在拍网球、踢足球、喝冰激凌，听那红头发人吹打着嘹亮的铜管乐，"心中只有佩服赞叹而已"。而"最为惊骇的经验"，是"有一天外国人在他们的俱乐部中开一大跳舞会"，林语堂偷看到的是"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相偎抱，狎亵无耻，行若生番了"。[②] 孩童的眼光不禁很是惊讶，那些把中国人唤作野蛮人的洋鬼子就是这样文明的吗？

寻源书院连个图书馆也没有。少年林语堂学的是地理、算术、经典，还有一本薄薄的地质学。课后，只是玩耍游戏。老师要他们背书，他们就巧妙地搞背诵作弊糊弄老师；学校不让他们出外买夜宵，他们就唤来小贩，用竹篮子把夜宵吊上楼去。在他的记忆里，校长是个整天打着珠算盘的人，因为"鼓浪屿很繁荣，做房地产是好生意"。[③]

在美丽的鼓浪屿，林语堂迷上美妙的西洋音乐，每当教堂里飘起幽雅的钢琴声，传来传教士女士们的女高音合唱时，他就会放下手里的书本，闭上眼睛，陶醉于那飘向海空、飞往天国的圣洁旋律。他说他迷上音乐，"是受了美国校长毕牧师夫人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②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③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Mrs.Pitcher)的影响”。这是一位端庄淑雅的英国女士，她的衣着永远是偏暗的纯色，或黑或青，衬以白的衬衣，出门时总是带着风帽，头发总是整齐地盘成发髻，她的言行举止是那么的高贵善良，特别是她说话的声音，温柔悦耳而又抑扬顿挫，着实把少年的林语堂迷住了，以至于要暗地里偷偷地模仿毕牧师夫人的说话。直至耄耋之年，林语堂回忆起这位夫人的说话时，会由衷地写道，“我两耳听来，不啻音乐之美”，“在我这个中国人的耳朵听来，真是印象深刻，毕生难忘”。[①] 林语堂最终走上了追求生活艺术的道路，或许那种子便是在端庄淑雅的女性的声音和鼓浪屿的音乐声中种下的。

林语堂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都是厦门人。

◎鼓浪屿林语堂故居

寻源书院毕业后，林语堂进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他改名为林玉堂。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当时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气的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那时，这所学校已经出了三位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6 页。

有名的大使：施惠庆、施肇基、顾维均。到大学二年级时，林语堂连续三次走上礼堂的讲台领取奖章，他是这个学校学生中的佼佼者。同在这所大学学习的厦门同学还有陈希佐和陈希庆兄弟，他们是厦门名医陈天恩的孩子，林语堂要好的朋友。一天，林语堂仰面躺在圣约翰大学的草坪上，望着春天灿烂的天空，独自享受着春的气息。这时，陈希佐两兄弟带着妹妹陈锦端来到林语堂面前。原本悠悠然的林语堂眼睛一亮，他有些发呆，他看到一个足以使自己一见钟情而且一爱便不能释怀的女性，用他的话说是“她生得确是其美无比”。陈锦端那年 18 岁，正在上海学美术，春天的阳光，青春的生命，学美术所特有的艺术气质，以及那活泼大方、无忧无虑似的性格，一下子把大山里出来的林语堂倾倒了。美在驱使着林语堂的生命，他开始向一个美丽的女性侃侃谈起艺术的美妙绚烂、艺术殿堂的神圣和艺术家从事创造的伟大，他已经把陈锦端看作了艺术的化身。陈锦端无法抗拒林语堂的殷勤示爱，这个玛利亚学校的美术生原本对圣约翰佼佼者林语堂早有所闻。林语堂说：“我要写作。”陈锦端则说：“我要作画。”这对闽南男女相爱了，并很快就深深地坠入了爱河。

暑假回到厦门，林语堂兴冲冲地到陈家做客，他去找陈家两兄弟，心里想见的则是陈家小姐。闽南的豪门少女原本就家规甚严，不便随意在家露面见人，而此时陈天恩正在为自己的掌上明珠“物色一个金龟婿”，[①]当时闽南女孩婚姻又都是由父母决定，林语堂就更难以见到心上人了。

陈天恩是厦门的名医，也是厦门的巨富，他是基督的信徒，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菲律宾，在菲律宾创业。袁世凯死后回国从事实业，先后创办了榕城福建造纸厂、厦门电力厂、陶化大同公司、福泉厦汽车公司等大企业。他看出林语堂的心思，也洞察到女儿的恋情，但他知道林语堂并不笃信基督教，人虽聪明，但家境一般，与自家女儿并不门当户对，他不能同意这对年轻人结为伴侣。林语堂兴冲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5 页。

冲来林家，则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他“知道不能娶C小姐时，真是痛苦万分”，[①]他失望地回到坂仔，“哭得全身瘫软”。[②]

陈天恩毕竟是个基督徒，是个开明的人，他不能伤了年轻人的心，他将邻居的朋友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了林家，他要为林语堂做媒。

◎林语堂与夫人廖翠凤

廖家是开钱庄的，在厦门有自己的码头和仓库，虽不能与陈天恩同日而语，却也称得上厦门的富商。廖家有三男三女，廖翠凤是二女儿。廖家虽让女儿读书，却要求她们学会烧饭、洗衣、缝纫，依着传统把女儿培养成主内的一把好手。廖翠凤在这样一个稳定的家庭长大，读完鼓浪屿的毓德女中后，也像鼓浪屿其他有钱人家的女儿一样，到上海就读圣玛丽女中，在圣玛丽女中，她也一定听说了圣约翰佼佼者林语堂的名字。待到林语堂再回到厦门过暑假时，也在圣约翰读书的廖家二公子廖超照便约林语堂到家中吃饭了。林语堂不知道这顿饭实际是闽南人家婚姻过程中的一个程序，叫“对看”。吃饭时，廖翠凤就躲在家中的角落，偷偷地观察着林语堂的举动，数着他吃了几碗饭。是从中考核林语堂的身体？还是为自己以后照顾丈夫吃饭做准备？我们不得而知，林语堂只是感觉到“有一对眼睛在某处向我张望”，他还不清楚在陈天恩的介绍下，林、廖两家已经在为这对儿女安排他们的终身大事，也不知道廖翠凤此时已经为他洗好了路途中穿脏了的衣服。廖翠凤对自己所窥见的这位青年颇为满意，他谈笑风生，无拘无束，胃口也很好，当她的母亲告诉她“玉堂是牧师的儿子，但家里没有钱”时，廖翠凤说了一句让林语堂铭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②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九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记一辈子的话："穷有什么关系？"林语堂同意了与廖翠凤的婚姻。

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并没有马上结婚，他去了清华大学任教，他似乎还期望着陈锦端能给予他机会，而廖翠凤却一直在等着他。3年后即1919年，林语堂与廖翠凤在一个英国的圣公会举行婚礼，此时，林语堂已经在清华任教三年，按学校的规定，他可以到美国留学。于是，新婚夫妇在父亲林牧师的送别下，登上越洋的轮船，前往哈佛旅行度蜜月。自此之后，这对夫妻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一起走完上苍赋予他们的人生的旅程。

与林语堂分手后，陈锦端并没有选择父亲陈天恩给她物色的"金龟婿"。她从圣玛丽女中毕业后到美国留学，依旧学习美术，回国之后在上海中西女塾教美术，直到32岁时才与厦门大学的方锡畴教授结婚。方也是留美的学者，两人没有生儿育女，但抱了一子一女抚养。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说："玉堂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她说"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地位"。[①] 不知是不是因为陈锦端的原因，林语堂喜欢作画，他所画的女性一致的身材修长，长长的青发用宽发夹夹在脖子后。林太乙曾问过父亲为何女性都这般表现，林语堂说，锦端的头发就是这样的。林语堂一家住在上海时，陈锦端会上林家玩，一旦她来，便成为林家的一件大事，其接待的准备与热情、照顾的细致周到，以及家中主人心里的愉悦，都是寻常客人所不可比拟的。但廖翠凤则充满自信，没有怨言，她像闽南大家闺秀一样，既识大体又贤慧，拿得起也放得下。她会不厌其烦地、得意地告诉她的儿女："父亲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廖翠凤说着就会哈哈大笑，林语堂则会"脸上有点涨红"。[②]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九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②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九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对于自己与廖翠凤的爱情，林语堂说是由“结婚才开始，是以婚姻为基础而发展的”，他们两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愈是珍惜这种发展出来的感情，“越知道珍惜值得珍惜的东西”，任那种自然的快乐幸福生长着。对于年轻时共同的艰苦患难，对于廖翠凤多次的自己牺牲，林语堂说自己“会一直留在心中，一生不忘”。[①]

厦门的这两位女性，就这样成为林语堂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占据着这位大师内心世界的重要部位。“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林语堂镌刻给廖翠凤的这两句诗，该也是给陈锦端的吧！

从北京到厦大

1923 年，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林语堂回到北京（林语堂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后转莱比锡大学研究语言学，攻读学位），他来到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同时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

北京大学有他的密友胡适，是胡适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一笔巨款，“千百里之遥”寄给他，让他度过了在国外那段最为困苦的时期；北京大学还有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他们那“不说别人的话”的姿态很让刚回国的林语堂认同。“那时北大的教授们分为两派，带甲备战，旗鼓相当：一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博士为领袖；一是《语丝》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树人（鲁迅）为首。”[②]原本是胡适密友又是留学欧美的林语堂本该是加入欧美派的《现代评论》行列的，但此时的林语堂自称“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是被人视为“异端之家”的北大的一个激烈分子，[③]他与“语丝”派的朋友们趣味相投，他成了《语丝》这份密切关注与批评现实的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对于自己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7 页。
②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 页。
③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 页。

的加入“语丝”，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都认为胡适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由是个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

1926 年，林语堂到复校后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鲁迅也离开教育部，来到北京女师任教授。这之前，因对学生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顾正红的行动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持不同观点与态度，《语丝》与《现代评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林语堂与鲁迅都鲜明地站在支持学生一边，与“现代评论”派针锋相对，发表了激烈的言论。胡适曾就此对钱玄同说过，如果某个人的意见语堂看不起，即使那人是他的好朋友，他也不愿意和那人打招呼的。这是胡适自己亲身的体会，而林语堂的这个拗相公似的性格，也是他后来很快离开自己一手支撑起来的厦大国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6 年 3 月 18 日，这一天被鲁迅叫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上午 8 时，林语堂刚走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处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这是学生自治会的刘和珍打来的电话，她代表自治会全体学生向林教务长请假一天，去参加首都学生“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爱国游行请愿。林语堂答应了，游行请愿在那个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军阀统治年头，是经常发生的事，但林语堂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天段祺瑞政府会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在春天早晨 8 点钟的阳光下，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天会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下午 2 时，林语堂正悠闲地衔着烟斗，翻阅着教授们的开课计划，电话铃又急促地响了，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听到的是一阵比电话铃更急促而慌乱的声音：“林教授，出事了！赶快去国务院，游行的学生被打死了，刘和珍死了！”

林语堂一下子懵住了，疑惑、恐惧、震惊、愤怒，什么样的心情都一起涌了上来。他和许寿裳赶到国务院，迎面摆的就是 23 口棺材，打开棺材，第一个就是刘和珍，脸色苍白，短发零散不堪，眼睛半睁着，胸腰裸露，身上凝结着血块，一堆血衣胡乱塞在棺内。这就是那个“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女生吗？林

语堂忍不住悲痛，眼泪夺眶而出。许寿裳赶忙紧握住他的手，暗示他坚持住。他们又在医院的杂物间里，找到杨德群的尸体。他们要将两人的尸体领回学校，但当局却不许刘和珍的尸体被领走，理由是刘和珍是“匪首”。林语堂“出离的愤怒了”，他豁出去了，他喊道：“人已经死了，你们还想怎么样？痛快些，说出来。”他不顾一切后果地将自己的两位学生的遗体运回学校，安放在女师大的大礼堂里。

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的屠杀持续了几个小时，当场惨死的青年47人，受伤132人，失踪40人，史称“三·一八”惨案。47人中刘和珍遇害时22岁，杨德群24岁，关于她们的死，鲁迅在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中是这样描述的：

> 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了。

鲁迅悲愤地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三是中国的女性临危竟能如是之从容。”

惨案发生三天后，林语堂不再沉默了，他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刘和珍、杨德群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是“死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他们的工作”。这是惨案发生后第一篇站出来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谴责执政府屠杀学生罪行的文章。

3月25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和北京各界在女师大礼堂为刘和珍、杨德群举行追悼大会。追悼会由许寿裳主

祭，林语堂和鲁迅都参加了大会，长歌当哭，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的悲哀，可《现代评论》的陈西滢还放出“闲话”，说杨德群的死是因为“一个教员勉强她去，她不得不去”。于是一场文字的战斗开始了。

在这场与“流言”与屠杀者以笔为枪的拼杀中，林语堂与鲁迅取一样的姿态，以一个“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良知的知识分子身份，发表了《闲话与谣言》、《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等文章，直斥段祺瑞政府屠杀民众和陈西滢之流为当局辩解遮掩的丑陋。

3月19日，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祺瑞下令通缉5名所谓的“暴徒首领”，他们是：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顾兆熊（顾孟余），中法代理校长李煜瀛（李石曾），女师大校长易培基。

3月26日，《京报》又披露了执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共48名，除了第一批的5人外，林语堂排在第17位，鲁迅排在第21位，周作人排在22位。

4月，直系冯玉祥的国民军推翻了段祺瑞政府，但紧接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攻进北京，4月24日，奉系查封了《京报》，当夜枪杀了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不久，李大钊被杀害。黑云压城城欲摧，北京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林语堂在家里准备好了一个绳梯，以便随时可以翻墙逃走。但风声越来越紧，鲁迅找地方躲避起来，林语堂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带着妻子儿女先躲到东交民巷一家法国医院，后来又躲到漳州老乡、好友林可胜医生的家里，林可胜便是林文庆的儿子。三个星期后，即1926年的5月，在林可胜的推荐和林文庆的安排下，林语堂离开了危险的北京，携着全家回到了厦门。临行时，语丝社全体同仁为他饯行，也就在这次饯行宴上，他向沈兼士、鲁迅、顾颉刚、孙伏园发出了到厦门大学的邀请。

9月，林语堂正式上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并负责筹备厦大国学研究院。当时的厦大学生、后来的中央社社长、董事长马

星野这样回忆："当时林先生只有三十上下。经常穿长袍黑马褂，梳得亮亮的头发，俊秀英慧之态，不但光彩照人，而且慧气逼人"[①]，恰与不甚在意着装的鲁迅形成一个对照，鲁迅是穿一件灰色的爱国布长衫，橡胶底黑布鞋，冬天则穿暗蓝色的布夹袍，是不大修边幅的。

回到故乡的大学，他是满怀着抱负想干一番事业的。他首先抓住北京局势混乱、大学经常拖欠教授工资的机会，将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一批著名学者招揽到厦门大学。在他的友朋式的召集和感召下，文学家鲁迅，语言学家沈兼士、罗常培，古史专家顾颉刚，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编辑家孙伏园，考古学家陈万里，以及哲学史学学者容肇祖、外国语言学者潘家洵、作家川岛等，陆续踏浪走进了厦门大学，这批名家的主体是北大的"语丝派"与像顾颉刚、黄坚那样与北大"现代评论派"关系密切的人，他们的到来，让厦大文科盛况非凡，"一时颇有北大南迁的景象"，自然也会把当时北大的《语丝》与《现代评论》的某些人事纠葛带到了厦大。

◎鲁迅、林语堂与厦大泱泱社1927年1月2日合影

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会上，作为国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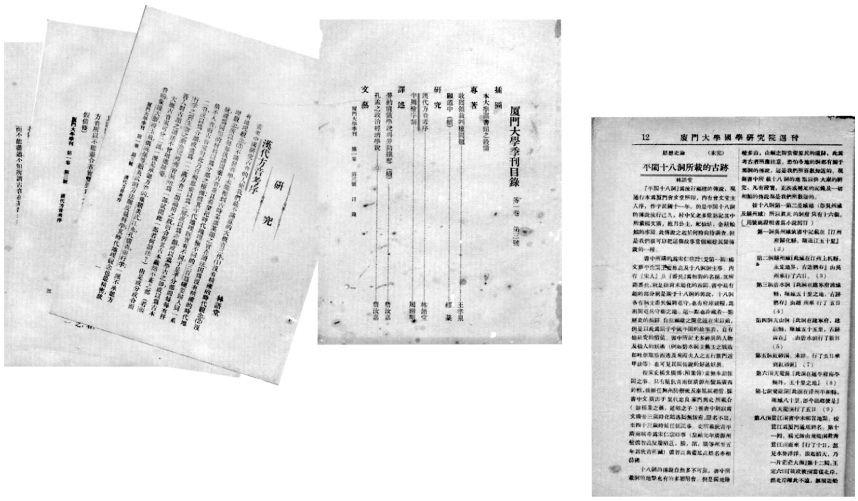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九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8页。

总秘书的林语堂发表了演说，提出他研究国学的意见，他认为“欧西各国学者，对于各种科学之成功，虽至微之处，不敢稍事忽略”，要求国学院同人“研究考古学，亦抱此精神”；他还提醒研究者要注意对象“所蕴藏的区域”，注意调查和研究“一方调查闽南各种方言社会以及民间一切风俗习惯，一面发掘各处文物”。并且与沈兼士一起倡导以“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的国学研究新理念。这种研究理念，正是今天大力提倡的跨学科研究与区域特色研究，它后来成为厦门大学文、史、哲等领域传承至今的学术传统，成就了厦大不少研究成果走在全国的前列。

对于厦大的文科建设，林语堂也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很想让国文系与国学院各自相互分离的教学与研究能合二而一，起码是让院系互为倚重。为此他向学校提出将国文系改为国学系的建议，他说国文系所设科目，“其性质既不一致，统称之曰国文系，似嫌太泛，若改名为中国文学系，又觉含义不周，失之过狭”，因此，他根据近代以来西方与日本将“中国固有一切学术”称为“支那学”，“Sinology 国人自称则直名为国学”，建议将国文系改为国学系，国学系“教授关于国学之基础学识”，国学院则进行“精深之研究”。[①] 正是从这样的一种办学理念出发，文科主任与国学院秘书的林语堂对于北京来的那些学者，基本都有了双重的身份，鲁迅为国文系教授与国学院研究教授，沈兼士为国文系主任兼文字学教授、兼国学院主任，顾颉刚为国学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容肇祖为国学院哲学助教兼编辑、兼国文系讲师，陈万里为国学院考古学导师兼造型部干事、兼国文系名誉讲师。这样的一种聘任安排，正是为了打通国学基础教育与精神研究的界限，打破教学与科学研究原本隔离的努力。

林语堂在厦大教英文课，他研究平闽十八洞的古迹和闽粤方言，他在国学院作了一次《闽粤方言之由来》的学术演讲，这个演讲稿从 1927 年 1 月 5 日起在厦门的《民钟日报》上连载 6 天。但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学者作家，

① 见《厦大周刊》第 157 期，1926 年 10 月 2 日。



◎林语堂在厦大国学院时发表的论文

更把精力花在创办厦大国学院的大小事项上，与国学院的同事一起制定章程、办事细则、研究生研究规则，讨论国学周刊、季刊的编辑事务，提出经费预算、确立研究课题和著作出版计划，以及组织风俗调查会。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林语堂实在没有了那份“住在美国式暖气的英国山庄，娶日本太太，有法国情妇和中国厨子”的“幽默”和浪漫。鲁迅曾有几次对周围不满想发作，但都因想到林语堂的用心和苦心，怕对不起他和担心他“要被攻击”，就按捺下来甚至“有些彷徨”。而林语堂见到鲁迅被迫三次被迁移住处，见鲁迅经常心情不好，觉得自己“失了地主之谊”，总是邀鲁迅到家里做客，吃闽南春卷，吃廖翠凤做的闽南菜。1926 年中秋节，他还特地给鲁迅送去了一篮月饼，所以鲁迅在 10 月 10 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玉堂的兄弟和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

按林语堂的说法：“北京大学这批教授一到，厦大国文系立刻朝气蓬勃。”[①]然而，厦大国学院终究好景不长。因陈嘉庚橡胶生意进入一段低落期，国学院的经费被大幅削减下来，加上

①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9 页。

上文所述理科矛盾冲突，生物系向国学院讨回了办公的地方，国学院被迁移到集美楼，与学校图书馆同楼办公。林语堂觉得自己将那么多名家请到厦大，厦大却未能履行原本的承诺，于是在11月20日以“办事不顺手，经费节减一半，理科人横加排挤，愤而辞职”，[①]11月25日，林文庆连忙召集林语堂、鲁迅、顾颉刚、张星烺等人商量，并答应在4000元的经费上再增加600元，林语堂才放弃辞职的念头，但人心已散，原本的一套计划已成了肥皂泡，国学院那些“大牌”们开始另寻门路了。

◎厦门大学生物学院大楼，国学研究院旧址，抗战期间被日寇飞机炸毁

10月20日，孙伏园请假去了广州，虽然后来还回过厦大，但心已飞到广州、武汉的办报事业上了。

10月27日，国学院主任沈兼士走了，并从此没有回来过。国学院的主任一职只好叫张星烺代理。

12月3日，鲁迅正式向学校递交辞职书。1927年1月15日，鲁迅留下一封给林文庆的谢绝挽留的信，离开厦门到了广州。林语堂写下了《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开厦门》一文，用尼采笔下的萨拉斯托拉的“走过去”，比喻鲁迅离开

① 《顾颉刚日记》第一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819页。

厦门的无畏与执著。

1927年1月7日，因为鲁迅的辞职，厦大学生组织了罢课风潮委员会，决定罢课罢考，贴出“打倒刘树杞”、“改革学校”的标语。

曲终人散，厦大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此时，他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部长的朋友陈友仁几次向他发来了邀请，陈友仁需要林语堂这样精通英语的人来协助自己的工作。1927年2月底，厦大国学院宣布停办，林语堂再次打起行装离开家乡。

林语堂总说自己常有好运道，总能逢凶化吉。从北京到厦门，他在林可胜的帮助下，化险为夷，来到厦门大学，而当他在厦大遇到困境时，他的人生旅途上又出现了陈友仁。于是，他到了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后来又兼任《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不久，“四·一二”事件爆发，武汉的汪精卫也大开杀戒，屠杀革命群众，林语堂对“国民革命”失望了，“对革命家也感到腻烦”了。7月，离开了武汉国民政府，9月抵达上海，从此“开始专心写作了”。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也来到上海，这对好朋友又在一起了，但谁都很难料到，这对好朋友要在笔墨上吵嘴了。

三、山城中的现代派施蛰存

2001年4月，96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躺在上海愚园路家中的病床上，一位老人走到他的病床前跪了下来，老人轻声地唤着：施老师，施老师。病中的施蛰存忽然睁开眼睛，用上海话爆出“朱一雄”三个字，并伸出手来，在枕边的纸板上，很费力地写了两行字：“还在画画吗？书出了没有？”说完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跪着的人此时已是满脸的泪水，他真的就是朱一雄，厦门大学中文系1947级的学生，后来是美国维吉尼亚州“艺苑”创办人，在长汀厦大中文系学习时，他是住在汀州北山的施蛰存家的常客。当朱一雄听到自己的老师病重的消息时，便从大洋彼岸飞到上海。此时他含着眼泪回答着病者的话：我还在画啊，书已出版了好几本了，都是您吩咐的啊！但施蛰存已经

闭上眼睛，老弱的病体爆出自己学生的名字已经消耗了他的许多精力，他没办法听到自己学生的回答。

逝者如斯，当年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老了，当年将烽火中的学子当作自己的孩子的老师能像施蛰存如此还能在开放的春天里见到50多年前的学生的老师也已经很少很少了，但那种在血与火中建立起来的学府情怀，则是永远不会老的。

施蛰存是20世纪30年代震荡中国文坛的海派作家代表，是在中国文坛搅起现代主义潮流的主要人物，文学史上将他与穆时英、刘呐鸥统称为“新感觉派”。施蛰存也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编辑家，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生前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这位现代派作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来到山城长汀中的厦门大学的。

“防空洞事件”

施蛰存（1905—2003年），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原籍浙江杭州，成长于上海松江。1929年施蛰存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罗摩什》、《将军的头》，最早在中国实验创作现代心理小说，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奠基人之一。小说集《将军的头》、《梅雨之夕》是他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他的小说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笔下大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之类。他或者让小说主人公在度假的列车上将对面的妇女幻现成妖婆，来表达人物的心灵创伤（《魔道》），或者让一

◎青年时期的施蛰存

个在夜朦胧、雨朦胧、车朦胧的朦胧中的男性邂逅一位美丽的少女，幻想出初恋的情人，来表现潜意识与意识的冲突对人生的支配(《梅雨之夕》)，还有像《将军的头》那样以虚构的方式书写历史，剖析历史人物在情欲与理性双重冲突下的灵魂搏斗。1932 年 5 月，施蛰存开始在上海现代书局主编《现代》杂志，推崇现代主义、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产生广泛影响。

抗战爆发后，他先到云南大学任教，三年后，他从昆明取道越南到香港，香港的朋友把他留下，他带着“总是要做点事”的人生态度，在真理学会校阅天主教文学的中文译稿，并为香港作家协会的暑期讲习班讲课。1941 年 9 月，他来到厦门大学。《厦大通讯》第三卷第十期(1941 年 10 月 25 日)这样报道：“母校本年度新聘各院教授多人，皆一时知名人士，经于开学前陆续到校。”报道中介绍的新聘教授的第一人就是施蛰存：“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施蛰存，曾任私立中国公学预科教授，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福建省立中学师资养成所国文组主任。”之后晋升为正教授，作为教授代表参加了厦大校务委员会。

在厦大，施蛰存开的是专书选读课，讲的是《史记》，自己也写了许多《史记旁札》，他很受学生的尊敬。那时，厦大学生的文艺社团非常活跃，有诗与木刻社、木屋学会、中国文学会等，还有以创作表演抗敌话剧为主的话剧社，创作演唱抗战歌曲的铁声歌咏团，几乎每一个学院、系都有学生自己的专业学社。烽火硝烟中的山城大学，时常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但这里却燃烧着万千学子的青春烈火，流淌着年轻生命报国学习的热血。施蛰存经常被这些青春似火的年轻人请去指导他们创作，他的宿舍经常聚集着十多个学生，在那里谈文艺创作，谈古典诗词，谈戏剧小说。学生中有个自己发起组织的“笔会”活动，“笔会”是一个没有组织章程、也没有组织形式的文艺爱好者的组织，提倡以文会友，自由结合，自由创作，定期交流创作。“笔会”的成员中谁发了文章，拿到稿费，谁就请客，吃长汀花生，喝长汀美酒，边吃边讨论文学。“笔会”每年端午节(当时的诗人节)在校内外举办诗歌朗诵会，还举办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活动，如 1943 年发起对患肺病无钱就医的作家张天翼的募捐救济活动。

“笔会”不设顾问，但活动时就请王梦鸥、施蛰存、虞愚出席指导。“笔会”后来走出不少著名的学者、文艺家，像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教授、台湾艺术学院的文艺家姚一苇教授、美国维吉尼亚州“艺苑”创办人朱一雄先生、书法版画家朱鸣岗教授等。40 年后的 1982 年，施蛰存还很清晰地记得那些学生在他宿舍里大做艺术梦的情景，记得“当时作新诗的有朱伯石，现任华中师院教师，有勒公贞，现任江西吉安教育学院教师，作旧诗的有欧阳怀岳，诗做得像黄山谷，可惜毕业后即被疯狗咬死。有马祖熙，填词不下陈其年，现在安徽当中学教师。教育系学生潘茂元，文学是副系，也常来参加茶话，他现在是厦门大学副校长。姚公伟写诗，也写散文。他的爱人范筱兰，善演话剧。”①

姚公伟也就是姚一苇，毕业后去了台湾，成为台湾杰出的剧作家、文艺批评家，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的一部话剧《红鼻子》不仅轰动台湾，而且红到大陆，在北京、上海上演，轰动一时。他与施蛰存情缘很深，在厦大学生时代发表的小说《春蚕》，写的是大学毕业生洪蓝小姐，面临着上司胡搅蛮缠时的恍惚心理和面对姐夫介绍的留美博士时的幻想，显然受到老师施蛰存的心理小说的影响。而那件险些让他与她遭殃的防空洞事件，更使他与施老师结下了一段特别的情缘。

姚一苇是个才子，大学时代就发表了多篇的小说，范筱兰是厦大话剧团的活跃演员，两人很快相爱了。有一天，两人就在防空洞里“情不自禁”起来，被“拈酸”的同学发现了，便向学校的训导长告发。那时萨本栋校长治校相当严格，他召开校务委员会，讨论“防空洞事件”与处分办法，施蛰存是校务委员会的教授委员，他参加了会议。会议先由训导长报告了事实，然后各位委员发表处理意见。会上几乎所有委员都主张严厉处分姚、范两位同学，有的主张开除，有的主张记大过，主张开除的意见很是坚决，理由是这一对男女在校内做出不名誉的事，严重败坏校风，如果不开除，将来必有更多的丑闻。

施蛰存是文学家，是创作包括性心理在内的心理分析小说

① 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19 页。

的作家，他更愿意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这对大学生男女的“情不自禁”行为，况且要处理的学生是与自己接近的学生，富有创作才气的学生，哪能让他们的学业半途而废，于是施蛰存站了起来，他要力排众议了，他讲了自己的意见。“第一，防空洞在山上，校舍在山下，防空洞不在校园内”，他以此否定了学生是在校内违规；“第二，他们都是成年人，婚姻有自主权。如果他们愿意结婚，那就不必处分。如果他们有一方不愿结婚，那就成为法律问题，受损害的一方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处分。”这是从上海都市来的施蛰存比别人高明的处理意见，既保护了学生，理由又站得住脚。萨本栋同意了施蛰存的意见，后来施蛰存提起这件事时说：“萨本栋是一位极其民主的大学校长。”[①]会后，训导长找了姚、范两人，他们原本就相爱着，此时便同意先公开确定婚约，毕业后在学校举行婚礼。毕业后，姚一苇与范筱兰双双去了台湾，继续着一个人创作一个人表演话剧的快乐，过着志同道合的夫妻生活。

1982 年 6 月，当姚一苇的《红鼻子》话剧在北京、上海公演并引起轰动的时候，施蛰存写了一篇《〈红鼻子〉的作者》的散文，文章最后写道：“现在我回忆起这件事，感到姚一苇的剧作才能，恐怕和他的爱人不无关系，但不知这一对情侣是否还厮守在一起，或者还是一双佳偶。”[②]这位中国的文学老人，想念着他厦大的学生啊。

图书馆的收获与闽山闽水的体验

施蛰存多次说过：“在厦门大学五年，由于厦大图书馆的藏书毫无损失，全部内迁，我着实看了不少书。”[③]抗日战火燃烧起来后，萨本栋校长果断决定学校内迁山城，赶在日本炮火射向厦门之前，用大卡车将厦大的图书资料及时完整地转移到长

① 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0 页。
② 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0 页。
③ 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75 页。

汀，所以抗战时期厦大图书馆的藏书是全国各大学中最为完备的，尤其是那些外文版的图书资料。施蛰存说自己“在厦大图书馆里发现有许多外国文学书，大多是英文本，其中有不少关于戏剧的书”。①

烽火岁月中，能在一个山城中找到一处安静的读书处，又有几十万册的图书杂志供人阅读，这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惬意事。施蛰存精通外文，最初他为了消闲，从厦大图书馆借出一批英、美版的剧作看，他想，读多幕长剧要费时间，而读一个独幕剧只要二三十分钟就够了，于是就专门读起了独幕剧。没想到的是，读着读着，这位小说家对独幕剧发生兴趣了。

世上的事情总是这样的，在你没有接触到它的时候，你与它是隔着一层墙，你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你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它的价值，而一旦你走进它的世界，尤其是走进那些经历过人类文明的岁月淘洗过的事物的世界中时，你便会对它有了兴趣，便会爱上它了。施蛰存爱上外国独幕剧了，他从阅读开始，接着就手痒痒地开始翻译了。那时，厦大的戏剧尤其是话剧活动在王梦鸥老师的影响与指导下，创作与演出都特别活跃，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施蛰存翻译几个独幕剧，交给了在永安搞出版的同乡海岑（陆清源）印行。不料在厦大的这一积累与兴趣，便成就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一部庞大的翻译作品《外国独幕剧选》的诞生。

1979 年，经历了 10 年“文革”文化浩劫的中国文坛迎来了复兴的春天，此时，《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等话剧以其振聋发聩的声响，从舞台走向人们的心灵，当代中国掀起了一个话剧创作与演出的高潮。这时，海岑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戏剧电影编辑室当编辑，他想到曾经与施蛰存合作过翻译编辑外国独幕剧的事，便向在华东师大的施蛰存组稿，要施蛰存提供几个著名的、可供演出的独幕剧，以配合话剧界的需要。施蛰存是个学者，他考虑到世界独幕剧的历史只有 100 年，倘若编一部系统完整的外国独幕剧选会更有价值，对中国的戏剧发

① 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04 页。

展更有作用。于是他便与海岑合作，开始了《外国独幕剧选》的翻译编辑工程。编到第二集后，海岑不幸于1981年4月逝世，从第三集起，便由施蛰存一人主持编译的事了。1987年，《外国独幕剧选》一套六册出版，但此时中国经济的转型已经开始，中国话剧界即将面临新形势新观众新市场的考验，《外国独幕剧选》的出版已经失去动议时中国话剧的高潮期，施蛰存感叹道："我估计，'独幕剧'也即将成为一个戏剧史上的名词。"[①]但他没有想到，一种适应了时代观众与演出市场需要的"小剧场话剧"诞生了，它实际上可看作是独幕剧的延伸变化。

在厦门大学，让这位从大都会出来的现代派作家最着迷的，是福建的山山水水，是大自然给战火中生活的人们带来的色彩与韵律。

长汀郊外的南寨有一片大树林，自厦门大学迁到长汀后，南寨的大树林就变成了厦大师生散步的天然公园。这里原本有两个公园，一个以孙中山命名，一个以蒋介石命名，公园里有供游人休息赏景的长椅、亭子，但厦大的许多师生则更喜爱南寨的大树林。

施蛰存到厦大的第三天，就成为日常到大树林散步的许多人中的一个。这个大树林中，长着许多同时节开花结果的栗子与柿子，"秋风一起，他们的果实就始硕大起来了"，但栗子成熟得早一点，柿子的成熟期参差到两个月以上，这两种果树的自然合作，让施蛰存他们"整个秋季的散步不觉得太寂寞"。栗子熟的时候，施蛰存会去看老妇人仰面长竿打栗、孩童提钳奔跑拾栗的情景，"不禁会忆起古诗'八月扑栗'的句子"。但施蛰存更喜欢那一片柿子树，当西风吹落了柿子叶，这里的每一棵柿树就裸露出至少300个的果实，犹如"每一株树上挂着三百盏朱红的小纱灯"，"延绵四五里不断"，在秋天的斜阳里，幻化成"秋风中万盏红灯的光景"，施蛰存本来不喜欢吃柿子，但自从进入这片树林之后，他才知道，"柿树原来是秋天最美的树"，他

① 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2页。

开始爱吃柿子了。①

山光水色，历来是文人墨客钟情之处，对于施蛰存这位从上海都市走出来的“现代派”作家也不例外。但施蛰存并不爱游名山，在他眼里，“所谓名山，都是经营布置过的”。他说他在福建的游山玩水，“别是一种境界”。他在《在福建游山玩水》中写道：“我在福建的时候，就经常在平凡的山里随意闲走，认识各种树木，听听各种鸟鸣，找几个不知名的昆虫玩玩，鹧鸪和‘山梁之雉’经常在我前面飞起，有时也碰到蛇，就用手杖或石块把它赶走。”他在离长汀 20 多里的一出山径中逶迤，沿路“至少都是秦汉以前的古物”，让他“仿佛是在作一次人类学研究调查的旅行”；他在武夷山里，屡次误走了采茶道，于是写下了“误入龙窠采茶路，一溪横绝未施桥”的诗句。几十年以后，只能到上海的复兴公园、桂林公园去游山的施蛰存，常常想劝那些外省到上海的游客：“你们回家乡去，在任何一个山里走走，比比看。是上海好，还是家乡好。”在这位“现代派”作家的心中，福建的山在他的近百年的人生旅程中，留下了“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的不灭记忆。②

福建的水，给施蛰存的印象则是一种被人忽视了的伟大、美丽和杰出。他说，游西湖、太湖、玄武湖，看大龙湫、黄果树瀑布、五泄，过巴蜀三峡，泛富春江，乘皇后轮渡太平洋，都是在看水，而非玩水，因为“水是水，我是我，双方的生命和感情，没有联系上”。

他的福建第一次“玩水”，是从福州闽江乘小火轮溯流而西到南平，一天之后，船由平衍的江进入溪滩领域，白浪洪波从乱石堆中冲刷过来，船迂回曲折地迎着急流向前推进，施蛰存站在船头，他感觉自己“就像战争之神马尔斯站在他的战车上，指挥十万大军对更强大的敌人予以迎头痛击。经过七十二险滩，宛如经过七十二次战役”。到南平后，他走上码头，“很像胜利

① 以上引文见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183 页。

② 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8 页。

者高举血迹斑斓的长剑在进行入城式”，他觉得自己的第一次福建玩水“极其壮美”。

两年后，他从长汀沿着汀江到上杭，又从上杭到峰市，几乎走了汀江全程。汀江逶迤于闽西苍茫的大山与客家居住的山地中，全长 200 多公里，因流经长汀县而得名，被称作客家人的母亲河，是福建的四大水系之一，“东南山豁大河通，汀水南来更向东；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如画夕阳中”，这是长久以来人们对于汀江与长汀山城的描绘。那次游汀江，施蛰存乘的是船夫撑篙的小小的薄板船。第一段航程船飘飘泛泛，逐流而下，施蛰存与艄公、篙师一起悠然自得，大有“春水船如天上坐”的情趣。但渐渐的水流湍急了，还可远远见到中流击水的大礁石。只见“篙师站起来，用他那支长竹竿向左边石头上一拄，又掉过来向右边一块石脚上一撑，船就正确地从两个大石礁中间溜过”。从这段水路开始，汀江一路都是险滩，水面礁石和水下暗礁星罗棋布，但船却在艄公与篙师的魔法般的掌控中，“从乱石缝中像飞箭一般射过”。施蛰存过后说：“我简直不能想象它可以通航，但我实在坐过一叶小舟在这许险绝人寰的乱滩中平安浮过。”他有了一种“灞上军如儿戏”之感，他不禁感叹道：“福建艄公，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的绝技，今后怕会失传了，因为客、货已改从公路汽车和火车运输，险滩有许多已被炸平了。”

后来，施蛰存还游了武夷山的九曲溪，“我游九曲是在夏天，索性只穿一件汗衫”，“有时索性把两脚浸在水里，像鹅那样划水”。而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一次溪水猛涨时的放木。一天晚上，施蛰存被人声惊醒，他跟着学生走向溪边观看，“只看见平静的溪水，已变成汹涌的怒潮，像约束不住的奔马，从上游驰骤而来，发出凄厉的吼声。上游的木客，趁此机会放木，把无数大木头丢在水里，让它们逐流而去，一夜之间，可以运输六七十里”。在月光下，观此溪水暴涨的景象，施蛰存深感“惊心动魄”，但他看到的老百姓“并不急”，依然从从容容地欣赏着“大木头在激流中横冲直撞”的情景，他不禁自嘲道：“我是江南人，从来没有见过溪涨。到福建之后，才屡次见到。我自以为壮

观，肯定被福建人哂笑，说我少见多怪，那只好回答一声‘惭愧’。”①

丘陵地带的福建，那依旧蛮荒的闽山闽水，却留给了施蛰存如此深刻的记忆与感受，施蛰存这位实验并推崇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现代派”，其内心世界里与许多现代主义者一样，往往是都市生活、现代文明的厌倦者、反思者，他们更向往那种不被都市文明侵蚀的自然生活，他们是自然的崇尚者。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施蛰存将他的散文集取名为《北山散文集》，在厦大时，他就住在汀州北山脚下的厦大宿舍。

四、烽火中的抒情诗人林庚

2006 年 10 月 4 日，林庚先生在北京大学的燕南园他的寓所，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就在他逝世的两天前，他照样在寓所前与几位老师赏月，他念叨了一句：“月亮怎么还没有圆呢？”逝世的那天晚饭前，他像往常一样的在寓所前散了散步，只是在饭前不住地感谢小保姆多年的照顾，晚饭时分他悄悄地睡去了，没有痛苦，没有丝毫的声响，静静地躺在他的卧室床上辞世了，前后不到十几分钟。当北大原中文系主任孙玉石先生为我描述先生逝世的情景时，我惊讶于诗人如此安详平静、如此诗意的辞世，诗意人生又因了逝世前那句关于月亮的疑问，又使得这死亡的诗意有了别一样的韵味和境界。

艰苦中的诗意栖息

林庚（1910—2006 年），字静希，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学者。福建闽侯人，1910 年 2 月 22 日生于北京，他与萨本栋校长是老乡又同是清华校友，这或许就是他跟随萨本栋从北京来到

① 以上引文见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9～191 页。

厦大的一个原因。1928 年，18 岁的林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 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与著名的现代作家、学者吴祖缃同班。在清华大学，他加入朱自清先生指导的“中国文学会”，并与诗友创办了学生刊物《文学月刊》，开始诗歌创作。1933 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第一本新诗集《夜》于毕业时出版，由闻一多先生设计封面，俞平伯先生作序。从 1931 年到 1937 年夏天，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新诗创作上，出版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和《冬眠曲与其他》等 4 本诗集，也在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兼课。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林庚意识到“北京成了失去政治意义的文化城”，内心又“唤起家乡故土的生命意识”，便于 9 月乘太古公司的轮船到香港，从香港转到厦门，受聘担任厦大讲师，1941 年晋升为教授，1947 年秋天离开厦大回北平，从此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厦门大学整整有 10 年的时间。

◎林庚1937年于厦门大学像

林庚所经历的厦大岁月，正是厦门大学最艰难最困苦的办学时期，但也是厦门大学赢得“南方之强”美誉的辉煌时期。

20 世纪 30 年代，陈嘉庚产业走向下坡，并最终倒闭，尽管他还是以“卖掉大厦办厦大”的举动将厦大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但终究力不从心，无力再支撑厦大。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国民政府接管厦大，厦门大学归入国立大学，清华大学留美电机学教授萨本栋博士接掌厦大。9 月 3 日，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厦门，厦门大学生物馆（即鲁迅刚到厦大时住的那栋上下有 100 多级台阶的大楼）和化学馆被炸成废墟。厦大不得不暂时迁到鼓浪屿，假英华中学和毓德中学开学。9 月 3 日之后，日本海空炮弹疯狂袭击厦门，敌军占领厦门指日可待。林庚正是在这样的烽火中来到厦大。

1937 年 12 月，厦大被逼实行彻底迁移，300 位师生从厦门鼓浪屿出发，走在崇山峻岭的崎岖山路上，跋涉千里，抵达闽西山城长汀。

山城长汀的办学条件与环境与厦门实属两个天地，按当年厦大教务长周辨明教授当时的说法，是“举目凄凉无故物”。林庚来到厦大，只与厦门的大海亲近了很短的日子，便跟着整个学校迁到山城长汀，从 1938 年 1 月到 1946 年夏天厦大迁回厦门，这位现代新诗的抒情诗人，其诗人与学者的生涯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弦诵不辍的硝烟中度过的。

在长汀，与林庚先生一起工作过的中文系老师有：王梦鸥、施蛰存、虞愚、戴锡樟以及后来一直留在厦大的郑朝宗、黄典诚等。林庚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历代诗选”、“新诗习作”等课程。据当年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时常常会就诗中的某一名句深入剖析，不惜大加发挥，一讲就是一整堂课。如《诗经》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楚辞》中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曹植的“惊风飘白日”，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从他不惜以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解的一句诗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林庚先生的审美兴趣和对诗的艺术追求，想象得出他那一斑窥全豹、遇到兴然之处便一个劲地讲下来的授课风采。

除上课外，林庚还经常为学生作新诗的学术报告。一位 1946 年级的厦大电机系学生说：“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学术报告，我也听过，记不清是几次了。听的是关于新诗方面的，讲新诗的格律化方面的内容，一行 9 个字，11 个字，13 个字等，也注意音韵，另谈到诗眼等。”这些关于新诗的理论思考，都集中体现在他的长篇论文《新诗形式的研究》中。那时林庚留给学生很深的印象，这位听过林庚学术报告的理科学生回忆道：“在长汀学习过的校友，大多都会记得林庚教授。高大的身躯，白皙的面孔，稍胖一些，常穿着长衫，一付斯文的祝福神情，但也常活跃在篮球场上，打前锋的，常常表演出沿底线过人突破，完全变

了另一个人似的。”[①]

◎1945年林庚于长汀厦大后山与学生合影

在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林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与科研上，写诗成了业余生活的内容。但他还是在争取更多的写诗条件，生怕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断，他因此特地开了“新诗习作”课程，一边指导学生写诗，一边也自己创作新诗。但在那个战火四处蔓延的时候，长汀与外界几乎是处于半隔绝状态，林庚写的诗能得以发表的甚少。这阶段他的诗歌诗话，除发表在《文艺先锋》、《文学杂志》上的，根据相关的线索，应该有一些发表在厦大师生创办的刊物或当地报纸上。

① 曹祖庆：《悼念林庚教授》，《南强记忆——老厦大的故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那时厦大师生的学习和文化活动红红火火。仅就师生创办的刊物而言，有厦大学生战时后方服务团所办的《唯力》旬刊，这是个综合性刊物，内容有时事述评、战局报道、厦大动态和文艺作品，王梦鸥讲师的三幕话剧《生命之花》就发表在该刊的第三卷上（1939 年 5 月），这个刊物的第三卷第一期还登载了林冷秋的《一个脆弱灵魂的再生——略论何其芳》，分析了何其芳的转变。第二期发表了弱水的《中国新文艺伟大的沉默期》，称这个时期文艺的沉默是“新个体诞生前苦痛的预示”，是“中国新文艺要从空虚走向充实”的“必须的准备”；重要的还有《中南日报》，该报由厦大校友罗瀚为社长、厦大学生邹锡光等为编辑，报纸设有多种副刊，皆由厦大师生主编，黄开禄教授主编“经济副刊”，谢玉铭教授主编“教育副刊”，冯定璋教授主编“厦大语言文字导刊”，魏应麒讲师主编“闽赣话余”，其中由厦大中国文学会主编的文学副刊“巨图”最有影响。林庚先生的诗论“论新诗的形式”就发表在“巨图”上（1940 年 5 月 28 日），夏衍、秦牧、魏金枝、陈友琴和李金发都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过作品。比较注重刊载文艺作品的副刊还有厦大学生林仲麟领衔的《大成日报》“高原”副刊，副刊连载了王衍康教授的长篇小说《炼》、何励生先生的《抗战乐府》，发表了王梦鸥讲师的散文、小品。除此，还有《厦大通讯》、《厦大剧团》、《铁声歌咏团》等。林庚除了《论新诗的形式》发表在《中南日报》的副刊“巨图”外，是否还有其他新诗发表在那些喜发文学作品的学校或地方报刊上，因为已经找不到这些报纸副刊了，我们无法予以确认，长汀厦大时期林庚创作的新诗，大多也已经散失了。但据林庚先生在《〈林庚诗选〉后记》中说，当时的厦大学生后来的“九叶”诗人杜运燮，从长汀要到昆明，他曾将一些诗稿交给杜同学，让他带到昆明的报刊上零星发表。前些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朱伟华教授终于从抗战时期的《贵州日报》中，寻到了林庚先生的三首佚诗：

纸烟

当纸烟的广告画过了图案
红的吉士还是小盒的美丽
平静的乡村上有远的行人
而他走得远了留下了记忆
吐出你蓝色的烟圈的倦意
这里是新来的园地
做季候适宜的海上远梦
做人生原野上自由的询问

这首诗注明“1940 年 7 月汀州”，发表于 1941 年 6 月 9 日的《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第 2 期。另外还有《诗二首》发表于 1946 年 5 月 26 日的《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第 9 期，诗为：

清晓

像深沉的悲哀在回旋的海上
像秋深的落叶在幽僻的山谷
从一座山峰上照过的阳光
它青色的而且多冰的乡土
我幻想于一条清洁的小河
流向那无尽的大海的颜色
当安睡的人们渐多了寂寞
当要醒的人们又怀着疑惑

夜之无题

夜像水静静地流过
时间的漂泊是生客
在微雨的你的檐前
谁知道说梦的颜色
拾起空间的摆布吧
青草爱青虫的寂寞
风原是求群的旅人
原野的雨丝又思索

在厦大写的这几首诗，既没有“愤怒诗人”的激烈愤慨，也不是困境中的哀怨悲伤，有的是在深沉大海与幽僻山谷、小河静淌与原野虫草交错的意象中，流露出一种单纯的困惑与思索，在漂泊旅途中“做人生原野上自由的询问”，“幻想于一条清洁的小河”，这种在烽火中依然干净明朗的诗意，体现出一个纯粹的审美型的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超越性浪漫情怀。那个时期厦大中文系教师的课外活动，留给人们较深印象的有两件事，一是王梦鸥的国防剧创作和国剧运动，一是余謇先生组织的玩文字游戏的“诗钟会”（“诗钟”别称“折枝吟”）。前者热血激昂，紧贴时代风云，后者玩古诗词，在传统游戏中寻一块文人乐趣。但林庚先生却都不在其中，他有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追求与方式，他确实是一位执著于自己诗意生活的诗人。

学术的耕耘与收获

林庚先生在厦大最重要的影响是那部充满创造性和个人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发表在《厦大学报》复刊后的两篇论文，其一是《从楚辞的断句说到涉江》，发表于 1943 年《厦大学报》复刊的第一集；其二是《新诗形式的研究》，发表在 1943 年《厦大学报》的第二集。

《厦大学报》创刊于 1931 年，原为《厦门大学学报》，宗旨为“发表各教授的哲理或专长”，“鼓励理智的进步”，通过对各种问题“新见识的贡献”，“引导我们更接近于真理”，每年一卷，一卷有二、三期不等，抗战爆发后停刊。1943 年复刊，复刊后改为《厦大学报》，卷、期改为集，复刊时萨本栋校长写下简短的卷首语，说明厦大迁到长汀，“一切均待草创，学术刊物之发行乃归停顿。本年鉴于长汀校舍雏形粗具，校基渐固，爰有赓续刊行学报之议”。复刊最初的第一集和第二集都有林庚先生的学术论文，足见林庚先生于烽火中不懈的学术耕耘和不薄的学术成果。

《新诗形式的研究》是一篇 14000 多字的长篇论文，全文分 8 节，从新诗形式研究的困难和新诗形式的可能性出发，具体细

致地阐发了新诗的节奏美学。这篇论文突出之处是以诗人自己的创作实验为例，在自己切身的创作感受中，对诗美的节奏格律进行理论的阐述和升华。林庚就像一位一尘不染的自然之子，向你呈现着大自然造化于人类的诗情。他说："诗是最纯粹的文艺，他便有着最完美的形式。"他以自己的诗《自然》破题，由《自然》一诗而提出新诗之所以能具有"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就在于"它简明朴直，一种没有修饰的美"。天然去雕饰，他要诗人懂得"一切复杂的感觉都必须表现在一个简明的形式上"。他认为诗的形式关键不在中国律诗强调的平仄，也不是欧洲诗歌注重的拍子，而是新诗所能体现出来的"自然节奏"。"自然节奏"便是那人的情感的自由韵律，"首在把自然的语吻纳入平衡的形式中"，构成"从容的、谐和的、多味的"清新与和谐，读起来"悦耳"。他又像是一个柔情似水的歌唱者，在那里演唱着一支条分缕析的抒情曲，他说诗歌"在音量上肃然比拍子自由，在时间上却反而比拍子更有组织，更合乎节奏的原理"；他以自己的演唱，告诉你新诗的"相生相成的结构"，"所根据的是心理上的自然起伏，心脏上自然地收纵"。在这篇论文中，林庚提出像"句逗"、"语吻"、"音数"、"节奏单位"、"节奏的尾"这样一些独特的诗歌形式范畴，通过这些形式范畴的结构分析，在新诗与古典律诗、外国诗歌的形式比较中，阐明了新诗形式的普遍意义在于它能以"节奏自由"、"节奏波浪的形式"，"激荡在我们心上"，并"历来成为诗坛盛衰的凭借"。

《中国文学史》是林庚给厦大学生上课的教材，1941 年曾由厦大出版组以油印本装订成书，油印本只有《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前三编。1946 年，厦大出版委员会决定出版厦门大学丛书，将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列为丛书的第一种，并于 1946 年冬交厦门市大道印务公司承印出版，但因纸价不断飞涨，几经停滞，直至 1947 年 5 月才印成。当时《厦大校刊》第二卷第三期（1947 年 5 月 31 日）这样介绍该书："全书计达四百余页，颇多独到见解，书前有作者及朱自清先生序文，极为名贵云。"

这部独特的文学史，抱着"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带着寻

◎厦大出版组出版的《中国文学史》

觅文学主潮和文学主潮此消彼长的原因的意图，注意解决文学史上“许多没有解决过的问题”，以一种“社会要向文艺学习”、文艺为“黑暗摸索着光明”的浪漫信念，[①]用诗人的锐眼和体验来考察、探析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整部文学史每一章每一节篇目的主题暗示，对盛唐诗歌“少年精神”的提炼，对于汉语诗歌“半逗律”特征的发现和剖析，都是极其独到精辟的。在“自序”中，林庚先生说自己在写文学史时，更相信了“那能产生优秀文艺的时代，才是真正伟大的。没有文艺的时代，无论如何，离开那理想的社会必然还远”。这道出了一个纯文学学者对于时代的理想想象，林庚的心愿是“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文艺的社会”出现。他说：“文艺是领导人生的，但它并不就是幸福，然而我们的幸福能有其他的保证吗？我们愈是想保证幸福，幸福就常常离我们而去。”他让幸福紧紧系在超越物质生存

① 林庚：《中国文学史·自序》，厦门市大道印务公司1947年承印出版。

和社会生存的审美上，他将文艺、将审美当作一种神圣的光，他说“在黑暗里摸索着光明的，正是文艺；有文艺就有光，就有活力，然后一切问题才可以解决”。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厦大时期林庚先生的精神写照，这位以文学理想为生命的诗人，尽管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物质条件下，尽管是在烽火硝烟的民族危难时刻，也依然以一种超越性的诗意，表现出一种以审美为导向的生存姿态。

1926年鲁迅到厦大任教，因为教文学史而写了《汉文学史纲》，抗战时期林庚在厦大任教，也因为上文学史课写了《中国文学史》，这两位学术姿态很不一样的作家、学者，却在厦大这座偏居一隅的学府写出两部最具个人创造性和鲜明特点但都不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这倒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

五、台湾三位文艺家的厦大生活[①]

2006年4月19日，厦门大学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那一天，厦门大学授予了连战法学名誉博士学位。连战在演讲中说，厦大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学校，同时也是有多元特质的一所高等学府。厦大栽培了无数青年人，他们在台湾的尖端科技、交通、教育、文化等领域，成就大放异彩，令我敬佩和骄傲，我在台湾的三位文艺家朋友便都是厦大校友。连战所说的台湾三位文艺家，便是文艺理论家、剧作家王梦鸥，剧作家姚一苇和诗人余光中。1999年，在台湾举办的“台湾文学经典”的评选中，王梦鸥以《文艺美学》入选理论类经典，姚一苇以《姚一苇戏剧六种》入选戏剧类经典，余光中以《与永恒拔河》入选新诗类经典，在评选出的台湾文学30部经典著作中，三位曾经在厦门大学学习或工作的文艺家，他们的作品占了20世纪“台湾文学经典”的十分之一。

① 本节资料取自朱双一的《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中的第五章第三节。

王梦鸥的厦大热血生涯

◎ 王梦鸥像

王梦鸥（1907—2002 年），福建长乐人，1926 年就读福建法政专科（后改制为福建学院）。学生时代受到何振岱（梅生）与陈衍（曾为厦大国文系主任）两位诗人老师的影响。30 年代初曾二度负笈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文研所研究文学，深受日本学者的细腻学风的影响。1936 年回国，先于南京《中央日报》编辑“电影周刊”，在报上发表一些随笔、短评和译文，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电影事业指委会编写剧本。卢沟桥事变后，他在《中央日报》连续撰文，声讨日寇，表达抗战决心。撤离南京后，先回妻子的老家湖南教中学，后受国立厦门大学校长、他的小学同学萨本栋教授之聘，到已经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任讲师。40 年代初曾在重庆两年，后又返回厦大。抗战胜利后，先任职于海疆学校、福建师范专科学校，萨本栋校长访问美国回来后，选择到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王梦鸥跟着到了中央研究院任职。1949 年随中央研究院到了台湾。到台湾后转向国学研究，特别是在《礼记》、《文心雕龙》和唐人小说研究方面，成果斐然，在台湾被尊称为大师级学者。在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颇有造诣，影响很大，他的《文学概论》（晚年自订稿改名为《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长期为台湾高校的教科书。有人以“博大与精深”来形容这部著作，称该书“驰骋古今，进出中外，旁征博引，例证中国”，又结合了美学、语言学、心理学、潜意识及文化感情，成就了独特的具有“较大的诠

释力量与发展潜力”的文学理论。[①]

王梦鸥是1939年春天来到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的，在中文系任讲师，后来任萨本栋校长的秘书。他日常带着一副金边眼镜，在他的长汀同事郑朝宗教授的眼里，他是个“白面书生”，“一个典型的福州才子”，但他却“不卖弄才华”，“天性敦厚”，“对人谦虚诚恳”，“对学生尤其热情”。[②] 但正是这样一个白面书生，在八年抗战的艰苦时期，在厦大经历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创作时期，度过自己一段人生的热血生涯，他当时的文学活动重心是话剧创作和编导。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王梦鸥正是而立之年，民族危难，国土沦丧，他悲愤交集，在南京《中央日报》接连发表《把我们武装起来》、《肃静，听着》和《野兽，杀死它》等文章，大声疾呼：“我们有一秒钟的时间，也是为着杀敌而活着。我们有一寸土地，也是为着杀敌而存在着。”以一介书生的身姿，表达了拿起武器与敌血战到底的中华民族的血性和气概。日本攻陷南京，他撤出南京，在“战火中流浪”，有一年的时间辗转在闽赣湘鄂一带。

南京沦陷，民族处于存亡的关头，厦大师生创办了《唯力》刊物，发出“我们的国家，确实已步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危机”的呼告，号召全民抗战，“唯有全体民众动员起来，唯有集合全国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才能打破中华民族历史难关”，这也就是《唯力》刊物名称的来源。此时，王梦鸥还没有到厦大，但在厦大的《唯力》第一卷上，却能看到他的《龙岩道中》等两首诗，“驽骀不厌崎岖苦，家国深仇志在胸”，民族仇恨的烈火在王梦鸥的心中激烈地燃烧着。一年后，他结束了流浪，来到厦大，“息影于一个十分清秀的山城”——长汀。[③]

在厦大，他除任中文系讲师外，把很大的时间和精力用在

① 林明德：《斟酌古今中外——论王梦鸥〈文艺美学〉》，陈义芝主编：《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1页。

② 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③ 王梦鸥：《火花·附记》，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版，第146～149页。

话剧编导上，将一批热血青年团结在自己的抗战戏剧的周围。那时，戏剧演出是最受民众欢迎的抗日宣传方式，王梦鸥觉得原有的剧本“花厅气味太重”[①]，远远不能演出抗战的时代主旋，就自己动手创作剧本，用18天的时间，在敌机的轰炸声里，在忙里偷闲中，创作出国防三幕剧《生命之花》，连载于1939年《唯力》第2卷第3期至第5期（该剧正式出版时改名《火花》）。该剧描写的是一对抗日爱侣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抗日故事。女主人公白玲以酒家侍女身份为掩护，与情侣安东一道企图炸毁日军运往战场的大批军火。不料行动受挫，安东被捕。白玲继续男友未竟的行动，提着装着炸药的皮箱，前往火车站，从容镇定地骗过日军特务长中村，机智地将日寇引开，最后炸毁敌寇的千万吨军火。话剧歌颂了抗日志士英勇机智的行动，以女性的无畏与镇定，激励国人抗战的勇气与信念。该剧在王梦鸥导演下由厦大剧团排练，在厦门大学纪念抗战二周年募捐会上演出，所得剧资，捐给抗战将士作为慰劳金或其家属抚恤金，话剧演出后“民众莫不感奋”[②]。后来，厦大剧团的《生命之花》在福建省内外各地广为上演，从长汀、重庆一直演到包头，成为当年一部影响广泛的爱国抗日戏剧。

此后，王梦鸥便成为当时福建十分活跃的剧作家和剧运活动者，福建的剧运刊物《抗敌戏剧》、《剧教》、《福建剧坛》等，时常出现他的创作和活动消息。在厦大，他除了又创作出三幕剧《红心草》、四幕剧《冤仇》[③]等之外，还撰写和发表了一些独幕剧和有关抗战戏剧运动的理论文章。1941年12月2日，闽西连城的《大成日报》刊登了王梦鸥寄自重庆的《战都的剧运》一文，编者特别加了一段按语：

我们虚心检讨战后的中国剧运，谁也不会忽略了以

① 《厦大剧团从花厅走出街头》，《唯力》第2卷第5期（1939年6月）。

② 详见《厦大通讯》第1卷第8期（1939年8月21日）；《唯力》第3卷第2期（1939年9月1日）。

③ 该剧原名《同命鸟》，后改名《冤仇》亦称《仇》，1942年由独立出版社在重庆出版时再改名《乌夜啼》。

《生命之花》、《同命鸟》、《红心草》等几个大剧本献给戏剧界的王梦鸥先生。王先生过去从事于电影脚本的创作，战后由水银灯下走上舞台，针对各剧团的剧本荒，献出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剧本。这些剧本在福建、在赣州、在昆明、在重庆、在广大的祖国土地上，都被各团体热烈地演出。作者今夏应重庆全国文协总会之约，由福建入渝，此刻正站在战时首都的文化岗位上，与曹禺、宋之的、陈白尘、老舍并肩作战，想不久我们必可读到作者的新作。

1941 年初夏，王梦鸥离开长汀到重庆，他想重庆是陪都，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中心，又有原本南京电影界、演艺界的朋友，他要到那里发展抗日戏剧的理想。但他去了之后，现实却打破了他对于陪都的期待，他说："我一向喜欢服役于话剧，并且喜欢自己动手。但到重庆，老友们爱惜我，只许看、指导，不要我忙手忙脚的，我反而成为白看戏的专家了。"但厦大却不一样了，虽说长汀山城的演出条件、演出规模与陪都不能同日而语，但那大学师生与小城中人对于戏剧创作与表演的尊重与渴求，那足于让一个剧作者充分发挥自己才华的环境，则是王梦鸥所向往的。两年后，王梦鸥回到厦大，他带回了他在重庆创作的大型三幕历史剧《燕市风沙录》，他要在厦大排演这出大型话剧。回到厦大后，他一边担任校长秘书的工作，一边继续从事戏剧活动，任长汀抗敌剧团的导演。他把《燕市风沙录》交给了厦大机电学会排练演出。

与当年郭沫若的《屈原》、《南冠草》，阳翰生的《天国春秋》、《李秀成之死》，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陈白尘的《大明英烈传》等一样，《燕市风沙录》也是以中华民族的历史人物为题材，塑造民族英雄形象，宣扬民族意识，鼓舞人们反抗侵略，谴责卖国投降行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历史剧塑造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突出描写了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在宋朝大官大多投降之后，不为元朝官爵、朋友义气、旧君臣的情谊所诱惑，不因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的软化而屈服，为国家的复兴宁愿身首异位的英勇行为，以强烈的戏剧冲

突抒写了一曲民族的正气歌。剧本搬上舞台后，引起重大反响。在1943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优秀话剧奖，当年同时获得这个奖项的还有老舍、赵清阁的《桃李春风》，于玲的《杏花春雨江南》，郭沫若的《南冠草》和曹禺的《蜕变》等13部话剧。只要看看这13部剧作的作者名字与剧目的名字，你就会知道当年王梦鸥及其《燕市风沙录》的巨大影响力。

厦大时期是王梦鸥戏剧创作活动的高峰期。除多幕剧外，他的独幕剧《守住我们的家乡》、《动物园的血案》、《草药》、《无题喜剧》等散见于《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福建青年》、《剧教》、《文艺先锋》等报刊。他这时期的戏剧理论文章则有：《研究戏剧的途径》、《乐教思想与戏剧运动》、《展开积极性的戏剧运动》、《学校剧》等，也分别载于《剧教》、《文艺月刊》、《青年戏剧》等刊物上。在内容上，王梦鸥的剧本绝大部分为抗战而写，表现了一股民族正气，感染了全国的民心；在艺术上，则紧紧抓住“戏剧冲突”这一戏剧艺术的关键，精心设计布景、道具、灯光，调动人物造型、对话道白、旋律运用、氛围渲染等技巧，使广大观众接受、喜欢，从而发挥戏剧的抗敌教育的作用。他秉持戏剧活动应与生活实践相连接的创作理念，从教育性和娱乐性并重的中国古代乐教思想中吸取营养，从而写出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的抗战戏剧作品。

抗战后期，王梦鸥的著述重心开始转向“礼”、“乐”研究。郑朝宗教授这样写道：“眼看抗战胜利的日子快要来临了，他忽发奇想，要为中兴的国家制礼作乐，因此工作之余便关起门来攻读《礼记》、《乐记》以及王忠悫公遗书中的有关文章。”抗战胜利后，王梦鸥于国立海疆学校之后，又来到福建师专任教，并从《建言》周刊第8期起接编该刊。想借助刊物“替社会扬点正气，存点公道”[①]。此时，“他的制礼作乐的想法早已付诸东流，代之而起的是满腔的悲愤，有时还形诸笔墨”，“他自己也意态

① 本社：《来一个人工呼吸》，《建言》创刊号，1946年5月。

消沉，全无平日谈笑风生的样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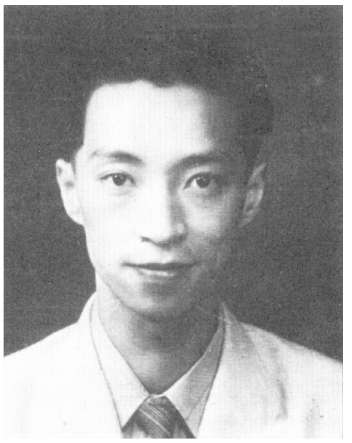
40年代后期应萨本栋邀请，王梦鸥到南京进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年随中央研究院到了台湾。到台湾后，王梦鸥不再写剧本，也不再参与什么社会运动，他开始倾心于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这个原本一腔热血的眼镜书生，走在了许多闽籍学者走过的学术道路上。

姚一苇的厦大起跑线

1979年10月1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叶剑英发表了国庆讲话，世界眼光聚焦到了中国台湾海峡的两岸关系变化上，从对峙到缓和，海峡两岸的华夏子孙开始来往了。1982年，一出台湾话剧《红鼻子》在中国大陆走红了，这部台湾话剧经大陆剧团的排练并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后，由于它的现代实验色彩，它的那么一些并不脱离写实的神秘与象征意味，给正在进行着现代主义争论的大陆文艺界开了眼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大陆的观众因此知道了一个叫姚一苇的台湾剧作家的名字。但他们却不清楚，这个著名的台湾剧作家却是抗战时期厦门大学的毕业生，是40年代许多前往台湾工作的厦大毕业生中的一位，与他一同到台湾的还有他的妻子范筱兰，一个厦大学生剧团的演员，后来也是台湾著名的话剧演员。姚一苇的剧作家生涯，其起跑线是在厦大刷开的。

姚一苇本名姚公伟，1922年出生于江西鄱阳，祖父是前清遗老，父亲是中学的文史教师。抗战爆发后，他进入吉安中学，随学校迁至遂川县的山村藻林。1940年，18岁的姚一苇开始以“姚宇”等笔名发表作品，那时他还是高中生，但浙江《东南日报》“笔垒”副刊、桂林《救亡日报》“文化岗位”副刊、浙江《新青年》杂志、江西《大路》杂志以及《宇宙风》等报刊上，却能经常看见他的散文，文学的才华和天赋露出端倪。1941年4月，因为

① 郑朝宗：《忆王梦鸥先生》，《海滨感旧录》，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姚一苇像

热情参与街头宣传抗日，姚一苇突然和十几位同学被拘禁，在监狱里关了一个多月，直到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才被释放，他只得带着一支钢笔，直接从看守所赶到考场。6月，他被当时内迁山城长汀的厦门大学录取了。此后，他因为转专业的缘故，在厦大学习了四年半的时间。1946年初在厦大毕业后，像当年许多厦大毕业生一样，他跨越台湾海峡，奔赴台湾谋求生存与发展。10月开始在台湾银行供职。1957年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得到当时台湾艺专校长张隆延的延揽，到该校演讲，从此定下了自己人生的位置，在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上一发不可收，创作了《姚一苇戏剧六种》、《傅青主》、《我们一同走走看——姚一苇戏剧五种》、《X小姐·重新开始》等14种戏剧作品集，出版了《诗学笺注》、《艺术的奥秘》、《戏剧论集》、《美的范畴论》、《戏剧原理》、《审美三论》、《艺术批评》等理论著作，发表了《姚一苇文录》、《欣赏与批评》、《戏剧与文学》、《说人生》等散文集与评论集，成为当代台湾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称姚一苇为台湾文坛“暗夜中的掌灯者”，他说对于自己和黄春明、王祯和他们这一代作家来说，“姚一苇先生的存在，是极为重要的”。[①]

内迁长汀山城的厦门大学，烽火硝烟中弦诵不辍，学生社团活动火热，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学生自发的沙龙式文学社团“笔会”，集合了一群爱好文学的青年，姚一苇和范筱兰都是“笔会”的成员。笔会成员各有各的创作兴趣与特长，或作诗填词，或擅长散文、剧作，也有专攻文学翻译的，姚一苇用功于小说，后来创作剧本。在战争的威胁中，这群年轻的学子自由、热情地生活在“粤汉路以东仅存之唯一最高学府”里，有施蛰存、虞

① 陈映真：《暗夜中的掌灯者》，台湾《联合文学》第152期(1997年6月)。

愚、王梦鸥这样的老师指导，有厦大图书馆比其他高校图书馆丰富的中外文艺书刊，他们的神思想象伴随着抗敌的热血，从山坳中飞向山城以外的世界。姚一苇是其中的才子，深得施蛰存的厚爱，是经常到汀州北山施蛰存住所的学生中的一位，施蛰存还在一次校务委员会上为他据理力争，力排处分他与女友范筱兰的众议，这就是本书前面叙述过的“防空洞事件”。1947年4月，已经毕业并在台湾工作的姚一苇，在上海《大晚报》副刊“每周文学”发表《乡间婚礼》，当时的主编就是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施蛰存。

在厦大，姚一苇仍然以“姚宇”笔名发表小说，他在永安的《改进》上发表过《输血者》(1943年)、《春蚕》(1945年)，在福建的《中央日报》“每周文艺”副刊上发表《料草》(1945年)，在《明日文艺》上发表过《翡翠鸟》(1946年)等。《春蚕》有老师施蛰存小说构思的明显痕迹，《输血者》、《翡翠鸟》中的人物则透露出青年姚一苇学习鲁迅受鲁迅影响的信息。

对姚一苇一生的文学生涯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在厦大读书时与戏剧的初次结缘。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正值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抗敌宣传成为热血青年自觉承担的责任。在萨本栋校长的鼓励支持下，在王梦鸥老师的影响与带动下，这时期厦大学生的戏剧活动如火如荼。南京沦陷后，厦大人发出了呼吁：“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一八一二年九月失去莫斯科以后的俄罗斯；是为抗御德军侵略失去布鲁舍拉以后的比利时；是初期民族解放战争遭受挫折而失去君士坦丁堡以后的土耳其”。青年学子们号令，“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不能逃避这大时代艰巨的责任”。[①] “为了要再鼓起这快低落的民族意识”，厦大学子决定立即改变原来的街头演讲宣传形式，“以演剧和家庭访问暂时来代替街头演讲”[②]。于是，轰轰烈烈的抗敌戏剧运动在山城中的厦门大学开展起来，并像传递火把似的将这个运动一届又一届往下传。姚一苇进校的那一年(1942年)

① 厦大学生刊物《唯力》创刊号献词，1938年3月。

② 许荣度：《一年来厦大学生的救亡活动》，《厦大通讯》创刊号，1939年1月。

的上半年，在厦大校园与长汀城，厦大学生剧团和各种社团，在元旦演出了《炮火升平》，2月下旬演出了《野玫瑰》，三八节演出了《女子公寓》，4月校庆期间演出了《人之初》，迎新大会上演出了《处女的心》、《一杯茶》、《约法三章》等。从小对戏剧有着浓厚兴趣的姚一苇，当他踏进厦大校门的时候，已经为那风起云涌的抗敌戏剧活动震撼了，他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预感，他的心很快融入热血学子的抗战戏剧潮流中。

姚一苇在厦大第一次观看的话剧是《野玫瑰》，在剧中，范筱兰扮演“家玫瑰”角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认识了范筱兰，后来两人便相爱了。姚一苇性格内向，内向的姚一苇并不宜在台上扮演角色，他参加厦大的抗敌戏剧活动，开始是到学生剧团帮工打杂。他在厦大写的散文《后台断想》描述了自己那时的情形。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深夜，前台还在彩排《家》，做后台工作的他坐守后台，寒意与倦意一起向他袭来，工作的艰苦让他想起了夏衍话剧《戏剧春秋》中的台词：“这里面有多少辛酸，多少眼泪”，他开始浮想联翩，想起了小时候在家乡，大人小孩争看野台戏的情形，想起了契诃夫《樱桃园》和阿胥《复仇神》里的年轻人欢乐嬉戏、充满青春活力和自然生活气息的片段。当他因疲倦而昏昏欲睡时，突然听到了一种“像古井里的钟声似的”声音：

> 你们，你们这戏剧的拓荒者，你这不可轻侮的力量，你们要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你们的前面是这样一条辉煌的路——虽然是充满杂草与蘼芜的，虽然是被别人歪曲过的，而你们是可以清除它们的，只要多用一点点力气。
>
> 在自己生活中及自己天性中学习，假如你的工作是伟大高尚的，你不要只想如何及用什么方法能够达成这个目的，你要行动，工作，而后一切自成。
>
> 能使一群义勇的工作者，做出最大量的工作，仅仅因为这些工作被安排得愉快而为人欣悦，其实不是一种平常

而普有的优点。[①]

就是在这个寒冷深沉的夜晚，姚一苇发现了戏剧工作的“伟大高尚”，决心到那“充满杂草与蘼芜”的戏剧创作道路上当一名“戏剧的拓荒者”，要去行动，去工作。这个决心的萌发，是为厦大抗敌戏剧活动的火热情景所感染，自然也为前台的演员中有自己心上人的感情所驱使。厦大时期的姚一苇，就这样树立了为戏剧而真诚、努力工作的信念，为戏剧人生而奋斗的理想，刷出了一道戏剧生涯的起跑线。这种戏剧信念的表白，我们后来在姚一苇一生不同时期的文字中都可以反复地读到，无论是1980年《写在第一届实验剧展之前》，还是1987年写的《我们一同走走看·自序》，我们看到的姚一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在坚持着自己大学时代所确立的人生目标：“我要坚持下去，为文学戏剧奋斗到底，哪怕成为最后一名唐·吉诃德！”[②]此后，姚一苇创作了他的第一部话剧《风雨如晦》，这是一部五幕七场的长篇剧作，总字数达10万字。这部大学时代的剧作虽未曾发表，但却是他剧作创作的开端。

山城中大学戏剧活动，调动与发展了姚一苇的戏剧兴趣和才能，厦大当年相对完善的办学条件，又提供了姚一苇接触大量中、外戏剧名作的机会。后来姚一苇回忆道：我自小爱好戏剧，进入高中，正值抗战初期，演剧之风甚炽，当时所接触的只是一些国人作品和翻译，“进入大学，在图书馆中发现大批英文本西方戏剧，使我眼界大开，只要得暇，就捧着字典读。读得越多，就越着迷，以致于也想编一部戏剧”[③]。他像自己的老师施蛰存一样，在厦大图书馆里阅读了大批的英美戏剧，接触了一批对中国戏剧界来说还很陌生的欧美著名剧作家及其作品，施蛰存因此有了后来的6部《外国独幕剧选》，姚一苇因此有了后

① 姚一苇：《遣悲怀》，《戏剧与文学·代序》，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② 姚一苇：《我们一同走走看·自序》，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3页。

③ 姚一苇：《回首幕帏深——〈姚一苇戏剧六种〉再版自序》，同上，第32页。

来成为戏剧大师的书海阅历和创作、理论基础。

也是在厦大，姚一苇开始尝试了戏剧评论。当时他发表的戏剧评论至少有《论〈总建筑师〉》、《论〈女伶外史〉》、《原野的评价》等。[①] 评论易卜生剧作的《论〈总建筑师〉》发表于1945年4月《中南日报》上。姚一苇紧紧扣住时代和社会的变动，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由上升而转向下坡的历史变迁来观察易卜生的剧作，精辟地勾勒出易卜生创作的演变过程，其中可见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实践，表现出作者早年文学理念的现实主义基本倾向。后来姚一苇尽管对于现代派手法也有相当的吸收，但无论是其理论或创作，都没有离开他大学奠定下的文艺基本立场和观念。

姚一苇半个世纪的戏剧生涯，便这样在烽火岁月里、在山城长汀的南强学府中迈开了脚步。

骑着自行车上学的余光中

我第一次见到余光中是在1991年的春天，那一年春夏，我应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主任周英雄的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中西小说比较，余光中先生在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授，在一次“环保诗文朗诵晚会”上，我听先生以低沉却有力的声音朗诵着：“就这样大方，海啊，都送给了我们/而人呢，拿什么跟她交换？/除了一地的假期垃圾/破香烟盒子和空啤酒罐。”朗诵晚会结束后，我与暨南大学的郑龙在现场拜访了他，我对他的第一感觉是精干矍铄。当我自我介绍是厦门大学教师时，他笑着说：“厦门大学，那时我是骑着自行车上学的。”

几年后，大概是1995年吧，厦大外文系邀请余先生回母系参加系庆，我那时是中文系副主任，外文系主任林郁如教授让中文系和他们一起接待余先生，组织余先生的学术报告会，于是我又与余先生见了几次面。在一次我主持的晚宴上，大家自

① 姚一苇：《论〈总建筑师〉》，刊长汀《中南日报》副刊“每周文艺”第8期，1945年4月25日。据李映蔷整理《姚一苇先生著作目录》，《原野的评价》刊于长汀《兴华月刊》；《论〈女伶外史〉》刊长汀《民治日报》1945年10月15日。

然谈起厦大，他又说："我那时是骑着自行车上学的。"

最近的一次见到余光中是2010年11月12日，我们一行陪同孙世刚副校长到台湾高雄参加台湾中山大学30周年校庆活动，那天晚上观赏孙翠凤家族的歌仔戏团为中山大学校庆献演的《猫神》。演出前，我们在礼堂的会客室与余先生伉俪会面，孙副校长邀请他回母校参加九十华诞庆祝活动。这一次，他再次笑着向我们描述他骑着自行车到厦大上学的情景。如此想来，"骑着自行车上学"已经成为了这位全台湾最著名的诗人心中一个与厦大连成一体的永远情结。

◎余光中在厦大85周年校庆文艺晚会上

余光中原籍福建永春，出生于南京，从小随父母在南京、重庆等地生活。1949年2、3月间，中国的现代历史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的21岁的余光中，转学来到厦门，进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习，同年夏天离开厦门。1949年1月9日厦门《星光日报》曾报道：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学生，因着在北方念书的诸多不便（按：应指时局变动），纷纷南下向厦门大学借读，"教育部青年辅导会"甚至在此设立办事处，协助安置战地流亡学生。余光中便随着这股南下就学的潮流来到了厦门。

在厦大，余光中为走读生，他家住厦门公园路，从公园路到厦大，需走鸿山前与蜂巢山开出的马路，倘要走路，也得近一个小时。为了上学方便，余光中的母亲特地为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余光中骑上自行车，先是要经过一段气喘吁吁的爬坡，待到蜂巢山的坡顶（如今的鹭江大学的校门口一带），他便轻松了，一路的下坡而驰，直到厦大的西校门。余光中说："到坡上后，我们就喊叫着，放开双手，让自行车一路的奔驰，真是畅快。"我听他描述时，眼前出现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用吊带挂起洋装短裤的青年，在自行车上伸开双臂，飞翔在上学的路上，那情形犹如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那个经典镜头。

在厦大，或许是大海的召唤和秀丽风光的诱惑，缪斯女神紧紧拉住了余光中的手，余光中怀着对诗的憧憬和虔诚，上课之余便独自埋头读书和写作，他在厦门开始发表诗作了，在《星光日报》的副刊"星星"和《江声报》的"人间"副刊上发表了《臭虫歌》、《给诗人》、《扬子江船夫曲》、《沙浮投海》、《歌谣两首》、《旅人》（短诗剧，未刊完）等，[①]其中《沙浮投海》是他写于南京的新诗处女作。如果从作品的公开发表上考察，厦大时期可以看成是余光中文学道路的最早起步。尽管这些作品在整个余光中文学世界中，只占了极小的份额，但它们却是这位名震海峡两岸的诗人的成功起点，也是他的诗作基因，这些大学一二年级的诗作，在余光中的诗歌世界里，或显或隐地闪烁着犹如金字塔基石的光亮。

青年大学生的余光中，有着一个纯净青年对于普通劳动人民的亲爱，有着对于民谣、乡土的本色亲密，"上水来拉一根铁链，/把船儿背上青天！/哎唷，哎唷，/把船儿背上青天"，"疯狂的浪头是一群野兽，/拿船儿驮起就走！"，"早饭在叙府吃过，/晚饭到巴县再讲！"（《扬子江船夫曲》），劳动者的粗犷、豪放的性格，劳动号子般的感叹，以及重沓反复的段落和诗句，流露出乐府民歌风味的清新诗风，也透露对劳动对生活的希望，《清道

① 这些诗作分别刊于《星光日报》1949年5月13日、1949年6月5日、1949年6月22日；《江声报》1949年7月31日、1949年8月7日、1949年10月19日。

夫》和《插新秧》两首诗，也是在这样的基调上展开想象。《臭虫歌》则诙谐反讽，节奏自然，诗的最后写道："你的美酒我的血，/你的大菜我的皮；/你这寄生虫，/自称主人翁。//臭虫，臭虫，/黑夜的英雄！/请你当心，/没有不醒的梦！"阅读琅琅上口。

厦门是个诗歌创作活跃的小城，20世纪30年代末期，厦门诗歌会遵循着中国诗歌会的主张，倡导"诗歌大众化"，以清新的诗风推进闽南的新诗运动。在余光中进入厦大读书的当月，即1949年3月，由杨梦周等发起，厦门文坛举办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座谈会，并于当月31日在《星光日报》上刊出座谈会记录，座谈会的地点就在厦大的学生宿舍里。刚来乍到的余光中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些文艺活动，但受到文坛风气的影响，多少也是会的，起码他的诗会被两份报纸看中发表，也是与当年厦门的诗风有所联系的。

《沙浮投海》是余光中的新诗处女作，写于南京发表于厦门。抒情诗以希腊女诗人沙浮为抒情主人公，她恋着菲昂，却遭受遗弃，她站在高岩上，向苍天和大海投去最后的一瞥，向菲昂道声"永别"，也向生养自己的希腊说声"再会"，人生便以郁郁投海而结局。诗作以沙浮告别人世时的情景和口吻，表达一种理不清的孤独苦痛。短诗剧《旅人》写的是一个孤独旅人遭遇魔鬼变成的妩媚少女诱惑的故事，抒写了旅人"永无休息的途程，/从清早到黄昏；/驮一个沉重的包裹，/挑一肩零乱的灰尘。……/啊啊！小鸟也有巢可归，/啊啊！只是我无家可回！/人生的道路我早已走累，/疲倦的心儿怕就会枯萎"。这两首诗均发表于作者离开大陆前往港台地区的前后，表明作者敏感的心灵似乎已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离乡别井的羁旅愁绪，语言清新明朗，声韵流转可人，后来余光中不断写出脍炙人口的乡愁诗，已经在这里蕴藏下先声。

余光中在厦大时期的诗歌创作，数量并不多，但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显示出了横溢的才华和语言的驾驭能力。除了写诗，余光中还发表了不少文艺批评性质文章，这些文章都发表于《星光日报》的"星星"副刊上，有《为莎士比亚伸冤——驳海天先生的〈写作的道路〉》(1949年7月8日)、《读书和救国》

(1949 年 7 月 13 日)、《文学与情欲》(1949 年 7 月 18 日)、《臧克家的诗——〈烙印〉》(1949 年 7 月 25 日)、《莎士比亚的伟大》(1949 年 7 月 28 日)、《郊寒岛瘦——从时代观点看孟郊和贾岛》(1949 年 8 月 7 日)、《答欧、树两先生(上、下)》(1949 年 8 月 14～15 日)。此外还有两篇译文。

《臧克家的诗》称赞臧克家的诗"无论就内容上或形式上看来",都可以说是"新诗中最前进最优秀的作品"。文章追溯了久远的中国诗歌发展历史,指出中国古代大半诗人对生活抱持不积极的态度,缺乏鲜明的时代意识;民国后的新诗,则多数仍不脱旧诗的范围;而新诗的作者群里,"却也有一些'沉着而有锋稜'的前进的号手,吹着和他们同伴不同的调子"。但臧克家的诗,却"找不到旧诗人的惆怅和闲逸,或某些新诗人的强调和神秘",在内容上"一面暴露了现实的黑暗,一面却讴歌着永恒的真理",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的羸弱形式而发挥出散文化的有旋律的力量",具有五大优点,即"严肃的态度"、"强有力的旋律"、"善用字,尤善用动词"、"散文化"、"美的诗意"等。

《郊寒岛瘦》借评论唐代诗人孟郊、贾岛的诗歌,推崇愤怒出诗人的诗观。他说贫穷和压迫本是大多数诗人的命运,然而"除了杜甫等诗人外,简直可说没有人大胆地鸣过不平。而孟郊和贾岛却曾把他们的愤怒表露在他们辛苦经营的诗篇里",表达了年轻的余光中对于孟郊、贾岛敢于鸣不平、表愤怒的精神的赞赏,以及对孟、贾"把艺术看成第二生命"、一诗吟三年的诗歌精神的推崇。这些诗观与诗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余光中后来数十年文学生涯中所执著追求的东西。

除了这两篇谈诗的文章,余光中其余评论大多牵涉到一场颇为热闹的文学论争,在厦大时,年轻气盛的他在厦门文坛与对手过了三四回招,参与了几个回合的文学论争。1949 年 7 月 5 日,"星星"副刊上发表了署名"海天"的《写作的道路》一文。3 天后,余光中即在同一副刊上发表了《为莎士比亚伸冤》,批评海天将作家截然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类、将作家的创作和其所属国家的性质相等同的观点,他反对海天贬抑前者、崇扬后者的做法,提出不盲目学习外国、建立以本国

现实为中心的艺术；认为现在的文学问题不是“要不要”、而是要“如何”创造出“大众的”文学，“要不忘文学到底是艺术的”，表现余光中真把艺术当回事的特点。此文发表两天后的 7 月 10 日，海天发表了《也算答辩——敬复余光中先生》答辩，三天后，余光中又有《读书与救国——答海天先生》应对。余光中和海天的争论很快引起了厦门文化界的注意和呼应，一个多月内，“星星”副刊先后发表了艾里戈、亚丹、吴炳辉、欧海澄和树长青的论战文章。8 月 14 日至 15 日，余光中发表《答欧树两先生》来最后结束这场论争，他在文章中表明自己“并未迷信艺术万能”，同时强调自己“并不认为强调艺术为不当”，重新阐明“文学是一种艺术，自然应该注意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文学的要素固必须包括现实，但其特性却在于是‘艺术’的。”与这场笔墨交锋多少有点关系的是 7 月 18 日发表《文学与情欲》长文，这篇文章是余光中针对一个星期前一篇吴姓作者的《扯谈文艺与情欲》而写的；7 月 28 日，余光中发表《莎士比亚的伟大》长文，反驳 7 月 19 日李光的《伟大的莎士比亚？》中的观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余光中连续撰写了如此之多的理论批评文字，勇于阐发自己的见解，而且其见解是如此地注意到社会现实与艺术特征，这已经呈示出这位年轻学子的才思敏捷和涉略的广泛，也表现出他自主独立和敢于做艺术弄潮儿的艺术精神。

余光中在厦门，年纪轻，时间短，但作品颇多，虽为初露锋芒，却已显示出较深厚的知识根柢和才气。余光中后来一手新诗，一手散文（评论）的“艺术多妻主义者”的创作风貌，以及较为辩证、周延的理论特色，在此已露雏形。余光中来到厦门大学，他给了厦门文坛增添了年轻弄潮儿的朝气和热闹，而对他本人而言，这却是他一生文学生涯的一个良好开端。

厦门春暖花开的时候，余光中骑着自行车上学来了；那一年厦门走进烈日炎炎的时候，余光中乘着轮船走了，手里拿的是“一张窄窄的船票”，这一走就是几十年的光景，是“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的凝固岁月，直到 1995 年母系喜庆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母校厦门大学。

六、多舛的命运

历史风风雨雨，历史中人的命运也会有沟沟坎坎，尤其是那些保持着一份良知的学者作家，时常要在曲折的历史中“运交华盖”，但他们的多舛命运，会给我们的世界、为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人生留下深刻的精神记忆。

因笔名而罹难的徐元度

徐元度，笔名徐霞村，祖籍湖北阳新。是上海吴淞炮台统领徐胜家的长孙，望族的后裔。6岁到保定读书，因向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发奋努力，小学毕业后考进北京汇文中学，后进中国大学学习，在那里相识了“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朱湘，由此朱湘成为他走到文学道路上的启蒙者。从1925年起，他开始自发尝试翻译欧美作家哈代、法朗士、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说，并从英译版翻译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作品。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也写些散文和短篇小说，向北京各报刊投稿。

1926年，徐元度与郑振铎、陈学昭、袁中道、魏兆淇五人结伴到法国留学，1927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先是和丁玲、胡也频在北京汉园公寓同住了一个月，后来辗转到上海，为复旦书店主编文艺刊物《熔炉》。在上海，他与徐志摩、朱湘等“新月派”朋友一起作文论艺，也一起出入于“夜上海”的歌舞场，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上海文坛上一位风流倜傥的人物。

20世纪80年代我帮他整理上海旧文坛轶事时，他告诉我他和徐志摩、施蛰存如何出入上海的歌舞场情景。他说自己和几位朋友都是留洋回来的，探戈、华尔兹娴熟的很。那时，上海的舞厅开始来了不少日本舞女，日本舞女虽温柔，却对交谊舞较陌生，跳起来不得不拖着她们走，他说“我们把这叫做‘拖板车’”。有一次，他把我叫到厦大西村的家里，拿出一封信让我

◎徐元度教授相片

看。那是杭州大学的郑振魁教授的一封请教信，信中说自己发现了一首徐志摩的诗，诗中有一句“白色的领上一个猩红的吻”，郑教授请教许先生这句诗有什么象征意义。徐老师哈哈笑了几声，说那没有什么象征，没有什么所指，他徐志摩是个情种，讨女性喜欢，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去跳舞，那个与徐志摩跳舞的舞女又较矮小，就在徐志摩的白衬衣领上印了一个吻。过后，徐志摩还对他们说，他要把这件衬衣当作“纪念品”压在箱底，并为它作一首诗，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徐先生一边说着，一边让我录音，叫我按照录音给郑教授写封回信。

在上海的这个时期，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古国的人们》，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翻译小说《菊子夫人》，出版了《法国文学史》、《二十年以来的西班牙》等著作，这是徐元度创作上的一个多产时期。但此时他只是靠稿费维持生活，起起落落的稿酬收入让他甚感生活的不稳定，便又回到北京。

在北京，他找到一份比较安定的教职，于 1932 年与吴禄贞将军的女儿喜结良缘。这期间，他翻译出版了《鲁滨逊漂流记》、《西班牙小说选》、《皮蓝娄戏剧集》，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大事，他的生活与事业似乎都走向了惬意的境地。然而，“七

七”卢沟桥事变打碎了了徐元度北京的平静生活，为了逃避日本文化特务的骚扰，他携着妻子儿女逃离了北京，一路尝尽了颠沛流离的困苦。在逃亡的途中，他的三个儿子夭折，徐先生第一次吞咽人生的巨大苦痛。

1947 年，他再度回到上海，施蛰存刚好也从厦大回到上海，经施蛰存的牵线，他见到了已经有七八年没有见过面的留法时期的朋友汪德耀，此时汪德耀在厦门大学代理校长，他邀请徐先生到厦大工作。就这样，徐先生来到了厦门大学，在中文系任教，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所位于东南沿海的南强学府。

一开始，他只教两门课：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大一国文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文艺学和西洋文学史课也是中文系少不得的课程。徐先生是现代文学的亲历者，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自然落在他的身上，而文艺学与西洋文学史也是他必须承担的课。他的讲课如同他的文章一样，语言很是简练，分析很是到位，讲到得意之处，会用手将腰间的皮带提一提，微微笑一笑，在吐出几句幽默话语，引得同学们轻松一笑。

但厄运很快接二连三地来了。1952 年“三反”运动开展后，他因为新中国成立前抽过“黑烟”，出入于资本阶级的舞厅，他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之后，“冯雪峰、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被“揪了出来”，他因为与丁玲的关系，遭到了更严厉的批判；待到“反右”斗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后，这个“老运动员”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成了厦大第一批右派分子。他告诉我，他的“右派”罪名是因为他的笔名徐霞村，因为丁玲有篇代表作叫《我在霞村的日子》，这是一篇在延安整风中就被当作“毒草”的小说，因此徐元度的“霞村”与丁玲的“霞村”便成了遥相呼应的“反派”了。荒谬的运动自然有荒谬的行为，因为笔名而引来的政治灾难，终究是难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灾难，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并非只发生在徐元度一个作家身上。

徐先生被打成右派后，就不能再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中文系工作了，也不能上讲坛了，他被转到外文系搞外国语言的

整理工作，却因此意外地拓展出自己一块学术的领地。1960年，厦大外文系接受了商务印书馆的委托，把苏联学者库宁主编的《英语成语词典》译成汉语，翻译苏联的辞书不会有政治上的担心，于是徐先生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从此他与辞书编纂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他负责了《英语成语词典》的增订工作，编纂了《综合英语词典》，成就了一部当时最大型的综合英语成语工具书。1995年，这部大词典获得了中国首届辞书奖，翻译界赞誉这部词典是“全、新、准”，“填补了国内这类辞书的空白”。“文化大革命”中，徐先生自然逃不过那一次一次的批斗或陪斗，但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他似乎已经把批斗当成了家常便饭，因为自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他只在自己那块翻译和编纂辞书的领地上耕耘，没再上过课，造反派们也无法挖出他的一些更新的“反派”材料，对他的斗争激情也就消失了。

1984年，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我帮他整理了《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向文坛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杨没累女士作为莎菲原型之一的诸多史料。这之后，他有了一个重要的想法，要我帮他将现代文坛林林总总的记忆写成一部书，这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坛都是很有价值的事，于是就有了后来那篇由我整理的长文《忆朱湘》。然而岁月不饶人，他终于没能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就离开了人间，带着他那珍贵的记忆和丁玲、胡也频、徐志摩、朱湘等老朋友怀旧去了，而这却给现代文坛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特殊身份的彭柏山

1961年12月，厦门大学来了一位身份很特别命运极残酷的作家，他叫彭柏山。彭柏山刚到厦大时，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时经常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福建省的头头脑脑来看望他，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与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副政委刘培善也在其中，校方告诉学生他是鲁迅的学生，学生都很尊敬他，却不知道他是个正在经历着炼狱般惨痛煎熬的人物。

彭柏山是鲁迅和胡风关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左联”“亭子

◎彭柏山和厦大学生的合影，1962年7月1日摄于厦大

间”作家。30年代，以《崖边》、《皮背心》、《忤逆》等小说为“左翼”文学增添了新的“锋刃”；1934年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出狱后投笔从戎，成了民族解放战场上的一员虎将，曾是解放军中赫赫有名的“老虎团”的指挥员，在解放战争中最艰难的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大决战中立下显赫战功。戎马硝烟中，彭柏山一手枪一手笔，以战斗的经历和简单而有韵味的笔力，描写着那个年代的生活和人，给胡风主编的《七月》投去不少的文稿。新中国成立后，彭柏山任华东地区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55年中国文坛悲风横扫，彭柏山被《人民日报·编者按》公开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进了自己为之浴血奋战的共和国的监牢。1956年底出狱。出狱后的彭柏山在“运交华盖”的自嘲和“豪情都作断肠梦”的创伤中，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长篇《战争与人》的写作，这部长篇又因两个主要人物“带有小资情调”而被组织上否定了。

1961年冬天，饥荒威胁着中国，经过了“劳动改造”的彭柏山在青海师范学院当图书管理员，谁也不知道这位管理员是怎么来到这大西北的，只觉得这个人呆在院里，多分一份口粮，多

领一份工资，也多了一份累赘。于是院领导找他谈话："你可以自找出路，哪里要你，你就到哪里去，我们放你走。"就这样，彭柏山在老战友叶飞、皮定均、贺学敏的帮助下，经过陈毅副总理的同意，来到厦门大学中文系。

刚到厦门大学时，日子表面上过得还算平静，这自然与原第三野战军的将军们常来探望有关。他一面执著地修改着《战争与人》，一面讲授着鲁迅、郭沫若、闻捷、杨朔乃至当时谁都不敢公开谈论的胡风的作品，中文系的老师听到他在上课时讲胡风，一个个都目瞪口呆，以为他是向豹子借了胆。除此，彭柏山还写了一批作品鉴赏文章和论文，还在鲁迅创办的厦大学生刊物《鼓浪》上发表短诗，之后他又转上"文艺创作"课。曾经是彭柏山学生的著名学者刘再复后来回忆说：彭柏山"是多好的学者和老师啊。他不仅有学问，他的课也上得好极了，就是他教会了我写作。"

然而，不管彭柏山有多么的坦然、自信、执著，有着别人不可能有的战友的温情，他终是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的阴影。1963年春天，全国贯彻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方针，掀起"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潮，"胡风分子"彭柏山自然又成了专政的对象，他的诗文、论文不能发表，哪怕是登在学生办的《鼓浪》上也不允许，当他再讲到现代文学史中的"左联"时期文学的时候，教室里不知为什么就坐满了校系领导，他们详细地记着这个不同寻常的教师的每一句话。课后，彭柏山被叫到系办公室，他被要走了讲稿，他的讲稿需要审查。有一天，福州军区海军司令彭德清到厦大看望他，两位老战友一起游南普陀，却不料身后寸步不离地跟着一个不言不语的学校保卫干事，他连与共和国的将军的接触也被监视了。皮定均司令听说这件事后，很生气地说："我们人民解放军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尚且要优待，何况彭柏山。我们曾经同甘共苦，在同一只锅里吃过饭，我们并肩作战、出生入死，十几年如一日，为什么不能探望他？"

伴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彭柏山不可能留在中文系了，他被逼从中文系转到了意识形态不那么强烈的外语系，继续教写

作课。但此时他的处境已经越来越糟糕，在学校里，他只能将心理的困惑与苦恼与他所信任的芮鹤九、应锦襄老师交流，只能与住在隔壁的中文系青年教师林铁民下棋排解苦闷，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现当面成为'同志的'，却在暗中将我作为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这样的语句，何等的像鲁迅在遭遇高长虹事件时在厦大时写下的一段话。

1965 年，山雨欲来，福建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10 月，一纸"此人不适合在前线"的结论下达，彭柏山就不能再留在厦门大学了。10 月 12 日，他提着一个小包，凄然地离开厦门大学，离开了努力保护着他的原三野的战友，只有同是军队出身的黄景湖老师送他到火车站，只有他的好友芮鹤九老师等在月台上向他作孤独的告别。"心事茫茫谁堪诉"，这一走，这位断定 20 年后胡风案子要平反的纯真汉子，就再也没能亲自等到昭雪的那一天了。

1968 年 4 月 3 日，在造反派的迫害下，彭柏山在河南农学院含冤含恨与世长辞。

傲气逼人的李拓之

李拓之也是厦门大学中文系命运多舛的作家和古典文学学者，从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到 1978 年重返教坛，已经是整整 20 年的罹难生涯过去了。虽然他还兴奋地吟咏着"老骥犹期奋绝尘"，但实际上已是力不从心，病体已无法撑起他那容易激动的大脑，生命离大去之期也仅仅剩下不到 5 年的时间。

李拓之，1914 年出生于福州北门屏山脚下，父亲是晚清秀才，同盟会会员。虽家境为不错的知识家庭，却因为是庶母所生，自幼精神便遭压抑，读完中学就自谋生计。他先在家乡福州《民报》任编辑维持家计，后与几位朋友创办野火文艺社，开始阅读新文艺刊物并创作。1929 年在福州主编《华南日报》的文艺副刊"前夜"和《朝报》文艺副刊"明月"，因在"明月"上刊登了邓拓的讥讽散文《紫金山下》，被反动当局逮捕，在原陆军监

狱过了3个月的囚徒生活，后来托人向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方声涛说情才被放了出来。出来先避地金门岛，从此流落他乡，独自飘然远行，以教书和作文艺为业。后来到武汉国民政府郭沫若手下的第三厅任记事，曾给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等共产党精英的演讲作记录。国共分裂后被当作“嫌疑分子”送进六战区集中营审讯，以无证据释放。后又流亡到重庆，任一所中学的教师，此间以吟咏诗词发泄悲愤，由此结识了诗人柳亚子、潘伯鹰等，于是在京沪一带的周刊发表了不少诗作。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在上海一面教书，一面创作，写下了一批历史小说，有《焚书》、《变法》、《听水》、《文身》、《投暮》、《惜死》、《阳狂》、《招魂》和《摧哀》，单看这些小说篇名，熟悉中国古代史的人就不难看出这作者是个不安分的人，郑朝宗先生称这些作品“取材于中国历史，有根有据，却不胶柱鼓瑟，而是变化多端，有些地方作者的想象力大得可惊。笔墨的精妙，风格的多样，也令人钦佩不已”。[①] 就这样，李拓之的前半生过去了，坎坷颠沛，屡遭困厄，却是不屈不饶。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派到北京新华社工作，喜出望外地与邓拓相逢。不料邓拓深知他的性格太傲不便从事新闻，认为他更适于教学和做学问，便通过章振乾和傅衣凌教授把他推荐给中文系主任郑朝宗先生，经呈请王亚南校长批准，破格聘用了这位仅有初中学历的性情人为中文系的副教授。郑朝宗先生说李拓之“容易激动，神经又过敏”，“是个脾气古怪的人，表面上彬彬有礼，而骨子里却蕴藏着一股咄咄逼人的傲气”。正是这种独特的个性，让他在学术上当仁不让，作出像《〈红楼梦〉的瑕疵》那样的论文，以百例举证，不客气地指出这部千古奇书的多处“瑕疵”：或措辞不当，或意义含糊，或前后矛盾；而一旦他与人学术见解分歧，也必定要争得脸红耳赤，不欢而散。这种独特的个性，也让他与政治灾难遭遇上了。

1957年“反右”斗争把厦大的一批学者打成右派，李拓之气愤不过，就用英文写了一封匿名信发给“右派分子”，为他们打

① 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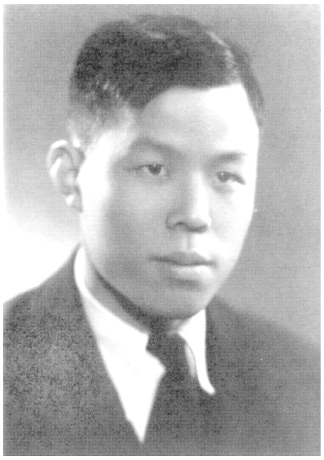
抱不平。不料有的“右派”犯了政治恐惧症，把信交给了组织，这就带来了李拓之近 20 年残酷的劳改生活。在宣布李拓之为“现行反革命”的大会上，一位领导对着站在批判席上的李拓之说：“李拓之，你不是很爱自己的孩子吗？现在你成了现行反革命，你的孩子怎么办？”那时李拓之的两个儿子都很小，一听这话，这位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傲气”的从小飘然独行的文人，顿时潸然泪下，那情景真是极其惨痛极其让人心酸的。之后，李拓之被开除公职，到福建大田劳动改造。1960 年由大田农场到泉州整休学习，学习结束后在泉州师范代课，1962 年泉州师范与漳州师范合并为福建第二师范学院时，他继续在二师院代课，但到了 1964 年大抓阶级斗争的时候，他被解雇回家了。之后的“文革”，他自然也逃不过铁拳对“反革命”的专政。

李拓之是 1978 年平的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终于照到了这位一生罹难不已的知识分子身上。我认识李拓之是在 1981 年，那时中文系举办纪念厦大建校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位瘦弱的文质彬彬的老头作了一个“论《离骚》”的报告，说《离骚》就是发“牢骚”，这样的观点在那时自然是独特的，对我们这批经历过一点世事沧桑的 77 级学生来说，自然要引出会后的诸多争论。后来，他给我们上了一次课，也仅仅是这一次课，讲的是中国的元曲。教学秘书扶他走进教室，放了一把靠背椅让他坐着讲。但他开了口便坐不住，常常要板书，字很工整很清秀，只是缺少了力量，字迹比较淡；讲到高兴处，有些手舞足蹈，又是吟又是唱的，很自得地呵呵呵大笑起来。但我们看着他那颤巍巍的样子，是怎么也笑不起来的。

七、郑朝宗：敢有豪情继严林

郑朝宗教授毕业于清华园，从 1938 年以来就长期执教于厦大中文系，之间曾于 1949 年赴英国剑桥留学，回国后任中文系主任。在 1957 年那场知识分子的政治灾难中，他也“以言获咎”，被投闲于图书资料室当资料员，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复

出主政中文系。



◎清华时代的郑朝宗

作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学者，郑先生像他那一辈的不少学者一样，博古通今，融会中西，国学和西方文化的功底都很深厚。而不像今天的我们“身无彩凤双飞翼”，先天是本土的与西洋的文化营养不足。郑先生主治西洋文学史，却又能在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等领域游刃，这也就成就他开了《管锥篇》研究的风气之先，成了“钱学”研究的首创者和奠基人。而作为一名风格特别的作家，他写的主要是散文、随笔，作品大多收在《护花小集》、《梦痕录》、《海滨感旧集》和《海夫文存》中。

和许多集研究与创作于一身的学者作家一样，他的文学作品往往不如他的研究成果那般广为传播。但大凡阅读过他的散文的鉴赏之士，都会拍案叫绝，私下里称他为八闽散文第一人。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坛的学者散文一时兴盛起来，这类散文的研究情景也随之热闹不已。而事实上，中国现代散文一开始便是由学者散文牵的头，中国新文化的散文先驱者，又有哪一位不是当年人们熟知的名师教授，他们的散文不少便是典型的学者散文。郑先生的散文属于学者散文一类，他写人时，书斋型的内心求索与历史中的文化迁变相融；写事时，个人的世事洞察与社会的人生际遇相会；进入山川地理书籍，又禁不住展开个人与人类文明、自然宇宙的关系探寻；且他的论学衡文之作，往往极带散文韵味，洗却了学院派的书袋习气；抒情言志篇章，又给你学识的享用，诸多文章可作为论人论世的短章来读。其思想的精深、知识的情怀和笔力的老到传神，都显示出一位学者的学识功力和独到眼力。

郑先生的散文创作开始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那时他风华正茂，目光犀利，笔力遒劲，虽常用曲笔，但爱恶形诸笔端。

40年代写的《记冯友兰先生》一文，开篇便是“冯先生是我生平所见城府最深的一个人，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确定他应该归入谁的门下——孔子或少正卯？”文章针对冯先生“太爱坐飞机”而“中国学人能真正耐得寂寞的原就不多”，奉劝冯先生不要“不安本分”，应“为贫弱的中国学术界着想”。几十年过去了，这篇一语中的的文章却更有了警醒学界的作用。

郑先生晚年散文内敛，思想沉潜，笔调变得温和圆润、蕴藉，以写同仁老友、前辈学者和他的平凡人生的夫人最为精彩感人。他的文章自然约稿者如潮，但除了《读书》、《随笔》外，省外刊物来约者大都不应，而把自己的文章都给了闽地报刊，哪怕是很不起眼的地、市刊物。这位留学过剑桥的学者并非会鄙夷异域，而是他有一种特别的赤子情怀。他时常自允“叫旦之鸡”，为福建的文学、文化鼓而呼。他说自己“生平深愿是使本省文化恢复到严复、林纾时代居国内前列的水平”，“使落后的福建再度蜚声全国”。为此，他还写了一首七绝抒怀：“八闽文献久消沉，敢有豪情继严林？已分冥顽同槁木，山灵触我旧时心。”拳拳之心，殷切期待，让如今的福建文化人汗颜。

1998年10月20日，郑朝宗先生逝世，享年89岁。

厦大文本

筹办厦门大学演讲词

◎陈嘉庚

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致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待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救亡图存，匹夫有责。我厦中人士其可不猛省乎？且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认捐十分之二三或十分之三四，则亦无损于富。

鄙人深愧棉力，负担有限，唯具无限诚意。希望内地诸君及海外侨胞，负国民之责任，同舟共济，见义勇为，则数千万元之基金，不难立集。

欧美先进各国，统计男女不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六七，日本为新进之邦，亦不满百分之二十，我国则占百分之九十余，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嗟嗟！我国不竞，强邻生心，而最痛巨创深者，尤莫我闽若也。试观吾闽左臂，二十年前固已断送。野心家得陇望蜀，俟隙而动，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生；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目，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日。勿自馁其志，而视

为杯水车薪，无裨大局。须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深望诸海内外同胞也。

（原载《厦门大学十二周年纪念专号》，1933 年 4 月 6 日）

记厦门大学开校式

集美陈嘉庚君倡办厦门大学，原定厦门演武亭建筑校舍，因演武亭尚未着手建筑，先设在集美。昨四月六日，在集美举行厦门大学开校式。先期由陈嘉庚君柬请厦门官绅商学各界前往与会，并备小轮招待。会场设在集美中学，招待所设在集美新建之大学校舍。

会场门首悬五色国旗，门柱结绿叶鲜花。场内正方中设演说坛，坛之壁上用鲜花结成“厦门大学开幕纪念”八大字，内悬“自强不息”四字。演说坛前设速记席，左便设外国来宾席，军乐队席，女宾席，大学生席，集美师中学生席，女学生席；右便设男宾席。莅会者，福建省代表冯守愚，教育厅代表聂文逊，厦门道尹陈培锟，税务司夏立士，大学狡长邓芝园，美国杜威博士，福州协和大学校长邓萃英，鼓浪屿英华书院校长洪显理，各界男女来宾，省十三中学童子军，及学生等计三千余人。

十时半开会，奏军乐。大学校长邓芝园主席，报告开办经过，略谓：陈嘉庚先生不辞劳苦，筹备两年，用尽苦心，始有今日大学开校之一日。此大学基本金八百万元，陈嘉庚君负担四百万，其余则由南洋华侨捐助。鄙人不揣冒昧，于去年十二月受陈君聘定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今先招学生二百名，一半是集美中学毕业，一半是由各地方送来者。陈君所负担之基本金，除建筑费开办费外，按年纳十二万元云云。报告毕，全体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学生全体唱国歌，大学生唱校歌。歌毕，校长邓芝园演说。略谓：大学之要务有三：（一）为研究学术。中国天然物产甚富，何至于贫，皆因工业不兴；工业不兴皆由于无制造之

新知识。故大学之要务，以研究学术为首重。（二）培养人才。中国有二万万方里之土地，四万万众之人民，何至于弱，皆由无人才之故。教育所以培养人才，国有人才，则无虑其不强。（三）教育与社会须联为一气。今中国所有学校多与社会相隔，故教育不能兴盛，社会亦长此闭塞。故学校必与社会互相援助，而后双方均有利益。此三种要务之外，尚有一种要务，就是自强不息四字。办此大学之人，均以精神贯注，无论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毫无懈弛，乃能获效。陈嘉庚君诚自强不息之人，观其已往，即可卜其将来。初办小学，继办中学师范，今办大学，其热心教育，有进无退，故此后办学，必无倦怠之心。余素崇拜陈君，尤望各界念陈君之苦心，互相协助。

继由校董陈嘉庚君演说。略谓：民国八年由南洋回祖国，因念我国地广民众，贫弱至于此极，欲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以救国家。因闻欲救国家及援助社会，当以教育为先。前年在浮屿开会，议办大学，佥议在演武亭建筑为宜，余即向道尹及思明县长请愿，给演武亭地址以资建筑。蒙道尹会同臧师长电请李督军，经督军复电照准，给予护照，拨演武亭四分之一为建筑地址。前年到香港请英国工程师计划建筑，英工程师寄函加拿大请图式，迄未寄来。去年旧历三月到上海，请美国毛工程师来厦测绘图式，美工程师办理大学经过甚多，至今年新历三月已绘就。建筑校舍至少须两年，待至两年始行开校未免太迟，今先在集美并校。但此次开校，甚为草率，备项均不全备。今已请准道尹在炮台边建筑工厂，下月即可兴工，俟明年建筑工竣，即将大学移厦。今聘来大学校长邓君，是鄙人素念其学问其深，又经各筹备员公推。邓君曾作北京高等师范校长，教育部参事。美国杜威博士及其夫人女公子与邓君同来，不胜荣幸。下午两点，杜威博士在此讲演，再二三日，即往香港广东游历。俟厦门演武亭校舍落成，再请杜威博士讲演。鄙人冒昧，已办小学，又办中学，今又办大学，然大学种种经费非予一人所能独力负担，尚须集腋成裘。惟先筹款而后开办，未免太迟，不如先行开办，此三五年之经费，鄙人可先牺牲，一面募捐补助，谅可支持。以中国与美国比较，美国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其大

学有四五百所，中国只有政府所设之大学，并无公立私立者。我国不乏殷富之家，然以金钱用于教育者甚少。教育普及，固可救国，然国人私心太重，恐五十年后尚未普及。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岂能久待？不如先将一部分之青年培养，亦可救国。但愿人人注重道德二字，自私自利之心丞宜捐除。学生当求实厚，不可以得一毕业文凭，遂自诩为莫大光荣，此求学者当切戒也。

继筹备员黄琬演说，略谓：鄙人为厦门大学筹备员之一，其余筹备员或在上海、或在香港，未尝来厦。今日大学虽已开校，然鄙人所负筹备之责任犹未告终。以正式校舍未建筑，种种设备未完全，鄙人尚须负筹备之责。今日中外人士咸集一堂，皆陈嘉庚君之热诚有以感动，鄙人最崇拜陈君以一己汗血之资创办大学。去年汪精卫先生在上海推邓芝园先生充大学校长，鄙人极表赞同。以邓君学识渊深，又识世界潮流，最为相宜。美国大学之多，经陈校董说过，不必赘述，即以欧洲之英法德意及东洋之日本而论，日本人口仅六千万，国立大学有四所，全国共有十余所，大学生达数万人，英法德意等国，均有二十余所，小如瑞士国亦有大学四所，中国大学合北京南京上海而统计之，不上十所。救国以教育为第一要素，南洋侨胞人人具有极大思想，有此大学，定必赞同云云。

继杜威博士演说，略谓：鄙人到此，有三种希望：（一）望在学人数日多，人才辈出，如太阳经天，光照世界。我美国亦不胜欣慕。（二）希望学术发达，为富国之根本。私立国立，当一同进行。（三）望到会诸君，须景仰陈君。中国人多自私自利之心，惟陈能公而忘私，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

继福建省代表冯守愚致祝词，教育厅长代表聂文逊致祝词。继陈道尹演说，略谓：上年中央教育部拟分区设立大学，有谓划闽浙为一区者，有谓划闽粤为一区者，当时我谓划闽浙为一区，其大学必设在浙江，若划闽粤为一区，则大学必设在广东，我福建必无设立大学之可望。今浙江广东大学均未设立，有陈嘉庚君竟以个人之力设厦门大学，今日已正式开校，鄙人

不胜欢忭。陈君诚有自强之志，自奉又极俭约，以金钱补助教育，鄙人尤为钦佩。望诸君目此大学为厦门大学，非陈君一人之大学，但须念陈君创办之苦心，永矢弗谖，此则鄙人所厚望也。

继则厦门税务司夏立士演说，谓我素崇拜创办人陈嘉庚君热心教育，诚能自强不息，我为陈君换一字，以强字换信字，陈君能自信其不息者也。继福州协和大学校长邓萃英君演说，教育会长李禧演说，集美师中校长叶采真演说，鼓浪屿英华书院校长洪显理演说，均表扬陈君之热心，及对厦门大学种种希望。次美国工程师详述受聘测绘之经过。谓下月即可动工，明年招生时即可落成。

最终邓校长致答词，奏军乐，散会。招待员引各来宾至招待所午餐，饭后摄影，各来宾随意到师范、中学、女子师范等校参观。

下午二时，杜威博士讲演《大学之旨趣》。略谓：我今所说，为中国大学之问题，即是发达学者之能力。中国天然物产甚丰富，或贷弃于地而不知采取，或以天然物品售诸外人，待其制成有用之物，转售中国，此为一种大漏卮，皆因无能力之故。譬如中国煤炭甚富，若尽行开采，可供全世界之用。无人开采，则千百年仍蕴藏于地。又如乡间沙漠之地，充人灌溉，无人种植，虽千百年仍无生产。中国人如无教导，则永不能发达其固有之能力。以厦门观之，中国人非无能力，如菲律宾、新加坡、槟榔屿、泗水、苏门答腊、仰光，以及美洲、欧洲、日本之华侨，以闽粤为最多，亦有经营许多大事业以援助祖国者。中国之不强，皆因能力不发达。欲发达其能力，必自教育始。学校养成之人才，对于国家之关系有二：一是道德，一是工商业。工商业之发达，即由学问而来。现在中国人之学问，较前清大有进步，如电线、铁路、飞机等项，中国皆有。有知识而后能发达工业，欲发达其知识，必先研究科学。中国人之勤苦，为世界所公认。今中国人所少者，惟新科学。欲以新科学发明新事业，即在此大学研究。尚有一层，中国人之通病，在界限太分明，南北已分界限，又有各省各地方之界限，大学当捐除此等畛域。中国人尚有两

种病:“病在不用功,一病在用功过勤。不用功之病固不待言,即用功时,对于世界激流不知应付,仍是不完全之人。外国人有知识,尤知知识之作用处。若专用功以求知识,而不能用于国家社会,何益之有。现今欲驱逐腐败之人,必先有驱遂之能力。智育体育之外,尚有许多要务,望学生自家研究,就中尤以养成公共之能力为最要。愿学生于功课之余,练习此公共能力,以养成完全之人才,是则鄙人所厚望也云云。

继杜威夫人演说,题为“女子教育之必要”。杜威夫人演讲毕,大学校长邓芝园谓:今回厦潮时已届,诸君可乘小轮回厦,杜威博士及夫人今晚在厦门青年会演说云云。遂奏乐散会,时已四时半矣。

(载《申报》1921 年 4 月 16 日十七版)

本校五周年纪念会之演说辞

◎林文庆

今天是本大学五周年纪念日。我们大家都很欢喜,所以趁这机会同诸君研究研究将来的希望。但要希望将来,应先回顾以前的经过怎样,现在的情形怎样。

我很欢喜,去年我们学校里除略受五卅案的影响外,其余都很平静。上海广东的惨案发生后,很影响到全国。关于教育商业工人方面,中国受极大的损失。后来又引起战事,全国的大局到处骚动,现在还没有全国承认的中央政府,没有一省完全平静。人民全失了所应享的幸福,不能安安静静营业。有很多地方,连生命财产都不能保,自由平等更不必说了。各省统兵者公然劫掠人民,人民无可逃避。我们看了全国这样的现象,回顾我校,真是无上的幸福哩。想许多学校,关门的关门,解散的解散,就是不至于关门解散,也大概经费缺乏,勉强敷衍。独本校还能积极进行,力谋扩充。因此我们不能不格外感

谢陈嘉庚先生对于本校的热心毅力。经费非仅足用而已，且常常有超过陈嘉庚先生已经应允之巨款，亦无不承认。所以本校进行全无妨碍；即有妨碍，亦非经济的问题。或为大局的不靖，各方意见的不一，所以往往要快不能快。这是我觉得很困难的。譬如建筑新校舍，我们建筑的钱是有了，但是计划还是不能实行，因为地基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过我们总有希望，这种困难渐渐减少，就慢些也无妨，因为可以稳当一些。譬如图书馆，如随便草创，去年九月就可动工。就因为想费了巨款，总要有详细的计划，所以图样至今还在请专门家研究，有种种的新意见可以采用哩。

去年教职员学生的行动及态度均很好，因为他不为爱国运动而抛弃自己的职务。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欢喜，前途的希望更大。至于中国的前途，我们假使没有实在的宗旨和毅力，几乎失望。但是中国的病总是要医的，所以趁此机会请大家研究。我看病是已经很重了，所以处方要仔细。救中国的方法很多，今天不能全讲。但大学教育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能够养成全国的领袖人才。所以大学的教职员及学生，对于国家都有很大的责任，应当格外要研究。

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问题社会上的人，各种报纸常常有得研究。现在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一）富国，（二）治安，（三）与各国平等。但这些问题不是大声疾呼得到的，也不是各处骚动可以得到的。虽然我们各处的国民运动很多，不过建设的方法却很少。我看这个方法是很容易，亦很旧，只要能够实行《中庸》上说的“三达德”就行了。第一，富国是经济问题，是关于智的；第二，治安，是仁；至于要同各国平等，则非有大勇不可。但智仁勇三者，非有相当的旧道德涵养是不能得到的。所以要救中国，先须养成人格，没有人格，就没有法子。但人格何来呢？自古在家庭中得来。家庭教育自治家起，家能治，国才有希望。而治家之根本在修身。修身虽个人之事，而亦在家长的有无教育。故救国之根本在普及教育。普及教育何来？在学校。学校之希望在教员。教员之陶冶成材在师范大学。中国无礼拜堂无寺院，所以全靠有相当的大学

指导人格教育，养成全国的风气，使人人为君子。如此看来，大学教育应该德智体三方面完全的，不应偏于一方面。所以在大学里，应该研究历史、哲学、政治、社会、风俗、习惯等，使知中国有很久的文化，我们当用何种方法使他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忘却中国有特别的情形，与欧洲不同。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完全中国的，不象欧洲各国互相参酌的，可以互相借用。因为他们同出一源，同是希腊、罗马、希伯来的文明。我国四五千年文明全在旧的经书里，如《大学》所谓平天下之道，《礼运》所谓大同之世，为西洋各所万想不到的。罗马算是与中国最相近，但细别起来，还是相差很多。所以我们学外国文化，不能完全仿效他。比较上，我们所缺乏的是科学，除外我们都很好，不要破坏了，只可略为修正。日本很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的维新马上成功，今天居然列在五大强国之内。我们须照他去做。学科学不要忘却了旧文化，这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国内各大学应负责提倡，使全国之人明白。国之希望在民，人民能照天理做，自然能存。否则一无办法之愤激，是无用的。《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现在国内象本大学这样设备完全的还很少，所以我对于本大学有无限的希望。孔子所谓"斯文在兹，天必不弃我"，愿与诸君共勉之。

（载《厦大周刊》第 145 期，1926 年 4 月 10 日）

勗勉同学词

◎萨本栋

厦门大学改为国立，本栋谬蒙国民政府简命，来长斯校，视事伊始，即值全面抗战爆发。比以厦门原校址，位在敌人火线之内，奉令迁徙，复承校内外人士仗义协助，厦大得以弦诵不辍，略副国府抗战期中绝对维持各级学校课业政策。公私感幸，曷可言宣。兹值本大学成立十七周年纪念之辰，自愧数月

以来，毫未建树，爰将平日律己待人及治学处事之一部份信条，胪列数则于后，愿与诸同学共勉之！

一、自奉应俭约，工作应紧张，但不可伤及营养或害及卫生。

二、对于国魂所寄托的事业，资助务必慷慨。

三、不应互相攻讦，做出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情。

四、在艰危中，须特别努力份内职务，务求无负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及政府将厦大收归国立之至意。

五、应先用客观的态度，观察并分析民众的痛苦，以作课余及假中下乡训练民众的南针；要记得衣食足而后知廉耻。

六、对于正在试做中，而成绩尚未表现的事，千万不要大吹大擂。

七、举办一事，不要以首创者自诩；做完一事，不要以成功了自满，应牢记本校校训“止于至善”。

八、居于任何行政地位，应蹈规守法，切勿破坏行政系统。

九、到了一个新地方，要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再谋改革方法，不要自视太高，目空一切。

十、移入乡村，不当常说“这地真糟，什么东西都没有”；应时时想“此处尚好，还有不少人物”。

十一、因负责做事而遭人毁谤时，毋须灰心，要知道时髦的骂人艺术是“不骂不如己者”。

十二、对待诚恳的人，办法只应一个：就是同他一样诚恳；对待狠心的人却有两个方法；如果你能狠心，那末，不妨使用更狠的手段；如果你狠不下心，最好用诚恳的态度去感化他。

十三、不要因为韩复榘而小看了我国抗战的军人；不要因为汤尔和而骂尽所有留日学生；不要因为郑孝胥而怀疑个个福建人；也不要因为傀儡剧演员中，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就自毁敌人视为眼中针而方在萌芽的我国高等教育。

十四、青年可用理智来训导，不可用地位或势力来压迫。

十五、学习教育的同学们，要知道教育要有政治的头脑，但不可作政治的活动。

十六、学习政治的同学们，将来上了政治舞台后，要善用教

育原理与教育心理，但不得干涉教育行政。

十七、以纯粹科学为终身事业的同学们，若被诘问所学有何所用的时候，可坦然的答复“政客们将来由此征收税款”，这是法拉第氏研究电磁现象时回答英国首相的不朽名言。

十八、从事高深学术或技能研究的同学们，要记得现代的技能不限于美术，现代的学术绝对非八股；八股与美术可在异族盘据中发展，而有关民生国防的学术与技能，都不是敌人铁蹄下所得以自由研讨的。

十九、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要知道我们对暴日只能“抗”战而不能作“惩罚”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学术至今尚未独立，我们民众技能的水准几百年来未曾提高。

二十、要思想纪律化，最好去研读数理；要知道祖国的可爱，应当温习史地；语文不通顺的人，在学术界不会有地位；不动手做实验的人，休想控制大自然，以造福于国家及人群；这些是厘订本大学第一年课程的基本哲理，同学其善喻斯意！

（载《唯力》旬刊第三期，1938 年 4 月 3 日）

《唯力》创刊号献词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困难眼看着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一八一二年九月失去莫斯科以后的俄罗斯；是为抗御德军侵略失去布鲁舍拉以后的比利时；是初期民族解放战争遭受挫折而失去君士坦丁堡以后的土耳其。啊！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确实已步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危机。

在这国族存亡的关头，救亡的责任，紧压在每个中华国民的双肩，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不能逃避这大时代艰巨的责任。想着前方几十万成仁的战士，和正在与敌人苦斗而准备作壮烈牺牲的多少民族菁英；想着一万万以上沦为敌虏而尝

尽了亡国奴惨痛的同胞，每感泣涕零，不能自已！在后方的同胞，暂时虽未克身临前敌，与诸将士共甘苦、均危难；然在后方的知识青年们，其负有救亡宣传的责任，却是何等的重大啊！

困难的严重，爱国的热情，救亡的责任和良心的驱使，使我们于课业外，不能不勉尽我们的力量，去干救亡的工作。故在这神圣的认识上，我们自随校迁入内地后，更努力于救亡工作。现本团出版期刊，其目的：一方面翼将平日研究学术之一得，公诸社会；他方面是要把我们心坎里救亡的呼吁，从文字上广播给本地民众和全国同胞。本团同人愿用我们的笔，尽我们的能力在大时代里说“良知”所要说的话，做“良能”所当做的事；同时希望一般知识青年们，救亡同志们，尤其负有领导民众运动之责的地方当局们，要切实担负起救亡的责任。

现在，抗战是到了最紧急的阶段了，我们相信：这伟大而艰巨的工作——中国民族解放战争——是不能全靠前方少数战士所能胜任的。我们的战争是全民抗战，唯有全体民众动员起来，唯有集合全国的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才能打破中华民族的历史难关。本刊以《唯力》为名，其意义就是在此。

生活在大时代里的同胞们！我们大家要团结一切力量，并以负责的态度，必死的决心，来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请看下面这些历史上曾经艰苦奋斗的国家，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殷鉴：俄罗斯在莫斯科失陷后的当年十月，展开了一次疾风样的扫荡战，直逼莫斯科；比利时在全部毁灭之余，终于还是光荣地复兴立国；土耳其在历尽艰难挫折以后，完成建国大业。只要全国同胞具坚强的意志，在拥护中央政府、信仰三民主义和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抗战到底，则中国的前途定是光明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定是胜利的！

（载《唯力》十日刊第一期，1938 年 3 月 13 日）

怎样做一个大学生

◎王亚南

首先代表学校，对你们参加厦大学习表示欢迎，并祝贺你们大学生活的开始。

怎样做个大学生，即怎样做个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学生：

一、做个人民大学的大学生是光荣的、幸运的，但很不容易

1.人民的大学

你们所住的学校，是人民的大学，是与过去的大学有区别的。过去的大学是买办资产阶级子弟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为了统治压迫剥削人民的。今天就不同，我们是为工农阶级的，而训练出来的人是为人民服务的。

今天我们所在学校是个综合性大学，不是工业大学，农业大学，而是综合性大学。不同地方是培养的目标不同。工农科培养工农业所需技术人才，师范培养教师，综合性大学主要是培养研究人员，科学研究人才。我们学校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人才是做些什么？即研究工农业、历史等方面问题的，你们将来就是要培养成为科学家。

厦门大学是全国二百三十个大学之一，是全国综合性大学十三个之一。这所大学是1921年设立的，有三十三年的历史，是由华侨陈嘉庚创办的，现在是国家的，但原创办大学的陈先生还在帮忙我们。在地理上处在祖国国防前线，这是厦大的特点，今后的学习过程中间，对敌人斗争是其它学校所没有的。但我们有巩固的防空设备，有强大的解放军保卫.，严密的防空组织。

过去，新同学入学时，老同学欺压之，现在你们来了，老同学是热烈欢迎。教师过去是不管同学的，但现在你们也可以看

到教师如何在指导你们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们是人民输送到大学里来的，培养你们将来为人民服务的，从人民立场来培养帮助你们的。人民大学在各方面都表现培养人民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2.为什么是光荣幸运的

所谓光荣是今天的社会制度不一样，是人民社会人民国家，你们进入人民的大学是光荣的事情，要培养成为国家建设干部，你们都是未来的干部，在每个人都是光荣的，而且是幸运的，今天能在这样大的房子里学习，全国有多少在工厂、农村辛苦的劳动者。比例每二千人只有一个大学生，很多劳动人民希望提高文化，都没有机会。另方面国家培养到你们毕业时就分配你们到国家建设岗位上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日本有十一万大学生，只有一万二千多人得到工作。今天我们如在蒋介石统治下，是有很大部分不能进大学的，这就是光荣的，幸运的。

但做个大学生是不很容易的，以往的大学生多数是地主家庭、资产阶级子弟，多数是凭资格，学好学坏都没关系。今天就不同了，今天学习是要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社会主义建设干部，就不仅要求有很好的业务科学，还要有社会主义品质，所以今天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合乎规格的人才——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条件。只有学好，不能学坏，所以不很容易，但好好学是不很难的。

二、明确为谁学习，解决学习立场问题

1.个人与家庭的关系

有很多人不明白我们学习为谁？有的人是为个人前途，家庭愿望，过去升大学为升官发财，扬名显亲。

为个人家庭与为国家是否有抵触？这是有抵触的，但也可说没抵触。有抵触：从个人家庭出发就有抵触，从国家出发就没抵.触。因为从个人出发是为了扬名显亲，而今天学习是为人民学习的。如果你的学习是为了满足个人与家庭的要求，那就

不能担负这学习责任。相反地你能端正学习态度，以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学习，你就有前途，同时也能满足家庭希望。这出发点是很重要的。

学校的老师要耐心地帮助你们，教你们也是为了人民，因为我是从国家事业出发。

2.我们应该从国家立场出发

今天进大学与过去不同，过去进大学是有特权享受的，今天进大学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劳动人民所养活的，进大学是劳动人民培养的，每一个大学生要劳动人民一千五百元，今年学校预算将近二百万，人民大学是劳动人民委托我们来学习的，明确了这个问题，就能明确我们是为谁学习。

3.为劳动人民学习的观点立场带到学习生活中去

助学金问题不是取消，是改变。在1952年—54年实行全国助学金后，群众有意见，所谓助学金是说经济上有困难的给予帮助，因此人们对这制度有意见。

今年改变的原则：助学金是帮助经济困难的，多困难多帮助，不困难不帮助，一般的视其经济条件申请，好的不申请，困难大的多申请，困难少的少申请，这里问题是要查清真正困难的，日常用费，书籍费都可以申请。从十月份起开始实行。

三、学习什么？向谁学习？

1.学习是要专心专业学习

所谓专业是从这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工业、农业、文化、科学、思想等方面的建设。在经济建设方面就有会计、政治经济、财金、贸易等专业，生物系就有动物、植物等专业，所有专业都是适合于国家建设的要求，满足这要求，即对准国家的口径。

专业学习就要有专业思想，就是专一，只有专一专心才能学到专门知识，否则就不能满足建设需要。

2.政治思想教育

政治思想教育就是社会主义教育，没有社会主义教育是学

不好专业的，学出来的人单是纯技术观点，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教育包括包级教育（观点，立场的问题），劳动观点，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品德。

社会主义劳动。学校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劳动，除了学习外，还有许多社会工作，阶级观点，集体主义精神都要努力培养。这不仅在书本知识上学，而更重要的要亲身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过去好一些的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今天这样的学生就是读得很好也不是好学生。因此大家应争取社会工作。

3.文体活动

学校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我们做好“三好”，也是为了更好地学好专业，更好地为人民工作，学校有很多的党团学习都是很好的，应向他们学习，向学习好的同学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

四、怎样学习，学习方法问题

各门科学都有其特点，特点不同，方法也不同，今天只能讲个共同的方式方法。

1.实事求是

这是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我们学习上如果好高骛远，不善于循序渐进，这是不对的，科学本身是由浅入深的，学校的学习也是根据这原则来进行学习的，我们就应按这计划进行学习，不要漫读，漫读是劳而无功，应好好的打好基础。

2.把握重点

一门课，一部书，某一章节都有重点，要抓住其中的论点，许多人学习方法是零碎，支节、重点搞不清楚。把重点集中联系起来，就是科学的系统知识，否则的话，仅能学到片断知识，这样是不能成为专家的。

3.联系实际

现在所学的是些概念，学过的东西如不与实际联系起来，那知识是概念化的知识。怎样联系实际？必须联系到日常的学习生活。同学们的互助，教师的关心等具体事实是说明今天

的学校是个人民大学。这样就不会使人民大学概念化。

4.应注意几点

(1)养成记笔记,用工具帮助锻炼思考、记忆。

(2)学习生活要有次序。

(录自厦门大学校办档 56—11,1955 年 9 月 1 日)

参考文献

厦大周刊

洪永宏编著:《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厦大校史资料》(第一辑至第四辑)。

华侨博物院编:《陈嘉庚文集》(1—6集)1994年印。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印行。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高伟强、余启咏、何卓恩编著:《民国著名大学校长1912—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严春宝著:《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王豪杰主编:《南强记忆——老厦大的故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陈武元主编:《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16、29、30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顾颉刚日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版。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沈世豪著：《陈景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朱双一著：《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后　记

写完“往事”的最后一句，十指在键盘上方使劲捏了捏，腰往后猛力一伸，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指示的时间是 4:20，这是 2011 年 3 月 14 日的凌晨，离厦门大学 90 岁生日仅剩 23 天的时间，而这部《厦大往事》是必须在这之前出版的，我与出版社只得采取分三次送稿审稿编稿的战略战术。昨天下午 3:00，出版社蒋东明兄发来一个短信：“朱老师，十万火急！明天能完稿吗？”我向他再次表示“抱歉”后，就给自己下一道“一定完成”的“死令”。我出版了十几部著作，是从未有过如此情况的。

四周是如此的寂静，整个厦大海滨东区的房间都是暗的，不知是谁家有了梦中人，叽叽咕咕几声之后便又恢复了原本的宁静，此时，我却一丁点的睡意都没有了。

我写这本书是很有感觉的，甚至常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每一次的下笔，我的笔底就会升腾起这 100 多年来我们民族从内忧外患中自强崛起的风云。中国的现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风雨历程而成长壮大，素有“南方之强”之称的厦门大学，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初衷到她一路走来的整个历程，都与我们民族的现代命运息息相系，那一步步的脚印，是如此的值得后来者记忆；每一个故事的叙事，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一个个历史的面影，他们或忧或喜，或怨或恨，却相互钩挂在一起，牵着手从风雨荆棘中踏出一条阳光道。历史长河中溅起的浪花，是如此蕴藏着厦大人的喜怒哀乐，如此的魅力有趣，如此的让人永不忘怀。

如果一定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我的写作姿态的话，那就是“以学者的态度，用文学家的叙事，坦呈厦大人的情怀”。

我要让我笔下的人物、笔下的故事，乃至那一个个有意味的细节都回到历史现场，有根有据的存在。从 1995 年我负责重新布置鲁迅纪念馆、撰写纪念馆的文字开始，我便与图书馆里那一摞摞尘埃覆盖的《厦大周刊》之类的宝贝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成为了厦大先人们的日记、书信的阅读者。这之后，我又两次接手了鲁迅纪念馆的修葺整理和重新开馆工作，写了厦大建校 80 周年的电视专题《光荣与希望》和一本《海上花园学府，中国南方之强》的小书；校庆 85 周年的时候，我又撰写了电视专题《中国厦门大学》和校史展览馆中 1919—1949 年时期的文字，参与筹备复办厦大国学研究院工作。这些工作，让我一次次地钻进了厦大往事的隧道中，触摸那一个个在现代中国教育时空中游动着的灵魂。2002 年，因为厦门要拍摄 6 集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陈嘉庚》，作为撰稿者的我又走访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当年的陪都重庆和红色的延安，将校主陈嘉庚的材料一股脑地抱回家里，抱进脑袋里。之后，我开始在学生中做一些校史故事的演讲，也开始写一点像《南强作家谱》（连载在香港《文汇报》和《厦门文学》上）那样的短文。到 2010 年春天，厦大 90 周年校庆开始走进了厦大人的视野，当时负责校庆筹备的辜芳昭同志找上我，除了策划校庆一事外，他说："你这次一定要把厦大故事写出来，我们应该有一本厦大人爱看的厦大书。"这句话把我的心搅动了，于是我动笔了。我原本并不想在书中作注释的，因为我写的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本要让人爱看的历史往事。但写了第一节之后，我改变了主意，我必须让我的文学情怀与历史叙述结成孪生兄弟，我写的是历史中真实的人真实的事，是人的情怀和真实故事中的厦大历史。我还是作注释了，来自于故事主人公原本的日记、信函，来自于厦大人的回忆录，还有那一堆厦大的过刊与洪永宏先生编辑的几部《厦大校史资料》，更有我 30 年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的专业积累。

但我不是在写历史，我是在尝试着一种有情感的有联想的但不是想象的叙事，这是史学家所忌讳而文学家所热衷的。我不敢违背客观的存在，但我并不会作编年枯燥的实录，我要让

文献让人物让那些事儿重新活跃起来，生动起来，重新走进他们原本生活的日常场景与情感世界里。我关注的是厦大往事与近代那些风云人物的瓜葛，叙述的是陈嘉庚与李厚基的巧斗、与邓萃英的纠葛，是他为何首选汪精卫为校长以及与汪精卫由友到敌的历史变故；是林文庆创办国学院的欣喜与烦恼、萨本栋的治校二三事、王亚南寺庙孤灯下《资本论》翻译志向的萌生；是鲁迅在恋爱与无聊厮守中的寻路，是林语堂的厦门情结、施蛰存的仗义执言、徐元度的笔名、彭柏山的罹难、余光中的骑自行车，乃至姚一苇、范筱兰的防空洞事件等等。作为一个在厦大学习生活了 30 多年的厦大人，这里面有我对厦大历史的理解，有我对厦大文化与精神的探寻，有我对 100 多年来中华民族沧海桑田的追问。

但这本书是有很大遗憾的，在我的资料仓库里，我实际上已集聚了一批关于厦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其他领域的那些人那些事，那里有我很钦佩的人物我很喜爱的故事，他们是厦大往事的重要组成，但我的这本书还是没能写到他们，不仅是因为时间，还因为我需要更多地更近地走进他们的世界，但愿以后我能补上这一课，能弥补这次的遗憾。

由衷地感谢出版社的蒋东明社长、董兴艳编辑，还有其他为这本书工作的朋友，我拖累了你们，你们为本书所付出的劳动和实绩我是不会忘却的；感谢我的妻子，几十年来她就这样默默地陪伴在我的身边，让我如此没有任何其他忧虑地去做我该做要做的事情，去专心地爱我们的厦大，我的学生、我的同学和朋友，没有一个不是尊敬她的。

2010 年 3 月 14 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厦大往事/朱水涌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3(2015.1 重印)
ISBN 978-7-5615-3856-2

Ⅰ.①厦… Ⅱ.①朱… Ⅲ.①厦门大学-校史 Ⅳ.①G649.28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188 号

K0483-1-3 K0483-1-3 K0483-1-3 K0483-1-3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 编 办 电 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 @ 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787 × 1000 1/16 印张:17.25 插页:4
字数:230 千字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